

话说华州

❧ 华州故事丛书第一辑 ❧

渭南市华州区地方志编纂中心 编

主编 ◎惠文波 闫广勤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话说华州 / 渭南市华州区地方志编纂中心
编. — 西安 : 三秦出版社, 2019.12
(华州故事丛书)
ISBN 978-7-5518-2104-9

I. ①话… II. ①渭… III. ①民间故事—作品集—渭南 IV. ① I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69104 号

话说华州

渭南市华州区地方志编纂中心 编
主编: 闫广勤 惠文波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雁塔区曲江新区登高路 1388 号
电 话 (029) 81205236
邮政编码 710061
印 刷 中煤地西安地图制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2104-9
定 价 128.00 元

网 址 <http://www.sqcbs.cn>

前 言

华州区地方志编纂中心主任 惠文波

华州，六山一水三分田，风光秀丽，物华天宝，民风淳朴，文脉绵长，是中华文明主要的发祥地之一。在这胜绝之区，先民们与时代同行，奋斗不息，曾上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剧：有战胜自然、开辟家园，不屈不挠的生活剧；有金戈铁马，你争我夺，狼烟滚滚的战争剧；有故事情节曲折，出神入化的传奇剧；有政通人和，田园牧歌，风调雨顺的喜剧；还有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天灾人祸的悲剧。你方唱罢我登场，循环往复，永无终止，有些甚至影响到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走向和进程。

然而，时过境迁，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更替，古老华州那些精彩的历史画卷、一代代华州人曾经的过往与辉煌，大多湮没在历史的烟云中，鲜为人知。为了使今人获知华州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概貌，以及鲜活生动的历史情景，华州区地方志编纂中心本着追溯历史渊源、体验风俗民情、展示自然景观、介绍人物古迹、歌颂人物精英、讲好华州故事为宗旨，立足华州，以地方志工作者特有的严肃态度和负责精神，用新特视角和文化人的品位，对这块热土上的独特风物进行了充分的挖掘和再现。作为《华州史话》和《华州古今》的姊妹篇，我们在内容选择上进行了甄选，力求补县志不足，写“史话”和“古今”之未言。此书稿件大部选自华州区人民政府网、华州区志办（华

州区地方编纂中心)所编辑印行的《华县志苑(《华州志苑》)、少部分为投稿。力求将思想性、学术性、可读性融为一体,全部为原创。此书为《华州故事丛书》第一辑,随后区地方志编纂中心将深入挖掘整理,将《华州故事丛书》继续编辑出版。

《话说华州》起步于2018年6月,2018年11月形成初稿,2019年8月送审。全书约30万字,分14个板块,全面展现了华州的历史渊源、风土人情、人文积淀,以期唤醒那些沉睡已久的记忆,激发人们热爱家乡、记住乡愁。

闫广勤,这位原地方志老兵,将大半生精力投入到地方史志研究的学者,欣然担任主编,他以广博的文史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废寝忘食的工作精神,以及对县情区情的熟稔把握,为本书的成型倾注了大量心血。地方志编纂中心的全体同志,更是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对本书全力以赴倾情打造。一些关心华州方志事业、热爱华州传统文化的团体单位、仁人志士皆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也得到了中共华州区委书记王海峰,华州区人民政府区长高波涛等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我谨表示诚挚谢意。

由于众手成书,加之时间仓促,纰漏与不足在所难免,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2021年6月



目录

村庄采撷

八里店与三合村·····	邵拉雄 /3
漫话兴国村·····	邵拉雄 /6
蒋家堡记事·····	蒋文正 /9
魏家塬风貌·····	魏宪文 /12
话说寺城子 ·····	郭轶栋 /15
如诗如画又一村·····	郝庆年 /17
李坡轶事·····	张 文 宋朝峰 /21
“老官台”漫话·····	秦 寂 /25
华州区部分村庄的村名来历·····	闫广勤 /28

名镇风采

历史文献中的“赤水”·····	闫广勤 /39
赤水怀古·····	蒋文正 /42
红色古镇——高塘镇·····	郭轶栋 /46

昔日高塘街·····	魏宪文 /49
从“柳子镇”到“柳枝镇”·····	闫广勤 /52
钜都明珠——金堆镇·····	谷 鹏 /54
华州区各镇（街道办）的名称来历·····	闫广勤 /57

风景名胜

华州八景·····	闫广勤 /63
少华山极顶·····	闫广勤 /70
蟠龙山和潜龙寺·····	秦 寂 /74
漫话西溪·····	秦 寂 /77
杜甫在华县的遗闻·····	杨步奇 /80
漫谈移山潭·····	闫广勤 /82
华州唐槐·····	闫广勤 /87
华州公园里的“棲雲樓”·····	秦 寂 /90
华州公园西门外的“华彩”雕塑·····	闫广勤 /92
历史文献中的“桥峪”·····	秦 寂 /93
风光旖旎的桥峪·····	邵拉雄 /95
华州圣山古八景·····	雷凤侠 /99
高塘竹海·····	王红旗 /101
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石 娟 /97

人物荟萃

- 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郑桓公····· 闫广勤 /109
- 从“脱靴断镫”话清官崔戎····· 雷凤侠 /112
- 清廉刚正的东汉····· 王小军 /114
- 华州在明清时的几位廉吏····· 闫广勤 /116
- “能办事方称循吏，不爱钱便是好官”——华州知州万家霖·· 王小军 /119
- 金石学家郭宗昌····· 闫广勤 /121
- 顾熠山传····· 闫广勤 /128
- 顾熠山的《重修华县县志稿》····· 惠文波 /137
- 古生物学家杨钟健····· 闫广勤 /142
- 高克林与《鲁忠才长征记》····· 雷凤侠 /145
- 华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李连璧····· 邵拉雄 /148
- 陕西省农业劳动模范张孝义····· 闫广勤 /150
- 群众美术教育家阎新立····· 刘合心 /152

郭子仪研究

- 唐代名将郭子仪····· 闫广勤 /157
- 郭子仪的政治智慧····· 秦 寂 /160
- 郭子仪故里风物散记····· 闫广勤 /164
- 华州区的郭子仪后裔····· 闫广勤 /170

- 汾阳王郭子仪的“汾阳”，与汾阳县无关····· 秦 寂 /173
- 华州郭子仪····· 闫广勤 /176

文物考古

- 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华州文物····· 闫广勤 /181
- 郭暖墓在何处? ····· 闫广勤 /183
- 李元谅功德碑····· 秦 寂 /185
- 赤水桥上桥的上桥建于何时? ····· 闫广勤 /187
- 华州文庙····· 秦 寂 /189
- 北京的华州会馆····· 闫广勤 /191
- “五间厅”漫话····· 秦 寂 /193
- 华州西岳庙——下庙····· 刘合心 /195
- 华州区出土的明朝郭宗仪棺槨····· 闫广勤 /198
- 明朝东思忠墓志铭····· 马振刚 /200
- 明代华州井濂买地券考略····· 赵建文 /201

史海钩沉

- “华封三祝”辨误····· 闫广勤 /207
- 三筑华州城 ····· 秦 寂 /209
- “华州”趣谈····· 闫广勤 /213
- 漫谈《打金枝》····· 秦 寂 /217

郭太后的荣耀与悲剧·····	闫广勤 /220
少华山、“九纹龙史进”及其原型·····	秦 寂 /225
少华山崩与王安石变法·····	赵建文 /227
蕴空禅院的历史与传说·····	闫广勤 /231
明朝四溪绕华州·····	宋朝峰 /233
咸中历史笔谈·····	闫广勤 /235
记述华州历史的三则讹误·····	闫广勤 /249
华州区的别称——咸林·····	闫广勤 /252

回忆纪实

华县解放初期的干部工作作风·····	刘耀明 /255
入社前后的回忆·····	刘正军 /258
故乡的“官路”故乡的桥·····	刘正军 /260
火热的工地 火红的青春——参加华县桥峪水库工程建设的记忆	杜明科 /268
瓜坡，那曾经的古瓜田之地·····	雷凤侠 /272

民间艺术

古老的民间艺术——华州皮影戏·····	贾平京 /277
面花花的世界·····	张潇娟 /283
清丽曼妙的华州秧歌·····	黄 玮 /286
华州背花鼓·····	黄 玮 /290

民风民俗

- 大年醇似酒····· 郝庆年 /295
- 正月十五上元灯节····· 郝庆年 /299
- 追望、看麦罢····· 雷凤侠 /301

物产小记

- 华州蔬菜种植的历史 ····· 闫广勤 /305
- 华州中草药漫话····· 雷凤侠 /311
- 赤水小吃····· 蒋文正 /314
- 关中华县大布与“织女” ····· 杜明科 /317

诗文华州

- 华州的历代诗歌····· 闫广勤 /323
- 唐代诗文中的华州风物····· 闫广勤 /330
- 名家论杜甫在华州····· 秦 寂 /333
- 华州大地的“帝王之声” ····· 殷小明 /336
- 北宋文学家李廌····· 秦 寂 /338
- 华州颂····· 闫广勤 /341

华州新貌

- 华县撤县设区的历史变更····· 雷凤侠 /345
- 大美华州····· 殷小明 /347
- 太阳照在渭河大坝上····· 雷凤侠 /350

传奇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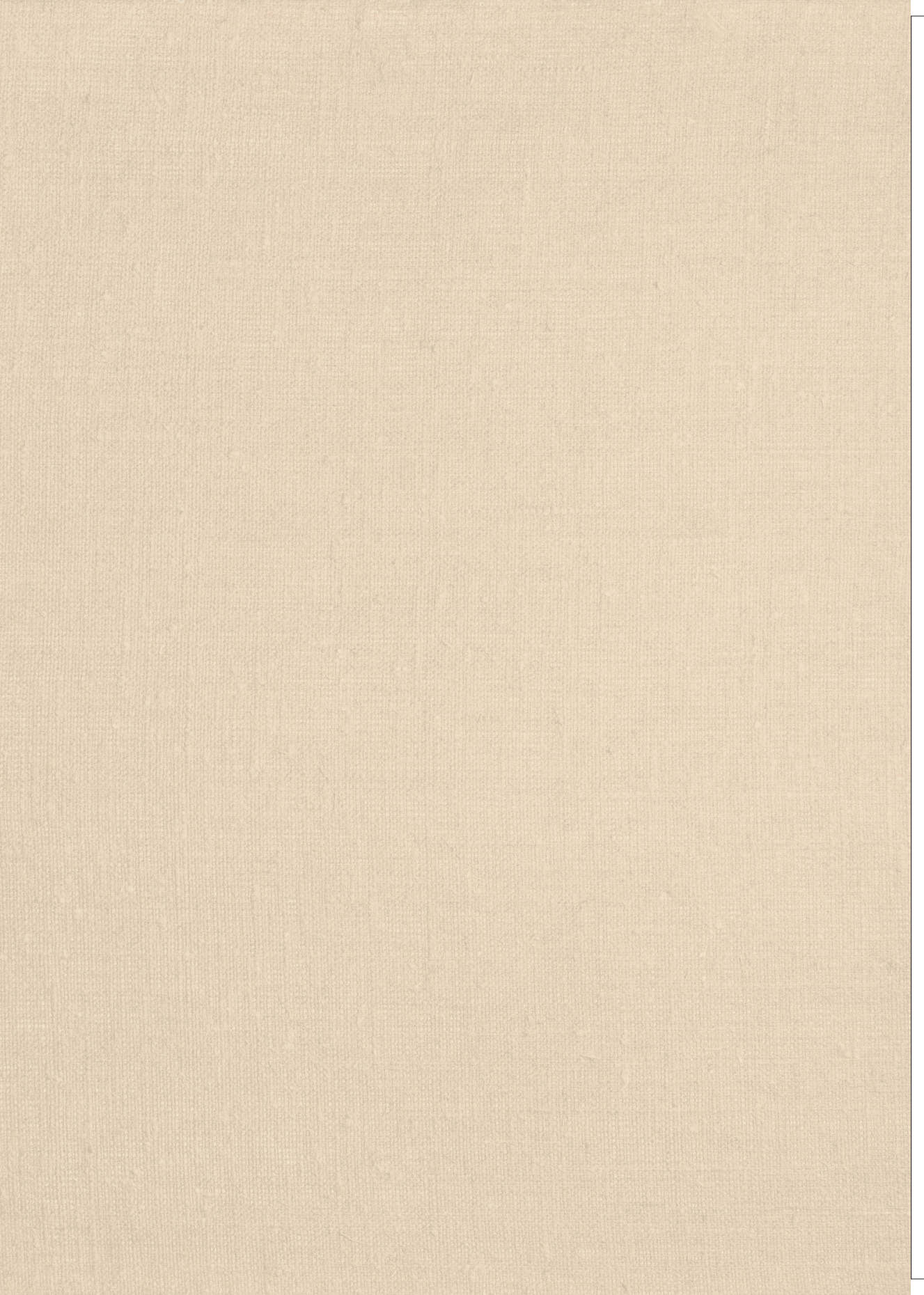
- 凤居山与鸾凤神鸟····· 秦 寂 /355
- 赤水河与周处除三害····· 翟羽佳 /357
- 唐代华州“人鬼情未了”的传奇····· 闫广勤 /359
- 陈抟老祖在华州的传说····· 闫广勤 /362
- 少华山崩的历史和山塌金斗王的传说····· 秦 寂 /364





村庄采撷





八里店与三合村

邵拉雄

八里店与三合村地处莲花寺镇境内的小敷峪，即现在的少华山森林公园主景区。两村以娘娘庙后面的香炉石山坡为界，上为三合村，下为八里店。



八里店旧貌

八里店，因地处进峪八里的地方，故名八里店。三合村是由农业合作化时的永丰十一、十二、十三社合并成三合生产大队而得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八里店叫大河村，三合地面有苍坪村和华阳村，均隶属二区（柳枝区）六乡（白家河乡）。1956年农

业合作化，村改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永丰命名。1957年4月属罗纹乡，又分别改称八里店生产大队和三合生产大队。1958年8月属莲花寺乡，9月，属华锋人民公社。12月，华县建制撤销，属华州人民公社小敷峪管区。小敷峪管区最小，就管这两个大队，管区设在八里店河西三间草房里。1961年华县建制恢复，属莲花寺人民公社。八里店大队部设在东崖底，三合大队部先设在燕子砭，后迁至石门内河东小坪。1984年以后，大队改称村，公社改称乡镇，两村属莲花寺镇（乡）。

早些年，山区居住简单行路难，自峪口向上五里，依次有三个造纸厂，备有骡马运送青竹、火纸。两村共有二三百户、两千多口人，分散居住在沟沟岔岔、山山崂崂，多住草房、石板房，瓦房极少，有的甚至住在茅草庵子或山洞里。



八里店村包括上厂、大河、雄岩、牛头四个村民小组。三合村包括沙马、苍坪、燕子、天崖四个村民小组。两村耕地面积少，八里店仅有杨家山、吴黄二岭、雄岩沟、东西牛头沟，三合村仅有闫家坡、燕子沟、洞沟岭等少数相对平缓的坡地可耕，余皆为沙土、浪石山坡地。早些年，居民惯用刀耕火种，以破坏森林为代价、毁林开荒的原始耕作方式，俗称“烧火田”。这种耕作方式致使土地贫瘠，水土流失，粮食产量低，主粮少，杂粮多。“芋豆米汤疙瘩火，除了神仙就是我”是当地居民自戏自乐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包谷糝米汤成为一年四季的主食。包谷面搅团、荞麦面饴饴、洋芋糍粑是最具山区特色的改样饭。

由于地域高寒，生存条件恶劣，居民曾自发地以各种办法相继外迁出山，两村人口逐年减少。近年来，在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引导下，政府实施移民搬迁。2003年，八里店村58户、260人搬迁出山。2004年，剩余的38户、110人全部搬迁出山，在310国道北侧罗纹河畔建起八里店新村。三合村56户、220人也于2004年搬迁到柳枝联社村旁原九治院内。至此，两村村民告别了祖祖辈辈居住的土打墙、茅草房，住进了崭新的楼房或平房。

八里店村民出山后无耕地，只能靠打工谋生。莲花寺镇政府将原公社农场土地协调给三合村民种植大棚蔬菜，不少村民也外出打工。国家实行退耕还林政策，加上少华山森林公园建设，小敷峪内不再开垦种地，部分居民种植核桃、毛栗等干杂果树或养蜂酿蜜谋生。

山区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小敷峪民间长期流行孝歌和花鼓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娘娘庙和燕子沟山神庙建有戏楼，华阳楼偶尔也演戏热闹。20世纪60，70年代，报纸、邮件可送到两个大队，电话也通到各生产队，家家户户安装有线广播，电影队偶尔进山放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两村仅娘娘庙一所私塾，识字人十不数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冬学，扫文盲，并先后建起了上厂、大河、牛头、三合、燕子、天崖等六七所普小（初小），并在娘娘庙附设高级班（后迁至武家坪），山区孩子可就近入学。不过改革开放前，小敷峪未有大学生，直到1980年后，三合村宋文战、八里店村张玉蝶等年轻人先



后走出深山，圆了大学梦。

2009年9月17日，少华山国家森林公园盛大开园。三合村、八里店村地域全部囊括在少华山森林公园里，两村历史也因少华山旅游业的发展而翻开了新的一页。

作者简介

邵拉雄，生于1943年，曾任华县党校高级讲师。



漫话兴国村

邵拉雄

兴国村位于原金惠乡政府西南一公里许（今属大明镇）的桥峪河畔，包括三个自然村，自北向南依次为龙河子、赵巷、王圣。



兴国村

龙河子因紧靠桥峪河，此河河水如游龙，故有其名。龙河子早年是一个有高大城墙的坚固寨堡，敦实厚重的土城墙上合拢古柏，有的粗壮之根有的顺墙直下，裸露于外，交叉扭曲宛如龙蛇。城墙四角构筑角楼，通过角楼上的瞭望孔，可观察四面八方的动静。南北两个城门为砖石结构，其建造坚固，精致美观。南门一道门，北门两道门，门板均为厚板裹铁页，上面长钉大盖，密钉排行，起明发亮。城门洞盘有火炕，夜晚有人看守，按时关闭、开启。城内有南北

走向一道长巷，如今城墙早已消失，新居重建，已有四道巷。

赵巷是村委会所在地，村大人多，早先也有城堡，有东西走向两道巷，改革开放前是三个生产队所在地，如今已发展到七道巷。

王圣村早先有堡有村，堡居高台，北临悬崖东靠沟，南有高墙。堡内五六户殷实之家，屋舍俨然，坚固美观。村子紧贴士崖有两排窑洞，皆穷人居所。王圣村名字来历具有传奇色彩。相传很早以前，村中有一棋迷，到桥峪清明山

打柴，看两位高人下棋入迷，饮其杯中剩残茶水。回到村中，已过千年，物是人非，难以辨认，只好在村西一巨石之上，放下扁担、绳镰，面向清明山，行跪拜叩首大礼，后在石旁古庙中修道成仙，成为圣贤，王圣村名，由此而生。村西古庙，一度香火旺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只有巨石之上圣贤放置扁担绳镰、跪拜行礼之痕迹，成为永久纪念。可惜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这块巨石被破开打碎，无有踪迹。如今，破旧窑洞已成为当年穷人苦难生活的见证，居民均在高台堡中建起新居，该村现为一个村民小组，300多口人。

兴国村现有3个村民小组、802户，2675口人，110多公顷耕地，农业以种粮为主，辅以花椒等土特产品。2020年，农民人均收入9000元。兴国村人重视文化教育，2009年全村就有13人考上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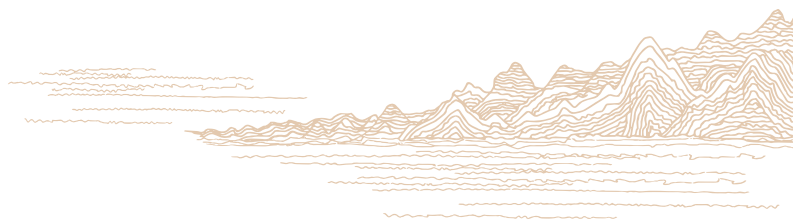
兴国村因村东兴国寺而有其名。兴国寺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明《华州志》中就有记载。整个寺院，坐东向西，占地十多亩，四周有高大院墙，院墙外杨树成行。院内有殿宇、良田、树木、竹园等。丰厚寺产，恢弘殿宇，前殿、中殿和上殿按照中轴线由低向高，依势而建。前殿大门以外，一对石狮蹲在石条台阶两边，怒目利爪，形象威严。门前广场上数丈高的铁旗杆，展示了寺院的肃穆与庄重。由广场向东拾阶而上，就进了前殿。殿内神像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穿过前殿，依台缓上，便到中殿。中殿两边，建有花园，中殿南大槐树下，一口水井芬芳静谧，阴凉清冷。过了中殿，踏上十八台阶，便是气势恢宏的五间上殿，即大雄宝殿。其青砖碧瓦，高屋建筑，五脊六兽，如压云天。殿内佛像，泥塑彩绘，或坐或站，慈善如生。罗帐垂帘，半遮半掩，众僧诵经，香烟飘渺，钟鸣鼓响，余音绕梁。寺院后坡，长满柏树、栎树和皂荚树，草木欣欣，绿树森森，使寺院有稳实靠山、长固永安之态。

村上借寺办学，有了兴国小学，将寺院房舍改做教室，再添补一些房舍，使学校日渐兴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府提倡破除封建迷信，寺庙香火处于停滞状态。寺庙仅有一名僧人，即和尚赵礼洪，合作化以后，他成了一名社员，被分配在学校打扫卫生。

20世纪60年代初，赵礼洪消极悲观，竟将恢弘上殿付之一炬。不久，学



校搬迁，前殿和中殿悉被拆除，材料用于添补新校建设。从此以后，气势恢弘的兴国寺渐渐在村东消失。但是，历史久远的兴国寺，依然留在兴国村人的记忆中。



蒋家堡记事

蒋文正

我的老家在赤水镇的蒋家堡子，亦称蒋家堡、蒋家村，或许因蒋姓人最早居于此地而得名，至于他们何时聚于此地、居于此地，已无从考之。但从村内仅存物及老人口述而断，至少已有大约四百年历史，可追溯至明末或清初无疑。



蒋家堡

据传，蒋家堡的蒋姓人家由古华州高塘高岭村一带迁于此地。高岭村 70 多岁的老人蒋志学回忆，当年蒋姓坟地位于村东南约一公里处，占地约四五亩，与蕴空山山口相对，墓园内松柏茂盛，大多为合抱之粗。

20 世纪 50 年代，每逢清明，蒋家堡的男性老少，都会在凌晨三四点集合，扛上柳杆，担上祭品，步行至高塘的蒋姓坟地，同那里的蒋姓村民一起在众多坟头一一祭奠，随后聚在一起，边叙家常，边将祭品食尽。正午时分，聚散，原下祭扫者又步行回蒋家堡子。第二天一大早，大家又聚集在一起去村西北，那里是只有三座坟茔的蒋家冢，连当时八十多岁的老人也记不清这三座坟茔是谁的。最后，各自再安排祭奠自己的近代先祖。

至 20 世纪 60 年代末，蒋家堡是一道笔直宽阔的通巷，道路东西方向分别通向遇仙河及三涨村，巷内树木繁茂，绿茵浓浓。村中水井三眼，水清如泉，甘甜爽口。村东西两头各有大石碾子一盘，供村民碾稻谷之用。东西两头各有照壁一堵，以防财运外出及邪气入内。村子周围四面环水，水中鱼肥藕香、芦



斜风畅，春夏秋冬，景色各异。每逢秋季霖雨，潦水由东向西从路面漫流而过，常有鱼儿搁浅于路上。村外有良田四十余公顷，将村子包围在正中央。村东西约二百米处，分别有一大渠，称作东渠、西渠。渠中常年水清如许，鱼游蛙鸣。自开春至冬至是孩子们摸鱼、男人们净身、妇女们洗衣的常去之处。过东渠再向东约百米便是遇仙河，河岸绿荫成行、鸟语花香，桑椹、杜李，皂角、苦楝等奇树异果，不胜枚举。两岸外侧还有一道渠，也是常年流水潺潺，路南每隔三四十米又是一东西走向的小渠，一连13条直至颜麻村地畔，渠水为河内渗水，一部分沿河岸外侧渠向北流，一部分沿小渠流至东渠。

在村子东头路中央还座落着一座比巷道还宽的两层古楼，此楼因何而建、何时而建及用途如何不得而知，后人只知叫“楼楼”，“楼楼”雕梁画柱、飞檐挑角，堪称该村一景，从其座落位置，便知其重要性，想必有东迎紫气、西纳春风、给蒋家堡人祈福求富的寓意。王灵女家门前是一座小土地庙，其东邻便是蒋家祠堂，乃是该族议事、赏罚或决定重大事宜之场所。除土地庙外，还有村西北的娘娘庙、村西的财神庙、村东的龙王庙、村西南的马王庙，村东南还有一座五角形、高约9米余的土塔，至于用途今人已不得而知。

蒋家堡有三大家族，分别为蒋、陈、雒，每姓均有十多户人家，其余还有艾、李、刘、谷、柴、白、马、韩、王、杨、叶、常、屈等姓氏，村民世代为邻，和睦相处，小摩擦虽不可免，但绝无深仇大恨或互相杀戮之事。村民的亲还表现在婚丧建房等大事上，无论谁家有此等事全村皆出动，热热闹闹、红红火火，显得人气十足。尤其丧事，无论有多忙，埋人之时必到，抬一杠，动一锨，也算是对亡灵的哀慰。自1949年后，逝者大都葬于村东沙滩荒地，为生者节约了不少良田。

长期以来，人们对该村人、事评价也不少，就智商而言有“蒋家能，颜麻犟，杜家婆娘爱嚷仗”之说；就文化娱乐而言，有“蒋家秧歌、白家船、郭家村曲子唱不完”之说；就做生意赚钱而言，古人有“蒋家压火香，卖到华州、小涨”之说……

蒋家堡人崇尚文化生活，晚清时该村艾如兰曾考中进士；蒋兆怀为兴办卧龙小学几乎倾尽全部家财，不惜让在高中就读且成绩优异的长子停学执教。二



蒋家堡记事

儿子 1958 年被政府选派至苏联留学，回国后执教于西北大学，后任渭南师范学院院长。该家四代为人之师，是我县为数甚少的教育世家之一（见《华县教育志》）。蒋进才长期供职于西北农学院，曾任该院总支书记。在文艺方面，蒋家秧歌远近闻名，自身的传统曲目就 11 部之多，1956、1960 年曾代表华县参加渭南民间戏曲汇演。旧时逢年过节，长长的秧歌队走街串村，实属该地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蒋家人也爱唱大戏，20 世纪 60、70 年代，《红嫂》《赶花轿》《沙家浜》等大本戏唱红了这个村，每逢春节便搭台子、唱大戏，方圆十里的人也慕名而来。该村的体育生活活跃，篮球曾一度打遍赤水、辛庄、渭南交斜一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蒋家村村民生活贫困，尽管村周围良田数百亩，但由于耕作条件极差，食不饱腹者，逾总人口 70% 以上。加之民国时期兵荒马乱，村里时有驻军骚扰，有时长达数月，真乃民不聊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生活有了很大变化，走上集体化道路，该村成为华县以生产小队划分的第一人口大村，后来由蒋家、颜麻、杜家、白家、郭家村组成的大队一直叫蒋家大队，“文化大革命”时称“立新”大队。域内的白家寺小学即原卧龙寺小学，亦为立新中学。而蒋家堡则叫做蒋家生产小队，由于一直坚持农副并举，该村副产品生产有一定底气，如油坊、豆腐坊、磨面房、弹拧花坊、菜园、果园、桐树园、莲池、芥子园等。村民饮食除大肉外基本可以自给。20 世纪 60 年代初，这里通了电，两餐有高音喇叭说唱，夜间路灯通明，后来新建了十间石头粮仓，又盖了可供饲养室、橡胶厂、库房共用的二十一间大房，这成了让外村人震惊、本村人自豪的象征，站在 4 公里开外的王崖塬头上，便可清楚地看到这座当时的“大型建筑”。

“文化大革命”给该村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又唤醒了该村的生机。现在，家家住上了新房，看上了大彩电，用上了电冰箱、太阳能。村内水泥路环通，排水设施齐全，晚间灯明如昼，真乃户户事业有成，日子如蜜。

作者简介

蒋文正，生于 1954 年，中学高级教师。



魏家塬风貌

魏宪文

从高塘街西眺，只见那复斗形台塬突起，一层高一层的梯田像大海的波涛一般，最上层高台酷似一艘巨轮在航行，有城堡依势而建的城墙好似船头和船舱模样，这就是我们的村庄——魏家塬。



魏家塬

这个高塬上的台塬面积不大，方圆三五里，独独居住着魏姓人家，因之叫魏家塬。村分东堡、西村两地，我们住在西村，全村只二三十户人。人们戏说这里是世界上的卢森堡、好莱坞，依我说恰似《圣经》里的伊甸园——她环境优美，

土地平坦肥沃，宜种植麦棉、瓜果，井水如醴。夏天特别凉快，无蚊虫叮咬之苦。夜静时，潺潺流水声给人们轻奏着安眠曲，确是人居的好环境。原来河水上不了这小塬，夏季往往无收成，好在三十年前已打了许多机井，现在旱涝保丰收，完全具备了人们生产、生活的优越条件。

站在田野里，南望是满目青山，北眺是狭长的高塘川道的出口，尽可望见关中平原，东看，高塘街尽收眼底，西边偌大的渭南长稔塬映入眼帘。风清夜静时，只闻近处有几声犬吠，破晓时到处是雄鸡打鸣，长夜里全是东西河川湍湍流水的声息，为人们轻奏安眠曲。这里才真是天蓝、地绿、山青、水秀、气爽的优等生态环境。以前，虽然全村只有一眼井，但其深达十余丈，水质甘甜，



为人们提供了物美价廉的优质矿泉水。

说起魏西村，先要说说三棵大槐树：一在东门口，一在西门里，一在村中间。两头的树可太啦！七、八人搂不住树身，其他枝干两人也不一定能抱得住，它们不朽不空，枝叶十分茂盛；中间的一棵稍细点，已是枯株朽木，但有几个枝干树叶依然茂密。千年柏万年槐，这三棵槐树至少有千百年龄了。谁都没有树的寿数高，是这个村子栽培了它们，老槐树见证了 this 古老的村子的历史。魏西村人和树一样，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具有正直、坚毅、浑厚、朴实的品质。夏天，满树密密的黄花，秋天结着繁繁的槐籽，树上有几处乌鸦窝、喜鹊巢，鸟儿欢快的哇哇吼、喳喳叫；树下好大一片花花地毯式的阴凉，耕牛中午在靠墙处安然地歇晌，不时地反刍着食物，鸡鸭悠闲地觅食吃；有时人们在这儿开会议事，大多是吃饭时靠着树根周围开老碗会，有说有笑，真惬意，真舒心，别有一番情趣，人和自然就是如此的和谐！

魏西村多是清贫人家，住屋都是木瓦房，好一点的家庭有上房、厦子，不少户只有两三间厦房，还有两家挤在一个院子里，拥挤不堪，更有四家住在窑洞里。只有一家不知何年破落的富户，还遗留着前庭房、后楼房，依稀还有格子门窗、拴马石之类的东西。一般人家的前门很低小，人和小土车能通过就行了，好一点的家庭盖点庵间叫做门房，一为护门不淋雨，二来可在门道放些柴禾。还有一些户根本没有前门，墙上挖个比人略高的洞儿，叫土门，胡乱用树枝编个篱笆就行了。

一般家庭只有几亩耕地，中等家十来亩地，还能养一头牛，这就很好了，只有一家富户，有三四十亩地，最富家养过一匹骡子、一头牛，这就是最值钱的生产工具了。

全村人都是以农为生，这显然不能糊口。夏粮还能稳收，可因为缺水，秋粮很难保证。玉米、谷子长势还不错，“三伏”天若不下雨，一料秋庄稼就全废了；有些年间，天大旱，烤得树上的知了声嘶力竭地哀鸣，根本没有种上秋，遍地红土一片。穷苦人总得生存，也是逼出了一条路子：多处联系请来机井队打了一眼深井之后，才解决了秋、夏双丰收的千年难题。



魏西村人勤劳耐劳，心灵手巧。为了生计，在农闲或农隙中学些手艺，做点小生意。那盖房，做家具的木匠、泥水匠，还有那缙箩（做箩）的箩匠，编笼、编筛的竹匠，那拧麻绳、牛皮绳的绳客，缫丝、缫线的线客，那卖包子的包子客；后来，又有钉秤的，做风箱的，修自行车的，火补轮胎的……差不多家家都有谋生的手段，户户都有维持生计的路子。

最可贵的是魏西村具有良好的村风——尊老爱幼、尊婆爱媳、睦邻友善、勤劳节俭——正直厚道，很少有偷鸡摸狗的苟且行为，没有抡枪弄棒的争斗事故。默默劳作、远离邪恶是村子的优良传统。

魏塬人祖祖辈辈蜗居在这丘隅之地，很多人一辈子没坐过汽车，没坐过火车，有自行车的人很少很少。一些人一辈子没去过华州关（华县城），没逛过渭南县，没进过西安省，倒是很多人都进过峪道，翻过秦岭，到过洛南腰市、岱吉，去那里打山柴、贩玉米、扛木料、为吃穿劳碌。

家乡人生活甚简朴，一年到头早饭是包谷糝子米汤，下午是米儿面。很少买菜吃，蔬菜来源主要靠春天剜荠荠野菜，夏天拔水芹菜，秋天割玉米棉花地里点的几窝南瓜、刀豆荚，冬天剜蔓菁、拾萝卜叶子窝一瓮黄菜（近似泡菜），这菜要吃半年哩！多数人家一年到头不见肉，殷实之家大年才割二三斤。

作者简介

魏宪文，生于1932年，曾任华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话说寺城子

郭轶栋

寺城子是一个自然村，位于高塘街南四里许，原属吉河行政村，现是南堡行政村的一个村民小组。这个名不传经传的小村同千千万万个村庄一样，见证着中国农村的变迁。



寺城子新貌

寺城子名称的来历是因为此村有“城”，有“寺”。其“寺”是睡佛寺，高塘塬区十景之一，又名广济院。据清康熙《续华州志》卷一记载：“僧寺曰，‘广济院’在今寺城堡，北其下有灵泉。”康熙《续华州志》卷三记载：“寺城堡旧有睡佛寺倾圮，公募

缘重新，题曰‘广济院’。”此寺遗址位于寺城子城北崖下，三面邻崖，高居于平台之上。该寺院呈长方形，院门面东，一条小路盘旋而上。进入正门，迎面是5间正房，泥塑着3尊神像，门旁有大钟一口，信徒们通过敲钟寄托美好愿望。左侧3间厢房为十二罗汉塑像。右侧3间厢房为睡佛像，佛爷侧卧，长8尺，宽3尺5寸，高2尺，面目和善，闭目养神，似睡非睡，塑像凸凹明显，表面光滑细腻。每年清明节众多善男信女来此赛诗，弃祛疾病，祈求平安。在医学不发达的过去，人们头痛就摸佛爷的头，脚痛就摸佛爷的脚，年轻妇女求子也如此……常年累月，就将佛爷摸得黑明发亮，好似一尊陶塑！该寺院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拆除，用于兴建吉河小学。

寺城子的“城”位于一个断层上，高度60多米，三面悬崖，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据老人讲，该城堡呈长方形，南北长300米，东西宽80米。城门面南，城墙长50多米，高3米，厚3米，门楼为2层，高5米，宽4米，单扇门厚10厘米，门面上有直



径30厘米的虎头两个，威风凛凛。二层为木楼，用于防匪护城，保卫家园。北门为地道，口径1米×1.3米，长约20余米，朝东出城。沿城门而上，两旁是高低不平的木架房，住了大约20余户，主要是郭、赵两姓人家。郭姓是主姓，是否是郭子仪的后裔无从考证，郭氏祠堂驻地在柿村（在高塘镇）。据老人讲，塬区郭姓大多是明朝嘉靖年间华州大地震后，从山西大槐树地区迁徙而来的。赵姓的由来，据说是处仁口（在高塘镇）一赵姓伙计常年在郭氏家打零工，后来在此娶妻生子，繁衍生息，发展成现在的赵姓家族。城门口东侧住着王姓家族，三大姓氏构成了寺城子人口主脉，现共有96户、330多人，耕地面积近27公顷。主要种植小麦、玉米，经济林以花椒、核桃为主，劳务输出是该村的主要就业途径。渭华起义红色旅游项目即将带动当地农家乐和服务业兴起。

寺城子原还有一关帝庙，位于城门口，紧挨王姓住宅。该庙占地三亩，共三楹房屋，由石条、青砖、琉璃瓦建成，气势宏大，规模壮观。最南端为3间两层庙楼，楼上有执勤室、瞭望哨口、枪眼；中间为4间厅房，陈列着12尊泥塑罗汉，南北两行，相互而望，立、坐、卧、哭、笑、闹、戏、打等形态各异，人物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体现劳动人民高超的创造艺术和精湛技艺；北边为老爷楼，即正殿，遗址现存，为两间两楹相连，和城楼紧挨，底部为9层324块石条围成，据说陕西历史博物馆有庙宇的设计图和石条数字等资料存档。正殿8米高，三铺顶，正脊饰有二龙戏珠，山墙正上方有精美石雕，装饰华丽。殿内关羽塑像居中，高2米，左有周仓，右有灵官，墙上有描绘关公故事的重彩壁画。庙宇东西两边有对称的8棵柏树。此庙明朝时复修，1954年被拆除。

如今寺城子村民已从老村整体搬迁至公路两旁，均盖起砖混结构楼房，门前修建了仿古式花园，沿路势排列有序，显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繁荣景象。太阳能、彩电等家用电器使用率达90%以上，拥有摩托车、三轮车等交通工具的人家达80%左右，家用小轿车有8辆。寺城子昔日往事仍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中流逝……

作者简介

郭轶栋，1966年出生，曾在华州区地方志办公室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



如诗如画又一村

郝庆年

我的家乡水峪村，是华州城南少华山下一个不大的山村，没出过什么名人，没有过大的富户，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件，名不见经传。

前不久，一位朋友拿了本祖籍为华县的台湾朋友编写的《陕西省华县志》，书中在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华县沿山一带十里杏花村的美丽风光时，特别青睐水峪村，说及其四周的青竹红杏和“走马戏”，赞其为“如诗如画又一村”，又勾起了我对家乡的怀念。



水峪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水峪村有六七十户人家，50 多户挤住在方圆约百米的城内。城门朝西，上有两层城楼，青砖表砌，顶层上端有“西望昆仑”4 个砖雕大字。太阳快落山时，高高的城楼铺满金辉，而四野田禾都浸在灰黛的暮色

中，城楼屹立其间，分外巍峨、静穆。

城外广场的南面有一个露天戏台，春节时村里自排的戏就常在这里演出。城门外北面有两个庙，靠东的是药王庙，庙内光线暗，三间七道檩，长久未加修缮，但精致的药王孙思邈的坐像（其旁还有一虎），看得很清。紧挨着的是土地庙，供着一尊大大的土地爷。他是中国农民在上苍的代表，在神界和农民在人间一样，地位是最卑微的，所以庙只是单间三道檩。正是这浅门浅户，让人们看得更清晰，



他慈目善面，常年四季，刮风下雨都笑吟吟地看护着农人们。村西北角有一座大庙，五间七道檩，原供什么，已无人说得清，当时已改作学校，是附近3个村子40多个孩童读书的地方。院中有一棵石榴树，农历四五月份开着火般的石榴花，极富生气。城东北角深陷下一条沟，沟两岸各有一座庙：西面的是火神庙，东面是三光庙。火神庙庙门朝西，两间两进，前进的墙上有残存的壁画，后进神台上有三尊泥塑，“怀中鸟雀营巢，口内蜘蛛结网”，中间一尊赤面獠牙，血盆大口，扬拳欲击，十分恐怖。沟东是“三光庙”，三间两进五道檩，大约是供奉日、月、星三神的（有人说是“福禄寿三官”庙，我似觉不妥，这三官是炙手的，不会建在城外最偏僻的去处的），后进有神台，但却无像无塑，整个庙内空荡荡的，营造了无字碑般的效应，使人产生对日月星及宇宙的遐想和敬畏。村东南有一座土塔，塔旁有一棵树冠很大的柏树。村南一里许的山脚下有建于唐时的华州名刹——甘露寺，曾经是“风篁雨桧，鹿喧溪鸣”的佳境，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已经破败，二三僧人惨淡经营。寺门外有几座破损的和尚圆寂塔，岁暮西风中显得分外颓凄。

水峪村南是一片宽约150米的竹林带，洋洋洒洒直通到山口，其间杂长着白杨树和栎树，高大的枝干盖在竹林上。竹林间有一条小溪，通到山口的一个大水潭，临近几个村的妇女常聚在这里洗衣。

村的东北西三面是看不透的杏林、柿子林和栎树林。水峪人一年到头不缺果子吃。春天吃青杏、黄杏，夏秋吃杏干、杏核。不少人家还有梨、核桃、拐枣……

水峪村是宁祥的。六七十户人家在平原地区是个中小村子，但在华州城南沿山一带却算个大村。除约10户住在城外的竹林中外，其余近60户分三排两巷挤住在城内。南巷单排，北巷两排人家前门相对。两巷东西两头各有一个观音龕、井王龕和一口约七八丈深的水井，井水甘美清冽。巷道上有三棵大槐树。从一些人家墙头的砖饰、门楣和门前的小石狮及拴马桩看，曾是殷实人家，但从庄基的大小和屋宇的建筑看，并无像样的大户。也许就因长期如此形成了较平和、融洽的村风，秦东的民俗得以在此较好的保留，民气得以积蕴得更加醇厚。



除正月初一到十五的隆重的春节外，正月十六七的“照虫虫”；正月二十三给孩子戴“老鸱（音 wa）扇”；正月底“年尽月满”，吃煎饼协助女娲补天；“二月二、龙抬头”吃棋子豆，咬“蝎子尾巴”；清明蒸面老虎、顶门杈，上坟祭祖；端午节插艾、带香包、蒸甑糕吃粽子；“六月六，晒丝绸”，各家都晒棉衣被褥；“七月七、乞巧节”，女孩子们泡豌豆芽做“巧”，老人们指着星空给孩子们讲织女（星）与牛郎（星）鹊桥相会；中秋晚凉月如水，献柿子、梨、板栗，祭神赏月；“十月一，送寒衣”；冬至祭祖，吃萝卜饺子，小学生在学校祭孔子；腊五、腊八，吃五豆饭，吃腊八粥；腊月二十三，烙“饽饽”，送灶王爷上天……一年到头大小节都过得较认真，尽管多数人家都不富裕，但日子自觉有滋有味。

水峪村人心比较齐。谁家儿子结婚，孩子满月，几乎全村人都送礼。“立木房”、百年大计，届时各家男人们都去帮忙。就婚礼来说，20世纪50年代初这里仍沿袭着祖辈的旧俗。普通人家也用花轿，新娘“凤冠霞帔”，新郎长袍礼帽，礼帽上插有金花，和古装戏上新科状元帽相像。讲究人家，新郎要骑马亲迎新娘。新婚当夜的“耍房”是全村的热闹事：新房内挤满了人，耍闹内容都是逗新人玩，增进这一对“布袋卖猫”式婚配的青年男女的了解和亲近的，有些游戏是用鞋底敲打新郎刚剃的光头逼着新郎新娘做的，内容方式都较为粗俗。水峪村有一件礼俗是别处少见的，叫“拜巷”：新婚第二天清晨，由婚礼的一位主事人夹着红毡，领着新郎新娘先去本家拜长者，随后在全村转拜。观音龕、井王龕、大槐树、官碾子是必须磕头跪拜的，有些爱耍笑、爱恶作剧的，还要新娘子叩拜拴马桩、自家门前的石墩、甚或大点儿的牛粪堆。这个婚俗是否还有其他来历不很清楚，单就其让新媳妇尽快地熟悉即将生活的新环境来说，也可算是一件值得倡导的好玩事。

水峪村人爱热闹是附近十里八村有名的。20世纪50年代，西安易俗社、三义社和渭南新民社等大剧团常到华县演出，水峪村一去就是二三十人，有的人家竟是锁上门全家“起营”。水峪村人爱看戏也爱唱戏。进入腊月，村里几个承头的人便筹划着排戏，定戏目买剧本，物色演员，背词排练。除传统的折



子戏如《苏武牧羊》《三娘教子》《苏三起解》《杀狗劝妻》《柜中缘》《舍饭》等十多折外，每年再做一些变换，增加一些新戏，有两年还排了《柳林告状》和《八件衣》等本戏。“跑马”是水峪村每年都玩闹的社火，都是村里人自己做的，腊月中旬便开始在城门外的广场排练。“跑旱船”是水峪村的特色项目，扎糊船是李应斌一手搞的。他是村里的文化人，长年在渭河南岸一带做小学教师，爱唱戏且多饰旦角，所以大家都叫他“先生旦”。跑船时，他就常做驾船的美妇人，唱一口好曲儿，与艄公嬉戏逗乐，跑起来行若行云，满场生风。他擅长的就是《华县志》中所说的“走马”，又叫“曲子”，即迷胡。由于他的引进，村里爱唱迷胡的人比较多。腊月，人们都忙着年事，水峪村上空还回荡着丝竹锣鼓与唱和之声。

现在的水峪村四周和巷道里的神庙、神龛早已毁掉，城墙也已掀倒，村子向外扩展了两倍多，有十多户还移居到了离村百米远的西潼公路边。村南的竹林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退耕还林后培育的花椒林和香椿林，郁郁葱葱通到山脚。取消了农业税，实行了合作医疗和65岁以上老年人养老补贴后，人们再无衣食之虞，再若官风清廉、政治修明，那就真是中华旷古盛世了。届时，享受生活将成为人们的基本追求，青竹红杏也许会重新繁育起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将拂去诗人原有的一切伤怀怨绪，以明快的色彩成为“如诗如画”的新水峪村的一瞥早春胜景。

作者简介

郝庆年，出生于1940年，曾任渭南市教育研究所所长。



李坡轶事

张 文 宋朝峰

杏林镇李坡村位于华州城南郊，以其独具特色的农家乐、乡村游和动人的“李郎与杏仙”的爱情故事成为渭南东部的“网红村”。李坡村下辖4个村民小组，分别是高岩村、西院村、李坡村、刘巷村。此文根据村内史仲州老人口诉整理而成。

高堡子和高西院

很早以前，在西院村村东约300米处有个村子，村中居民以高姓为主，人称高堡(bu)子。某年夏天，大雨磅礴，太平峪河水暴涨，形成洪水肆意漫延。洪水很快冲毁了高堡子，仅剩几户人家。其中5户搬迁至现在的西院村老巷子，老巷子相比高堡子地势较高，是个比较理想的居住地。西院村的全名叫高西院，顾名思义即高家西边的院子，还有一种说法是高家西边的一个花园。高堡子原先有座观音庙，前些年，有人在其遗址上挖出过青铜器，庙内遗存的碾盘子和碌碡去年被人运走，现在只保留有一段青砖残墙。如今因修路，观音庙渐渐没有了痕迹。

相传高家有四个院子，分布于华州各地。东院在现在的莲花寺镇荷草村附近；西院即现在的高西院，俗称西院；南院在高塘塬上一带。高塘高姓后人每年清明都会来西院祭祖，这里有他们列祖列宗的坟莹墓地。祭祖仪式结束后，由族长给大家分享烧饼、水果等食品。有一年，高塘高姓人来晚了，没有分到食品，一气之下，他们抢走个把祖宗神位牌，带回高塘祭拜之用，从此不再来西院。

叱咤风云的高家人

清朝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西院村高家五户：高振拓、高永光（



包括高凡玕算一家)、高步升、高天成、高文化,都是远近闻名的大家族。荣华富贵,书香门第,文韬武略,人才辈出。高春龙爷爷的爷爷,曾经在四川某地任四品官员,村里有人见过他的墓碑。他康熙年间早春去世,坟墓被盗过。高文涛曾经也是高官。高步升先后担任几个地方的乡长,在西安曾设有商铺。高文典、高凡琦、高岳松都是教书育人的文人。高岳岗曾任县政府文书。高岳森、高永光等有过军旅生涯。高振拓是著名的石匠,会雕刻各种石器。



西院村乱石滩所在地

西院村五户高家人住在城堡里,周围有城墙城门,城墙上每天安排护卫队巡逻,晚上有专人打更。这座城堡被称为“卧龙岗”。在高步升家的门前有一块石头,人称“鱼儿石”,其有镇灾驱邪的说法。高家是

当地的名门望族,至今仍保留有特殊的丧葬风俗——孝子不接灵。还有个说法叫过“点主”,大人物给亡者灵牌上添加一笔,然后赐封一个礼俗。只有有相当地位权利的人才资格“点主”,对于被“点主”的人家来说,这是一种荣耀。在100年前的某年正月最后一天,高步升的父亲高文秀和母亲上街回到家,已经是傍晚了。夫妻俩躺在炕上,拿起烟枪。正准备享受飘飘欲仙的滋味时,突然有几个人持枪闯进他们的房间,高问:好汉,你要多少钱?来人回答:不要钱,就要你的命!高迅速起身去拿枪。结果匪徒眼尖手快,砰砰,朝着夫妻俩开了两枪,夫妻二人双双身亡。当时高步升在襁褓中睡觉,匪徒没看到,他才幸免于难。高文秀的弟弟在高岩村打牌,听到枪声,迅速赶回西院村,在村口看到几个人,就问:刚才谁开的枪?没人回答,随即一声枪响,他倒在血泊之中。有人说是仇家所为,也有人说是高家内部矛盾引起的。谁是凶手,至今还是个谜。

在过去那个年代,高岩村的高家人同一家族的人名中,如果共有一个字,那就是同辈。高家本来传有家谱,几十年前不知去向了。高岩村紧挨山坡,因

此得名，高岩村村门口，曾经有一棵高大的柏树，分叉整齐，非常壮观，人称千枝柏。高岩村的高岳俊、高岳松、高岳森、高岳岗与西院村的高家同姓但不同祖同宗。西院村的高永光、高振拓与高岩村的高家同祖同宗。

西院村高家是最早的本地人，最早的外来户是宋家，宋家来自王什字村。一种说法是王什字盐碱洼地，不易耕种；一种说法是他们为了躲避战乱，移居西院村，只能住在乱石滩。至今，宋家村周围还叫做乱石。乱石滩是太平峪洪水造成的。蒋家、雷家给高家当长工，屈家、张家、袁家、雒家都是从太平峪深山搬迁到西院村的。还有一个外来户，他叫武学娃，李庄村人，入赘到西院，酷爱秦腔，晚上经常坐在门口拉板胡唱秦腔，自己雕刻皮影娃娃，在自己的窗户上挑线，一个人、一张嘴、一双手，伴奏唱腔一起过。剧情都是他看到本村的小孩子玩耍打架编辑的。孩子们坐在窗户外认真的观看，看到自己在剧情中，感觉非常有意思，时不时就笑了。

李坡村也有分支？



李坡村

李坡（也叫李家坡）村紧依山坡，几十年前，李坡村周围到处是竹园和杏树。民国时期华县十景中的绿竹千亩、的红杏十里，就包括李坡村。清朝末期，为了躲避战乱，李坡人在山脚下隐蔽处打了洞，地道通往寨子城（山坡顶），寨

子城周围准备了很多石头和碌碡。

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李坡村有人和高塘一个年长者聊天，高塘人说他们高塘也有一个李家坡，在原圣山乡刘家堡附近，是上辈人从杏林李家坡村移居到那里的，也是为了躲避战乱。至于真假，无人考证。



刘家巷的来历

刘家巷最早叫仁义村，位置在高堡子正北，即现在刘巷村正东。还是那场特大洪水，摧毁了仁义村，剩下的几户人家，往西移居，村里最早的三姓刘、安、史中，以刘姓者居多，故村名以刘姓命名。民国初期，村里有个姓安的，在县衙司职，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安家很有钱，花钱专门修了一条路，从刘巷村到县城。

作者简介

张文，出生于1968年，华州区影视协会司仪部部长。

宋朝峰，出生于1974年，微信公众号“华州百姓”、今日头条号“华州文史荟萃”主编。



“老官台”漫话

闫广勤



老官台村远眺

“老官台”，是关中东部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位于华州区西数里处。虽然是个小村庄，但它附近，曾发掘出距今8000年的古文化遗址；又在唐朝，与伟大诗人杜甫有过一段不经意的交集，因此使它有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老官台”，坐落在关中平原南缘的黄土台地上，是史前先民的一个聚落。上世纪五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此进行发掘，清理出灰坑，出土有陶器、石锛、骨铲及骨锥等。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一个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是仰韶文化的源头。因这一类文化遗存在老官台村首先被发现，所以中国考古界将渭水流域的同一文化遗存称为“老官台文化”。经考古学家研究，老官台文化时期，先民们已建村落，营造简单房屋，从事农耕、狩猎、家畜饲养及采集等生产活动，过着综合性经济生活。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有铲、斧、铤、锛、凿、半月型石刀等，打制石器也有一定比例。陶器以钵形或罐形为主，多数器表满布规整的网状交错绳纹，彩陶仅见钵或钵形三足器，口沿外绘一道深红色宽带纹。这里是高亢平坦、土质肥沃的黄土台地，村东因受南山诸峪水而成泓漾溪，切割台地向北流去，而河水清澈，长流不断（不像现在这样成季节性河流）。那时的先民，定居在此。由于当时人类社会是母系氏族阶段，先



民们都以氏族村落的形式定居和生活。老官台氏族村落建在河流附近，高于河床的台地上，既有到河中汲水之便，又可避洪水侵袭之害。而且这里又适于农业、畜牧、狩猎和捕鱼等生产活动。

历史发展到唐、宋、元、明、清时，老官台村东的溪水蜿蜒北流，称西溪。水势浩大，景色绮丽，风光别具。明《华州志》称西溪为“万壑风烟，眺游胜绝之所也。古今人慕杜司功子美之风，遂名之为小曲江云。”杜司功子美，即诗圣杜甫。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六月，杜甫任华州司功参军。司功参军是掌握地方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的。诗人杜甫在任华州司功参军时，常到此游览。当时溪边有一西溪游春亭，或名郑县亭子（因华州州治在郑县而得名），杜甫公余游此，在亭中吟咏，即兴写了《题郑县亭子》一诗：“郑县亭子涧之滨，户牖凭高发兴新。云断岳莲临大路，天晴宫柳暗长春。巢边野雀群欺燕，花底山蜂远趁人。更欲题诗满青竹，晚来幽独恐伤神。”杜甫还登临这里的高台，观赏西溪附近的百亩莲池和无边的稻田。老官台一带故老相传：杜甫常在此看庄户种稻植莲，听农夫在田间歌唱的小曲。当地人尊重杜甫，称杜甫为“杜老官”，以后，杜甫离开华州，漂泊西南。这里的百姓缅怀诗人，



杜甫游郑县亭子

在杜甫离开华州后，将其登临过的高台称为“老官台”。在他经常流连的西溪畔，今村东北角建有杜甫祠。祠址十亩，历代立为公田。因杜甫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世称杜工部。此杜甫祠又称工部祠。至于此祠建于何代，毁于何时，当地的老人也已说不清了。

唐朝末年，唐昭宗曾在这里观看划船比赛。诗人吴融适逢其盛，写诗描绘到：“片水耸层桥，祥烟霭庆霄。昼花铺广宴，晴电闪飞橈。”从中可见西溪的浩渺壮观。

宋代，记载西溪的诗文也很多。诗人陆游在《书事》诗中，想象从金人统治下收复

“老官台”漫话

华州的情景：“关中父老望王师，想见壶浆满路时。寂寞西溪衰草里，断碑犹有少陵诗。”以名句“云破月来花弄影”著称的宋代诗人张先曾在《华州西溪》一诗中描绘了“积水涵虚上下清，几家门前岸痕平。浮萍破处见山影，小艇归时闻草声”的西溪美景。从中可略见岸边老官台村“岸痕平”的景象。

明代著名文人吕柟、康海、王维楨都曾到此游览，并有诗题咏。清代时，老官台的郑县亭子已荡然无存，西溪的水势已大不如唐宋之浩渺，但有稻田荷塘，横翠花红，别有一番情趣。

民国以后，老官台的工部祠不知何时倾圮，西溪更加萎缩，仅为一条小溪，乃至近几十年的干涸，已无昔日壮观的风景。但老官台的荷塘、稻田点缀其间，仍不失恬静的田园风光。当地不时在耕作中出土先民的陶片，流传着一些有关“杜甫老官”的传说，依稀荡漾着历史的回声。



华州区部分村庄的村名来历

闫广勤

广大农村实际由众多自然村落组成，华州的村庄（自然村），据 20 世纪 40 年代不完全统计，有近 700 个，20 世纪 90 年代初统计有 900 多个。这些村庄往往有悠久的历史，其村名的来历也各有不同，要将近千个村庄的村名来历一一厘清，一是要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二是要做深入的民间采访。笔者能做到的，只是在阅读明清华州地方志等历史文献时，梳理出部分村庄的相关资料，再加上有限的民间采访，成此拙文，以抛砖引玉，使更多的人来探索、记录华州区村名的来历。



白泉村 位于大明镇。据明朝万历年间刊行的《华州志》记，当时此村称为秦麓村，“村间有白泉，在龙王庙中。今泉水喷玉溅珠，势若龙涌，且澄清见底”。此泉声名显赫，以致以其为中心的若干个村庄统设白泉里，为当时华州四乡四十一里之一。里是古代一种居民组织，一县（州）之内分成若干乡，一乡分成若干里。白泉里之设经明、清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在这期间，秦麓村之名渐渐被名气更大的白泉村代替。而白泉村的泉水，历经沧桑，至今汨汨不绝。

王圣村 为大明镇兴国行政村所属的一个自然村。据清康熙年间刊行的《续华州志》记载，很古的时候，有一个姓王的人讲，他在乔峪遇见神仙，因此人称其为王圣，又名其村为王圣村。

汤坊 原属金惠乡，现为大明镇毛沟社区所属的一个自然村。村名原称汤房，是为沿途行人提供饮水的处所，始建于明朝末年的崇祯年间。这里是瓜坡通往金惠塬的必经之路，设汤房是方便路人的慈善之举，曾坚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以致在汤房设置 70 多年后，清康熙年间的《续华州志》感叹说：“相沿岁

月，离乱弗寝。……嗟嗟华人，积善绰有古风。”后来，汤房逐渐形成了村庄，施舍饮水的功能不知何时消失，名称也讹变为汤坊。

桥峪 原是大明镇的一个行政村，地理上是南山的一条山谷峪道，现与水渠村合并为水渠村民委员会。明《华州志》、清《续华州志》等华州旧志书都记其为“乔峪”，据民国时编撰的《重修华县县志稿》，因仙人王乔曾在此修行而得名“王乔峪”，后简称为“乔峪”。人们不知就里，将“乔峪”误写成“桥峪”。

渔池 位于大明镇。《续华州志》记，乔峪河（下游称遇仙河）先时，出峪口后西流，迳高塘入赤水河。而发源于今大明镇金堆峪的金堆峪河直接向下流，称为遇仙河。后乔峪河水暴涨，东折改道直下，流为今遇仙河，金堆峪河反成其支流。这期间，乔峪口附近的山麓尽化为水国。后人因名其村曰渔池村。

马厂 在大明镇桥峪口外。据民国《重修华县县志稿》记：“明永乐年间（1403-1424），乔峪水暴涨，从乔峪口到龙湾，约五六方里，大石山积。几成不毛，积久野草繁殖。”明朝的潼关驻军在此牧马，故称马厂。

南耐庄、北耐庄 原在金惠乡，今属大明镇。古时本是一个村，据清《续华州志》，此村本名能村，后讹能村为耐村，又讹为奈庄，再演变为耐庄。可能因人口繁衍，又分为南北二庄。按《汉语大字典》的解释，能，古作耐，耐同奈。所以，耐庄名字的变化，还是有章可循的。

里寺村，原属东阳乡 现为高塘镇堡里村民委员会的一个自然村。其村名本为“理寺”，来历可以追溯到金朝大定二十七年（1187），此年这里重修了金明禅院（也称法明禅院），当时有碑为证。既是重修，可见寺院始建年代更早，这就是理寺村“寺”的来源。而重修金明禅院碑记该寺位于大理乡，大理乡即今高塘地区，故“理寺”，即大理乡的寺院之意。今寺院早已不存，大理乡之名也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只有村名透漏了一丝信息。

三溪村 在杏林镇。据明《华州志》记，当时此村称作“鸡湾”。明朝以后鸡湾逐渐改称“溪湾”，又因为人丁兴旺，村庄扩展，一个村变成三部分：上溪湾、中溪湾、下溪湾，统称“三溪”。



磨村 在杏林镇。据明《华州志》记，当时此村称作磨渠。古时候，华州山区及沿山一带，在河流溪渠旁建有许多水磨，利用水力带动石磨粉碎谷物。磨渠村位于沿山的石堤河东岸，当地人沿溪渠建水磨的很多，故村名叫做“磨渠”，后又渐渐演变成磨村。



老官台村

老官台村 在杏林镇的西溪遗迹西侧的高台上。唐朝大诗人杜甫在任华州司功参军时，曾畅游西溪，并登此台。当地人尊重杜甫，称杜甫为“杜老官”，在杜甫离开华州后，将其登临过的高台称为“老官台”。

故县村 在杏林镇。据《大明一统志》，唐时，郑县城在华州西南五里，即今故县村一带。元朝时，郑县建制撤销，其乡、里由华州直辖，郑县城废弃，遗址遂被称为“故县”。

露泽院（原名漏泽园） 华州街道办事处的一个村庄。漏泽园是古时用以掩埋无名尸骸及家贫无葬地者的公共坟场，由官家丛葬。不知何时，漏泽园逐渐有人居住，形成村落，公共坟场的功能消失，但“漏泽园”的名称保留了下来，但被写成“露泽院”。

西关、东关 西关村，即华州街道办事处的西关村民委员会，因地处古华州城的西门外而得名；东关村位于莲花寺镇东罗村民委员会，因地处古华州城的东门外而得名；明朝《华州志》对西关、东关都有记载。明朝的华州城西门在今西关街东口，约为今新华书店一带。明朝的华州城东门在今东关村西，具体位置不详。在此还需顺便提到柳枝镇南关村。南关，顾名思义，应是因地处一座城池的南门外而得名，但华州旧志对此一无所记，当地民间也无相关口述。据笔者初步考证，这座城池有可能是东汉时的沈阳县城，但这已属于另一篇文章的内容，这里暂且不表。

王坟村 在华州街道办事处吴家村村民委员会，因此地曾是明朝的著名文



人王维楨及其家族的墓地而得名。

宜合村 位于华州街道办事处先农村民委员会，据明《华州志》记，当时此地有一条小河，称“泥河”，也称北溪，溪畔村堡即称为“泥河堡（村）”。因地肥水美，北溪左右皆为菜地，村民大多以种菜为生。后来人认为“泥河”之名不雅，以谐音改为“宜合”。

纸坊 位于华州街道办事处先农村民委员会，据明《华州志》记，当时此地百姓割取楮树皮造纸，以为生计，故称“纸坊”。楮树又称构树，落叶乔木，叶似桑，树皮是制造桑皮纸和宣纸的原料。

东周、西周 在下庙镇。据明《华州志》、清《续华州志》，这两个村当时是一个村，称“周宁村”，因西晋大将周处平定氐羌之乱，社会得到安宁而得名。后因人口增加，村庄扩大为东西两部分，就演变简化为“东周”“西周”。

良侯村 位于瓜坡镇。西汉初，汉高祖刘邦登基后，立长子刘盈为太子，后见刘盈懦弱、平庸，有意废刘盈而立次子如意。刘盈的母亲吕后闻知，非常着急，向开国大臣张良请教，张良聘请“商山四皓”辅佐刘盈。商山四皓是隐居于商山（在今商洛市）的四名高士，即东园公、角（lù）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四人。张良请太子以高车驷马迎接他们，路过今良侯一带，直奔长安。刘邦见太子有四位大贤辅佐，消除了改立次子如意为太子的念头。刘盈后来继位，

为汉惠帝。据清康熙年间的《续华州志》记，因张良封为留侯，后人为纪念张良在此事中的作用，故名此地为良侯。

三留村 即三留村民委员会，位于瓜坡镇。三留村由东留村、西留村、北留村三个自然村组成，故称三留。三留原称留村，其村名来历与上述良



三留村

侯村相同，都是为纪念张良请“商山四皓”辅佐刘盈一事，因张良封为留侯，



故名此村为留村。

南沙、北沙 位于瓜坡镇的石堤河西岸。据明《华州志》，明朝时称沙涧村。后可能因人口繁衍，分为南沙涧村、北沙涧村，再简称为南沙、北沙。

宰相坡 位于瓜坡镇湾惠村民委员会，原是马泉村的一个村民小组。其村在马峪（又称赤堤峪）口的西坡，据清《续华州志》记，唐宪宗时的宰相裴度曾经到此游览，后人故将此地称为“宰相坡”。



罗纹村

罗纹村 又名罗纹镇，在莲花寺镇的罗纹河畔。罗纹河发源于小敷峪，向北注于渭河，流经罗纹镇时，水旋转如罗纹，因名。“罗纹”之意是回旋的水纹，元朝赵善庆《赛儿令·早春湖游》曲中“棹涟漪水皱罗纹，破韶华桃露朱唇”

一句可证。“罗纹”一名的最早记载见于唐朝，《新唐书·地理志》记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华州郑县修罗纹渠，引小敷谷水，灌溉农田。其名历史应在1300年以上。

虫陈村 又称虫王庙村，原属少华乡瓦头村，现为莲花寺镇西寨村民委员会的一个自然村。该村古时原有一座八蜡庙，祭祀与农事有关的八种神，即先啬、司啬、农、邮表畷、猫虎、坊、水庸、昆虫，以祈祷来年丰收。一般百姓对前七种神莫名其妙，不知其为何物，唯害虫为众人目所亲睹，身受其害，故尊称为虫王，诚心奉祀，望其不害田禾。久而久之，八蜡庙只有虫王得到尊崇，八蜡庙也就变成虫王庙，该庙所在的村也就称为虫王庙村了。

迷糊峪 原是莲花寺镇袁寨行政村的一个村民小组，后村民迁至山外。迷糊峪是潜龙寺西侧的一条山谷，据北宋时的《太平寰宇记》，当时称为猕猴谷（峪），应是因山中有猕猴而得名。明《华州志》已讹记为“猕虎峪”，后来民间更讹传为“迷糊峪”，离此峪名称的真正来源越来越远。



郭村 在赤水镇。有些人以为此村因郭姓人居住而得名，其实不然。此“郭”是“城郭”的郭，为外城之意，不是姓氏。据《续华州志》，北魏在郑县设东雍州，州城就在今郭村一带。西魏改东雍州为华州，直到隋朝，华州州城都在此地。唐朝时华州州城改建在今华州城区，原州城地区则因有郭有市而被称为“郭市”，后又演变为“郭村”。



郭村

南会、北会 在赤水镇。原是一个村，称会同坊，后因户口繁衍，分为南会同坊、北会同坊两个村，又简称为南会、北会。会同坊曾长期被讹传为“会东方”，又演绎出有人在此会见到西汉著名文学家东方朔的故事。清康熙年间的《续华州志》对此有厘正，该书指出，当地曾出土普鉴和尚塔铭，塔铭中有元朝“中统元年重修玉泉寺于会同坊”字样，证明此地应称“会同坊”，而“会东方”不过是音转而已。

左卫寨 位于赤水镇样田村民委员会，此村得名应与明朝时的“卫所制”有关。明朝军队编制实行“卫所制”，军队组织有卫、所两级。兵士有军籍，世袭为军，平时屯田或驻防；遇有战事，出发征战。故军队屯田之处称卫屯，当时在西安的驻军有西安左卫、西安前卫、西安后卫、西安右卫等，其屯田之处称西安卫屯。据明《华州志》记载，今赤水镇北部陈家村、样田村、马庄村一带，是西安卫屯处之一。左卫寨之名，应是西安左卫在此卫屯的历史遗存。相同情况的还有今赤水镇的屯军头、姚家寨、彭家寨等村，很有可能都与明朝的西安卫屯有关。

大涨、小涨 即赤水镇渭河畔的大涨村民委员会、小涨村民委员会。大涨村民委员会由原来的赤水镇新城、台台两个村委会合并而成，小涨村民委员会由原来的辛庄乡城里、南吉、太平三个村委会合并而成。大涨、小涨是历史悠久的老地名，据明《华州志》、清《续华州志》记，明清时华州有大涨里、小涨里，其



大体方位与今大涨村、小涨村近似。民国初，大涨里、小涨里延续。后取消“里”，但大涨、小涨的村名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还曾设过小涨乡。以后，作为行政区划，大涨、小涨消失了一段时间，但作为单纯的地名，依旧活跃在民间。2015年镇村改革时，恢复了这两个历史村名。大涨、小涨的“涨”，据《广韵》一书的解释，是“水大貌。”清《续华州志》认为大涨、小涨，“以其近渭而得名也。”

遇仙村 即遇仙村村民委员会，位于赤水镇遇仙河畔，由辛村、罗家两个村委会合并而成。“遇仙”是个使用频率颇高的历史地名，遇仙河、遇仙桥至今仍在使用，过去还曾有遇仙观，明清时，这一带设有遇仙里。其名称来源，据清朝的《续华州志》记，北宋时的著名道士陈抟，入华山过此，后人思之，即以“遇仙”名其河，名其桥，名其里。

步背后村 原在侯坊乡，今属赤水镇。步背后原为“铺背后”，意思是在“铺”的背后。此“铺”是急递铺，即古代用于传递军政公文的驿站。步背后村南面的公路，古代是驿道，据明《华州志》，距华州城十里的驿道上，设有急递铺称石桥铺，石桥铺应在驿道北侧，坐北朝南，离石堤河桥不远，其背后的村子就是铺背后村。后人可能不知村名的来历，写字又图简单，将“铺背后”写成了“步背后”。

侯坊村 原属侯坊乡，后属辛庄乡，现是赤水镇侯坊村民委员会的一个自然村。明朝赵时春在《马政论》一文中说，唐朝在同州（今大荔县）、华州置了八个坊养马，清《续华州志》认为侯坊与这八坊有关，侯坊村或由此得名。

伏中 位于柳枝镇，原是单独的伏中村委会，后与丰良村委会合并为泉护村村民委员会。伏中村南面是孙家庄，据明《华州志》记，两个村庄之间有一土岗，当时称为伏气岗，而当地人称为龙岗，岗北有张家村。后来人们将伏气岗、龙岗混称为伏龙岗，张家村也改称为伏龙堡。因人口繁衍，伏龙堡一分为三，即伏龙东堡、伏龙中堡、伏龙西堡。因伏龙中堡最大，后来的大队、村委会驻地也在伏龙中堡，故人们统称这三个村子为“伏中”。

半截山 柳枝镇张桥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原在半截山上，1969年迁至山下



现址。据明《华州志》记载，半截山原称阜头峰，北宋熙宁五年（1072），此山崩裂，山头向北倒下，形成东西五里、南北十里的乱石滩。其崩山遗址，只剩一座山的下半截，故名半截山，又名复成山。元末明初，半截山上曾有著名道士孙碧云的道庵。后又有人在此耕种居住，逐渐形成村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此村是柳枝人民公社张家山大队的半截山生产队。1969年，因莲花寺石渣厂征用半截山开采石渣，半截山生产队搬迁到山下的张桥大队，现在是张桥村民委员会的一个村民小组。

沟峪 原是柳枝镇的一个行政村，现与梁堡行政村合并为樱桃沟村民委员会，在地理上是南山的一条山谷峪道，村民现已搬迁到山外。“沟峪”的“沟”是误写，明、清、民国的旧志书都写作“构峪”。“构”的意思是构树，构树又称楮，或称榖，一种落叶乔木，皮为造纸原料。此峪因盛产构树而得名“构峪”。

王宿 又称王宿庄、王宿镇、王宿街，原属毕家乡，现属柳枝镇毕家农村社区居民委员会。王宿之名，据《续华州志》，是因周平王即位前，为避难曾在此住宿而得名。西周末年，周幽王无道，于后宫得褒姒以后，生子伯服。不久，竟废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于是宜臼逃奔申国，途经此地留宿。周幽王死后，宜臼在申国、郑国等诸侯国的支持下即位为周平王，曾赐姓庶子为“宜”，今王宿北有宜家村，有宜姓人家，据说是这个庶子的后裔。

拾村 原属毕家乡，现为柳枝镇新拾社区的一个自然村。拾村是华州区历史最悠久的地名，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郑桓公于公元前806年受封，在今华州地区建立郑国，先居住在棫林，后迁徙到拾地。郑国东迁到今河南一带后，拾地渐渐形成村落，称为拾村。以此村为中心，明清时，设有拾村里；民国时，设有拾孟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设有拾村乡；后长期为拾村行政村。由此看来，拾村有2800年以上的历史，当为华州区各村之最。

作者简介

闫广勤，1946年出生，曾任《华县志》副主编、《华州史话》主编、《华州古今》主编，《华州志校注》的校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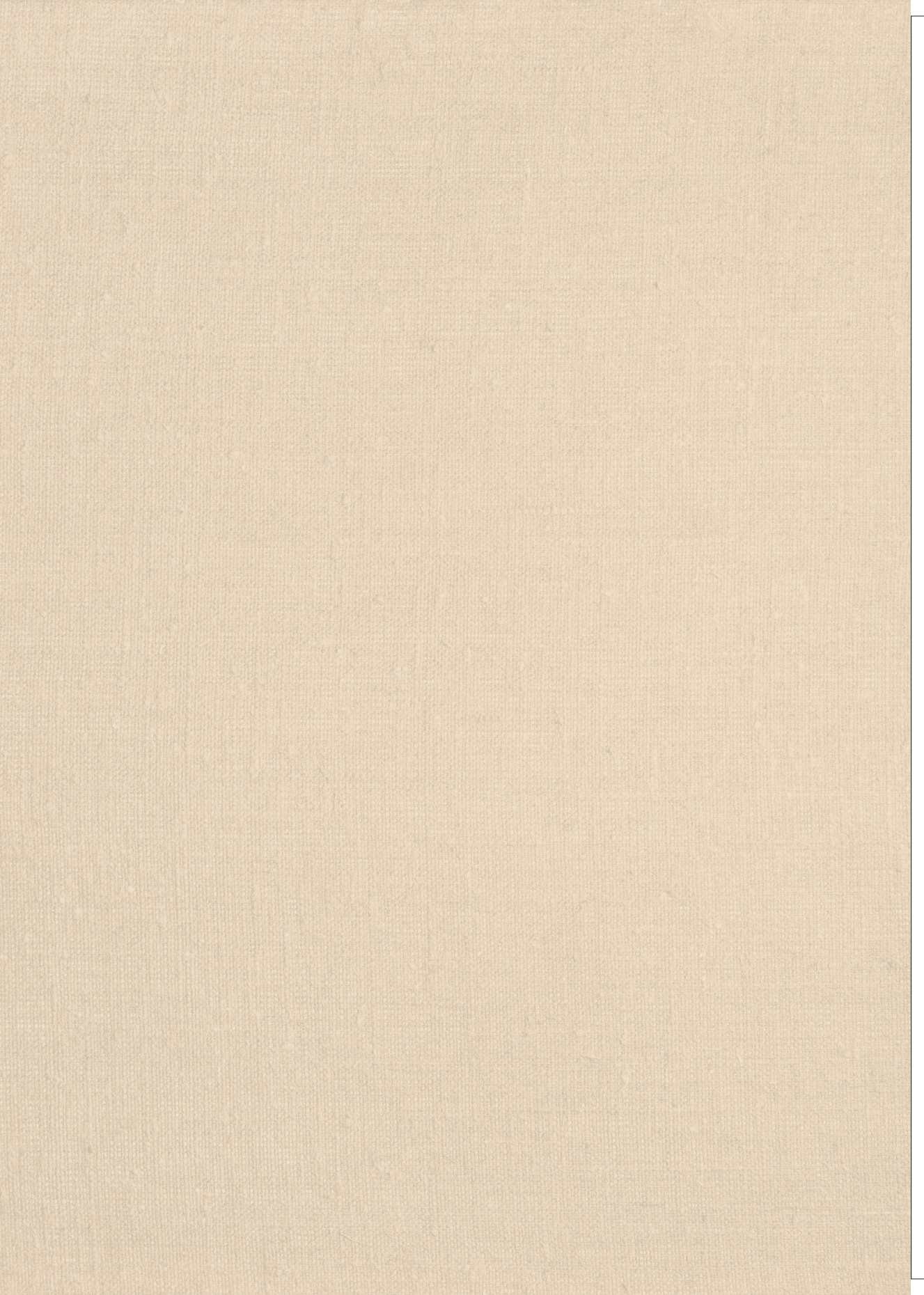




名镇风采

发展是第一要务 农村稳定 农民增收是我们的目标

不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战斗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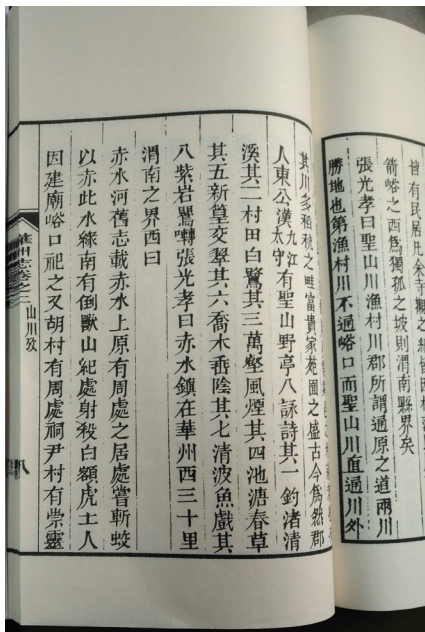


历史文献中的“赤水”

闫广勤

渭南市华州区的赤水，历代文献典籍有许多记载，见证了其历史的久远。

赤水本是一条河的名称，后来的赤水街、赤水村、赤水镇等，皆因河得名。赤水河最早的记载见于先秦时的《山海经》，不过当时不叫“赤水”，而叫“竹水”“灌水”。而北魏酈道元（约470-527）在《水经注》中，称竹水“俗谓之大赤水”，灌水为“小赤水”。“竹水”现称箭峪河，“灌水”现称涧峪河，二河合流为赤水河，向北流经今赤水街入渭。今赤水街一带，《水经注》称其为“蛮城”，又云蛮城“俗名之赤城”，并追述氐人领袖苻健在挺进关中时，于公元350年在赤城驻军，进而占领长安称帝，建立前秦王朝一事。二十四史之一的《魏



明《华州志》记赤水

书》记郑县（今华州区）地理时，也称其有“赤城”。这个城，应是军事要塞。另据《资治通鉴》，南北朝时有许多蜀人，从今四川一带迁徙到关中，一部分定居在赤水，称为“赤水蜀人”。北魏末年发生关陇大起义，在关中西部非常活跃。永安三年（530）二月，北魏派大军从京城洛阳出发，西进关中，前去镇压。赤水蜀人断绝了他们的前进道路，但被北魏将领贺拔岳攻破。综上所述，南北朝时期，赤水河之名已经出现。今赤水街当时称为“蛮城”，俗名为“赤城”，

但在北魏末年，以今赤水街为中心的地区已统称“赤水”。

唐朝时，赤水河依然出现在历史文献中。如，《新唐书·地理志》记：“永昌中，华州赤水南岸大山，昼日忽风昏，有声隐隐如雷，顷之渐移东数百步，拥赤水，压张村民三十余家。”此指公元689年，今赤水镇之南的高塘镇杨村凹一带，发生大面积滑坡，拥塞了赤水河。在唐朝，今赤水街一带，“峦城”“赤城”之名已经消失，就称为赤水。如诗人司马扎在《自渭南晚次华州》诗中，有“前楼仙鼎原，西经赤水渡”句。另一诗人韦庄在长篇叙事诗《秦妇吟》中，记述了唐僖宗时黄巢军攻入长安后的社会变乱。其中一句是：“昨日官军收赤水，赤水去城一百里。”当时赤水设有驿站，以唐末诗人罗邺的《春夜赤水驿旅怀》为证。赤水在唐朝时仍是军事重地，据《资治通鉴》，唐末大军阀朱全忠（后为五代后梁的开国皇帝），于公元901年攻打华州，其驻军就在赤水。赤水的风景也曾在唐诗中出现，如唐末诗人罗衮在《清明赤水寺居》中写道：“榆火轻烟处处新，旋从闲望到诸邻。浮生浮世只多事，野水野花娱病身。浊酒不禁云外景，碧峰犹冷寺前春。蓑衣毳衲诚吾党，自结村园一社贫。”

北宋以后直至民国时，今赤水街一带一直被称为赤水镇。此“镇”是集镇、镇店之意，指经济比较发达的人口集聚区，不是当今行政区划意义的乡镇。

北宋中叶的地理总志《元丰九域志》、记载金朝历史的《金史》，都记“华州郑县有赤水镇”。明朝《华州志》卷二记会同坊村之西为赤水镇；记赤水河，提到周处斩蛟的传说，但认为：“盖疑似之事，莫可遐考。”卷四记赤水镇集、会贸易时间为“间日一集，每逢三日则一会”。清朝《三续华州志》记赤水镇集、会贸易时间与明朝一样。闻名遐迩的“赤水桥上桥”是在清朝时形成的，清康熙年间的《续华州志·建置志》记赤水桥始建于顺治十七年（1660），建成于康熙六年（1667）。清光绪年间的《三续华州志·山川志》记，赤水桥建成一百多年后，因泥沙淤积，河床增高，桥眼堵塞，道光二年（1822），华州知州张坦集资并派人于原桥之上又砌石增高，另造一桥，遂成“桥上桥”的奇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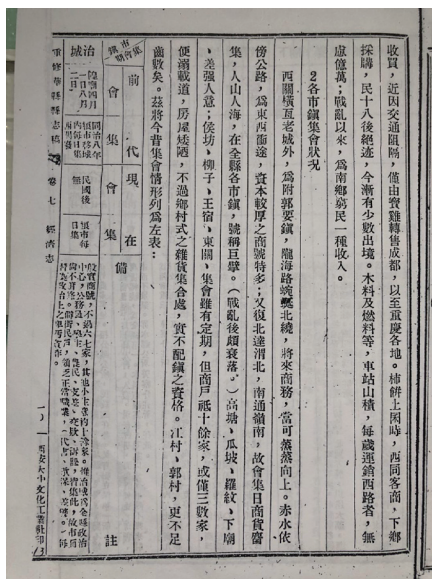
刘安国于1925年出版的《陕西交通挈要》一书中，记当时的赤水街：“赤水镇，人口约五百，市况比之华县为繁盛，盖以渭水舟楫之便，一切货物均于此地集合，



故凡由山西来此之民船多于此处卸载。工业有缫棉及竹细工等，缫棉用美国之缫棉机。棉、麦、石炭铺各数家。其街心有赤水河，河岸全为道路，附近田地多种稻、粟、棉等。”勾勒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赤水概貌。1949年4月华县解放前夕出版的民国《重修华县县志稿》，在其经济志中记：“赤水依旁公路，为东西冲途，资本较厚之商号特多，又复北达渭北，南通岭南，故会集日商货麇集，人山人海，在全县各市镇，号称巨擘。”又记赤水集、会贸易时间是：逢农历三、七日为会，逢农历单日为集。接着又记：“现在会期，渭北渭南、高塘，商货辐辏，为全县第一。木料布线甚多。战乱以来，军队不断来驻，市面颇不景气。”对民国时期的赤水经济状况有概括性记述。

民国时，赤水是华县塬下西部地区的重镇。据《重修华县县志稿》卷五记，民国十四年（1925），全县设5个区，塬下的石堤河至渭南界为第三区，区办事机构驻赤水街。民国二十九年（1940），全县改设13个乡，赤水乡是其中之一，赤水乡公所、警察分驻所驻赤水街。

相关历史文献对赤水的记载，证明其悠久的历史，但这记载很少，且零星片断，更多文献资料尚待进一步发掘。



《重修华县县志稿》中对赤水的记载

赤水怀古

蒋文正

在我的心目中，赤水除了为我之故乡外，我对她还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即对赤水古朴、繁华之美的眷恋与欣赏。



赤水街

赤水之地名因赤水河而得。赤水又分为大赤水与小赤水，其源有九。囊括华州高塘、圣山、赤水及渭南箭峪，东至遇仙河流域。赤水是大水、遇仙两河所夹滋，南塬北端与渭河所挟润之地，四方不足六七平方公里。三水环绕，大道六

纵六横交织，其当年胜景可想而知。

“赤水”之地名早已载入典笈，早在南北朝时期的《水经注》中，就对“赤水”有记载。另据赵宇共教授《华县与中华族名、族地、族源考》一书所记，20世纪50年代发掘并编号的57处文化遗址中，赤水地区（大赤水）竟占27处，且百分之百被定为新石器时代遗址，可见赤水包括该地区先民早在3500至5000年前就生存于此地了。再从郭村白土崖、坡头村西土壕古墓葬群、古窑址出土的文物如六底瓶、瓦缶、瓦罐、鬼灶等其形制来看，人类在此地的定居、生息、繁衍等活动仅次于柳枝元君庙、泉护村一带。

赤水居关中东部、西潼公路中点，南依秦岭，北濒渭水，东有罗家之屏，西依张岭为障，坦荡而润泽，威严而繁华，道路四通八达，水流村村堡堡。赤

赤水怀古

水镇乃赤水中心，20世纪70年代前，该镇还有当年之尊容。三座戏楼坐落于赤水镇东、中、西。分别为山西会馆剧场、红庙剧场及火神庙剧场。剧场雕梁画栋，飞檐挑角。街内家家古香古色，形状各异。街道长一里有余，集市分布清晰。街中间北面为坐北面南的红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为乡镇政府所在地。20世纪80年代前，赤水的大小活动均在这儿举行。街中间以买卖饮食、布匹百货居多，街南为牲口市、街东为肉、鸡市，“文化大革命”前也曾为牲口市，街西依次为铁器市、农贸市，赤水桥东岸为粮食市，等等。另外街中还有文化馆、医院、药店、食堂、邮局、银行、粮店、食品厂、酱园、学校，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整个街道布局合理清晰。据《华州志》记，当年赤水镇间日一集，每三日一会。远至河北孝义，渭南故市、丰塬、高塘等地来此赶会者络绎不绝。在当时交通工具落后、常常以步代车的情况下，赤水的这种繁华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叹为观止。

在我的记忆里，赤水堪称北方水乡。这儿除三条河环绕之外，赤水河、遇仙河两侧分别有大渠各一，其中以金沙渠、遇仙河东渠为最大，常年水流不断，加之众多的沟渠交叉，水田交互，一年四季，水清如碧。街道四周鱼肥藕香，鸟鸣蛙唱，每到秋夏之交，果香稻黄，天蓝荷红，时时蝶欢蜂鸣，处处莺歌燕舞。这儿又是关中粮棉主产地之一，也是关中粮棉大型集散市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津沪各大厂商多在此驻守采购棉花，据老人讲，旺季棉花列三行，长达里许，街上门无虚设，场无隙地，家家开铺，户户摆摊，东起娃娃桥，西至九眼桥，总是人山人海，川流不息，自晨至暮，购销应接不暇。

除了繁华的贸易往来外，昔日之赤水亦为华州之工业重镇，且在不少方面优于当时的华州镇。手工业作坊门类齐全、品种繁多，尤以铁器锻造、翻砂、麦草编制、竹艺、拧绳为之王牌，其余还有酿酒、制糖、加工业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儿还保留着许多原有的工业特色，所不同的是将个体转为集体罢了。随着社会发展及华县经济的统一布局，不少厂家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迁厂或合并于华县城区，如竹艺厂、麻绳厂、塑料厂等，由于近年整个国家经济发展较快，且大部分都更为规模化、产业化，赤水原有的一些手工业基础



就相继失传或濒临失传了。

赤水是全国闻名的“赤水大葱”主产地。“赤水葱”以身高白长，滑爽清香，入汤后长浮于汤（汁）面而饮誉全国，《重修华县县志稿》有述：“李托，会同坊之葱，江村尤最高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前，各村年年都有种植大葱的任务。每到深秋初冬，国家常在赤水粮站、山西会馆、江村粮库等地方扎堆设点收葱，交葱大军车水马龙、人山人海汇聚此地。人声、车声、牛马声、堆垛声、报秤声、声声不绝于耳，细品倒象一曲美妙的收葱交响乐。其阵势其场面可想而知，每当大葱丰收之年，收葱时间常常可达月余。

赤水有其独特的美食文化。历史上的赤水镇，可以说是一条美食街，每逢小集大会，自东到西布满各种各样的小吃——东塬的绿豆凉粉、柿子饼、饴酪，西塬的红薯凉粉、油滋，桥家的油糕、油条，水城的麻花、包子，老火车站的牛舌头烧饼，西街的面皮、水盆羊肉，中街的醪糟、扯面、腊肉，等等，琳琅满目，真令人垂涎三尺。过去在赤水街道常可听到孝义人对赤水饮食的评说，“进了赤水门，吃食多于蚊，一样尝一口，用尽孝义银”。这也许是孝义人对“赤水的蚊子、孝义的银子”的回赠吧。直至今日，赤水已形成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如赤水扯面、赤水腊肉、赤水醪糟等，这些食品早已名扬四海，远销天南地北，时不时有临潼、渭南、潼关及山西运城、河南灵宝等地的人亲自来赤水买几斤腊肉带、几斤醪糟带带回家细品，赤水大葱等也为赤水的知名度增添了不少光彩。

赤水人包容、豁达、憨厚、淳朴，由于赤水悠久的人文历史、方便的道路交通、繁华的经济往来，这一带聚集着我国不少省份的生意人，尤以河南、山西、四川、山东居多。天南海北的人到赤水几乎都能扎脚落户，尽管赤水地盘甚小，但却能四海交融，五湖杂居。在这儿很少有新老生熟、先后晚迟、贫富贵贱之分，就连逃荒要饭之人，只要稳扎稳打，肩挑负贩都能在这儿成就一番事业，不少人也成为富裕户。时至今日赤水街道还可听到地道的河南、山东及四川等地的口音。

由于赤水文化底蕴深厚，景色秀美如画，赤水的历史传说、故事、神话、典故比比皆是。如《周处斩蛟龙》《除三害》《东方朔背锅》《赵匡胤与陈抟



赤水怀古

老祖哄庙（红庙的别称）下棋》《李春娃娃桥遇张果老》等等，均与赤水这块地方有关。听听这儿的地名更觉得有意思了，什么红水村、赤水、赶头村（今碾头村）想必与周处斩蛟有关；卧龙寺、近圣居、龙背（今龙北村）、忠王村，想必与皇帝、王爷有关；当然还有这儿的村子多为堡、寨、城、坊、庄，而这些村名的背后哪个不隐藏着许多沁人肺腑的故事呢？

值得一提的还有在近现代社会中赤水又与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1927年渭南赤水职业学校党组织就派员在三涨村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开展革命活动。王璋峰烈士曾任赤水农校校长，为中国早期革命做了大量工作，培养了大批人才，直至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暗杀……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时，东北军与国民党中央军在赤水相持时间最长，战斗之激烈属赤水历史上罕见。此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抢劫、杀掳之事在赤水屡见不鲜，也使得赤水经济数年不振。

的确，赤水无论从哪个角度，哪个层次说，都有其光辉的一页、美丽的一面。每当我想起这些林林总总时，我都兴奋不已，津津乐道：“赤水是天下最美的地方。”



赤水镇政府院内的古楼

红色古镇——高塘镇

郭轶栋

五月的高塘，天高云淡，河水潺潺，鸟语花香。慕名“竹溪里”江南水乡，缅怀渭华起义烈士丰功伟绩。笔者同几位儿时的伙伴再次回到故乡，回到那魂牵梦绕的高塘塬。

据《华州志》卷二载：“赤水遵川而南，曰圣山川，又西南曰新兴头，又南迤东曰高堂岭，有高堂村……”又据《华州志》卷一记载：“州南曰丰原乡，在则摄丰原、高堂、东西阳。后又去义坊、丰润、崇安、徐村、高堂……”查《华县志》记载，高塘镇地处华州区西南部台塬区，距区政府驻地 15 千米。南跨秦岭与蓝田县灞源镇、洛南县洛源镇相连，西与临渭区桥南镇、崇宁镇连接，北、东与本区赤水镇、大明镇接壤，地域面积 296.9 平方千米，由原高塘镇、圣山乡（2001 年 12 月合并）、东阳乡（2010 年 11 月并入）组成。地势南高北低，南部为山地，蕴藏有大理石、硅石等矿；北部为台塬，箭峪、黄鹿峪、西牛峪、东牛峪、西涧峪、东涧峪 6 条河流聚汇形成赤水河。下辖 41 个行政村，235 个村民小组，人口 5.5 万人。高塘镇历来为塬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民国时，此处曾设县佐、县长办事处以便统治，1928 年，渭华起义的指挥中心也设在这里。清代以来，集市贸易吸引着塬上塬下、岭南、渭南崇凝塬等地的村民客商。工商业较附近各乡发达，据民国三十一年（1942）统计，商号约 30 多家，尚有染坊、铁业、竹木等手工作坊。清末的高塘学堂、民国时的县立初级中学吸引着塬区各乡学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塘仍为县境西南商贸重镇。主产小麦、玉米、棉花，土特产有大葱、柿子、苹果、核桃、花椒等。有中学 5 所，小学 56 所，在校学生 5700 多人。工商企业已发展到 50 多家，农历每逢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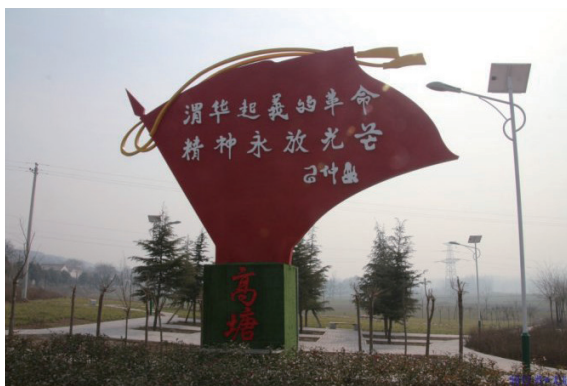


红色古镇——高塘镇

日为集市贸易日，人流量达1万多次。有卫生院3所。街内驻有法庭、派出所、地段医院、邮电支局、县办高中、镇办初中、中心小学、农业银行营业所、信用社、税务所、工商管理所、文化站、粮站等机构，并有渭华起义纪念馆。

沿渭华旅游专线驱车而上，曲折宽阔的柏油大道，树花交错的林荫带，干净美丽的村庄，器械齐全的农民健身广场，不停地映入眼帘，令故友惊叹不已，家乡变化真大！

进入镇区，一把巨型琵琶雕塑矗立于竹海之中，“竹溪里”三个字镶嵌于琵琶之上。高塘小城镇建设规划示意图显示，高塘小城镇建设布局由商业区、移民小区、竹溪里、滨河大道、竹海、南湖和北海六大板块组成。其中“竹溪里”



高塘镇

江南水乡民居项目2018年5月正式对外营业。该项目依托高塘丰富的水力资源和原生态竹子资源，结合江南民居的建筑风格，建成小桥流水与青砖黛瓦的楼宇天然合一民居，小船与杨柳相互荡漾，高塘传统文化与江南水乡的秀美巧妙结合，构成高塘古镇旅游的独有特色，不断吸引区内外游客来高塘休闲游玩观光，为发展乡村旅游、带动镇域经济发展注入新能量。

漫步在滨河大道，观田园风光，听潺潺流水；穿梭于竹海幽深处，体验原生态景色，静听鸟叫雀鸣；置身于南湖、北海，亭台楼阁气势恢宏，湖水荡漾鱼跃鸭游，让人心旷神怡，美哉！乐哉！

不知不觉来到渭华起义纪念馆广场，巍峨的渭华起义纪念碑高耸如云，被郁郁葱葱的松柏环绕，庄严肃穆。参观了渭华起义烈士纪念馆，游览了渭华起义旧址，瞻仰了渭华起义纪念碑和烈士陵园，对渭华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历史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渭华起义爆发于1928年5月，高塘人民具有朴实善良、勤劳勇敢、敢于反抗的性格，积极参加渭华起义，做出了重大贡献。据渭华起



义教育基地管理办公室负责人介绍，渭华起义纪念馆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也见证了高塘镇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第一次是1986年至1998年，修建了渭华起义纪念塔，成立渭华起义纪念馆，举办庆祝渭华起义60周年、70周年活动。第二次是1998年至2016年，纪念馆大规模扩建，修建了现代化展厅、园林式公园广场及办公楼、停车场、接待厅，还修建了渭华起义纪念碑，举行渭华起义80周年庆典并对外开放，举行渭华起义88周年庆典及“9·3”烈士纪念日、“9·30”公祭活动；第三次是2017年以后，对渭华起义纪念馆进行资源整合，组建渭南市华州区渭华起义教育基地管理办公室，重新制定渭华起义红色旅游景区发展规划方案，成功举办渭华起义90周年纪念活动。2017年共接待社会各界群众、机关事业单位、大中专院校、中小学师生参观2000余场次约42万人。

围绕红色旅游，高塘镇制定镇区全领域规划，形成“一心两轴四片区”（即以小城镇为主体的镇区服务核心；沿涧峪河及赤高公路贯穿镇域南北走向的村镇旅游观光及服务拓展轴；东阳农副产品加工区、城镇红色旅游区、赤水湾乡村风光旅游区、秦岭自然风景区）的发展格局。突出抓好红色游、生态游、观光游，依托赤水河建成“秦岭一号”漂流和“赤水湾海啸”，并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2015年建成的渭玉高速公路，全长13.98公里，区域内设寺前服务区一个，高塘出口一个，高速引线长6公里，东西横穿辖区，引线两旁实施景观绿化、美化；2015年建成投资1.1464亿元的赤水至高塘红色旅游公路，长16.2公里；2018年完成渭华起义纪念馆至渭华干部培训学院5.5公里柏油路工程，配套实施绿化亮化。

2011年高塘镇被陕西省政府评为“陕西首批特色旅游名镇”；2013年高塘镇被确定为市级小城镇建设重点镇。经过镇历届党委、政府的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高塘经济社会发展的落脚点确立为发展红色旅游和小城镇建设，这既顺应党中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发展理念，又符合高塘发展实际和人民愿望，愿高塘人民在致富奔小康的道路上向着“奋力追赶超越 精神美丽华州”目标迈进。



昔日高塘街

魏宪文

高塘街是华州区塬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高塘人心目中，这里既是农副产品、生产、生活资料集散地，也是人们会客交友的交际会所，更是人们游玩、散心、消遣的休闲乐园。

这个百年古镇，有大小铺店二十余家，多是杂货铺、京货铺、饭店、药店、染坊、客坊、铁匠炉子、杀猪架子；最奢侈的是有三四座烧锅，最下层的是钉掌场子。最热闹的是露天集贸市场，有卖猪、牛、鸡、羊的牲畜市；妇女卖线、卖布、卖鞋、卖布衣的布市；下苦人卖柴、卖草、卖炭、卖山货、卖椽檩的柴市、木头市，还有不大的棗、卖杂粮的粮食市。



高塘集市

平日街上显得稀稀拉拉、萧萧条条，可每逢五、九日集会就热火了，通过这一大窗口，可尽览高塘风土人情了。

逢集会时，比过庙会热闹多了。赤水、瓜坡、塬下各地，渭南、蓝田、商州、洛南各市县的人，四周八岔，成群结伙，

络绎不绝地涌向街头，或交易，或交际，或会亲访友，或说话办事，或游玩散心，各有各的目的。

在四方去街的路上，抬头看去，棗粮推车车的，卖炭、卖柴、卖菜、卖凉粉、卖豆腐脑担担子的，卖鸡、卖蛋、卖麻糖（花）、卖饸饹背背笼的，卖椽、



卖檩肩杠的，就是极少有骑自行车的。

年轻的妇女换上干净的衣服，年长的老人拄着拐杖，青少年活蹦乱跳喊喊闹闹、说说笑笑，都很快地去上会。一进街，哟，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腊月天的集会总有两三万人。人们的穿着，虽尽量换上干净点的，但都十分简朴。夏天，男的多是粗布黑裤、白衣衫；女的多是黑裤、葱白衣裳；少数富裕点的女人才有安安兰、阴丹士林洋布裤子；冬天，男的多是黑棉裤，对襟袄褂，腰上紧个腰带，女的多是大襟棉袄，少数人才有黑市布衣服，裤腿缠个腿带，色泽十分单调朴素。



赶集归来(张韬/摄)

要逛完牛市、柴市、木头市、布市、粮食市，那可不容易！街道上拥挤得实实的，水泄不通。那人群汪闹声，牛的哞哞声，猪仔的吱吱声，烧醪糟拉风箱的吧嗒声和炉灶烟囱的呼呼喷火声，几里远都听得见、看得着，恰似一幕场面宏大的交响演奏会。很像《清明

上河图》里当年的开封市，就是没有那耍猴的、斗鸡的。

多数人是有事而来。散会时该卖的卖完了，该买的买到了，粮粃了，菜买了；钱赚到腰包了，东西拿到手了，都是满载而归。而有的在剃头担子上削个光葫芦也是办了件事。但一些人不为办事，只是游一游，转一转，吃一盘凉粉，喝一碗醪糟，自带两个黑馒头泡馍锅子一泡也就满足了；有的买几根麻糖就算打发孩子了，买几个包子就是孝敬老人了。

那鸡市上，尽是老婆婆卖鸡、卖蛋的，她们舍不得补身子而换些钱买盐、买菜用；那布市上，尽是妇女卖布、卖线的，前几会称（买）些棉花，自弹自织，卖了赚些钱，来回倒腾，维持家庭的零花用；那柴市、炭市、木头市，尽是一些瘦骨嶙峋的下苦人，骨如柴，脸如炭，卖那一担一担的山柴、一筐一筐的木炭、

昔日高塘街

一架一架的木料，来赚些苦力钱。一见到这柴捆、炭框、椽檩，不禁为下苦人的劳顿所感动——身小瘦削的百十斤体重的人，竟能担、扛一百斤以上的重物！尤其是担炭、扛木头的，能足足搬运一百五十多斤的东西。在崎岖的路上，肩上扛重担，手里拿着带杈的长棍，走不到一百米，便得用木杈撑着重担歇一歇，换换气，就是这样，挪一挪，歇一歇，真是蚂蚁搬泰山，艰难极了！

在街上常常看到有些老人，挑两个担粪笼，手拿个小木锨，啥也不买，啥也不卖，出没在竹园里、猪牛市上，来回转悠，原来是拾猪屎、人粪。我村就有一个老人，每会都去，一集会一满担，一年积一个大粪堆，一家几口几亩地的庄稼，全靠家粪、拾粪就够用了。



从“柳子镇”到“柳枝镇”

闫广勤

华州区古代历史上的“镇”，是指较大的市集，当地人也称“镇店”，如赤水镇、罗纹镇、柳子镇等。柳子镇今写作柳枝镇。而明清两代的华州旧志记为柳子镇（今柳枝街）、柳子里（政区）、柳子坡（今柳枝街以北的田野）等。民国时依然写作“柳子”，20世纪50年代初，逐步讹转为“柳枝”，大概是因为人们不解“柳子”何意，而改写作意思较好理解的“柳枝”二字。



柳枝镇

柳子镇的“柳”，指唐朝人柳怀素，“子”对是古代老师或有道德、有学问人的尊称为“子”。此地名“柳子”，为后人追念柳怀素为华州城隍庙书写碑文而命名。唐朝末年，唐昭宗封华州城隍神为济安侯，城隍庙因而称济安侯庙。

唐昭宗光化二年（899），为济安侯庙立碑。由镇国军节度使、华州刺史韩建的幕僚李巨川撰文，时任右拾遗一职的柳怀素楷书，柳怀素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擅长楷书。

柳子镇历史悠久，明清两代都属将相乡柳子里。因地处官路驿道要津，经济相对繁荣。明朝《华州志》记：“柳子镇，民聚数千家，饶于都城之民，不好耕读，专事锻冶，为刀剑闻于四方。”清朝康熙年间的《续华州志》记华州物产，讲到柳子“善经作大布”，即民众善于织布。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华

从“柳子镇”到“柳枝镇”

州人王志澍曾赋诗《柳子店题壁》，其中有“柳林来去愧间关，咫尺衡茅积翠间”句，描写当时的柳子街简陋的茅屋相连，掩映在繁茂的树木之中。民国时的柳子镇属华县的令公乡，令公乡公所驻此。东西二街，商户只二十余家。

1949年5月华县和平解放后，属令公区，同年7月改为柳枝区（一度称二区），区政府驻柳子街。1956年4月在此设柳枝乡，1958年8月并入莲花寺乡。1959年1月为渭南县华州人民公社的柳枝管区。1961年12月为华县的柳枝人民公社，这期间，乡政府、管区管委会、公社管委会革委会都驻柳枝街。1984年，柳枝人民公社改为柳枝镇，完成了“柳子镇”从一个镇店到一个行政区划的转变。2010年12月，原毕家乡并入柳枝镇。现在的华州区柳枝镇面积101平方千米，辖11个行政村，两个农村社区人口3.3万人。原柳子镇，现在的人们习惯称柳枝街，或西街，镇人民政府驻此。其市面繁荣，商户云集，是华州区东部的经济文化中心。



柳枝新街道

钼都明珠——金堆镇

谷 鹏

在渭南市华州区最东南端有一个山区乡镇，虽然地处偏远的秦岭深处，但它却很有名气，这就是金堆镇。原因是其境内蕴藏有丰富的钼矿产资源，在这个小镇上诞生了全国最大的钼矿采选基地——金堆城钼业公司，也是亚洲最大、世界第三的钼业基地，2006年中国矿业联合会授予华州区金堆城“中国钼业之都”称号。



金堆城钼矿

金堆镇的名字是因镇政府原驻地金堆而得名。这个金堆原是个村名，古时称金斗，因当地曾向官府日进“斗”金而得名，后来音转为金堆，又因四面青山环绕似“城”，故又称“金堆城”。明清时属华州，民国时为华县的岭南乡。1949

年5月改为岭南区（一度称七区），1957年4月改为金堆乡，1958年9月改为幸福人民公社，1959年1月为渭南县的金堆人民公社，1961年9月为华县金堆人民公社，1980年11月金堆人民公社改为金堆镇。政府驻地也从金堆村迁至寺坪。

金堆镇地处四县市交界地带，东北与华阴市毗邻，西接蓝田、南靠洛南。平均海拔1300米，全部为山地，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总面积约224平方公里。文峪河、栗西河、栗峪河、蒿坪河四条河流由北向南汇入南洛河。六条川道将

金堆分割成沟沟岔岔，境内沟壑纵横，山峦叠嶂，是华州区唯一的纯山区镇，距城区 70 公里。由于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很多山里人一辈子都没有出过金堆。好在 1959 年建成华（阴）金（堆）公路后，汽车可通华阴、洛南、华州城区，交通方便多了，坐客车从城区到金堆要两个小时左右，下山到城区需要 1 个多小时。这里山高云淡，空气清新，气候冬暖夏凉，夏天晚上睡觉时还要盖上厚被子。由于这里全部是山区，耕地面积较少，仅有 528 余公顷，但森林面积达 2.47 万公顷。农民生活主要靠种小麦、玉米、马铃薯等，还有就是卖些林特产品如核桃、松子、黑木耳等，农民收入来源少，生活还是相当困难的，很多人靠外出务工来挣钱。



金堆镇街道

金堆虽然只是一个小山村，但在古代却因产沙金而闻名。明《华州志》卷二记载：

“秦岭左右峪中多锡砂，又南四十里至白桦岭，即土人名金堆城者，其地矿穴百出，银砂称盛，或淘取黄金之砂。金堆城西南则青冈坪，出铜砂。又

其南则通道于商、洛、襄、邓之墟。”说起钼矿的发现，还要从 1955 年说起，当时西北地质局 647 地质普查队郭伯珠、陈代福、陈述伦、赵亨等人组成的普查组，在陕西省华县金堆地区西川河畔发现了露头的辉钼矿。1956 年，陕西省地质队派出强大的勘探队伍，在秦岭渺无人烟的深山老林中经过 3 年日夜求索，探明金堆城工业矿石储量约 10 亿吨，含钼金属量约 100 万吨，是世界上罕见的特大型钼矿床之一。1958 年 10 月，由辽宁杨家杖子矿务局调派的第一批建设队伍 500 人奔赴金堆城开始了钼矿建设。1966 年 9 月 1 日，金堆城寺坪选矿厂突破选矿技术难关，生产出第一吨钼精矿。1979 年，“金堆城矿”更名为“金堆城钼业公司”。1984 年，建设周期长达 10 年的二期工程试生产结束，中国最大的钼生产基地横空出世。1985 年，公司首次提出了“一业为主，多种经营”



的战略思路，并首次向非钼产业投资，开启了多元发展的先河。1994年，公司以强大的综合实力一举跃入中国500强行列。为了指明未来的发展道路，1994年，公司制定了“十年发展规划”。1999年，公司在产品延伸方面制定了“一点两线三个市场”发展战略，实现产品结构的根本性调整，最终构建起了炉料、化工、深加工产品三足鼎立的格局。金堆城钼业公司具备了规模化生产、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跻身成为世界前3位大型钼工业企业。

金堆城钼业公司的建设和发展，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昔日山深谷幽的穷乡僻壤，已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矿山城镇。镇上环境优美，设施齐全，交通便利，市场繁荣，村上也通了水泥路。镇内除驻有镇政府、钼业公司及其所属厂矿外，还有各银行办事处、法庭、派出所、邮电支局等机构。国营、集体、个体商业饮食服务业门面摊点应有尽有。学校、医院、俱乐部等文教卫生设施也很齐备。钼业公司建设发展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解决了许多农民子女的就业问题，增加了他们的收入。这些年山里很多农民都迁出金堆在山外安居乐业，其中位于莲花寺镇的金新社区就是原金堆镇西川、大栗西、栗西三个村移民合并成立的新型农村社区。也有很多人在城里买了单元房，有的也买了汽车，山里人的日子也逐年红火了起来。如今，这个秦岭深处的钼都明珠正在以更加崭新的面貌迈向辉煌的明天。



作者简介

谷鹏，生于1977年，华州区地方志编纂中心副主任。

华州区各镇（街道办）的名称来历

闫广勤

华州区的乡镇建制自古有之，其名称、政区、数量，历朝历代变化频繁，延至现在，全县共有9个建制镇，一个街道办事处。这10个镇（街道办事处）的名称来历各异，但都有其历史、自然、人文的深刻内涵。



华州街道办事处

华州街道办事处 因办事处所在地为古华州城而得名。据史料记载，在今城区位置的古华州城，是唐代宗永泰元年（765）所建，唐华州城的周长大约8.5公里，今城区古城村、吴家村至大街一带，气象站到东关一带，都在唐华州城的范围内，而这一范围正是今华州街道办事处辖区的重要部分。



杏林镇

杏林镇 因辖区内曾杏树成林，盛产红杏而得名。华州区的瓜坡、杏林、莲花寺、柳枝的近山地区，非常适宜杏树生长，自古便杏树成林。清朝的《华州乡土志》记：“近山



砂砾之田，东西数十里，皆桃杏林也。”故“红杏十里”为华县八景之一。而杏林镇正处于这数十里红杏林带的中心区域，杏的栽培面积、杏树株数、杏果产量，在20世纪60年代都曾占到全县的60%左右。20世纪70年代以后，杏树林面积急剧萎缩，“红杏十里”已不复存在，但“杏林”一名，还可窥见其昔日的风采。

赤水镇 因境内有赤水河而得名。赤水河因河水发红而名“赤水”，据民间传说是西晋大将周处在此斩蛟，蛟龙血染河水而成，实际应与河水从南山流出挟带红褐色矿物质有关。“赤水”这一河名在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中就已出现，依河而建的今赤水街当时已经形成，称为赤城。唐朝时，今赤水街已是繁华的赤水集镇，并延续到民国时成为赤水乡公所所在地。1949年以后，依然是区、乡、公社、镇等行政机关的驻地。

高塘镇 因镇政府驻高塘街而得名。“高塘”一名最早见于文献的，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华州志》，不过该书写作“高堂”，100多年后编纂的清《续华州志》认为“高堂”是“高塘”之误。据当地故老相传，此处旧有五龙泉，积水成潭，潭边筑堤，高塘街市就建在堤岸边沿高处，故称“高塘”。《辞海》云：“塘”即堤岸，可见故老相传不误。



大明镇

大明镇 因镇政府驻地旧为大明寺而得名。大明寺的得名，有人说是因为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第四子隐居于此，企图恢复大明王朝而命名此寺为大明寺。其实这是错误的。成书于1581年的明朝《华州志》就记此地早已有大明寺，这比崇祯皇帝出生的时间还早30

年。“大明”是日月齐辉，大放光明之意。大明寺香火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民国时，先改作小学，后大明乡公所入驻。1949年以后，大明地区的区、乡、

公社、镇等行政机关也驻在这里。

瓜坡镇 因镇政府驻地瓜坡古为瓜田之地而得名。“瓜坡”一名，在华州区现存的最早的志书——明朝的《华州志》中就已出现：“瓜坡，萦以众泉，古瓜田之地也。”据说当时这里泉水密布，瓜田连片，种有西瓜、南瓜、东瓜以及甜瓜等许多品种，独缺北瓜。这里曾是上高塘塬的东路



瓜坡镇新貌

必经之地，上塬的“十里瓜坡”，坡陡路险，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行人莫不视之为畏途，“十里瓜坡”也就成了华县人形容道路难行的代名词。

莲花寺镇 因境内曾有一莲花寺而得名。此寺位于小街以北的老西潼公路北侧，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同治七年（1868）曾重修。寺门前池塘遍植莲花，因名莲花寺。民国初，寺庙败落被卖。20世纪30年代初，陇海铁路陕西段修建，需用大量铺路石渣，此寺附近直至南部的半截山下，乱石十里，石块堆垒，是上好的石材，西安钰记公司就在此设立了石料站，生产运销铺路石渣，办公处就在寺内，站名就叫钰记公司莲花寺石料站。1950年该石料站被收归国有，并发展为莲花寺石渣厂。为解决运输问题，1951年又在此建莲花寺火车站。从此，“莲花寺”一名，随着石渣运往全国各地而驰名。1958年8月，当时的柳枝乡、罗纹乡合并，合并后的乡政府驻地设在莲花寺石渣厂、莲花寺火车站附近，这个新的乡，就以已经驰名的“莲花寺”作为乡名，以后又作为镇名。

下庙镇 因镇人民政府驻地下庙而得名。下庙的得名是因为此地旧时曾建有西岳庙，当时华阴县的西岳庙为上，华州的西岳庙为下，故称华州的西岳庙为下庙。华阴县的西岳庙是历代帝王祭祀西岳华山神的场所，规格很高，规模较大。华阴县、西岳华山在明朝及其以前属华州，在华州州治所在地建一个规模较小的西岳庙，供当地官民祭祀华山神，是一个当然之举。其始建时间不详，在明朝万历九年（1581）成书的《华州志》中，“下庙”这个地名已经出现，





下庙镇

且在其附近已形成集市，可见华州西岳庙始建年代更早。华州西岳庙被俗称为“下庙”后，也逐渐出现了下庙堡、下庙街、下庙村等，“下庙”也就不仅仅指华州西岳庙，而是这一带的统称。1956年设立下庙乡（1998年改乡为镇）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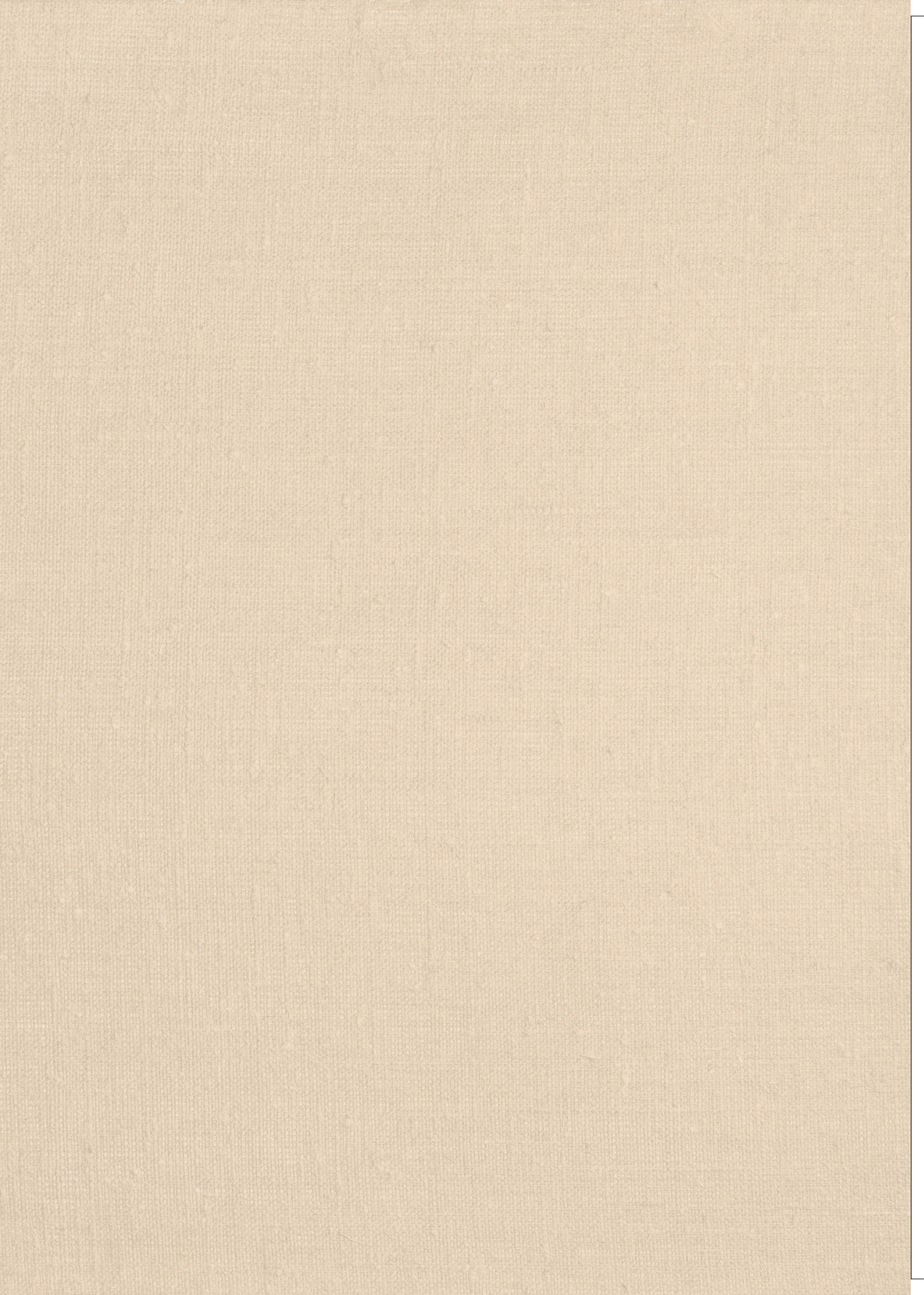
庙”这一地名，就从一庙、一街、一村涵盖到了一个乡镇。

金堆镇 因镇政府原驻地金堆而得名。这个金堆是个村名，古时称金斗，因当地曾向官府日进“斗”金而得名，后来音转为金堆，又因四面青山环绕似“城”，故又称“金堆城”。虽然只是一个小山村，但在古代却因产沙金而闻名。明朝《华州志》中，已有金堆城“淘取黄金之沙”的记载。民国时，岭南乡乡公所设在这里。1949年以后，这里又曾先后为岭南区、金堆乡、金堆人民公社等行政机关的驻地。1955年，西北地质局金堆城地质队在这一地区发现了钼矿，随即建立了亚洲最大的钼金属采、选、冶大型联合企业金堆城钼矿（后改名金堆城钼业集团有限公司），金堆也成为比较有特色的工矿型城镇，因此，1980年改原金堆人民公社为金堆镇。政府驻地也从金堆村迁至寺坪。





风景名胜



华州八景

闫广勤

华州区历史悠久，山川壮丽，拥有一些集历史文物、自然景观于一体的风景名胜，历代不乏游人流连与文人墨客的吟颂。明、清、民国都有不同的“八景”之说，皆为当时文人对本地风光的典型概括。

明代华州八景

明代华州八景为：南寺晓钟、西溪夜月、石桥官柳、龔（hóng）宫古柏、泮壁甘泉、移山灵湫、少华晴岚、渭川晚渡。

此“八景”为明朝成化二十二年（1486）时，华州知州伍性、训导钮莹中所创，因明万历九年（1581）《华州志》的记载，而流传至今。

南寺晓钟 指南寺报晓的钟声，有诗曰：“五漏筹残夜色平，梵王宫阙吼长鲸。”据说当时清越的钟声可传遍全华州。南寺，正式名称为南塔寺，位于明朝华州城西南隅，在今城区渭华路步行街东头路北。至民国时，据《重修华州县志稿》记：“该寺仅房屋三五椽，僧一二名，清越之晓钟，久已绝响。”1949年后，此寺逐渐倾圮无存，今已建为金城小区。



明华州八景之南寺晓钟

西溪夜月 指西溪的水光月色，有诗曰：“帘澈晴空月色低，蟾光流影映西溪。”西溪在今城区西的杏林镇老官台村、梁西村与李庄村、武家堡之间，古代这里水势浩大，风光绮丽，为畅游佳景，甚至可以划船竞技，唐、宋、明、清皆有诗人题咏。唐朝大诗人杜甫在任华州司功参军时，常到此游览，并吟诗记胜。惜明清以来，水势渐小，以致于今，仅为田野耕地而已，人往风微，胜景不在。



明华州八景之西溪夜月

石桥官柳 指石堤河桥附近的柳树成荫，有诗曰：“郡城十里架长虹，官道依稀古木丛。”石桥：石堤河桥，在城区之西十里、北沙村以北的石堤河上。官柳：官府栽种的柳树。据明《华州志》卷二记：“河水自石堤峪出，北入于渭，自桥南眺，山峰叠翠，一壑芳蕤，更夹岸高柳荫荣，过者恒驻马赋诗，以叹胜绝。”民国《重修华县县志稿》卷十五记：“从前夹岸高柳，叶嫩荫浓，加之山色南来，河水北流，固一幅天然画图也。”今石桥还在，但已翻建多次，再无当年旧颜；官柳早已不存，徒留诗人吟唱。



明华州八景之石桥官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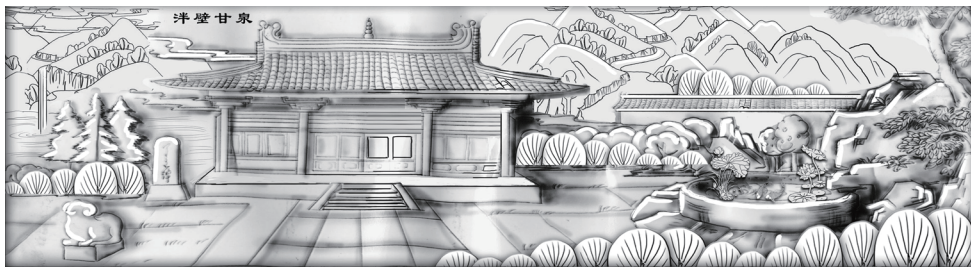
华州八景

黉宫古柏 指黉宫内的古柏繁密茂盛，有诗曰：“数仞宫墙一径深，两行青翠柏森森。”黉宫：学宫，即古代的学校，也称儒学，明清华州的儒学在文庙大成殿西。这些古柏不知生存了多少年，至民国时只剩几株半死不活的枯树，1935年被全部伐去。



明华州八景之黉宫古柏

泮壁甘泉 指学宫墙外的汨汨甘泉，有诗曰：“数尺甘泉水，近在宫墙西。”泮：泮宫，即学宫。明《华州志》卷二记：“学宫亦因东城高阜，右（即西面）有柳巷街（即今三门巷），街侧有甘泉，深四五尺，甘冽殊常，古今无盈歉之时。”明清时，这一带曾设过甘泉里。清末时此泉干涸。



明华州八景之泮壁甘泉

移山灵湫 指灵秘深邃的移山潭，有诗曰：“少华山隈乱石滩，白云绿水净漫漫。”移山：即移山潭，又称白崖湖，位于今柳枝镇张桥村的半截山下。据明《华州志》卷二记：北宋熙宁五年（1072），少华山的阜头峰崩裂，“其下水出，其深无际，名曰移山潭。其崩山遗址，名半截山”。《华州志》卷九记：“移山潭水深数十丈，大与郡城同。”移山潭山光水色，澄萍数里，风光



怡人。元明清时，一直是华州名胜。直到清末，移山潭仍周回百亩，以后，水面逐渐缩小，直至干涸，成为一片农田。



明华州八景之移山灵湫

少华晴岚 指少华山晴日的雾气，有诗曰：“日色才临泰华东，岚光如画蔼溶溶。轻凝远嶂浓还淡，倏然凌崖翠且重。浑似蚩尤军涿鹿，恍疑神女醉巫峰。非烟更觉还非雾，幻尽先天造化踪。”描写了晴天有云雾缭绕的少华山，在云海里出没无常，时隐时现，似真似幻的景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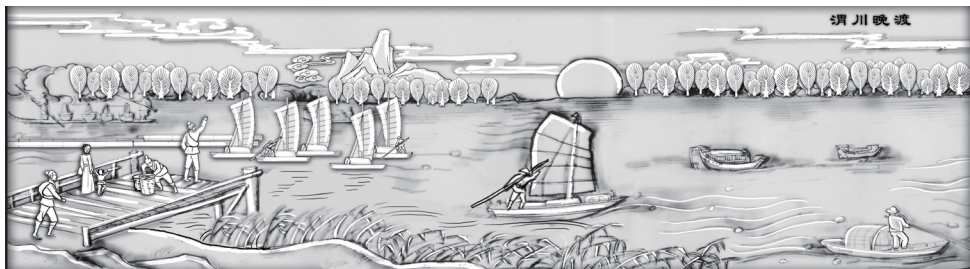


明华州八景之少华晴岚

渭川晚渡 指傍晚时分的渭河渡口，有诗曰：“华郡堂堂枕渭流，夕阳日日往来稠。一篙清浅斜晖影，两岸喧腾伫待舟。”渭河自西向东流经华州北缘。在 20 世纪 30 年代陇海铁路过境之前，在运输上也有相当价值。民国《重修华县县志稿》卷二记：“查铁道未兴前，秦豫晋间货物，均借此转输。”同书卷六云：“渭河行船，麦棉炭灰盐铁等，均由此转输。……清时的王里渡为官渡，水夫四名。大涨、解家、周家庄、孟村、拾村，均为私家设船，为渡渭往来要津。”陇海铁路过境后，渭河运输衰落。民国《重修华县县志稿》卷十五记 20 世纪

华州八景

40年代的渭河渡口为“地势寥落，行旅稀少，只余广漠荒滩而已”。现在，铁路、公路有更大发展，渭河水路运输式微，仅存詹刘、滨坝、拾村等处，为两岸村民往来使用。



明华州八景之少渭川晚渡

嘉靖三十八年（1559）任华州知州的陈应麟，后来在华州八景的基础上又添“五泉细流”“天池灵灏”成为华州十景。“五泉细流”指太平峪五眼泉引细流入州城内。“天池灵灏”指太平峪脑的仰天池。

清代华州八景

清代华州八景为：万户朝烟、山林宝藏、石堤香轮、百果缀珠、岗峦樵迹、春桑柘（zhè）树、绿畦桔槔（jiè gāo）、盈塍（chéng）粳（jīng）稻。

此“八景”的提出，始见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续华州志》，书中有华州贡生刘遇奇的《械林八景诗》。“械林”，华州的别称。

万户朝烟 指华州人丁兴旺，堡居相望。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1556年1月）发生了以华州为中心的大地震，华州死亡人口数达总人口的十分之六。明末清初的战乱，人口又一次锐减。清康熙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激增，村堡增多，人烟旺盛。此诗正描绘了当时之景。

山林宝藏 指华州山区物产丰富。华州南部为秦岭东段的华山山地，山林密布，禽兽繁多，林特产品及林副产品堪称“宝藏”。

石堤香轮 指石堤峪制香（祭祀时用）的众多水磨。香轮：指制香时磨制木屑的水磨。据《续华州志·物产述》记，石堤峪山民，以木制水磨，用流水



为动力，磨榆、杏杂木作香，四十里间水磨众多。从这个记载中，可知当时石堤峪制香的手工业之盛。

百果缀珠 指华州水果品种很多，生长繁茂。华州自古就盛产水果，明、清、民国旧志对此记载不断。当代水果生产更为兴盛，“百果缀珠”延续至今。

冈峦樵迹 指山冈上打柴人的踪迹。华州南部山区林木茂盛，古代至 20 世纪前半期，是人们的燃料来源之一，山民们也多以砍柴卖钱为生。现在已基本绝迹。

春桑柘树 指春季采摘桑树、柘树叶养蚕。柘树叶也可饲蚕，然叶硬不及桑叶。华州的蚕丝业在明清时颇为兴盛，明《华州志》对此略有记载；清《续华州志》卷二记，华州西部多养蚕，蚕丝极丰，商人多称华州丝最好。但到清末时已显颓势，清末《华州乡土志》记：“蚕向以西乡为多，而传授无多，获利不广。”民国时，据《重修华县县志稿》卷七记：“仅养少许，故蚕丝终不发达。”

绿畦桔棒 指用桔棒汲井水浇灌庄稼的田园风光。华州北部地势平坦，沃野田畴，自古即为宜井灌区。桔棒：井上汲水的工具。

盈塍粳稻 指稻田广布，水稻丰盈。华州平原地区的夹槽地带、沿山各河口、西南塬区的几条川道，水源充沛，历代都有水稻种植，旧志中多有记载。

民国时的华县八景

民国时的华县八景为：红杏十里、绿竹千亩、龙山木材、石堤香轮、枣实贯珠、柿果嫣红、荷盖翻绿，稻穗垂黄。

民国八景的提出，为民国时纂修的《重修华县县志稿》，书中认为明清八景大多已成历史陈迹，故提出景色新致，与经济生活相关的新八景。

红杏十里 华县近山砂砾之田上，有东西数十里的杏树林带。春季开花时，“彩霞浓郁，弥望无际，致为佳胜”（清末《华州乡土志》语）。明清以来有不间断的记载。直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华县水果业仍以杏为主。此后，杏林面积锐减，“红杏十里”之景已不复存在。



华州八景

绿竹千亩 华县竹林资源丰富，为关中之首。栽培加工利用历史悠久，明清以至民国时期都有记载。东起柳枝上安，西至高塘北侯，南达大明寺王，北迄瓜坡东赵黄家，都曾有广泛分布，面积长期有数千亩之多。华州民间有“绿竹千顷”之说，实为误传。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步衰败，现仅有数百亩。

龙山木材 龙山，即五龙山，是华州名山，曾被森林覆盖，林木茂密，为民国时华县一景。但在20世纪40年代被人为滥砍，竟成秃岭。至今，植被仍未恢复到原有状态。

石堤香轮 与上述清代华州八景之一的“石堤香轮”一样，说明民国时石堤峪仍在用水磨制香。

枣实贯珠 指枣子像成串的珍珠。据民国《重修华县县志稿》卷七记，王宿、北刘村（今属柳枝镇）多枣，侯坊、小村（今属赤水镇）枣以酥脆甘甜驰名。

柿果嫣红 柿子树在华州（华县）有广泛分布，民国《重修华县县志稿》卷七记，公路（指今柳枝镇—赤水镇之间的老公路）南，柿树成林。西南塬区也非常多。柿子成熟时，红柿满枝头；制作柿饼时，需挂起晾晒，此时的田间村巷，嫣红一片。

荷盖翻绿 指荷塘中荷叶在微风吹拂下摇曳。华州旧地方志中，有对荷花的不间断记载。凡水源充沛，地势较低处，都有荷塘分布。无论是观赏荷花，采食莲子、莲藕，都为华州的别样风景。

明、清、民国时的华州（华县）“八景”，是景观集约，是风景之精华，便于记忆，易于留传，是宝贵的历史的遗产。但时过境迁，许多风景已不存在，或价值有变。不过，在旅游经济风行的当代，参考这种形式，确定华州新八景，也许是可行的。



少华山极顶

闫广勤



远眺少华极顶

古代的少华山，由东峰阜头峰（今称半截山）、中峰少华峰、西峰五龙山组成（据《灵秀少华山》）。后来的少华山仅指少华峰，21世纪新建的少华山森林公园将少华峰囊括其中。少华峰位于华州区莲花寺镇肖家场行政村的刘家河

村南的左撵沟内，东连小敷峪，西邻白石峪，海拔 1664.4 米，是少华山森林公园的极顶。少华峰因地势险要，难以攀登，少华山森林公园尚未开发至此，所以这里人迹罕至，人多不识其庐山真面目。

少华峰的山势呈簸箕形，其口向北，簸箕内即为左撵沟，东西两条山梁宛如两条游龙，与南面凌空而起的主峰相连，形成这个簸箕的边沿。边沿外侧山势陡峭，几乎无路可登，内侧也只有左撵沟中的一条羊肠小道。

进山不远处，有古代留下的一道石墙，两头与东西峭壁相连，中有一门洞可过行人，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当地人称其为“石门”，传说此为古代绿林好汉所筑，这不禁使人想起《水浒传》中少华山好汉占山为王的故事。《水浒传》上说：少华山上“一伙强人，扎下一个山寨，聚集着五七百个小喽罗，有百十匹好马。为头那个大王唤作‘神机军师’朱武，第二个唤做‘跳涧虎’陈达，第三个唤做‘白花蛇’杨春，这三个为头打家劫舍”。后来，少



少华山极顶

华山下史家庄的九纹龙史进入伙，坐了第一把交椅，当了寨主，最后少华山全伙归顺了梁山。《水浒传》上的少华山好汉只是文学形象，但从少华峰上的古代遗存来看，结合当地传说，少华山上当年有强人出没，当不为妄说。通过石墙，即见满山密布葱郁的梢林，从中穿行而上，可达少华峰。

少华峰由3个东西并立紧连的山头组成，当地人称东峰、中峰、西峰。东



少华山石炕

峰除与中峰一狭窄的连接处外，几乎都是笔直的岩石，仿佛一座岩柱拔地而起。东峰东侧有娘娘庙，西南侧岩石下，有一石井。中峰为少华山极顶，上有玉皇庙遗址。据《续华州志》记载，玉皇庙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1573-1640），现仅存废墟。庙南石壁上，有一

南北纵向朝西凹进的石槽，槽中有石炕两个。《宋史·陈抟传》记北宋著名的道家人物陈抟老祖，曾住在“少华石室，每寝处多百日不起”。此处石槽可能就是所谓“少华石室”，石炕就是陈抟老祖的睡榻。陈抟老祖常被视为神仙，主张以睡眠修炼，时常一眠数日，人称“睡仙”，华山、少华山是他经常习练睡功的所在。石炕上方的石壁上有清道光六年（1826）、光绪十九年（1893）的游人题诗。前一首为华州人雍鼎写的：“踏遍盘螺径，峰登少华巅。山根通百二，世界俯三千。石井穿层障，松涛卷暮烟。瑇瑁何处觅，搔首问青天。”后一首作者不详，其诗为：“少华苍苍，渭水泱泱。君子之风，与之久长。”此诗脱胎于北宋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虽说是套用前人旧语，但也非常贴切游人登上少华峰顶后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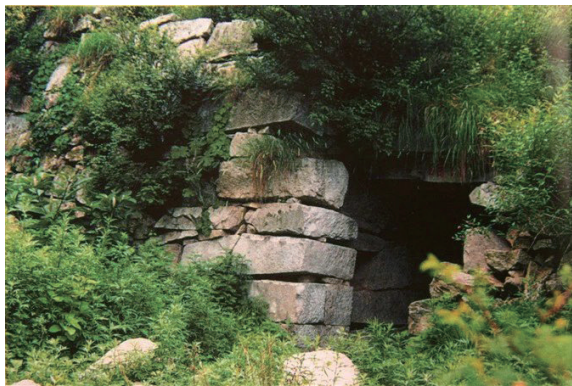
西峰略低于中峰，峰上有一石洞，系人工开凿，长七八米，其内黑暗，呼之若风，相传曾藏虎，故名老虎洞。少华山东峰、中峰、西峰紧紧相连，共长两千多米，最宽处只有十几米。南边是深不见底的绝壁，北边是登攀艰难的陡坡，



山势异常险峻。峰顶灌木丛深，松柏摩天，白云缭绕，怪石矗立。站在山巅上环顾，北有渭水如带，蜿蜒东去；东有华山耸立，巍峨挺拔；南见万山起伏，直达天际；西望风烟万里，迷茫无涯。

从中峰沿东山梁北行，如履鱼脊，即到北峰。一块石坪，方圆十几米，号称王伯当的跑马岗。正史中的王伯当是隋末瓦岗军将领，随李密降唐，后又随李密反唐被杀。传说中的王伯当曾是少华山寨主，所以少华峰上有了他的跑马岗。跑马岗旁有一圆形石槽，汇集雨水，人称饮马池。石坪上立一巨石，隔断通行，其西侧有只容一人通过的石砌门洞，应是占山为王的防御工事。无论是王伯当还是史进，无论他们在历史上的真相如何，但他们与少华山联系在一起，与绿林好汉联系在一起，就使少华山平添了许多传奇色彩。

少华山以其险绝高峻，引起古代许多文人的赞叹，东汉著名科学家张衡在《西京赋》中有“缀以二华”之句，将少华山与太华山并提。唐朝诗人李端、张乔、杜牧、郑谷等，都曾借少华山咏怀。“大历十才子”之一的李端在一次游少华山时写道：“寻危兼采药，渡水又登山。”张乔吟道：“少华中峰寺，高秋众景归。”杜牧有《望少华》诗3首，可惜他没有进山，只是在山外远望少华，借景抒情而已。郑谷有《少华甘露寺》诗，描述少华山下甘露寺（遗址在今莲花寺镇龙潭堡村西南）及其附近景色，其中一句是“石门萝径与天邻，雨桧风篁远近闻”。不知此“石门”，是不是前文提到左撵沟口的“石门”？北宋诗人李廌在《少华山》一诗中描写少华山气势磅礴：“少华连延翠烟永，细路缘云上高顶。奇峰西奔入秦蜀，幽谷南通接荆郢。”在明代，“少华晴岚”被认为是华州八景之一，一首描绘此景的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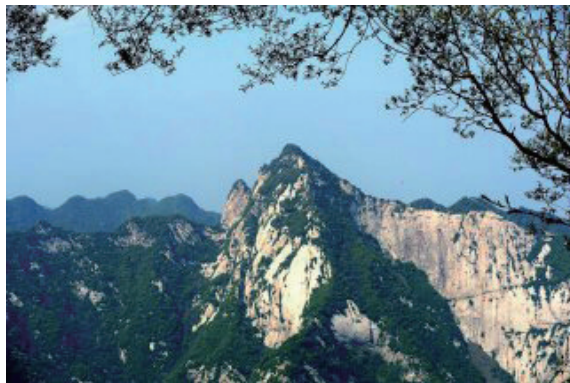
通向少华山顶峰的石门

为：“日色才临泰华东，岚光如画霭溶溶。轻凝远障浓还淡，倏忽凌崖翠且重。”



少华山极顶

清代咏少华山的诗歌，除上述道光六年、光绪十九年的两首外，华州人宜元熙的一首：“帝座通天上，孤峰插汉间。攀萝蹑鸟道，搦管入云山。极目秦疆尽，凭栏晋域环。飘然入境外，俯瞰小尘寰。”也写尽了登上少华山极顶，凌空俯视苍茫大地的豪迈与超然。



秋色绚烂少华山





潜龙寺

蟠龙山和潜龙寺

秦 寂

少华山森林公园中的蟠龙山和潜龙寺（俗称藏龙寺），是一处风光别具的旅游区。在安装索道以前，登蟠龙山，只能走其西面长十五里的猕虎峪，或东面长二十里的白崖峪。蟠龙山是二峪的交汇点。蟠龙山以形若飞龙而名。龙头高昂处于北，龙身蜿蜒迤至南。山的北面，龙头之下是峭壁悬崖，深不见底。西面山势挺拔陡峭，游人只能履险而上。东面山坡较缓，但松林覆盖，隐天蔽日，林深苔滑。南面一条山梁，地势稍平，像龙身龙尾与丛山相连。龙头是蟠龙山的制高点，突兀嵯峨，气势雄伟，直插云天。周围嘉树青葱，怪石耸立，潜龙寺就建在这里。它坐北朝南，掩映在茂林修竹中，幽静、雅致。拾级而上，跨入上书“潜龙寺”三个大字的山门，就进入寺内。迎面是三间中殿，后面是五

蟠龙山和潜龙寺

间上殿，东面有七八间厢房。院内有古柏及樱桃树，其中有一棵“柏抱槐”，在三人合抱之树干中，长出一棵槐树，堪称一奇，据说，此柏已有一千多年。寺内还有从明成化四年（1468）至清咸丰四年（1854）的历代碑石八块，记载着潜龙寺的兴衰历史。山门西面有一石包，站在上面，可西观少华晴岚，东见太华之颠。周围山峦起伏，宛如屏障，林海苍茫，松涛阵阵。寺后另一石包上有小庙，登极北眺，只见渭水如带原野广表，锦绣秦川尽收眼底。



潜龙寺中柏抱槐

此寺名为“潜龙”，而“潜龙”是有大德的君子未得时之谓也。民间传说，东汉光武帝刘秀，早年被王莽追赶时，曾在此藏身，人们俗称藏龙寺。“王莽赶刘秀”是许多地方都流传的民间故事，不是信史，寺庙建于何代，当然不能以此为据。清代康熙四十六年（1707）的一块碑石上说“自汉明帝时有其寺”，汉明帝是东汉初期的皇帝（58—75在位），当时佛教刚在中国内地流传，蟠龙山是否建寺，尚存疑问，寺内其他碑石并没有相同记载，又缺旁证，因此汉明帝时有寺的说法有待进一步考证。其他几块碑石都提到唐朝僧人周钵为其寺

祖师。以此来看，潜龙寺至少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现在寺内殿宇，皆为清代重修。寺院内有一铁钟，虽然不大，却为明代遗物。据钟上铭文记载：此钟铸于正统十四年（1449），已有五百多年了。

潜龙寺和蟠龙山，虽然在外界鲜为人知，但在华州一带还是小有名气的。明代华州知州桑溥（后官至按察使），于正德十六年（1521）仲春，曾从白崖峪而上，登临此山。白崖峪山路旁尚有两处桑溥“来游于此”的题名岩。于嘉靖五年（1526）任华州知州的甘为霖（后官至工部尚书），也曾游此寺。明万历年间的《华州志》记载：“往郡守桑泽山公溥，甘孔山公为霖，眺游咏歌，挥洒盈于寺壁，今风雨湮没，半不可读。至今士人感二公惠政，名其后山曰甘公，



右峰曰桑公台云。”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续华州志》中记载了桑溥题寺联一副：“虎啸禅林叱咤长风生万里；龙蟠宝地呼吸霖雨沛千川。”明清时华州士人多有游览题诗，华州旧志中也有记载。20世纪时也常有人到此春游。最近几年，随着旅游业的兴起，游客不断增多。人们在这里，或见山势险峻，松林浓郁；或感山风习习，盛暑如秋；或见淡雾缭绕，云海茫茫；或感山林幽雅，恬然物外。



潜龙寺内

蟠龙山和潜龙寺确是别具一格的旅游区。它集华山的陡峭险峻和骊山的秀美旖旎于一身，又独具广袤的森林和灵山古刹。而且它的周围还有其他风景区，如白崖峪中几十里山林苍翠，风光别致；在蟠龙山东面山脚下的余家沟中，道庵和玉泉别有洞天；白崖尽头，

海拔 1974 米的山峰，高于周围诸山，游人登顶，可向四面八方极目眺望，大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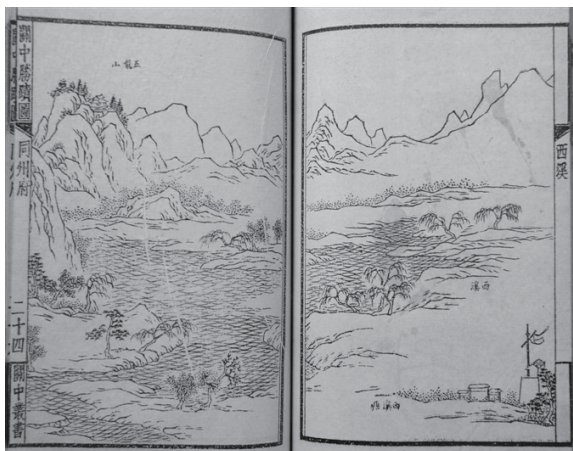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秦寂，1946 年出生，华州文史研究者。



漫话西溪

秦 寂



清《关中胜迹图志》中的西溪图

西溪是华州区一处几近消失的名胜，其位于城区西老官台村与梁西村、梁老堡村与武家堡村之间，是石堤河的一条支流。台地夹峙，稻田如茵，溪水蜿蜒北流，风光别具，在古代为眺游佳景。

唐代时这里因受南山诸峪溪水而成泓漾溪，万壑风烟，景色绮丽，号称“小曲江”。

诗人杜甫在任华州司功参军时，常到此游览。当时溪边有一西溪游春亭，或名郑县亭子，杜甫曾有《题郑县亭子》一诗：“郑县亭子润之滨，户牖凭高发兴新。云断岳莲临大路，天晴宫柳暗长春。巢边野雀群欺燕，花底山蜂远趁人。更欲题诗满青竹，晚来幽独恐伤神。”相传当地百姓尊称杜甫为“老官”，后人遂将杜甫登临过的西溪西边高台命名为“老官台”，并在西溪边建造杜甫祠堂，称“工部祠”。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社会大乱。乾宁三年（896）七月，华州刺史、镇国军节度使韩建将唐昭宗及朝官胁迫到华州。唐乾宁五年（898）六月，唐昭宗曾在西溪观看划船比赛。诗人吴融适逢其盛，写诗描绘到：“片水耸层桥，祥烟霭庆霄。昼花铺广宴，晴电闪飞桡。浪叠摇仙仗，风微定彩标。都人同盛观，



不觉在行朝。”从中可见西溪的浩渺壮观。唐王朝的中央政府在华州运作达两年之久，乾宁四年（897）十月的科举考试也在华州举行。次年春发榜，考中的进士在西溪开“师门宴”，新录进士殷文圭写诗吟道：“西溪水色净于苔，画鹢横风绛帐开。弦管旋飘蓬岛去，公卿皆是蕊宫来。”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大军阀朱全忠（后来的五代后梁开国皇帝）攻打华州，韩建投降，朱全忠曾在西溪郑县亭子宴请韩建。

宋代，记载西溪的诗文也很多。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先君入蜀时，至华之郑县，过西溪。……其地在官道旁七八十步，澄深可爱；亭曰西溪亭，盖杜工部诗所谓‘郑县亭子涧之滨者’。亭旁古松间，支径入小寺，外弗见也，有楠木板揭梁间甚大，书杜诗，笔亦雄劲，体杂颜、柳，不知何人书……”南宋嘉泰四年（1204）陆游《书事》诗，想象从金人统治下收复华州的情景：“关中父老望王师，想见壶浆满路时。寂寞西溪衰草里，断碑犹有少陵诗。”以名句“云破月来花弄影”著称的宋代诗人张先曾在《华州西溪》一诗中描绘了“积水涵虚上下清，几家门前岸痕平。浮萍破处见山影，小艇归时闻草声”的西溪美景。《新唐书》的编纂者之一的宋祁也有诗写华州西溪：“山近重岚逼，溪长匹练分。霁波平撼日，寒岫侧藏云。弄荇鱼差尾，投汀鹭列群。如何去寻丈，尘路已纷纷。”

明代著名文人吕柟、康海、王维楨都曾到此游览，并有诗题咏。吕柟诗云：“仲春十月到西溪，水绕山环鸟乱啼。”康海诗云：“西溪风月美无边，赢得优游便是仙。”王维楨诗云：“曲水围青带，回岗抱翠屏。冠裳仍废榭，鸥鹭自寒汀。霞覆千里树，风翻十月萍。少陵何处问，徙倚白云亭。”“西溪夜月”亦为明代华州八景之一，一组八景诗中的《西溪夜月》写道：“簾澈晴空月色低，蟾光流影映西溪。”

清代时，游春亭已荡然无存，其遗址曾建有杜基庙。西溪的水势已大不如唐宋之浩渺，但有稻田荷塘，横翠花红，别有一番情趣。华州人王志湑在《夏日游西溪》中写道：“观莲何必问花红，一片横塘染翠中。杭稻润黏芒屨露，荻芦偃透葛衣风。”在潼关人杨维谦的眼中，西溪已是“郑县峰岚空翠靄，曲江亭榭半荒凉。”



漫话西溪

民国时，工部祠不知何时倾圮，杜基庙在抗日战争时期也被拆毁。西溪更加萎缩，仅为一条小溪，蜿蜒北去，已无昔日壮观的风景。

现在的西溪，已是良田沃野，但仍不失恬静的田园风光。当地广泛流传着一些有关杜甫与西溪的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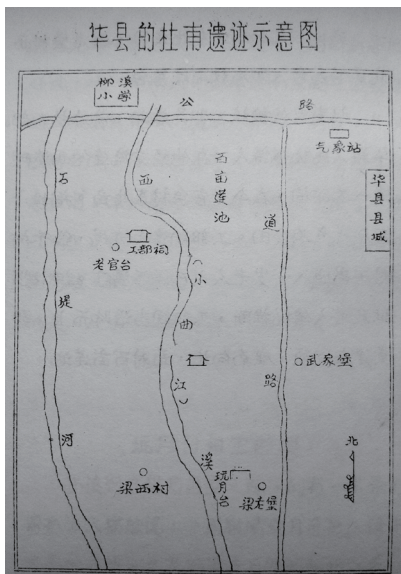
西溪遗址

杜甫在华县的遗闻

杨步奇

华县是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曾经活动过的地方。1200多年过去了，虽陵谷代处，世事变迁，但在这里，仍有与杜甫有关的一些遗迹可寻。

西溪和老官台



华县有关杜甫的遗迹示意图

宋代史书《唐鉴》云：“杜甫谪华州司功，风流豪爽，游西溪寄兴……”西溪在华县城西，经杏林镇老官台村东向北流去。明《华州志》称西溪为“万壑风烟。眺游胜绝之所也。古今人慕杜司功子美之风，遂名之为小曲江云。”清《续华州志》在提到老官台村名的由来时说：“杜少陵游西溪曾登台，后人思之，名其地并传其像。”老官台村建在西溪西岸的高台之上。老官台又叫“老观台”，对这一村名的来历，当地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纪念“杜老官”而名“老官台”，一说是此为老杜观览之处，逐名“老观台”。不管哪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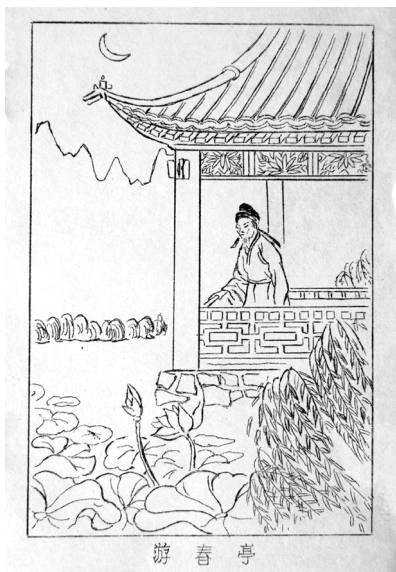
说法为是，都与杜甫在此活动有关。

西溪在唐代时，水势浩大，风景绝佳，唐昭宗曾在此观竞渡。杜甫在华州时，常游吟西溪之畔，也可想见当时西溪迷人之处。老官台一带相传，西溪附近有百亩莲池和无边的稻田，杜甫常在此看庄户种稻植莲，听农夫在田间歌唱的小曲。

现在，西溪已无古代的壮观景象，但杜甫留下的足迹如此之深，以至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在西溪和老官台一带，仍流传着“杜老官”的传说。

杜甫在华县的遗闻

游春亭和杜基庙



杜甫在游春亭

明《华州志》载，杜甫任华州司功参军时，“常憩郑县游春亭子”，“游春亭不知作于何代，以子美诗显于唐，诵于今尔，子美谪华州司功，题郑县游春亭云：‘郑县亭子润之滨，户牖平高发兴新……’”唐朝的华州治所在郑县，即今华县。游春亭遗址就在老官台、梁西村、梁老堡、武家堡四村之间的西溪河畔。因年代久远，游春亭早已荡然无存，但后人对此亭很是怀念。明代华州人，曾作过南京国子监祭酒的王维楨曾有题西溪游春亭诗，有云：“少陵何处问，徙倚白云亭。”

当地群众为了纪念杜甫，不知何时在游春亭遗址上建了一座三间坐北向南的庙宇，叫杜基庙。杜基庙庭院宽敞，树木繁茂，西溪水绕庙而过。可惜的是，此庙于抗日战争时期被拆毁。

玩月台和工部祠

西溪到了皓月当空之际，别有一番景色，曾有古人描绘说：“簾澈晴空月色低，蟾光流影映西溪。”“西溪夜月”为华州八景之一。当地相传杜甫常在此赏月，梁老堡村西北角的高台，即为杜甫玩月台。

杜甫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世称杜工部。华州人民缅怀诗人，在他经常流连的西溪畔建一工部祠，在今老官台村东北角。祠址十亩，历代立为公田。工部祠建于何代，毁于何时，当地 80 岁老人也已说不清了。但从遗址及老人传说推断，工部祠当沿阶而上，殿堂建在涧顶，坐南向北，面对百亩莲池。

作者简介

杨步奇，杏林镇老官台村人，已去世，此文作于 1986 年。



漫谈移山潭

闫广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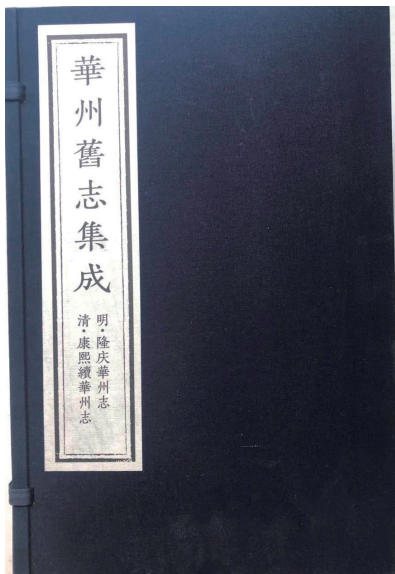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第一次听到“移山潭”这个名字，是在柳枝公社的张桥大队。那是半截山下，张桥村与暴榆沟村之间的一大片平展的田地，土地肥沃，庄稼茂盛。这里地处山前洪集扇区，本应是高低不平，石块磊磊，只在石头浪窝之间局促着一小块一小块贫瘠的沙石地。而移山潭这一大片平展肥沃的土地，确实是不一样的存在，不免有些迷惑不解。

直到后来，我从事了华州史志工作，翻阅华州旧地方志，才找到了答案。

据明万历九年（1581）成书的《华州志》记载，半截山原名阜头峰，北宋熙宁五年（1072），阜头峰崩裂，向北倒塌，“其崩山遗址名半截山。”“其下水出，其深无际，名曰移山潭。”说是“其下水出”，其实附近的白崖峪等山峪沟道的流水，都注入其中。

“移山潭”这个名字，应当在北宋时就产生了，并延续到现在。从北宋，经过金朝、元朝，到明朝时，这时的“移山潭，水深数十丈，大与郡城同。”（明《华州志》卷九记）“移山灵湫”，成了明朝的华州地理八景之一。

成化二十二年（1486），华州知州伍性、训导钮莹中作华州八景诗，以《移



华州旧志



半截山

《山灵湫》为题的一首曰：

少华山隈乱石滩，白云绿水净漫漫。
风吹万叠波涛涌，夜浸一天星斗寒。
鸥鹭亡机留旧约，鱼龙得意起长蟠。
威灵屡应官民祷，化作甘霖洒大寰。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的华州知州陈应麟也有一首《移山灵湫》诗：

湫水深千尺，蛟龙称跃霄。
襄时能沛泽，日日沃郊坰。

从中可见移山潭水面浩渺，绿水漫漫，湖光山色，鸥鹭翔飞。俨然是华州的一处名胜，游览者络绎不绝。最出名的游客，当属明正德年间任华州知州的桑溥和万历年间的著名文学家袁宏道。

北宋山崩以后，半截山前形成数里的乱石滩，移山潭周围更是巨石林立。移山潭西北有一块巨石，据民国华县志记载，此石名“移山石”。上有华州知州桑溥的题字：“正德辛未春，进士知华州事帝丘桑溥、判士古粟、段瓚，训导文水吴腾、资邑刘博，游于岩下。泽山桑溥题。时二月十二日也。”桑溥是



华州历史上的著名清官廉吏，正德辛未，即明正德六年（1511）。民国华县志记此石上有斗大“独秀岩”三字，……“屹然独立，周围约二十丈，高约三丈许。”此石今已不存。

移山潭北，还有一巨石，至今尚存。此石上长有一棵柏树，人称“石抱柏”，或称“白崖湖石”。此石平地突兀，成倒梯形，上宽下窄，高约5米，宽约8米，长约9米，顶部长有一棵柏树。此树高约5.6米，树围1米，南北枝展3.36米，东西枝展3.95米，虽扎根石上，但生机不减。民间传说为明初著名道士张三丰所植。更珍贵的是此石上留下了七款摩崖题咏。其中一款为明代著名文学家袁宏道（字中郎）与友人朱非二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题词：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袁中郎、朱非二同游。

袁宏道是明朝公安（今湖北省公安县）人，字中郎。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官至稽书郎中。他是明代著名文学家，为中国文学史上明代公安派的代表人物。万历三十七年（1609）夏末，袁宏道被任为陕西主试，在西安主持陕西的乡试。试事完毕后在返京途中，于九月到了华州。曾偕友人朱非二游移山潭。除此题词外，还赋诗一首：

直从镜里窥东海，还向峰顶忆北垠，
跌坐石盘须尽醉，浮生别具一乾坤。

另一款题词是万历四十二年（1614），著名金石学家、华州人郭宗昌的《白崖湖记》。

郭宗昌认为移山潭一名名气不大，而白崖诸峪水注入其中，应更名为“白崖湖”。他在此文中不无诗意地写道：“是岁秋望，置酒湖上，西露初零，金风乍涌，山移远影，水涨新痕。客无猥俗之谈，人有泉石之韵。”



白崖湖石

这七款摩崖题咏至今保存



完好。

明朝时的移山潭，水势浩大，溢出的水北流，令其下的今莲花寺镇与柳枝镇的交界处有数大池。明《华州志》卷九记：人们在此养鱼种莲，“共鱼莲之利”。金石学家郭宗昌，看中这一带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的独特风景，就在此建一园林，命名“沚园”。并留下《沚园记》一文，描绘园中林光水色，池馆台榭。

时至清朝，民间仍将此湖称移山潭，而地方志书却依郭宗昌的意见，有时也称“白崖湖”。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续华州志》卷一《地理志》记载了“白崖湖，即移山潭。”还在《宫室考》一节中收录了郭宗昌《沚园记》一文，并注明“今为刘亳州园亭”。刘亳州即华州人刘泽溥，据说今莲花寺镇北马村是其故里。刘泽溥是郭宗昌的晚辈，交往甚密，曾任亳州知州。郭宗昌死后，可能将沚园转让给刘泽溥。沚园后来荒废了，但至今人们还将沚园的残留水面称为“刘家潭”，在今柳枝镇寨窑村西。

乾隆年四十一年（1776），陕西巡抚毕沅编撰的《关中胜迹图志》，在卷九中记，这里在北宋山崩后，“陷为湖水，深不可测，今名移山潭。”



沚园旧址——刘家潭



到了清末，光绪八年（1882）的《三续华州志》，移山潭、白崖湖二名互见。卷一的《山川志》记为“移山潭”，卷四的《省鉴志》记为“白崖湖”。但其水势已大不如以前，《三续华州志》记，光绪三年（1877）的一次大旱，就使“白崖湖竭。”20多年后，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书的《华州乡土志》记“白崖湖，即移山潭，周回百亩，极旱不涸。”“极旱不涸”，有点言过其实了，因为40多年后，民国三十八年（1949）成书的《重修华县县志稿》，在卷十五，记华州八景的“移山灵湫”时说：“潭水久涸，变成耕田，祷雨又系迷信，此景殆天然消灭。”不管怎样，移山潭（白崖湖）在民国时就逐渐干涸了。

移山潭虽然干涸了，但它的诞生至消失，印证了沧海桑田的自然变化；在它存续期间产生的人文情怀，应当流传下去。今天，张桥村干部群众正依托移山潭的历史文化，开发乡村旅游，移山潭的历史篇章正在得到续写。



移山潭现状



唐槐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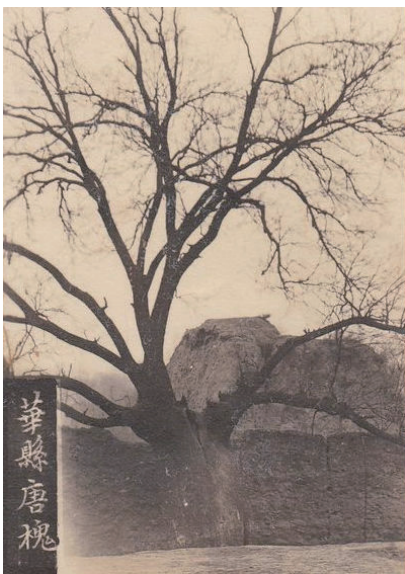


华州唐槐

闫广勤

原华县人民政府院内，生长着一棵古老的槐树，因相传为唐代物，人称“唐槐”。槐树，又称“中国槐”，原产中国，华州唐槐就属于这种人们喜爱的乡土树种。

此槐生长之处，自唐朝至清朝一直为华州公署，辛亥革命后因华州改为华县，才成为县政府所在地。千百年来，这棵古槐尽览华州风云变幻，静观华州士人进退。但对它的记载却并不多。现在发现的最早记载是明朝著名文学家袁宏道的一首诗。明朝万历三十七年（1609）袁宏道到西安主持陕西乡试，九月返京时路过华州，在华州公署住宿，见此树不禁爱之，题之为“国槐”，并赋诗：



民国时的唐槐

“孙枝郁郁遍三秦，溜雨笼烟不记春。若论花黄忙举子，已曾忙过九朝人。”诗题中，记“华州公署古槐大可四十围”。“围”，计度圆周的量词，尺寸说法不一，一说五寸为一围。以一围五寸计，此树树干“四十围”，即周长有二十尺，约六七米，可以想见当时这棵古槐的高大伟岸。事后，为纪念袁宏道为古槐题字赋诗，在此处建了亭碑。

时过 15 年，至明天启五年（1625）十月，袁宏道的朋友段猷显赴西安，路过华州，见此槐及亭碑，而此时袁宏道已经过世。段猷显睹物思人，不觉怆然，遂赋诗四首。其中

描写古槐的诗句有：“孤根蟠地曲，疏影半空余。”“老干孤标岁月残，撑霄插汉耐霜寒。”“饱露笼烟翠霭浮，不知阅尽几春秋。”从中可见古槐沧桑而茂盛的形状。

又过了几十年，经过改朝换代，兵燹战乱，清康熙初年华州人刘遇奇作《古槐记事说》记此槐已“化为乌有”。但其生命力极其强盛，不知何时，又萌生重荣，以致到民国时，亭碑虽早已不存，但槐树长得高大挺拔，有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一张照片为证。1932 年，县长王其晟大书“唐槐”二字，立碑于树旁。

1949 年以后，此槐一直屹立在华县人民政府院内西侧，但 2003 年其主干枯死，人们曾以为“唐槐”从此消失了。不想两年后的 2005 年，此槐残存的半拉树干竟然又萌生枝叶，重新复活，越长越繁，正是所谓“屡枯屡荣”。

唐槐自古以来就是华州的一个游览胜景，清康熙华州人刘遇奇在《古槐记事说》记，当时有许多缙绅贤达到华州，经常眺览此槐，在此饮酒赋诗。从清末、民国，直至当代，在唐槐前流连忘返，怀古思今的游客依然络绎不绝。

2012 年，华县人民政府搬迁，原址南半部归县公安局，包括“唐槐”在内的北半部归咸林中学。“唐槐”今在咸林中学校园内，除了成为一个更为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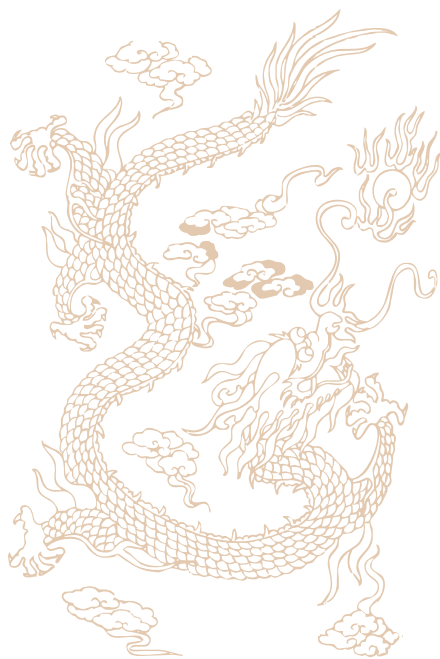


华州唐槐

的旅游景点外，对此校的莘莘学子也有着特别的象征意义。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槐树与科举考试有密切的关联。据北宋人钱易《南部新书》记，唐时的六七月间槐花黄时，举子都忙着温习功课，做文章准备考试。又据南宋人尤袤在《全唐诗话》中记载，唐语云：“槐花黄，举子忙。”反映了唐朝槐花盛开时，文人参加科举考试的情景。举子赴考又称“踏槐”，因此宋朝苏轼有“强随举子踏槐花”的诗句。明代各省乡试在七月后，一般在八月，正当槐花黄时，举子正忙于准备考试，所以前面引袁宏道题华州公署古槐诗中吟道：“若论花黄忙举子，已曾忙过九朝人。”

花草树木，在古代传统文化里，都与世俗生活有密切关联。槐树是科举考试中的文化符号，寄托了一众举子的情怀与向往。华州唐槐最终归于咸林中学校园内，对华州当代“举子”们有着特殊的激励作用，祝咸中学子们好运。



华州公园里的“棲雲樓”

秦 寂

华州公园里有一座颇有特色的仿古建筑，三层高楼，尖峭笔挺，似有耸入云端之势，楼上的匾额题为“棲雲樓”，写成简体字应是“栖云楼”。



棲云楼

“栖云楼”的“栖云”，意为栖于云雾中，谓在极高处，形容楼之高耸，也有的历史资料将此楼写作“齐云楼”。栖云楼是唐朝华州名楼，位于华州公署内。唐朝华州公署在原华县人民政府处，栖云楼故址约在今“五间厅”一带。这

里是一块黄土台地的北部边缘，地势颇高，是眺景佳地。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天下大乱。各路军阀不但相互混战，还都想将皇帝与朝廷控制在自己手中。唐昭宗李晔时，内有宦官专权，外有军阀争战，没有实权，无力回天。乾宁三年（896）七月，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攻打长安，唐昭宗率朝官逃出，被华州节度使韩建胁迫到华州，其行宫就在华州公署内。唐王朝的中央政府在华州运作达两年之久，但唐昭宗及朝廷被韩建控制，听由他的摆布和擅政专权。唐昭宗形同软禁，没有自由，极其苦闷忧惧。乾宁四年（897）七月的一天，唐昭宗与学士、亲王登栖云楼观景散心。只见眼下是辽阔的平原阡陌，西望是遥不可及的京城长安，北望是蜿蜒的渭河及苍茫的渭北高原。唐昭宗见景生情，感慨万端，悲愤交集，令宫廷乐工唱他填就的《菩萨蛮》一词，词曰：

登樓遙望秦宮殿，茫茫只見雙飛燕。渭水一條流，千山與萬丘。

遠烟籠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

樂工唱畢，在座者皆泣下沾襟。這詞中表達了唐昭宗在被藩鎮凌逼，倉皇出逃，陷於華州後，亟盼返回京城長安的憂憤、危懼之情。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唐朝末年分崩離析，行將亡國的現實。這闕詞，在中國詞的早期發展史上，也是有重要位置的。

乾寧五年（898）八月，昭宗的車駕離開華州回到長安。唐昭宗及其朝廷困於華州達兩年之久的噩夢結束了，但6年後，昭宗被軍閥朱全忠（即朱溫）派人殺死，9年後，唐王朝就徹底滅亡了。

數百年後，元朝著名詩人楊維禎到華州，寫有《題棲雲樓詞序》，詞曰：

棲雲樓，渭水一條流。獨飛燕子，春來秋去春復秋。碧雲四合凍生雀，愁殺纒千頭。

此詞以唐昭宗在華州事，感嘆唐昭宗的悲慘命運。只是不知楊維禎棲雲樓懷古時，棲雲樓是尚在還是毀而重建？可以知道的是，明朝時棲雲樓已經毀圮，據萬曆初年的《華州志》記：“左右台址尚存。”清朝著名文學家王士禎於康熙十一年（1672）出使四川，經過華州，凭吊了棲雲樓故址，發思古之幽情而賦詩一首：

棲雲樓上望京師，渭水東流無盡時。父老尚傳行幸日，教坊曾譜斷腸詞。城空只見雙飛燕，劫敗猶爭一局棋。莫問寒山十六宅，土花凝碧至今悲。

同治七年（1868），在棲雲樓故址處建了正宅五間，即今之“五間廳”。2012年，縣人民政府搬遷後，此處已在咸林中學校園內。

歷史上的棲雲樓早已不存，2005年建設華州公園時，為記住這座華州歷史名樓，借用其名，將建好的樓命名為“棲雲樓”。唐朝棲雲樓的形狀規格我們已經無從知曉，但唐昭宗的宮廷樂工在樓上可以擺開場面演奏演唱，應當還是不小的。現在的棲雲樓顯然太小，建築也不是唐代風格，又不在原址處，但無論如何，“棲雲樓”三個字，可以留下那一段歷史的記憶，留下唐昭宗李晔《菩薩蠻》詞的千古韻律。



华州公园西门外的“华彩”雕塑

闫广勤

连霍高速的华州出口处、华州公园西门外有一座高 22 米高的雕塑，由三根



华彩雕塑

立柱和一朵玫瑰花图案组成。这是华州区的地标，是华州的象征，是华州区各种雕塑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座。这座雕塑名称为“华彩”，建于 2003 年元月。

华彩雕塑，中间拔地而起的三根立柱代表华州区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不断腾飞的地方经济。

历史这根立柱，以 8000 年的考古发现和 3000 年的文字记载为支撑。文化这根立柱，以杜甫在华州的诗作，文学家李廌、王维楨等人的人文之盛，皮影、面花等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咸林中学等校的教育开拓为支撑。地方经济这根立柱以华州数十年来的蓬勃发展、日益昌隆为支撑。

围绕三根立柱的玫瑰花图案，源于华州区泉护村（在柳枝镇）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距今约 6000 年。这种陶器上有花卉纹，以二方连续、间或以三方连续等形式绕器装饰。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这种花纹是玫瑰花图案，是仰韶文化的标志。

连接玫瑰花和立柱的，是五弦七彩杆，展现着这块古老热土将谱写更加华美的乐章并创造流光溢彩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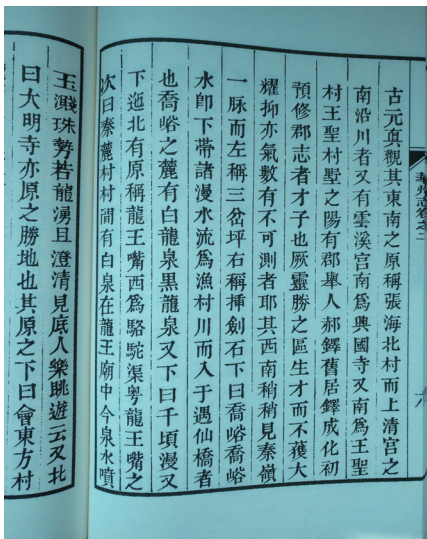
历史文献中的“桥峪”

秦 寂

桥峪地处大明镇南部，是华州区境内较大的一条山谷峪道，不但山清水秀，风光旖旎，而且历史记载也比较多，其名称也屡有变化。

桥峪最早的记载见于先秦古籍《山海经》，当时称其为符禺山。《山海经》记符禺山的南面盛产铜，山北面盛产铁。山上有一种树木，名称是文荃，结的果实像枣子。山中生长的草大多是条形，形状与葵菜相似，但开的是红色花朵而结的是黄色果实。山中的野兽大多是葱聋，形状像普通的羊却长有红色的鬃毛。上文中的“铜”“铁”指天然矿石。“葱聋”，古人说是野山羊的一种。

北魏时成书的古代中国地理名著《水经注》，对此山谷峪道也有记载，不过只记了招水，即今桥峪河，可知今桥峪当时称招谷（或招峪）。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之一的《新唐书》记载唐朝华州郑县（今华州区）有“乔谷”，北宋时的地理书《太平寰宇记》对“乔谷”之名的来历作了解释：“即王乔所隐之处。”意思是古代隐士王乔在此隐居而得名“乔谷”。隐士王乔在历史上有四个人，一是春秋战国时的越人，二是东周时的周灵王太子，三是西汉时的蜀人，四是东汉时的叶县令，不知在“乔谷”隐居的王乔是哪一个？《太



明《华州志》对乔峪的记载

平寰宇记》还记乔谷有王乔祠，每年都有祭祀活动。



桥峪水库

到了明朝，“乔谷”已称为“乔峪”。明万历九年（1581）的《华州志》卷二记：“曰乔峪，乔峪水……流为渔村川，而入于遇仙桥者也。乔峪之麓，有白龙泉、黑龙泉。”但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续华州志》称“乔峪”为“招峪”，

这是作者泥古不化，喜欢使用古称之故，并非清朝时乔峪改称招峪，清朝光绪年间的《三续华州志》仍称“乔峪”可证。清《续华州志》中有一篇乔峪游记，其中记入峪三里为车厢坪，七里至崔家店，十里至张雁口，十三里为光石板，二十里至党家店，二十五里有孔家店，又三十里至三岔坪。作者对上述各地的地形风景都有描写，记录下清朝康熙年间乔峪风貌。民国时的《重修华县县志稿》对桥峪有多处记载，但仍写成“乔峪”。但不知从何时起，华县民间就将“乔峪”写成了“桥峪”，约定俗成，“桥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反而成了这条山谷峪道的正式名称，见诸于各种政府文件、宣传材料。1969年始修的桥峪水库，先后动员了数万劳力，使许多从不知道桥峪的华县人，在建设工地上的宣传标语、工地小报、壁报专栏中见到无数的“桥峪”一词，留下深刻印象，更使此名远播。

在此，还想对桥峪河的河道变迁介绍一下。桥峪河发源于桥峪老牛山下，出峪口后北流入渭河，其下游称为遇仙河。据《续华州志》《重修华县县志稿》记载，先时，桥峪河出峪口后北流不远即西流，经高塘入赤水，而今大明镇金惠地区南部的金堆峪水西北流直接入渭，称遇仙河。明永乐年间（1403-1424），桥峪洪水暴涨，使出峪口后的河流改道，直下流入渭河，流为今遇仙河，而金堆峪水反而成了桥峪河（遇仙河）的支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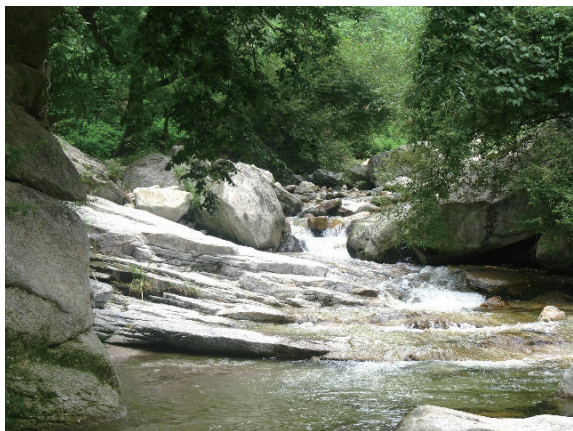


风光旖旎的桥峪

邵拉雄

桥峪位于大明镇南部山区，是华县最长的峪道之一。桥峪在战国时的古书《山海经》中称为“符禺之山”，后因传说中得道成仙的王乔曾隐居于此而得名“王乔谷”或“乔谷”。《新唐书·地理志》有“引乔谷水，支分溉田”的记载；北宋的地理书《太平寰宇记》云：“王乔谷，俗谓太公谷，即王乔所隐之处，谷有乔祠堂，岁常祠之。”而后经岁月沧桑，此峪道之名演变成“桥峪”。

桥峪是一条大峪，35公里深，入口处，桥峪水库大坝横卧峪口，“桥峪水库”



桥峪流水

四个石砌大字赫然入目。站在坝面，南观碧水青山，北望黄土台塬，顿感川原相间，天高地宽。桥峪水库是20世纪70年代，全县十多万人民投工投劳全力修建成的。1969年11月23日至1973年4月，华州儿女聚集桥峪口，没有机械化器械，运土载石，依靠架子车、

独轮车。春节不放假，水库不下马。工地上，红旗飘扬，号子声、叮咛声、喇叭声，响成一片，炮声隆隆，尘土滚滚，历时4年完成主体工程。大坝为黄土夯实，料石砌面，高55.2米，长225米，宽5米。水库总库容946万立方米，有效库容404.3万立方米，1975年1月完成大坝加固工程和遗留土方工程，累计耗用407万个工日，完成土石方191万立方米。大坝运行30多年，不断修复



完善，继续造福华县人民。每至盛夏酷暑，大车小辆，云集水库，纳凉避暑者不计其数。

水库上行一里有东砭和西砭，由西砭穿行，翻岭可到蕴空山。继续从正峪顺河往里走，有凉水泉。



桥峪溪流

凉水泉离峪口近 5 公里，有一块小平台，几户人家，凉水泉学校就在这里，是一所五年制学校，当年有数名老师，百余名学生，是桥峪的文化中心。

由凉水泉向里走，河东从北向南依次为锭子沟、石锭沟、张沟和椿岔，河西从北向南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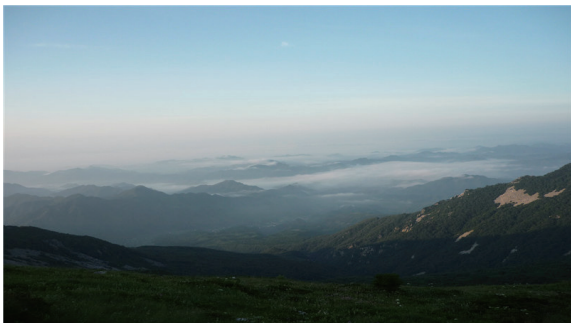
次为齐沟、散桥沟、石门沟、火泉沟，沿途 5 公里有锭子口、桥峪村、店子、高石崖湾、火泉口，不时有土墙民房，零零散散，简简单单。家家门前窗下或小院树下，或靠墙，或挨树，堆码着整整齐齐、层层叠叠的柴垛。河道里则是高低起伏、大大小小的乱石，进山路蜿蜒于乱石滩中，遇需过河处，有列石为路，当地人有“紧过列石慢过桥”之说。从椿岔往南，河西有北极沟，北极沟口有人居住。由北极沟往南不远，东坡山路转弯处的平台边上，长着一棵铁木姜大树，树干一搂有余，树冠约 30 平方米。再上行，河西山崖，形若大鱼，是桥峪有名的石鱼。石鱼上行不远，河道中有几块巨石相夹，流水从夹缝飞流直下，激起雪白浪花，形成一个大潭。潭水平静，颜色碧绿，水面直径约七八米，中间深二三米，人称老虎潭。老虎潭上下河道宽阔平缓，河道连山石如碧玉铺垫，水流其上，清澈透亮，绽放舒展，如锦似缎。上行二三里，水之北、山之南，有一块小平地，几间灰瓦房，两三户人家。住房门前，架木为桥。三股溪水，汇流于此，故称三岔坪。三岔坪离峪口整整 15 公里，东面流水向西而来，其沟较阔，山崖层层，密林丛丛，名叫中龙。中龙里一条岔沟叫错岔，错岔内有个



风光旖旎的桥峪

马沟大洞。据传，当年有个“陈半仙”去世于此，附近的南宁窝有其“悬棺”瓮。中龙是桥峪的正峪，溯流而上 15 公里，翻过岭头，可到金堆西坪。

三岔坪西边的沟岔叫石臼，进石臼沟 1 公里，沟南有个小岔，清澈的溪水，静静流过光滑的石皮，发出淙淙响声。一个小石潭正好在溪流中，呈老式清油灯形状，故取名“灯盏窝”。溪水注入“灯盏窝”，慢慢旋转一圈，又流出去，继续下山，“灯盏窝”的水，绿中泛黄，底部细沙碎石粒粒可辨。传说，当年此地藏有无数真金白银、珍珠玛瑙，被盗宝贼发现了，金银财宝被盗得一干二净，只留下“灯盏窝”这一奇观。从灯盏窝顺流而上 10 多米，有三间房大一块巨石横架于沟渠。巨石底部呈弧形，溪水穿流而过。巨石顶部呈长方形平面，人可在其上自由行走，是座天然石桥，故取名“天桥子”。石臼沟内，尚有两户居民，以做庄稼、挖药材为生。



壮美桥峪

三岔坪正南为龙江。龙江沟内，山峰峻秀，水丰林密，盛柳夹岸，如列盆景，卵石出水，酷似珠玉，确有柳暗花明之韵味，两户居民在此放羊做庄稼。白天，小溪两岸洒满阳光，羊钻林子鸟飞翔，流水穿

石翻细浪。夜晚，明月挂在东山尖，月光如水，繁星眨眼，林涛树影轻婆娑。不少驴友被龙江的静谧奇特所吸引，不禁由衷赞美：山水锦绣颂龙江，风吹柳摆花更香，流连忘返不肯去，谁言此处非天堂？

桥峪约 35 公里，河两岸群山连绵，层层叠叠，与其他峪道相比稍宽阔平缓，向南可到金堆和商洛，交通相对便利，古为交通要道。2008 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文物工作者首次发现桥峪从锭子口到中龙沿河东岸，有延续 20 多公里的古栈道遗址。如今，栈道已毁，仅有 85 个凿在石崖上的石窝，石窝有楔形、方形和圆形。当年，在石窝里插入结实牢固的石桩或木桩，便可在悬崖峭壁上搭建高空栈道。专家推测，该栈道为汉至元代时华州经桥峪来往于金堆和商洛



的一条交通要道。这些石窝里尘封着许多古老而神奇的故事，承载着遥远而厚重的历史。虽然大自然的风雨把这条悬空栈道剥蚀得无影无踪，人们依然可以遥想当年商贾的脚步，奔腾的马蹄，悦耳的铃声。到明清、民国乃至 20 世纪 60、70 年代，桥峪仍为通往金堆要道之一。1928 年 4 月，渭华地区党组织选调的二三十名党团员和农运积极分子，去洛南县三要司许权中旅接受短期军事训练，途径桥峪，回来后组建了陕东赤卫队，在渭华起义中威震陕东。1946 年，曾修通桥峪至洛南山路 92.5 公里。

改革开放前，华县派任金堆从事教育工作的塬区教员，也是经桥峪，步行百里去金堆任教的。

改革开放后，实施“山川秀美工程”，桥峪林木有所发展。1997 年 7 月，杏林人李斌芳承包了桥峪大麦石沟 9000 平方米的绿化工程，当年投资 10 万元，买料雇工，打墙封沟，制订计划。1998 年又投资 10 万元，栽植花椒 8 万株。1999 年春再投资 10 万元，在平台地栽植 4 万株猕猴桃和仁用杏，使大麦石沟的荒坡荒沟得到绿化。



桥峪风光

华州圣山古八景

雷凤侠

华州历史悠久，河川秀美，文化底蕴深厚，历来是文人墨客吟诗颂文游玩之地。明、清、民国均有“华州八景”之说，而今天我想说一下鲜为人知的“华州圣山古八景”。

圣山位于台塬区西北部，现隶属高塘镇。箭峪河与涧峪河在其境内缓急而流，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庄，这里原有自然村庄30个。圣山是华州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据考古发现，早在约公元前3000—公元前2000年的父系氏族时期，就有先民在今圣山大王堡等地使用了灰坑、细泥红陶、夹砂红、灰陶等器物，据考证为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迹。

圣山村就在圣山川口。明《华州志》载：“圣山直通川外，刊木以需民宫室，器用以需邻邑之樵苏者。又川多稻稭之畦（按竹苇今为该村产物，亦著名）。富贵家苑囿之盛，古今为然。”又载，“郡人东汉有圣山野亭八咏：（一）钓渚清溪；（二）村田白鹭；（三）万壑风烟；（四）池堂春草；（五）新篁交翠；（六）乔木垂阴；（七）清波鱼戏；（八）紫岩莺啭。”是为圣山八景。

从古志中叙述文字看，圣山村为山之关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竹子为该村一大景观，是谓“新篁交翠”。圣山村的竹子在当时是很有名的。

根据志书中描述的景象，我们不难想象出这样一个绝美的世外仙境：箭峪河与涧峪河在圣山川道穿过，山河交融，时缓时急，因势而流，或成清溪，或成池塘。每到春夏，溪水叮咚，鱼戏清波，百鸟争鸣，紫岩莺啭；小溪两岸，乔木垂阴，新篁交翠；池塘内外，春草油油，绿波荡漾；村前村后，白鹭成行，万壑风烟；偶然一瞥，却见一簪笠蓑衣，在清溪旁，浅浅垂钓。



如今，圣山古八景，大多已萧索或不复存在！然而，我们通过华州圣山这些人文自然历史景观，可以学习圣山古文化，追溯其历史渊源，借古推今，把今日圣山打造成更加一流的华州美丽乡村。

作者简介

雷凤侠，女，1974年出生，曾在华州区地方志办公室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



圣山的竹林

高塘竹海

王红旗

北方的冬天是寒冷的，万木凋零。满山遍野的树木落完了叶子，光秃秃的。没有了春天的花红柳绿，草木葳蕤；没有了夏日的枝繁叶茂，大树浓荫；也没有了秋季的瓜果飘香，层林尽染。

虽是大雪节气，可入冬一个多月来没有点滴雨雪，天气干冷干冷的。八方四野，空旷萧条，没有了一点绿色，没有了一丝生机。在寒风凛冽中，北方的人们渴望着春的温暖，企盼着夏的热烈，更希冀着秋收获。

如果你来到秦岭北麓的高塘塬，这里有一个地方叫竹溪里，恍若另一个世界，这里是冬天里的春天。

竹溪里，远远望去，满眼尽绿，青翠欲滴。占地千亩的大竹林，像在大沙漠中遇到一片绿洲一样让你惊喜，令你心驰神往。

沿着渭华起义纪念馆红色旅游公路疾驰而去，半个时辰就到了竹溪里。“竹园、竹林，不！真是一片竹海啊！”我惊叹地喊道。

“参天”的竹子，像胳膊粗壮，密密麻麻，挺拔向上。翠绿的竹叶在微微的寒风中舞蹈，清香扑鼻，沁人肺腑。灿烂的阳光从竹林顶上穿过缝隙照射进来，斑驳陆离，时有时无，阴阳交错，亦真亦幻。光影一会离你而去，一会又追你而来，好



竹林



像在和你嬉戏。地上厚厚的竹叶，踩在脚下，软绵绵，光溜溜，很有滑草的感觉。

竹子喜水，水绕竹林。听着流水汨汨，我们顺水往上寻，源头竟是很多的泉眼，咕咚咕咚地往上冒，冒出的泉水冲腾着热气。我伸手去摸，热温温，软绵绵，就像十七八岁姑娘的手。我弯腰一掬，捧进嘴里，香甜极了，甘泉玉浆一般。怪不得这里茂林修竹，枝繁叶盛。

泉眼周围，两尺深的水潭清澈见底。几个村姑，有的在浣衣，有的在淘米洗菜，我问她们：“这竹园有多大？”“大着呢！从村北到村南都是的，一组、二组、三组、四组，一村连一村，一片连一片。”

村姑抬头打量了我一眼，看我不像高塘塆上人，又关切地问道：“你不是走迷了路吧，出不去了？”

“嗯！”我不好意思地回答道。“你往前边那条小路上走，走上半里路，有一座木桥，就到河边了，河边有公路。”



竹溪里

我走在竹园小径，曲折迂回，有点阴森，静谧得有些害怕。我想曲径通幽，就大声地吼道：“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往前走，莫回呀头……”吼着唱着，终于走出了望不到边的竹林。我站立在木桥上，河水从脚下流过。过来一位老翁，嘴里叼着旱烟袋，我上前和他搭讪，聊起话来。他说：“这河水早先老大了，河上一连串有四座水磨子，一家油坊，都靠河水推着转，高塘塆上人磨面吃麦子、榨油菜籽油都在这竹溪里。”

河水欢快地流淌着，河边长满了一些小竹子，一阵风猛吹过来，竹子枝头的叶子被压进泥水里，风儿掠过，竹子又挺起头来，叶儿更水灵灵，深绿绿的。

“风压竹子低，虽低不沾泥。”这就是竹子的品行。

高塘竹海

河边，一片片湿地，水汪汪的；路边，一片片草地，绿茵茵的。

前面是一片新栽植的竹子，地里空间，崖边路旁，长了一些白蒿、蒲公英、枸杞子。我和妻正走着，她却停下步子，蹲下去挖药草，像见到宝贝似的稀罕。妻是学中医的，她说：“正月茵陈好，冬天的茵陈救命的草，可以蒸茵陈麦饭，喝茵陈汤，保肝养肝。蒲公英冲水当茶喝，清热解毒。”

妻挖着药草，我又去了竹林里，捉住一棵碗粗细的竹子使劲地摇晃，顶撞得一片竹子都跟着摇晃起来，哗啦啦地一声响，一群鸟吱呀呀地飞出竹林，飞向湛蓝的天空，排成一行，又落到另一片竹林子去了。

走了老半晌，好不容易走出了竹林。华州区渭教办主任余忠民带我来到渭华起义纪念馆，这里还有一大片竹林，一渠清水从竹林间穿出，流入纪念馆的红湖。近处高耸的渭华起义纪念碑，渭华起义英雄群雕和翠绿的竹林，与远处巍峨的秦岭倒映在水中，湖光山色，美妙极了，像一幅山水画。

“若知有高塘，何必去蜀南。”高塘镇党委书记杜向宏对我说：“我们正在打造竹溪里古镇，以竹海为主题，建设绿色高塘。”

到了铁里村，副镇长汪璠正忙碌着和群众房前屋后栽竹子，听她风趣地和农民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



高塘竹溪里

令人瘦，无竹令人俗。”高塘人打造出了一个高塘的“蜀南竹海。”

朋友啊！早知高塘有竹海，何必蜀南去寻竹。

高塘竹海，真美！

作者简介

王红旗，1958年出生，曾任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渭华起义纪念馆

石 娟

1928年5月，爆发了以华县（今华州区）高塘、渭南县（今临渭区）塔山为中心的渭华起义，渭华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全国最具影响的起义之一，它打响了西北武装革命的第一枪。

渭华起义纪念馆就坐落在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高塘镇东南，这里地势挺拔，南接秦岭，北临渭水，西距古城西安90公里，东距少华山风景区50公里，地处陕西省旅游东线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骊山风景区之间。成为人们瞻仰先烈、参观学习、旅游观光及爱国主义教育的平台。渭华起义纪念馆是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渭华起义指挥部旧址为依托建立起来的革命纪念馆。

1957年5月31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将渭华起义旧址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成立渭华起义旧址高塘文管所。1981年后，省、市、县人民

政府先后拨款对旧址进行了维修。1985年8月，经中共中央办公厅同意，陕西省委批准在渭华起义旧址建馆修塔。渭华起义纪念塔始建于1986年7月，1988年5月在渭华起义60周年纪念活动之际，塔馆建成并对外开放。



纪念碑

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2016年5月，华州区对原渭华起义烈士纪念塔进行重建，改塔为碑，新的渭华起义烈士纪念碑总建筑面积2849平方米，其中纪念碑基座121平方米，碑前广场2728平方米。碑身高19.28米，碑前5步台阶，象征起义爆发时间是1928年5月，碑身面向西北，象征渭华起义为西北地区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碑身下座正面镶有大型铜质群雕，纪念碑正面刻有邓小平同志题词“渭华起义烈士永垂不朽”十个大字。碑身背面有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撰写的碑文。

渭华起义纪念馆是目前陕西省东部最大的红色旅游景区，占地面积37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649平方米，由渭华起义指挥部旧址、陈列大厅、中心广场、烈士纪念碑四部分组成。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10年被评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2011年被评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2016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确定渭华起义纪念馆为“陕西省干部培训党性教育基地”。同月，渭华起义纪念馆被国家发改委、中宣部等14家单位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馆内收藏文物157件，各类照片1200余幅，文献资料75件（原件32件），



渭华起义旧址

特别是完好地保存着 1927 年 11 月共产党员陈述善、李维俊带领高塘、谷堆两校师生用青砖、鹅卵石铺砌的标语：“同志们赶快踏着先烈的鲜血前进啊！！！”它被誉为镶嵌在渭华大地上的特殊标语，属于国家一级革命类文物。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习仲勋、徐向前、汪锋、高克林等人对渭华起义给予高度评价并分别题词。邓小平的题词是：“渭华起义烈士永垂不朽！”习仲勋的题词是：“渭华起义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徐向前的题词是：“为革命牺牲精神永存，”习仲勋同志还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

原渭华起义纪念馆属华州区文物旅游局管理，渭华起义纪念塔（碑）属华州区民政局管理，2017 年 7 月，华州区将原渭华起义纪念馆和渭华起义纪念塔管理处合并组建渭华起义教育基地管理办公室。属于区政府管理，一级事业单位，总占地面积 51000 平方米，由渭华起义旧址（包括渭华起义司令部旧址和高塘会馆、三教堂、药王庙、郭家庄小庙）、陈列大厅、中心广场、渭华起义烈士纪念碑等部分组成。



作者简介

石娟，女，1984 年出生，现于华州区地方志编纂中心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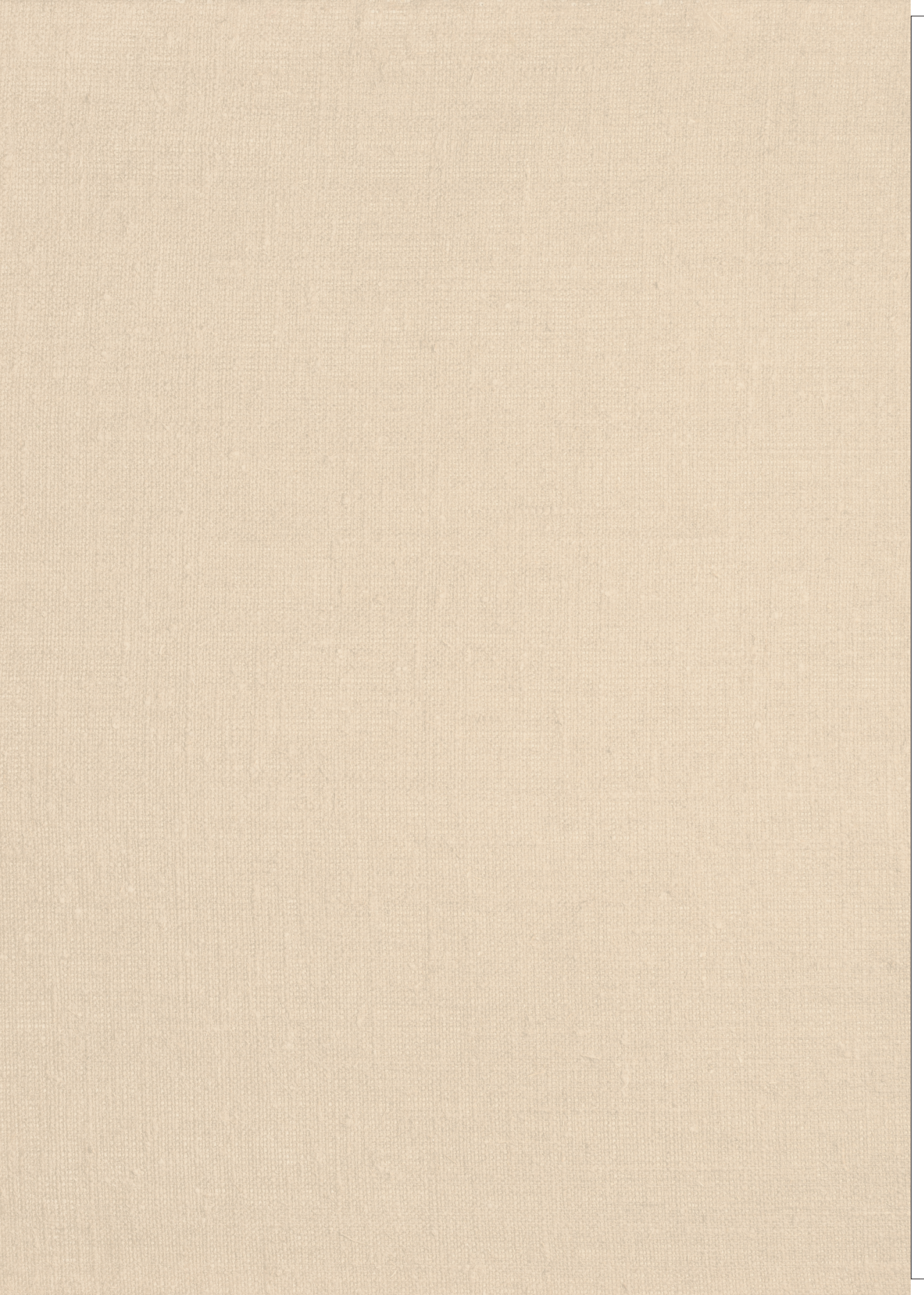




人物荟萃

郑桓公像





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郑桓公

闫广勤



郑桓公是华州区的历史名人，是周王朝时的大臣，诸侯国郑国的开国国君，是天下郑氏的始祖。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不是一般的大臣和国君，而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这主要表现三个方面：

首先，郑国东迁是他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的政治抉择。

周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806年），郑桓公被分封于郑（今华州地区），建立了郑国，“封三十三岁，百姓皆便爱之”（《史记·郑世家》）。但在担任周幽王的司徒以后，却作出了将郑国东迁到今河南洛阳以东地区的决定。

郑国东迁的原因，是因为周幽王沉湎酒色，不理国事，在位期间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化，政局不稳，自然灾害严重——泾、渭、洛“三川皆震”。为政贪婪腐败，重用“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的虢石父主持朝政，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引起国人怨愤，各诸侯国离心离德。犬戎不断侵入镐京所在的关中，周王朝内外交困，风雨飘摇。郑桓公看到了这一点，作为周幽王的叔父和司徒，他为挽救周王朝肯定作了什么，可惜史料没有记载。周幽王无可救药，郑桓公



只好拯救郑国，遂问计于太史伯（又称史伯）。太史伯劝郑桓公将郑国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以东，黄河、济河之南的河雒地区。这一地区，在郑桓公为司徒以后，曾“和集周民”，因而“周民皆说，河雒之间，人便思之”（《史记·郑世家》）。郑桓公在这一带有比较坚实的民心基础，故郑桓公听从史伯的建议，在请示了周幽王以后，在商人的协助下，将妻、子和财产寄存到洛邑以东的东虢国和郟国之间，为以后他的儿子郑武公完成迁国做了铺垫。郑桓公去世后，其子郑武公在继承父志，完成郑国东迁的同时，还辅助周平王东迁，定都洛阳，历史进入东周时期。可以推测，郑桓公在征求史伯意见之前，为郑国，为周朝的长远大计，就早有谋划，在去世前，应向儿子郑武公有所交代。这就是一个政治家的高明之处。

另外，郑桓公是一个有一定哲学思维的政治家。在他征求史伯意见时，他们讨论了“和”与“同”的哲学问题，这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出现的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和”的思想，从史伯起绵延不绝。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即“和”是不同事物或不同因素的结合，是差异性的统一。“同”是完全等同的事物或等同因素的重合，是排斥差异性的直接同一。史伯主张以和治国，反对强求“同一”。其实，郑桓公任司徒时，史料就记他“和集周民”，可见他以“和”的理念治国、治民。“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郑桓公是实践这一思想的第一人。

郑桓公作为深谋远虑政治家的第三个表现，是提高商人地位，促进商业发展。西周实行“工商食官”，的政策，将商人集中起来，设官统一管理，为他们提供衣食，驱使他们为政府服务。商业操纵在官府的手中，商品交换只能在官府允许的范围内有限度地发展。周王室和各地诸侯等贵族奴隶主用官府的名义直接控制着商人，其身份不属于私人奴隶主，而是国有奴隶，比奴隶要自由一些，但社会地位也不高，仍属平民阶层。到了西周后期，开始出现一些不属于官府的私人商业，形成一种社会力量，但仍很弱小，并且继续受到奴隶主王室和权贵们的歧视与压制，商人与商业始终处于卑微的地位。但郑桓公却提高了商人的地位，他与郑国的商人建立了“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巧夺。尔有利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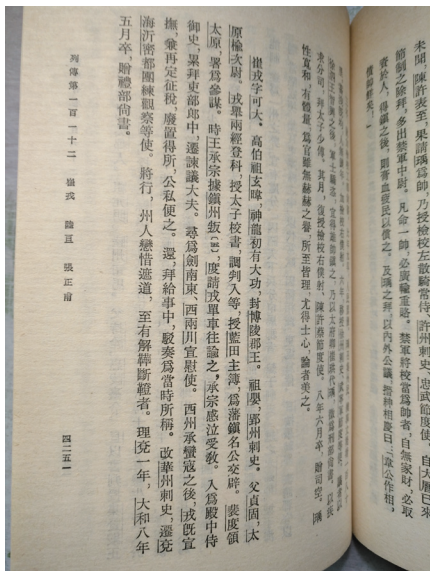
宝贿，我勿与知”的质誓，意思是：“你们不要背叛我，我不会强买强卖，更不会抢夺你的财物。你出售宝物，我也不会过问。”也就是说，郑桓公给商人提供良好的商业环境，不强买或夺取商人的货物，不干涉商人的经营。商人有值钱的宝物，也不去关心。国君发话了，商人的地位自然得到提高，商人的利益得到保护，商业得以自由发展。在这一点上，郑桓公走在时代的前面。

东迁以后的郑国，在春秋早期，曾是一个强盛的诸侯国，而奠定其基础的，就是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郑桓公。



从“脱靴断镫”话清官崔戎

雷凤侠



《旧唐书》崔戎传

崔戎（？——834），字可大，博陵（今河北定州）人，科举入仕，以关心百姓疾苦利害为己任，积极主动地为百姓办好事，获得百姓爱戴。唐朝文宗时的大和七年（833）至八年（834）任华州刺史。他为官清廉勤政，爱民如子，尤以任华州刺史时传为佳话。《旧唐书·崔戎传》有“将行，州人恋惜遮道，至有解靴断镫者”记载。

万缗私钱，留作军用

按照华州惯例，官作至华州刺史，则可置钱万缗（古时成串的铜钱，一串千文），向为私用。然而崔戎到华州任职后，一改往日陈规旧习，分文不取。而在其离任时，将此钱充作军用，并叮咛州吏：“这笔公款，留作军用，以改善士兵生活。从我起纠正这一惯例，以激励后来者廉洁从政。”华州百姓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敬佩这位清廉爱民的刺史，深受感动和鼓舞。这就是崔戎，在他心里，永远装的是社稷，是百姓，而不是自己，这是何等的为官境界！

教化有方，华州成为大治之州

崔戎为官，待民平和。他平日时常教育百姓邻里要和睦相处。有一次，一家兄弟为分家不均到州衙诉讼。崔戎在调解家务事时，并没有过分地责怪兄弟

中任何一方，而是认为兄弟不和，是官吏之过，并情不自禁地垂泪自责道：“华州紧靠京都，受皇恩教化日久，竟然还有亲骨肉为争财寻衅相残。这都是我在任教民不力啊！”兄弟二人及其母见到这种情景，皆受感悟，羞愧难当，争相认错，从此一家人不再分家，重归于好，和和睦睦住在一起。崔戎言传身教，教化有方，从此不再有人因琐碎小事来州衙告状，华州也成了大治之州。

百姓“脱靴断镫”，泣请留任

崔戎在华州做官期间，最感人的一幕则是他升任兖、海、沂、密都团练观察使时，离别华州时的感人场景。当时，这个消息刚一传出，百姓纷纷在他离任华州那天，扶老携幼，蜂拥而至，恋留挡道，泣请留任。父老乡亲们有人甚至用“脱其靴子，断其马镫”这种举动来挽留他继续留任华州。还有人聚拢到负责调动官吏的专使面前哭诉，求专使上奏皇帝，收回成命。专使深为感动，答应代为禀奏。

崔戎行程被阻，脱身不得，便劝慰百姓不可违抗朝廷旨意。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说：“挽留大人，触犯了皇帝，皇帝不过是杀我们几个带头前来的无用老人。只要大人还能留在华州，我们就是被杀，也心甘情愿！”

当时，那情那景，在华州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而，终究皇命难违，崔戎只好在夜里自己一个人骑着马悄然离去。从此，“脱靴断镫”成为一个典故，在华州大地一时传为佳话，流传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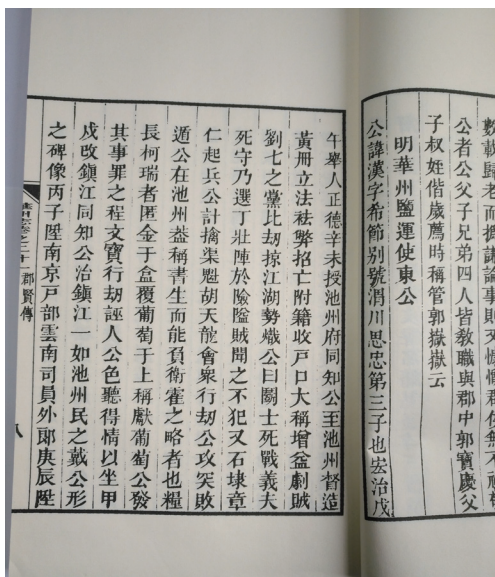
脱靴断镫

清廉刚正的东汉

王小军

东汉（1475—1541），字希节，别号渭川，东升之孙、东思忠三子，明华州故县里（今渭南市华州区杏林镇梓里村一带）人，弘治十一年（1498）戊午科举人，官至盐运使。东汉为官清廉刚正，造福地方，平定兵乱，安抚百姓，是明代著名的廉吏。

东汉在任池州府同知期间，征解田粮的粮长叫柯瑞，藏金于盒中，上面覆盖着葡萄，以献葡萄为名，借机行贿。被东汉发现后，东汉毫不留情，将柯瑞治以重罪。一个叫程文宝的人打劫财物，却诬陷他人。东汉在公堂上观察程文宝的神色，结合其言辞表



明《华州志》的东汉传

现，经推理判断，还原案件真相，终将程文宝治罪，案件得以公正裁决。

东汉初到池州上任，即颁布新令，祛除旧弊，招抚流亡在外的难民，重新编造户籍，并严加管理，使百姓安定生产，赋税收入也随之增加。在任户部河南司郎中期间，在江西查粮，发现并革新多年沉积的弊病，为朝廷追回皇粮五百万石。任九江知府期间，有一年发生饥荒，东汉下令打开粮仓，赈济灾民。临近州郡的百姓也来领取救济粮，东汉说：“奈何分彼此邪？”他一视同仁，无论是不是本州郡的灾民，全部发给救济粮，使更多灾民得以活命。任盐运使后，

东汉也能革除弊政，加强流通，使盐商获得便利。

东汉刚正不阿，一身正气。任职池州期间，正值刘七等发动农民起义。刘七率部攻入江南，多次进犯，形势危急，东汉宣告说：“斗士死战，义夫死守。”并挑选壮丁在险要隘口提前布防，严阵以待。刘七等听闻此事，不敢进犯。后石埭的章任又率众起兵，东汉用计谋擒住章任。胡天龙组织会众行劫，东汉亦率众攻击使其逃遁。东汉任职户部河南司郎中期间，正值宁藩之变，他拨款征募士兵，积极参与平叛。在九江知府任上，他修葺文庙，并组织追歼盗贼。镇守黎太监，倚仗宦官权势，在见到东汉时傲慢无礼，东汉一身正气，拂衣而出。锦衣卫的使者来到九江，原本希望到东汉府上拜会，当得知他为人刚正后，竟然不敢前往。因此，巡抚和巡按向朝廷推荐东汉为九江兵备道。由于当权者阻挠，故并未上报。

东汉确是一代廉吏，明华州人、文学家王维楨曾如此描述东汉：“躯满七尺，而面如紫玉，坐立如山。”学者马理评论他：“温恭而刚方不形，直方而毅果不见，宽栗而通敏无迹。”张光孝说：“公在池州，盖称书生，而能负卫霍之略者也。”由此可见，东汉刚正勇毅，令人钦佩。另外，他还颇具文采，曾著有《渭川集》二卷，真所谓“上马能杀贼，下马亦能文”。

作者简介


王小军，1977年出生，现在华州区渭华起义教育基地管理办公室工作。



华州在明清时的几位廉吏

闫广勤

刚正不阿的监察御史东郊



东郊，明朝华州故县里（约在今杏林镇故县村及其附近一带）人，字希宋。正德六年（1511）进士，授平阳府（今山西省临汾）推官，后升任浙江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行使监察之权，不仅可对违法官吏进行弹劾，也可由皇帝赋予直接审判行政官员之权力，并对府州县道等衙门进行实质监督，也可在监察过程中对地方行政所存在的弊端上奏。防范公家官吏侵害人民权益，或者是成为贪赃枉法的贪官污吏。东郊在监察御史任上，敢于上疏直谏，大胆揭露奸臣丑行。明武宗常借口巡边，抢掠妇女财物。一次武宗又欲巡行居庸关，东郊恐此行扰民为害，立即上疏进谏，竭力劝阻，使朝野内外大为惊愕。明武宗的亲信钱宁收受贿赂，东郊据实论奏。明武宗的另一宠臣江彬，依仗权势，索夺妇女珍宝，东郊予以揭发。太监张阳欲将百艘盐船强卖给州县，地方上不堪扰害，东郊力为禁止。明《华州志》称赞东郊在监察御史任上“桓善除恶，风裁犹著”，意思是惩恶扬善，刚正不阿的品格尤为著名。但佞臣贪官对东郊却恨之入骨，将他贬为潞州（今山西省长治）判官。东郊气愤之下，申请辞职回乡，脱离了宦宦生涯。

当官为民的郭宗振

郭宗振（？—1643），明朝华州甘泉里（约在今县城三门巷及其附近地区）人，字胤震，万历三十一年（1603）举人。先后任河南孟县和永城知县，寿

州（今安徽寿县）知州、刑部员外郎等职。

孟县地处交通要道，官差过往频繁，供给全部取之民间，百姓不胜负担。郭宗振力主革除。孟县额外的赋税几达四千金，郭宗振与上司力争，得以罢免。永城多豪绅巨室，号称难治。有一豪绅之子强夺民田，逼死人命，郭宗振不畏权势，将豪绅之子绳之以法。寿州北水害严重，居民被迫流亡他乡。郭宗振捐薪俸五百金，盖房架屋，招回灾民 60 家，人称此地为“郭公集”。寿州境内荒地甚多，郭宗振设法招抚，供给耕牛、籽种，宽免税赋，荒地渐次得到开垦。他在任刑部员外郎时，曾于崇祯九年（1636）奉命至四川，闻知两个军官触犯刑律，欲予以追究。有人说情为之开释，郭宗振不为所动，坚持以法处理。

为官廉洁的党声震

党声震，清朝华州党家河（在今莲花寺镇）人，字丕承。康熙五年（1666）举人，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授直隶（今河北省）成安知县，后升工科给事中。康熙三十五年（1696），曾主持福建的科举考试，后又任礼科掌印给事中，党声震一生为官廉洁。康熙四十三年（1704），他告老还乡。离北京后，有人上奏清圣祖，说党声震所携赃财甚多。清圣祖大怒，立即派人将党声震追回，拆开行装一看，尽是纺成的线缕。清圣祖十分惊讶，党声震说：路费拮据，以此补路费不足。清圣祖很感动，欲赐重金，党声震不受，清圣祖又薄给路费，他才接受下来。

家贫如洗的知府王惟一

古时有一句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意思是：当了三年清廉知府，也能到手十万两雪花似的银子。做了三年知府，即使尚属清白的，也已搜刮得十万银两。至于那些不清不白的，搜刮民财之多就可以想见了。但清朝华州人王惟一，宦游数十年，官至从四品的知府，但清廉有加，不贪财，不敛财，以致《三续华州志·王惟一传》称其“家贫如洗”。

王惟一，华州人，字薪斋。清朝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由教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等职。他任建平（今安徽省郎溪）知县时，积谷备荒的义仓因年久亏空，



王惟一捐薪俸补充亏额。此县有溺女恶习，他设育婴堂收留被遗弃的女婴。在代理徽州府（治所在今安徽省歙县）知府时，有人别有所图而持金祝寿，王惟一笑道：“我作十几年知县都不要钱，难道今天能改变气节吗？”贵州铜仁苗民很多，他在任铜仁知府时，对苗民不予歧视，妥善处理民族关系。一次查狱时，他发现差役为索贿而滥捕的数十苗民。王惟一痛惩了差役，将这些苗民全部释放。前任知府经常给苗民派加许多苦役，王惟一将这些苦役解除，以恩相待，苗民非常感激。王惟一离任时，数千苗民跪送江边，依依不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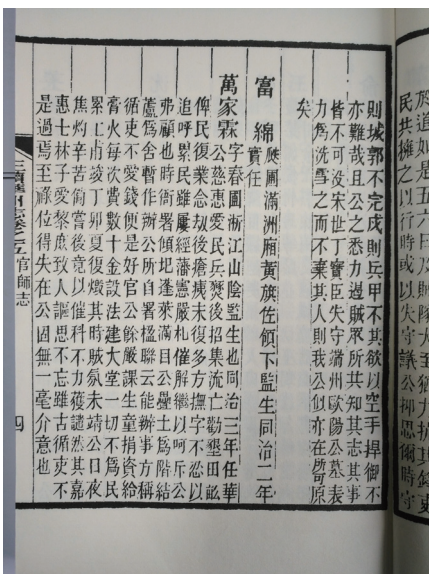
王惟一辞职回家后，生活艰难，仅布衣粗食而已。



“能办事方称循吏，不爱钱便是好官”

——华州知州万家霖

王小军



清《三续华州志》的万家霖传

万家霖，字春圃，浙江山阴人，清同治三年（1864）任华州知州。他仁慈善良，廉政爱民，为华州百姓的生计鞠躬尽瘁，为此丢官而在所不惜。

万家霖任职华州知州之时，华州刚经历严重的兵乱，田园尽毁，满目疮痍，对华州大地造成十分严重的创伤。万家霖刚刚到任，他设法招集逃亡的民众，极力劝他们复垦田亩，恢复农业生产。他想到百姓在经历劫难之后创伤尚未恢复，就多方安抚。他不忍心向百姓追征赋税，加重百姓负担，即使多次接到布政使的严厉催促，

甚至接着又被严厉训斥，他也没有考虑向百姓征税。

当时州衙府第经战火焚毁，蒿草满目，一片荒凉，万春霖堆起土阶，搭起席棚，作为州衙临时办公场所，并亲自题写楹联：“能办事方称循吏，不爱钱便是好官。”后他又想方设法，自筹资金修建州衙大堂，但一切都没有增加百姓负担。工程刚刚竣工，于丁卯年（1867）的夏天新的州衙大堂又遭兵乱毁坏。

当时战乱尚未完全平定，为了华州百姓的安定生活，万家霖日夜焦灼，尝



尽辛苦，但后来竟然以催科不力为名被罢免遣返。虽然遭到免职，但他的恩惠遍及华州百姓，他一心爱民的事迹和精神常常被后人想起，念念不忘，即使是古代青史留名的循吏也不过如此。万家霖一心为民，至于官位俸禄的得失，对他来说本来就毫不在意，其真可称得上华州历史上少有的清官廉吏。



金石学家郭宗昌

闫广勤

金石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陕西关中地区，因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比较多，金石学也比较发达，也出现了许多金石学家。明末清初的华州人郭宗昌，就是其中一位。

郭宗昌博雅好古，善于鉴别金石，并致力于搜辑研究古代铜器款识与碑铭石刻文字。他在金石学上的研究成果，编入《金石史》一书中，在古代金石学领域有一定地位，清代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也将《金石史》收录其中。

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清代进入鼎盛时期。明末清初时，正是其发展的重要节点，郭宗昌及其《金石史》的应运而生，使他成为金石学发展史上承先启后的人物。许多文人学者对其有很高评价。

明末清初的著名文人王弘撰、诗人钱谦益，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禛、晚清著名文史学家李慈铭等，都对郭宗昌推崇有加。王弘撰为郭宗昌的《金石史》作序，认为“三代以来，金石文之言，蒐考博而鉴定精，词复蕴藉尔雅，关西好古者未能或之先也。”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写道：“华州郭胤伯（宗昌），博雅好古，善鉴别书画金石，篆刻分法，为当时第一。所撰《金石史》，与赵岷赵孝廉（紫岷）《石墨镌华》并行于世。”民国迄今，金石学研究，亦多有研究郭宗昌及其《金石史》的论文。

家世生平

郭宗昌字胤伯（为避雍正讳后人又写作允伯、嗣伯），华州甘泉里（在今



渭南市华州区城区东北部)人。他生于明万历初年,卒于清顺治九年(1652),从有关资料推断,他去世时,应享年60多岁。

他出身于书香宦宦之家,其祖父郭岫,明朝嘉靖二十三年(1544)曾授江都主簿。其父亲郭性之,万历二年(1574)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山西按察司佥事、山西省右参议、山东省右参政,官至河南左布政使。郭性之著有《抱瓮丈人稿》一书。

郭性之有子四人,郭宗昌是他最小的儿子。郭宗昌的长兄郭宗周,能诗善文,精于书法,著有《高闲斋诗草》。郭宗昌的二兄郭宗仪,“诸史百家,无不综览,尤精《左传》。”(《续华州志·郭宗仪传》)著有《四仲礼考》。郭宗昌的三兄郭宗振,万历三十一年(1603)举人,历任河南孟县知县、安徽寿州知州、刑部郎中、钦差四川恤刑等职。著有《葱玉堂杂记》。

生长在这样的书香门第中,郭宗昌从小就聪颖好学,读书刻苦。7岁时就有大人风度,不屑与同龄儿童嬉戏,磨砖块为碑,刻字摹拓,得晋人笔法,其父大为惊讶。12岁出外就学,18岁补为弟子员。他博览经史及秦汉诸名家著作,为文效法《左传》《国语》《史记》的风格。以后10次参加举人考试(3年一次),却屡屡不中。明崇祯九年(1636),朝廷征召未仕的读书人为官。年近半百的郭宗昌赴京等候数年,只得一候补小京官,他不屑就任,回家归隐,著书立说,直至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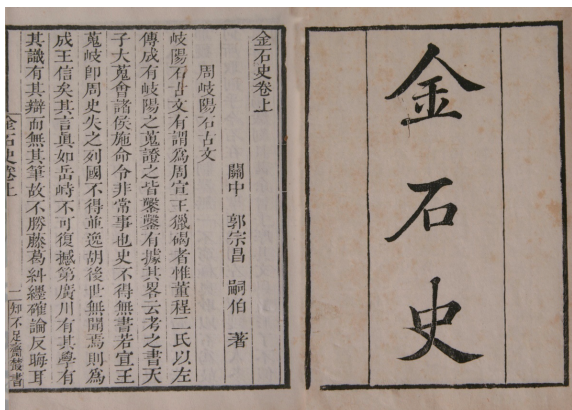
当志金石

借助关中得天独厚的历史底蕴,郭宗昌终其一生都在访碑搜帖,辑录印谱,收藏金石,并对其鉴别、研究。

郭宗昌的金石收藏,据他在《华山庙碑》的题跋中说:他收藏的金石古文,虽不及宋朝的欧阳修、赵明诚,但“癖结膏肓自谓过之。”他同时代的著名诗人钱谦益,在一首诗中称赞郭宗昌的古物收藏是:“关中郭髯最好古,十年收讨盈篋箱。”他的“忘年交”王弘撰在《山志》中,指郭宗昌“好收藏古印,积五十余年,共得一千三百方。”他的金石学研究,即在此基础上进行,其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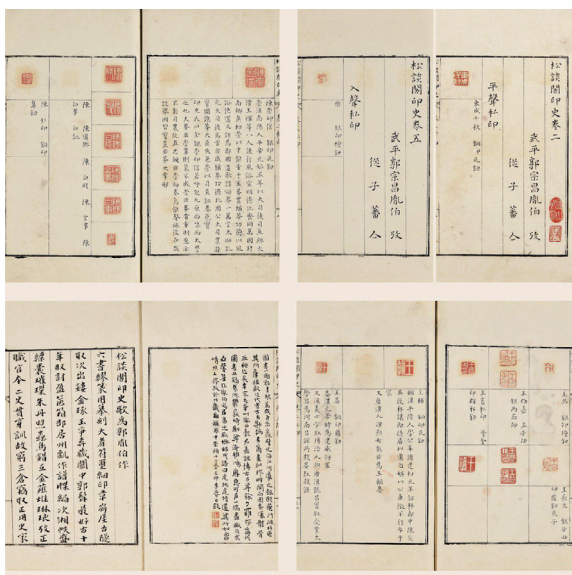


果主要集中在《金石史》和《松谈阁印史》两部专著中。



郭宗昌的《金石史》

《金石史》共分两卷，对周朝至唐朝的 50 多种石刻金文进行分析考证，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此书著录之金石，多来自郭宗昌收藏的金石之文，及经过作者访碑实地勘察所得来的。《金石史》首开金石学中书法一派，为后代金石学著作广为引用，其观点和考证对后世影响很大。



《松谈阁印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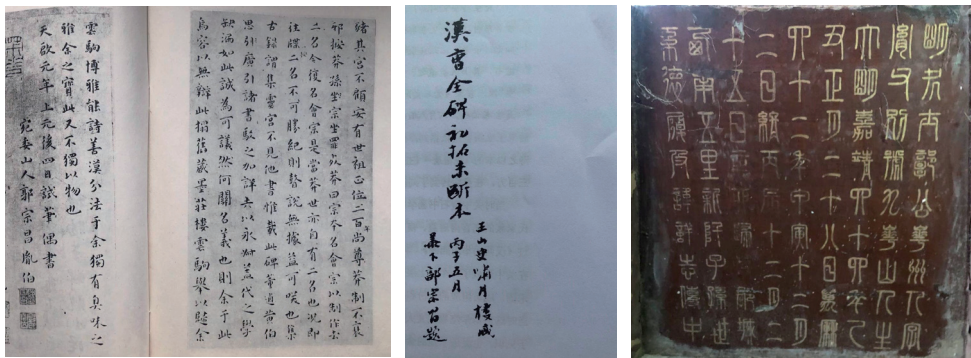
《松谈阁印史》是一部古玺印的汇编，共五卷，以四声编次，每枚印下有释文及考订。此书所著录的玺印都是来自郭宗昌的收藏。

清《续华州志·郭宗昌传》记他的著作，除上述两种外，还有《松谈阁稿》《涉园杂著》《笔史》《二戎记》《六斋疏》等，惜大都失传。

书法诗文

郭宗昌不但是金石学家，书法也名重一时。明末清初的著名文人王弘撰称赞郭宗昌的书法是：“四体各臻其妙。”清初杰出的诗人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云：“华州郭宗昌……篆刻书法，为当时第一。”《续华州志》记“公隶书，且工楷，四方求书者攬集，应接不暇。”但他真正保存下来的墨迹却很少，仅

见其在《西岳华山庙碑》华阴本后的题跋的楷书、王弘撰所藏《汉曹全碑初拓未断本题签》的行书，隶书有保存在西岳庙内的《太华山记石幢》和《寇平祭告碑》。篆书真迹以前没有发现，但2004年，在华州区出土了郭宗昌二兄郭宗仪的棺槨，上面有篆书题字，应该是郭宗昌所书。



郭宗昌的墨迹

除了上述几部专著，郭宗昌的诗文多散佚，我们只在清康熙《续华州志》中找到几篇。其一是卷一之《山川考》中的《白崖湖记》，其二是卷一之《山川考》中的《沚园藏书》。其三是卷一之《建置志宫室考》中的《沚园记》。其四是卷二之《古今诗文集》中的《白崖湖歌》。其五是卷二之《古今诗文集》中的《沚园孤石》诗。

华山庙碑

《华山庙碑》，是东汉隶书碑刻，原立于陕西华阴县西岳庙中。此碑碑文乃记述帝王修封禅，祭天地事。此碑书法于整饬端严中饶有变化，为学汉隶者所重。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毁于地震。

原碑拓本有四本传世，即“四明本”、“长垣本”、“华阴本”“顺德本”。惜“长垣本”已外流日本，顺德本因毁两页，被认为是“半本”。华阴本，也称“关中本”，明朝时藏于华州东肇商（云驹）、东荫商（云雏）兄弟的墨庄楼。天启元年（1621）东肇商赠与郭宗昌。郭宗昌的家僮惠灵偃、史明，善装潢，于明天启四年（1624）重新装裱。郭宗昌死后，此拓本归于华阴王弘撰。清康



熙八年（1669），王弘撰携此本到北京，为更多的人所知，因后人称其为“华阴本”。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本传拓最精，字口爽利，字神毕露。明清两代名人题跋最多，有郭宗昌、王弘撰、王铎、梁章钜、阮元等跋 38 段，张岳崧、王瓘、徐世昌等观款 43 段，并“郭氏胤伯”、“王山史啸月楼图书”、“苏斋”、“子贞”、“陶斋十宝之一”等藏印 148 方。此册还配有桦梨木面和红木匣，木面及木匣的四围刻满了著名金石家的题名，倍显珍贵。

《华山庙碑》的书者是谁，历来颇存争议，郭宗昌对此作了深入研究。他认为真正的书丹者应是郭香察。在《金石史》一书中称此碑“结体运意乃是汉隶之壮伟者。”他对此碑的研究成果，在那时和当代，都颇受金石学界的重视。

挚友交往

郭宗昌的交游十分广泛，多是金石研究者、爱好者，遍布省内外。在华州，因共同爱好，也因是同乡，他与刘泽溥、东氏兄弟等人，亦交往密切。

刘泽溥，明末清初华州人。明崇祯九年（1636）举人，清顺治九年（1652）进士，顺治十二年（1655）任亳州知州。刘泽溥在《金石史原序》中说：“先生生与予父同龄，忘年友余，谊最笃，把酒论文，常继日夜。”明朝灭亡后，二人“同患相恤，接见尤密，即豺狼冰雪不为阻。”清顺治九年（1652），郭宗昌去世，刘泽溥“闻先生歿，痛哭数日夜。归吊于家，哭于墓。”顺治十一年（1654），他见到郭宗昌的重要著作《金石史》的稿本，立即抄写手录，再经郭宗昌另一友人王弘撰的努力，予以刊行，使这一部金石学的扛鼎之作，得以流传至今。

东氏兄弟，即华州人东肇商、东荫商。东肇商，字云驹，华州诸生。东荫商，字云雏，明朝崇祯九年（1636）举人。东氏兄弟的祖父东棐，明嘉靖二十八年（1539）举人，曾任确山知县，他也是郭宗昌的外祖父。两家是姻亲，郭宗昌与东肇商、东荫商兄弟又有共同的志趣爱好，遂交往甚密。他们经常在一起搜访金石，鉴赏书画。郭宗昌、东氏兄弟与华州的王承祐、王承之、郭思、郭畹、郭蕃等人组成诗社，名南玼社，吟诗作歌，并编有《南玼社诗草》一书。



郭宗昌与陕西华阴人、清代著名学者王弘撰，亦有密切交往。王弘撰（1622～1702），字修文，亦字无异，号山史，王弘撰一生无意仕途，潜心治学。文章之外，也精通金石学，善鉴别书法名画和金石文。他年龄比郭宗昌小，应是两代人，但共同的兴趣爱好，使二人成为忘年交，亦师亦友。二人居住地相距七十里，时时过从。王弘撰在《金石史》序中写道，郭宗昌很喜欢王弘撰，王弘撰来拜访，则招东荫商、刘泽溥一起共坐城南竹林中，“把酒谈心，往往达旦不休。”明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起义军占领华州、华阴，他们相约潜藏于深山中，躲避战乱。郭宗昌去世后，王弘撰非常悲痛，“每忆及不禁泫然涕之泪沾襟也。”他从他们的共同友人刘泽溥处见到《金石史》的手抄本，即于清康熙二年（1663）赴南京将其刻印成书。

郭宗昌与明末清初文坛领袖、江南苏州人钱谦益也有交往。钱谦益既是官员，又能诗善文，还是史学家、收藏家。郭宗昌于明朝崇祯年间到北京，等候征辟。期间，结识了钱谦益等诸名流，他们“结社都门，朝夕倡和。”（《续华州志·郭宗昌传》）。钱谦益很赏识郭的才华，在钱谦益的《牧斋初学集》里，收有四篇为郭胤伯所作的诗，将郭宗昌比作东汉时期名士郭泰，称赞郭宗昌的《松谈阁印史》一书：“郭君此书精且良，曷不首勒玉玺图。”

华州遗迹

郭宗昌去世三百多年了，除几部专著留存至今外，他在华州的遗迹尚有保留。

北宋熙宁五年（1072）华州的少华山崩，在今柳枝镇张桥村的半截山下，形成了一个颇大的湖泊，即移山潭，湖光山色，潭边多巨石，其中一石上后长出一棵柏树，人称“石抱柏”，石上有明清时的摩崖石刻数则。郭宗昌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到此游览了水势浩大的移山潭，更其名为白崖湖，撰文《白崖湖记》，并刻在此石上。民国时移山潭干涸，但此石及石刻文字至今犹在。

郭宗昌的学术研究与著述，主要是在私家园林“沚园”中进行。沚园位于移山潭北。移山潭的水向北，或溢流，或伏流，在今柳枝镇寥家窑村以西，形成了很大一片水面。明朝时统称此为“莲花池”，其中有几处高凸地面的区隔，



形成了数个湖池。当时，这一带的风光是：半截山崩塌下的乱石遍地，水泊池塘穿插其间，湖水泱泱，鱼莲相生，水光山色，风光别具。郭宗昌于明末所建的“沚园”，就在这水泊沚渚之中。从他写的《沚园记》一文看，沚园风光以湖为主，湖可行舟，建有楼馆台榭。园中一水盈盈，莲叶田田，藻荇菱芡遍布水中，还有乱石纵横，竹木荫荫，鸥鹭鸕鹤，翔飞其间，颇有江南园林之韵。清初，沚园的主人换成了郭宗昌的好友刘泽溥。刘家园林后荒废，人称其遗址为“刘家潭”。

刘家潭的主要水源地移山潭从清末起，水势渐小，直至退成沼泽，民国时干涸。而刘家潭及其附近的湖池水面也逐渐萎缩，但因地势低凹，又有地下水补充，虽然水势风景大不如前，但仍有数百亩水面。20世纪90年代始，这里多辟为莲池与鱼塘，依旧保留的水乡余韵，还唤起人们对“沚园”昔日辉煌的记忆。



石抱柏



顾熠山传

闫广勤

顾熠山（1873—1962），名耀离，字熠山，马家斜村（今属华州街道办事处）人，爱国民主人士、民国《重修华县县志稿》主修。



顾熠山

顾熠山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农历十月二十七日。祖籍河北保定府，其祖辈迁徙至华州，先落脚于高塘，后移瓜坡塬，再移露泽院，最后定居于马家斜。其时家境贫寒，仅有茅舍两间，薄田两亩。父顾丁焄（1833—1917），字午峰，清廪贡生，业馆乡里，戊戌变法后，创立太王庙学校（今杏林小学）。

顾熠山6岁从父家学，12岁读经成诵，18岁考中秀才第三名。光绪二十二年（1896）赴泾阳味经书院受业于陕西著名教育家刘古愚（光蕘）。在味经5年，受刘古愚维新思想影响，立下兴学救国之志。光绪二十四年（1898），与杨松轩、刘海环、刘经轩、刘巨川、周文伯等华州同窗组成“友仁学会”，集资捐书研究实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又在友仁学会基础上成立“集义书社”，吸收华州赵象九、刘新斋、张恩波等新派人士参加，开展普及新学活动。光绪三十年（1904），味经书院肄业后，以品学兼优的生员被选入三原宏道大学堂深造。在宏道游学期间，与华州同窗郑云章及时在华州办学的杨松轩，书信来往频繁，互商团体兴学大计，从此形成华州开创现代新式教育的“三驾马车”。光绪三十二年（1906），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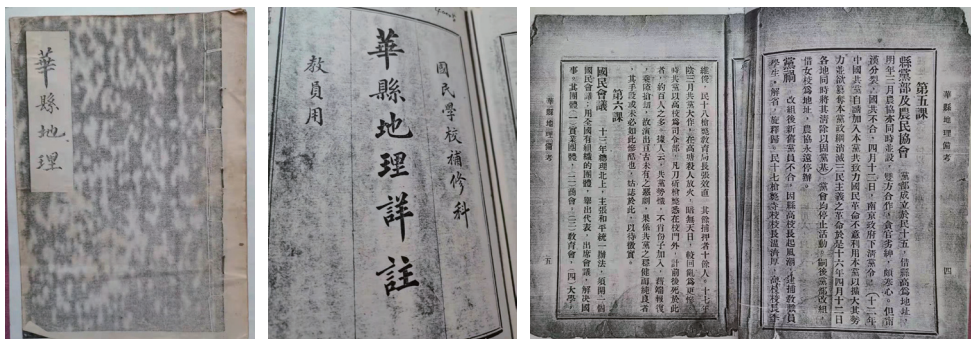
顾、郑团体兴学正式启动。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华州教育研究会”（简称教育会）成立。3月17日，教育会附设两等小学堂（简称附小，后又简称“教高”）借太王庙开学。时教育会及附小一无经费，二无地址，三无学生，困难重重。是顾熠山说服其父，借出太王庙学校，并借给学生，才使附小如期开学，为华县团体兴学立下大功。

光绪三十四年（1908），顾熠山宏道大学堂毕业，获得优贡。次年，顾熠山步入社会，充任华州高等小学和教育会附小教员，致力于新教育的开拓工作。教学中，实施教学改革，除课本外自选教材，组织学生阅读同盟会的《民报》、《新民丛报》、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等进步书刊，向学生介绍新思想、新知识。顾熠山的现代教育方式，引起守旧派的嫉恨，仇视新学的人竟遍张匿名揭帖，声言要大举起事，“先杀杨松轩，后杀顾熠山”，后经当局干预，事乃平息。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底，顾任第二届教育会会长，前后达7年。期间，全力支持张定九、王赞臣、张益斋等组织成立“华州天足振学会”，筹办“模范女校”，倡导开展妇女放足入学运动，并与华州新学人士订立“有子不娶缠足妇，有女不缠足”的公约，身体力行，移风易俗，开一代社会新风。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陕西响应。10月27日晚，华州江湖会党数百人攻进州城，推翻了清政府在华州的统治。但他们焚署劫狱，捣毁学堂，还扬言放抢，一时人心惶恐，地方秩序大乱。在此危急关头，顾熠山、袁佐卿、赵舜臣等组成“华州保卫公所”，出面筹钱以安会众之心，并推举高维昌入城统领会众，从而稳定了动乱局势，使华州免遭兵燹之祸。顾熠山积极投身辛亥革命运动，为路经华州赴潼关抵御清兵的革命军支应粮饷，并于民国元年（1912）加入同盟会。

顾熠山于民国元年（1912），任教高校长。民国三年（1914），任华县县高（即县立高等小学）校长。民国五年（1916），大力支持杨松轩筹办私立中学的动议，并于民国七年（1918）元月随同杨松轩等赴京、津、沪、汉等地考察私立教育。同年12月，被选为咸林中学十名筹备主任之一。在民国八年（1919）元月第一次筹备主任会议上，被公推为咸林中学首任校长，但本人坚辞，才另聘薛辑五





任校长一职。4月8日，咸林中学正式开学，顾熠山任该校学监，并兼任县视学。咸林中学是在艰难困苦中创办起来的，凝结着杨松轩、顾熠山、郑云章等团体兴学人员的心血。华县知事侯旬赠联云：“咸林自古宜桃李，少华于今仰顾杨”，肯定了顾、杨办学业绩。民国九年（1920），顾熠山与李春圃创办私立华县单级师范学校，任董事长，首期培养师资学员75名。同年，顾熠山还编写了《华县地理》一书，供各学校教授乡土史地知识之用。以后，此书多次增改、再版，长期是华县教育界的重要乡土教材。民国十年（1921），顾熠山任咸中管理主任兼教国文、地理，他常给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共进》半月刊上投稿，其中民国十一年（1922）3月《致映春函》一文，被该报称赞他是“改造社会的急先锋”。此时，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团员魏野畴受聘来咸中，任教员兼教务长。二人思想接近，志趣相投，成为“忘年交”。他们联袂推行教育革新，传播“五四”科学民主精神，使学校颇有从未未有之盛，但遭到校董会内保守势力的强烈不满和对抗，引发了民国十一年（1922）学校风潮。这期间，魏野畴、顾熠山先后愤而辞职离开咸中。民国十二年（1923），顾熠山受省立第三中学校长刘依仁（顾的学生）之邀到该校任教，后魏野畴也来该校。顾、魏再度合作，在省立三中继续实施教育革新，为国培养人才。

民国十五年（1926）秋，顾熠山从西安返回华县，二次任县高校长。并受中共组织的委托，参加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华县县党部的领导工作。任内支持农民运动。民国十六年（1927）10月，被当局冠以“亲共”罪名，撤消县高校长职务。民国十七年（1928）2月，离开华县到省立同州师范任教。



民国二十年（1931）初，顾熠山任韩城县政府秘书兼二科科长，因不满官场恶习，3月辞职回华县。7月任华县县志局编辑主任，主持县志修纂。不久，县志局因人事变化及经费短绌而无形解散，修志工作停顿。但修志一事，常萦绕于怀，在袁桢、刘依仁、李子春等人支持下，在此后的十几年里，利用业余时间，继续从事县志编纂。他针对旧志叙述不科学，内容支离重沓，迷信颇多的缺陷，决定改续修为重修。他和同道们一起苦心孤诣，惨淡经营，既埋首于图籍之中，又分赴各地调查，搜集了大量新材料。

民国二十一年（1932），继民国十八年（1929）大年馔后，又发生了霍乱大流行，华县境内哀鸿遍野，死尸枕藉，家庭离散，大量儿童成为孤儿四处流浪，成为一大社会问题。此年9月，顾熠山与史伯康、李子栋相商，募款创办了华县孤儿救济院，首次收养流浪孤儿四五十名。以后曾担任华县救济院院长7年，期间，收养孤儿四五十名，工读兼施。救济院坚持“教养并举”、“读劳并重”的方针，在城关马王庙、关帝庙内建起工房、课堂、图书室、娱乐会，设纺织、裁缝、竹编、木器等技术门类，使孤儿上午学习文化知识，下午参加技能培训。拯救了一批无依无靠的孤儿，使之成长为自食其力的社会有用之才。顾熠山的善举，获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民国二十三年（1934）3月1日，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亲笔题赠“功在地方”匾牌，以褒嘉先生倾力地方慈善事业的功绩。在整个民国时期，华县获此殊荣者，仅顾熠山一人。

民国二十五年（1936）12月“西安事变”中，中央军二十八师攻入东北军驻守的华县城，县长吴至恭不知去向，地方大计无人主持，华县面临战后兵灾的危险之中。有人希望德高望重的顾熠山出面解危，先生毫不推辞地说：“大劫当前，只有当仁不让，岂能甩手不管。”遂与齐逸农、王荣卿、冯明轩等组成善后委员会，购买烟酒、糕点、猪肉犒劳二十八师，为阵亡官兵购置棺材，缓和了关系，使华县免遭战后之乱。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咸林中学任教，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支持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

民国三十年（1941）元旦，华县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卅元”惨案，咸林中



学4名学生被二六兵站伤兵医院副官王志超枪杀，当局消极处理，使受害者家属的冤情无处伸张。顾熠山不顾近70岁的高龄，亲赴西安奔走活动，为死难者伸张正义。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最后使受害者得到抚恤，杀人凶手被正法。

这一年，顾熠山被推举为县粮食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后又任县财委会副主任，他关心地方利益，想方设法减轻百姓负担。他任职前，陕西省曾实行土地陈报，而华县在清丈土地时，与事者只知酒肉吃喝，搜刮民财，视土地丈量为儿戏，严重不实，省政府据此证实，使全县粮税负担骤然剧增，民众深受其害，有的鬻田典衣，卖儿卖女；有的痛遭捆打；有的远逃他乡；有的被逼自杀。政府对此置若罔闻，并扬言说，谁要复查纠正，就是“故意张大其词，阻挠成果，蓄意抵制征粮。”顾熠山上任后，不顾个人得失，敢于为民请命，曾多次向省临参会写申诉，并亲自赴省周旋，终于获准重新复查，华县人民的负担才有所减轻。民国三十一年（1942），省上掘财乏术，竟将各县畜税四成解省，致地方入不敷出。次年，在大荔召开八区（即第八行政专员公署所辖地区）财政会议，顾熠山在会上一再提出畜税四成应留地方的议案，并与出席会议的省政府主席祝绍周面争，终于为八区12个县争回了四成畜税。

民国三十二年（1943），经顾熠山十几年呕心沥血，而且大部分为私人在业余时间修纂，县志终于拿出初稿，送县政府审阅。县长王雨春感慨地说：“顾老先生真是华县奇人！公务公办，而卒独立支柱，办促厥成，可谓艰苦卓绝矣！”但因经费无着，没有付印。顾熠山继续补充资料，续写志稿。

民国三十三年（1944），顾熠山任华县临时参议会议长。此年秋季多雨，水涝灾害严重，顾熠山多次向省、县提出议案，请求拨款疏浚河道，开渠排涝，并面见县长王雨春，建议治理水患。后赤水、遇仙、石堤、罗纹各河都成立了治理委员会，安排民工进行疏浚。特别是柳枝的构峪河，原不直接入渭，形成二华（华阴、华县）交界处的大面积积水，他实地勘察，提出改道入方山河方案，从建议到交涉、勘测、开挖、放水，是主要的策划人和参与者。

在华县临时参议会议长任内，他以临时参议会名义，多次向省政府、省议会提出减轻地方负担的议案和建议。如《请省府核减军麦呈》、《为减少军运



并将差价赔累平均摊派代电》、《呈请改组县银行代电》、《恳求缓征欠赋呈》、《呈请省府裁减机构代电》等，其中有些议案得到采纳，有的被束之高阁，但其心系百姓、服务地方的一腔热情体现无余。

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来西安视察，召见陕西地方知名人士倾听民意。经西安市商会理事长薛道五的推荐，顾熠山面谒蒋介石。在蒋询问中，顾熠山不卑不亢，大胆陈报了关中严重的自然灾害、百姓极苦的生活状况和沉重的粮税负担，并列举了华县田粮管理处处长刮民肥己等官场腐败和国民党第一军在华县强索车马、敲诈财物、毁坏山林以及某连长因奸枪杀赤水瑞凝庄苗子农一家三口的案件。蒋介石随后减免了关中灾区七成田赋粮税，驻华县的民众大队也被调出。顾熠山敢于诤谏、为民请命的事迹，遂为社会传诵。

11月，他辞去一切职务，专力县志编纂。次年4月，县参议会决议修志，成立县志编辑委员会，他又被任为编辑主任。在住房和用膳极感困难，生活极不安定的情况下，县志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终脱稿，因经费困难未付印。顾熠山又相机补充了一些材料。民国三十八年（1949）初，经费有了着落，遂由西安大中文化工业社承印出版了《重修华县县志稿》。这部志书记事上至西周，下至1949年4月，且详于近代，注意经济，多载民生疾苦，对社会黑暗秉笔直书，为民国期间，陕西所修县志中较好的一部。

1949年5月，华县和平解放，顾熠山也曾做出积极贡献。解放后，顾熠山做为爱国民主人士，先后当选为华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及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县人民代表、县人民委员会委员、陕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他还是陕西文史研究馆馆员。1962年1月16日，顾熠山先生病逝于家中，享年90岁。中共华县县委曾送挽联致哀。联曰：阖县惊噩耗远近痛悼仰慕音容动哀思；毕生惟正义爱憎分明泽被桑梓堪遗范。横额是：正义犹存。

顾熠山一生倾向进步，追求光明，追求进步，痛恨黑暗势力，不断地随着时代前进。辛亥革命时，陕西军政府与潼关清军激战，顾熠山受命为义军筹集粮饷。他竭尽全力支持革命，倡导官商盐商预交加价款，并派人到渭北各县催提地丁款及盐款，解决了义军粮饷之危，为辛亥革命立下大功，并加入了同盟



会。他在咸中期间，支持魏野畴传播马克思主义，支持学生参加革命进步活动。大革命时期，他的学生杜松寿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归来，他支持其举办“华县农民运动讲习班”，组织建立各级农民协会，与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斗争。华县国民党组织恢复后，他出任县党部首任主任委员，与共产党密切合作，把华县农民运动推向高潮。抗日战争中，他拥护共产党团结抗日主张，在咸中大力支持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并利用在华县的人脉关系，掩护、营救和保释古崇礼、冯浪、袁定中、王灵肖等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共党员。解放战争中，他与中共华县工委书记王平凡建立统战关系，当王平凡委托他办事时，他说：“吾虽老朽，但当仁不让，若能为解放人民做些事，即赴汤蹈火也感荣幸。”使王平凡非常钦佩和敬慕。他利用上层关系，把申定远、周毓庆、史子华、王有吉等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安插到华县国民党军政要害部门，掌握了自卫团武装，为和平解放华县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他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他的两个儿子顾洲三、顾洲，女儿顾秀璧，都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顾熠山性情狷介，历来刚正不阿，疾恶如仇，是一位真正的反贪斗士。在民国初年，华县的几任知事晁桂昌、李云峰、李培材等都是贪污公款、搜刮民财的贪官，民愤极大。时任县财政绅的顾熠山坚持正义，联合华县士绅，向省军政府秉公告发，将其一一扳倒，在省东引起轰动。陕西省省长、军阀刘镇华的爪牙白文超任华县知事时，在不到半年时间内，他就吞掳白银数万两，华县民众讥讽为：“白娃，吃的白馍，拿的白银子。”时任咸中管理主任的顾熠山，组织学生以白文超为原型，编写了话剧《黑武蹴》，在社会公演，影射白文超的贪污恶行，引起社会极大反响。不久，白文超就被刘镇华派人接走了。顾熠山任县临时参议会议长后，更是见鬼必捉。高塘塬区发生私藏烟土大案，民政科、警察局、国民兵团各级官员监守自盗、染指分肥，民众反响强烈。顾熠山代表临参会据情质询县政府，要求追究此案，并专文呈报省政府，使该案成为轰动全省的禁烟要案。后民政科科长韩天信等案犯被拘押。县财粮科长曹少文勾结南寺和尚，把县城西南9亩公田明赎暗卖了。顾熠山听后，在参议会上，对着曹少文斥骂：“尔等非平日垂涎公产，何敢如此猖狂？”并以议案方式，

明令政府“一律以原价每亩 500 元收归县有，永作苗圃基地……并记录在案，即希查照办理”。这是民国时期华县民意机关惟一一次向县政府下达勒令，非顾熠山无人敢为。抗战期间，华县百姓粮税负担极重，可政府要粮要款有增无减。县政府每有摊派，顾熠山都要询问原由。一次和县长拍起了桌子，说：“老百姓不是韭菜园子，随便割哩！”

胡宗南第一军驻防华县时，每逢元旦、春节和纪念日，必在军部操场开军民大会。主席台上除军、师长外，还有地方县长、党部书记长、参议长就坐。别人讲话都是官话、套话连篇，惟有顾熠山先生不畏强权敢讲真话。有次，对着荷枪实弹的第一军官兵讲：“成天打内战，还美其名曰‘戡乱剿匪’。啥是乱？现在饭馆酒楼到处都贴‘勿谈国事’，百姓招不住敲诈勒索，都不准人喊冤叫屈吗？教师学生看不惯黑暗腐败，都不准人流露怨言吗？你总不能弄个封条把人嘴封住。对这样的乱不戡则已，越戡越乱！啥是匪？随便抢劫财产，抓人杀人，赤水瑞凝庄一连长，为强奸民女连杀三命，这不是匪是什么？有匪不剿，光喊异党异派是匪，对这样的匪不剿则已，越剿越多！”说的军政官员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台下的学生则掌声不断。民国三十五年（1946），国民党华县党部书记长高毅安，先封官许愿、索贿受贿，后在警察局、国民兵团吃空名子，借给自己父母祝寿敛财，巧取豪夺。顾熠山联合白伯旅、关秀卿、张健庵等向省党部举报，使高毅安被撤了职。民国三十六年（1947），贪腐县长李焕民借给死在河南老家的老人开追悼会，大肆收受贿礼，华县官员多巴结逢迎，惟顾熠山不买县长的帐，与其唱对台戏，号召有关人士为刚刚故去的华县教育界著名人士、共产党员郑云章开追悼会，后联合西安同乡向省上告发县长的贪污罪行。李县长看形势于己不利，即黑夜携眷潜逃。顾熠山无私无畏，一身正气、勇斗贪官，深得民心，但也引起黑恶势力的忌恨。

顾熠山是华县新式教育的开拓者之一，教育理念先进，注重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在 20 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春风化雨，辛勤耕耘，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材。马步益、雷光显、李维屏、苏士杰、潘自力、吉国桢、陈述善、高克林、杜松寿、关中哲等都是他的得意学生，后来都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民党军政高官马励武、潘廉方、史仲鱼，工商教育界人士薛道五、刘依仁等也是出自顾先生门下，可谓桃李满天下，其倾注半生心血兴办新学的功绩永不可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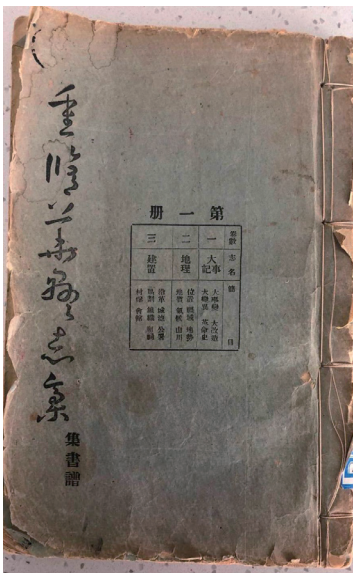
顾熠山先生的一个突出贡献，是完成了《重修华州县志稿》的编纂。民国二十年（1931）7月，他被华县县志局聘为县志总编纂，从此开始了他18年艰辛的县志编修工作。华县当时最近的地方志书是清光绪八年（1882）刘域主持编修的《三续华州志》，距此次编修已有60余年，确需续修。但在兵荒马乱的民国时期，谈何容易。县志局成立之初，编修工作已成孤掌难鸣之势，诸襄办和采编人员或来信辞谢，或渺无踪影，经费严重不足。至廉明伦任县长时，经费完全停拨，致修志中途搁浅。县志局宣告撤消，官方对修志工作彻底放弃。但顾熠山对编修县志一往情深，他认为“县志者一县之史书，风习人物、文化典章具载于斯，继往开来，悉惟此赖”，遂以个人之力，在官方不参与的情况下，“独干、穷干、苦干”，修志不辍。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利用公务闲暇，四处采访，悉心研究，伏案编撰，未花公家一分钱，自行专力，八易其稿，完成了十七卷泱泱大著《重修华县县志稿》。民国三十五年（1946），官方又介入了县志编纂，成立了县志编委会。民国三十八年（1949）5月，在华县和平解放前夕，顾熠山苦心孤诣、含辛茹苦18年修成的一代新志《重修华县县志稿》印行出版，为华县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并成为陕西地方志中的名作之一。

顾熠山的一生，持正求真，与时代同行，兴办新学，为民请命，勇斗贪官，倾力慈善事业，主修华县县志，深受华县民众的崇敬。



顾熠山的《重修华县县志稿》

惠文波



《重修华县县志稿》书照

顾熠山（1873—1962），名耀离，字熠山，马家斜村（今属渭南市华州区华州街道铁马村）人。1931年—1949年，他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编纂了《重修华县县志稿》。这部志书共17卷，约60万字，记述了华州自西周至1949年4月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是民国期间，陕西所修县志中较好的一部。

一、顾熠山生平

顾熠山出身于书香门第，清光绪十六年（1890）考中秀才。光绪二十二年（1896）入学味经书院，受业于陕西著名爱国教育家刘古愚，并受刘古愚影响，接受了维新变法的思想。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从宏道学堂毕业，1909年后任华县公立高小及教育会小学教员、华县教育会会长等，致力于新教育的开拓工作。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积极投身革命运动，为路经华县赴潼关抵御清兵的革命军支应粮饷，并于1912年加入同盟会。1919年他与杨松轩、郑云章等人一起，领导了咸林中学的筹建工作。他担任过华县县立高等小学校长，还曾在省立三中、一中任教。1926年受中共组织委托，参加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华县县党部的领导工作。1928年后，先后任同州第二师范教员，韩城县政府秘书兼二科科长。1931年7月任华县县志局编辑主任，主持县志编纂。

以后曾担任华县救济院院长7年，期间，收养孤儿四五十名，工读兼施。1934年陕西省政府付主席邵力子为他题赠“功在地方”匾牌。1945年，他以知名人士身份面见蒋介石，力陈百姓苦况，遂减征关中田赋七成。1949年，他为和平解放华县做了积极贡献。解放后，他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先后当选为华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及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县人民代表、县人民委员会委员、陕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和陕西文史研究馆馆员。1962年病逝，享年89岁。

二、《重修华县县志稿》的编纂过程

1931年5月，华县县志局成立，顾熠山主持县志修编。创办之初，基本上是顾熠山独自一人支撑，一年后，因人事经费问题，县志局被撤销。但修志一事，顾熠山始终没有放弃。他认为“县志者，一县之史书，风云人物、文化典章具载于斯，继往开来，悉维百赖，是“地方文献存亡关键”，“停废不能”，下决心“独干、穷干、苦干”，以明《华州志》、《续华州志》、《再续华州志》，《三续华州志》为蓝本，并增补清末民国时期新的资料，删繁就简，去伪存真，修成一部华县通志。从1932年县志局被撤销，直到1946年县志编委会恢复，县志皆随他的经历而经历，救济院、咸中、财委会、临参会，人走到哪里修志就带到哪里，“公余即怀铅提槧，未尝一日息”。15年时间，他节衣缩食，完全靠自费利用工余时间采访编纂，征文献、查资料、分门类、改体例，用尽心思，绞尽脑汁，日日思索修志诸事。公务之暇，他无昼无夜，勤勤恳恳于县志，见人即询问当地史实，有疑问即亲往考查，案头经常伏笔狼籍，床边资料堆积如山。华州的山川河流、祠寺庵庙，楼桥馆坊各个角落都落下他访查的脚印，沉睡千年的碑石簿卷、历史记载，页页都洒下了他的辛勤汗水。1947年底，县志稿修续全部完成，时任县长以款拙缓办为词，不予付印，顾熠山趁稿件尚未脱手的机会，将1948年、1949年两年发生的事情，再次加写了进去。1949年3月和西安大中文化工业社谈妥付印，5月县志印好，县上仅取了三十部样书，西安、华县相继解放，大批成书被当作废纸卖掉，只有少数几部留存了下来。



三、《重修华县县志稿》的基本概况及主要特色

《重修华县县志稿》刊印成书后共十册十七卷，原文约60万字。十七卷是：大事记、地理志、建置志、党团志、政治志（上）、政治志（下）、经济志、财政志、社会志、卫生志、人物志（上）、人物志（下）、官师志、艺文志、古迹志、文征志。新、旧志序、跋、入“杂事志”。

卷首“大事记”，分大事变、大改造、大变异、革命史略四部，选取地方重要事件，按时序罗列，定为全书之经。取材详今略古，以近、现代为主。如将辛亥革命视为大事件特别者，专列“革命史略”一目，记述辛亥革命以来，华县人从事革命，甚至为革命而牺牲的人的姓名和事迹。为研究辛亥革命在陕西的斗争提供了资料。在“大事变”目中，记载了1928年“渭华起义”和1933年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入华县高塘的情况。作者对共产党、红军没有贬称，可谓公正史笔。在“大变异”目中，作者列举旧志中之所谓“详异”条目，指出“何足为详异，均属愚妄无知”，并对慧星、陨石，日蚀、月蚀等自然现象，用科学道理加以解释，以破除迷信。地质、气候列入地理志中，并记载了光绪三年、二十七年，民国十八年旱情及异常灾害。党团志，分别记述了国民党华县党部和三青团华县分团部的发轫、经过及党团统一前后勾心斗角情况，对党、团的作用不加渲染，如实记述。政治志上卷含自治、保甲、教育，户口改附于保甲，以清代史尊的《再续华州志》、刘域的《三续华州志》为依据，分别对乾隆、道光、光绪年间，华县户口消长情况作了比较。并附民国二十三年至三十七年华县户口统计表。教育，分旧教育、新教育两篇，记述的很详细。旧教育概述明清科举制及其结晶。新教育从清末、民国初年实施，改革全小学教育开始，记述至1948年，包括小学、中学、师范及省立、县立、私立职业学校以及社会民众教育组织等。附教育经费及教育成果统计表。政治志下卷，列交通、水利、造林、军事、差徭等目。交通包括铁路、公路、县路、邮政、航空、桥梁等，分别记述各项兴建始末，对研究地方交通史提供了有用资料。水利分疏浚、灌溉、凿井，详述明清以来各渠道、泉水的兴废情况。军事“兵役”篇中，



列有抗战阵亡将士姓名一览表。“差徭”目中，收录了华县代表胡某上监察院长于右任书，内举大量具体事实，反映当时天灾人祸，差徭肆虐，至使民不聊生的悲惨情况。经济志农业篇中，分别记载粮、棉、油、染料等植物及骡、马、牛、羊等动物的分布、繁衍和经济价值，对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借鉴。商业篇中，附有物价表一份，记载1932年至1947年物价飞涨情况，“商业”后附度量衡，记光绪三十二年，1915年和1929年几次统一度量衡，定标准制的比率。财政志，主论田赋，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华县的财政经济情况。社会志，是首创。详细记述了社会训导、社会谣谚、社会劳动、社会病态等情况，尤其是近百年的灾害记录，更有资料价值。人物志，记述民族英雄、忠烈、耆旧，其中民族英雄记述为首创，尤其记述了一些拾金不昧者，现在读来，依然很感人。艺文志，分书集、艺术两门，所收书目，内容比较广泛，除文史方面的论著外，还有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如杨鹤庆多种医学著作，刘安国的《陕西交通契要》，杨钟健的《古气候学》《古动物学》《中国猿人与进化问题》《地震浅说》等均有一定参考价值。文征志中记载了李嘉绩《迎銮记》，记述光绪二十六年，西太后逃至华州的情形。新旧志序列入杂事志。



总体而言，《重修华县县志稿》是一部成功之作，这部志的主要特点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结构体例比较完整合理，《重修华县县志稿》主体分十七卷，卷下设目，目下设有子目，这种分类既符合当时修志理论要求，也符合华州的实际，能基本反映华州的历史和修志时的现状。卷下各目设列得当，有效地避免了交叉重复、内容遗漏。二是记述内容比较全面丰富。《重修华县志稿》在编纂中花费了巨大的精力。顾熠山以明《华州志》、清《续华州志》、《再续华州志》、《三续华州志》为蓝本，记事上至西周，下至1949年4月，综合古今，取材宏博，门类齐全，广征博引，资料极为丰富，具有相当高的资料价值，基本反映了辖域内的历史和现状。三是地方特色比较鲜明浓郁。地方性是方志的显著特征，一部地方志的地方特色是否凸显，直接决定其质量的高下。《重修华县县志稿》设立了许多域内特有的卷、目、子目，不惜笔墨专项记述华州独具的事与物，在概括叙述历史或事物概貌时浓墨重彩，大书有特色的亮点，

强化了志书的地方个性。四是语言文字比较精炼准确。在文风上，《重修华县县志稿》完全符合志书“记述体”的规范，在文字上，《重修华县县志稿》表述简洁、精炼、准确，基本达到了用最简省的文字，精确记述事件的始末。作者对文字卓越的驾驭能力，也为《重修华县县志稿》增添了光彩。五是纂写形式有所突破创新。其创新集中表现了在于卷、目之前设立小序综述议论以及在卷、目之后阐发观点，《重修华县县志稿》于史实的关键之处阐发议论，表明作者的立场、观点，阐明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因果，直接提示其真相，对于读者全面了解志中所记史实不无裨益。六是思想比较进步。他着眼下层，反映民生，一反华州以往旧志着眼上层，为达官贵人歌功颂德之弊，努力反映苛政下的百姓疾苦，如实揭露当时的政治弊端，官员腐败，军警肆虐等社会黑暗现象，在贬恶扬善、扶正祛邪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可谓是“画龙点睛”，尤其是对共产党的活动也有较为客观的记述，实属难能可贵。这也是《重修华县县志稿》与其他志相比，独有的特点和最可贵的精神。

当然，《重修华县县志稿》也有一点瑕疵，结构上有些卷、目或子目设置别扭，归属不顺；内容分布上体量多省悬殊；标点符号、计量单位、层次结构的使用划分有些还不够准确；一些资料缺乏缜密的考证，甚至还有差错；文字上过分强调简明精致，雕琢痕迹明显等。

《重修华县志稿》虽然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我们不能在物质文化都已高度发达的社会条件下，用现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吹毛求疵，过分苛求。总体而言，《重修华县县志稿》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志书，它对保存华州历史，传承华州文明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是顾熠山先生为后世资政教化留下的宝贵遗产，值得对其校注，也值得华州及一切关心华州的今人一读。

作者简介

惠文波，生于1969年，华州区地方志编纂中心主任。



古生物学家杨钟健

闫广勤

杨钟健（1897—1979），华州龙潭堡（在今莲花寺镇）人。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与第四纪地质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世界著名的古脊椎动物学家。



杨钟健工作中

杨钟健是著名教育家杨松轩长子，1913年考入西安三秦公学中学班，毕业后于1917年赴北京求学，先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在新文化思潮影响下，他热心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参与组织起“陕西省旅

京学生联合会”。“五四”运动中，他以满腔热血参加了天安门游行示威大会，接着参加了邓中夏等人发起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还作为北方学生代表赴上海出席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主编了以揭露陕西社会黑暗为主的刊物《秦劫痛话》。在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主办的《秦钟》月刊上，挥笔痛斥陕西军阀。1920年，经邓中夏介绍，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和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7月至1923年7月，他两次当选为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在此期间杨钟健与毛泽东相识，当时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职员。两人后来还有书信往来，1921年9月29日，毛泽东给杨钟健的一封信，被杨钟健一直保存下来，成为珍贵史料。与此同时，杨钟健与陕西在京进步学生刘天章、李子洲等，于1921年10月又



发起创办《共进》半月刊，并于次年成立政治性社团共进社。在1923年10月以前，一直是共进社负责人之一并担任《共进》半月刊的主编。1922年春，杨钟健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共关于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制定后，他由李大钊、邵力子介绍于1923年3月参加了中国国民党。

在北京求学期间，杨钟健应其父要求，为咸林中学代订了许多新的出版物，如《新青年》、《每周评论》、《共进》、《少年中国》等供学生们阅读。还为咸中介绍了一批优秀教师，如魏野畴、王复生、蔡颂臣、严少儒、訾吟甘等人。这些教师都是北京各大学的学生，“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到咸中，为这所刚办起的中学，带来了“五四”精神和新文化、新思想，为咸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23年春，杨钟健还打算聘请毛泽东到咸中任教，但未能如愿。杨钟健欲聘请毛泽东到咸中任教一事，虽因毛泽东已投身于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之中而未能实现，但成为咸中历史上的一段遗闻轶事。

1923年夏，杨钟健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接受老师李四光的建议，10月赴德国留学，于1924年4月正式考入德国慕尼黑大学地质系古生物专业，专攻古脊椎动物学。1927年，以优异成绩通过毕业论文答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当时西欧学自然科学得博士学位，一般授哲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北部之啮齿类化石》发表后，立即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赞誉，被认为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诞生的标志。1928年2月，杨钟健返回祖国。

1928年春，他在中央地质调查所，主持新生代研究室对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掘工作，翌年又担任这个研究室的副主任。从1929年到1934年，杨钟健的主要学术贡献在古哺乳动物学和第四纪地质方面。他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使他成为我国哺乳类化石和新生代（特别是第四纪）地质研究的奠基人。从1934年起杨钟健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爬行动物，但一直到1940年前，新生代地质和哺乳类化石，仍然是他野外考察和研究工作的主要对象。由于他在学术上的卓越成就，曾被选为1936年和1937年中国地质学会的两任理事长。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杨钟健只身南下，辗转到达昆明，任地质调查所昆明办事处主任，并兼任西南联合大学名誉教授。在昆明的



几年中，他的主要学术活动，是对云南禄丰动物群的发掘和研究。这一研究，使禄丰动物群成为世界上研究这一重要地史时期，脊椎动物和古地理的一个经典与标准的化石地点，而杨钟健本人也因此成为当时国际上最活跃和最有成就的一位古脊椎动物学者。1940年夏，杨钟健被聘为地质调查所古生物研究室脊椎古生物组主任和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同年10月，他随昆明办事处迁到重庆，应邀兼任重庆大学名誉教授。1944年4月杨钟健赴欧美考察和讲学。

1946年3月，回国以后，至南京继续在地质调查所工作，同年冬任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次年春，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48年秋，杨钟健出任西北大学校长，抵制了胡宗南将学校迁至成都的图谋。1949年4月，他拒绝了国民党胁迫他去台湾的引诱，在南京迎接了解放。

1949年12月，杨钟健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1953年，任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1957年8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成立，他担任所长；1959年又兼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从此，他将全部精力倾注于古脊椎动物学研究和自然博物馆的建设上。1962年，他以卓越的学术成就和崇高的国际威望，被美国古脊椎动物学会选为名誉会员。在解放后的17年间，杨钟健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做出了极为突出的富有开拓性的贡献，而且为我国古脊椎动物的研究和自然博物馆的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骨干。1956年4月，杨钟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被选为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文化大革命”中，杨钟健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但他顶着政治上的压力和肉体上的折磨，仍坚持科学研究工作。1975年，被英国林耐学会选为会员。

“文化大革命”后，杨钟健兴致勃勃地投入振兴祖国科学的伟大事业。但却因病于1979年1月15日与世长辞。

杨钟健一生学术研究的范围，涉及地层古生物、古人类及考古学等广阔的领域。他先后完成学术论著600多篇（册），其中包括20多部专著，是我国古生物学界著述最多的学者，在世界上也称得起是丰产学者。



高克林与《鲁忠才长征记》

雷凤侠



高克林

高克林（1907—2001），原名高文敏，华县（现华州区）赤水镇程高村人，生前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和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33年12月至1942年8月，高克林在陕甘宁边区工作。

1940年，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党中央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生产，支援抗战。当时，盐运业曾是陕甘宁边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用盐交换外货、运盐、卖盐是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

来源。1941年5月26日，边区政府发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动员边区人民运销六十万驮食盐的决定》。可是，有些人认为用牲口从定边县向关中运盐途中口粮消耗太大，且人员安全得不到保障，会发生死人死牲口的情况，对边区来说得不偿失。由于这些同志的重重顾虑，大家对运盐之事产生恐惧心理，导致边区人心惶惶不安。在这种情况下，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主席要求高岗派人对运盐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并拿出一分调查报告，高岗把这一紧急任务交给了高克林。

1941年8月13日，在边区政府工作的高克林找到郿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



才以及王毓贤、孔照庆组织开调查会，认真进行调查并记录，详细了解了他们带队到陕甘宁边区所属的“三边”（盐边、靖边、定边）地区长途运盐的情况。然后，根据调查记录，他加班加点，整理完成《鲁忠才长征记》，在三天内高效地完成了上级领导交给的任务。



1941年9月14日延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报》刊登的《鲁忠才长征记》

《鲁忠才长征记》全文3000多字，分驮盐的牲口数量、时间路程、沿途的困难、一路生活情形、路上所发生的问题、用费和赔赚问题、经验教训，共七个部分。这篇报告有实例，有概括，语言简明扼要，文风质朴，以事实论证了边区运盐的可行性，澄清了以往关于运

盐业流传的谣言，消除了一些人员的顾虑，稳定了边区人心。

毛泽东对《鲁忠才长征记》作出了高度评价，他在按语中写道：“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毛泽东重视这篇调查报告，不单是因为它的内容好，更因为它的文字风格质朴。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曾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强调要研究实际情况，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

高克林的这篇《鲁忠才长征记》，非常符合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的要求。他经过实际调查，深入了解当时情况，实事求是，通过实例，用



简洁朴实的文字，论证了当时边区运盐的可行性，及时解决了当时意见分歧的问题，因而它确实是一篇“扫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典范好文。同时毛泽东在这篇按语中，也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八股”这个概念，并随之于1942年2月8日作了闻名于世的《反对党八股》这篇报告。

高克林能在三天内写出这么好的一篇调查报告，除了他逻辑思维性强，条理清晰，文风朴实外，当然更离不开他扎实务实、俯下身子下基层的工作作风。今天，我们重新学习《鲁忠才长征记》，仍然大有益处。我想，无论什么时候，高效扎实的工作作风，谦卑的工作态度，条理清楚、言之有物、有的放矢、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好文章，这些都应该是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路标。



华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李连璧

邵拉雄

1949年5月23日，华县和平解放，第二天，华县人民政府成立，第一任县长是李连璧。



李连璧

李连璧是华阴北乐村人，早年就读于西安高中，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是西安地区学生领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后进入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调研室研究员、延安大学助教、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的秘书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战争时期，先后担任三原军分区司令部秘书、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等职。

1949年5月，华县和平解放，李连璧被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为华县人民政府县长。接到命令，他带着警卫员，连夜赶

赴华县就职。华县解放之初，形势复杂，险象环生，灾害严重，百废待兴。他身为县委常委、一县之长，坚决贯彻党在新区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县委领导下，组织全县人民积极开展防洪抗灾，生产自救，支前剿匪，减租反霸。在一个漆黑的夜里，他手执铁锨，带领县政府干部抗灾防洪，并一面指挥，一面率先跳进洪水中，农民群众看到县长扛着铁锨来防洪，非常感动，纷纷传言：老几辈只听说县长老爷坐公堂、坐大轿，哪里见过县长和农民一起在泥水里劳动？于是，

一传十，十传百，有的老人甚至大声训斥晚辈：“县长都来防洪了，你们还睡在热炕上，赶快起来，赶快起来……”

6月29日晚，国民党陕西二署专员张雅轩残部400人由南山窜出，袭击石孟（今柳枝镇毕家地区）、令公（今柳枝镇）两个区政府，继而西窜至县城，企图消灭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暴乱，李连璧大智大勇，指挥若定。与县委书记、副书记等领导在县委院内研究对策，采取了应急对策：封锁县城四门，布置岗哨，实行宵禁，暴徒在城外放了一阵空枪，撤至小敷峪。随后，李连璧迅速控制了形迹可疑的县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张宏钧等，并查明张宏钧等确系敌人内奸，粉碎了暴乱武装与内奸里应外合攻占县城的计划。在对县大队进行了全面整顿后，由李连璧兼任县大队大队长。

此后，县委组成了平乱工作组，一面进行武装围剿，一面发动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李连璧不顾个人安危，进驻柳枝伏中村，深入调查，花大气力作暴乱分子家属的工作，动员他们劝参加暴乱的家人自首，争取宽大处理。8月，渭南军分区派22团进山清剿暴乱分子，将其一举全歼。

1950年3月，李连璧调离华县，后长期担任中国驻外使节。1980年12月，他调回陕西，先后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90年10月，李连璧离职休养。离休后，他心系华县父老乡亲，曾多次到华县视察，为华县经济建设出谋献策，向干部作革命传统报告。2000年8月13日，李连璧病逝于西安。



陕西省农业劳动模范张孝义

闫广勤



张孝义

张孝义（1929—1978），张家山（今柳枝镇张桥村张山组）人，陕西省农业劳动模范。

他出身贫苦农家，少年时靠替人放牛、租种他人土地及打短工为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满怀激情投入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先后担任过农会主任、互助组长、农业社主任，并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曾任张家山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委员、县委委员等职。

张家山是一个小山村，山大沟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林木横遭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村民生活极为贫困。张孝义看准这个问题的症结，决心改变自然面貌，带领群众走上富裕之路。从1950年起，他就率领群众担起了植树造林、保持水土、发展牧业、增产粮食、改变贫困面貌的艰巨工作。他组织群众在荒山秃岭上植树，修建水平梯田，建设果园，改变粗放耕作习惯，精耕细作，科学种田，并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山区副业。至1957年，他们共封山育林1万多亩，植树造林4000多亩，建起了100多亩苹果园，栽种及养护了2000多株毛栗、核桃、柿子树。90%的荒山得到绿化，水土流失得以控制，粮食产量不断增加。养羊业也从零起步，发展到几百只。农、林、牧业的全面发展，使村民生活得

陕西省农业劳动模范张孝义

到很大改善，1948年，这个村有65%的户缺粮，到1956年，就已达到家家足食。张孝义为了张家山改变贫穷面貌，不仅作出了正确决策，而且始终与群众一起，同甘共苦，共同劳动，身先士卒，备尝艰辛。

由于张孝义的出色领导，张家山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成为全省乃至全国闻名的农林业先进单位。1956年，被评为陕西省林业模范单位和全国农林牧模范农业社，国家林业部颁发了奖旗、奖状。1958年12月，张孝义代表张家山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周恩来总理署名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奖状（张家山时称华峰生产队）。20世纪60年代前期，张孝义依然带领张家山在全面发展农林牧业的道路上前进。“文化大革命”后，张孝义调到柳枝公社工作，不久即去世。1982年，省人民政府给他颁发了劳动模范荣誉证书。



张家山获得的国务院奖状

群众美术教育家阎新立

刘合心



阎新立

阎新立（1933—1994），祖籍陕西平民县（今归于大荔县）。1952年，阎新立于大荔师范学校毕业，调到华县少华初级中学任美术教师，1963年调华县文化馆工作。同年，全家人搬迁到华县少华乡瓦头村定居。

1952年至1962年，阎新立在任华县少华初中美术教师期间，以“不能作专业画家，也可做一个业余画家；不能搞创作，也可做一个美化生活者；不能做艺术实践者，也可做一名艺术欣赏者。总之，要能全面正确理解艺术的作用”为宗旨的艺术教育思想，精诚敬业，严格培养学生的写实技巧和创作能力。

还利用暑假，多次义务举办美术培训班，选拔有美术基础的学生，进一步提高他们素描、水彩、临摹、写生、图案设计及创作的能力。至1963年，阎新立先后为西安美术学院附中培养输送学生21名，为渭南地区各县同期考入美术专科学校之首。阎新立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勤于写生，勤于创作。1958年，他创作的《一边读书，一边劳动》油画，在陕西省教育厅、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举办的“陕西省中小学教师画展”展出，并荣获二等奖。在国家“三年

经济困难”时期，阎新立从他低微的工资中，资助了华县一位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的贫困学生，鼓励这名学生专心学习，完成学业。

1962年以后，阎新立在华县文化馆和图书馆工作，他以美术宣传服务于社会为己任，以辅导群众美术活动为天职，多次举办培训班，辅导群众美术和书法学习，他继承“长安画派”“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的精神，遍访祖国名山大川，特别是渭南地区韩城的司马迁祠、禹门、文庙，华阴的华山、玉泉院，华县的少华山、潜龙寺、高塘塬、龙耳山、金堆、渭水河畔，等等，用水彩画描绘了渭河抽水灌溉农田系列作品和高塘塬风光，20世纪80年代，阎新立寄情山水和中国书法的研究和创作，用水墨山水画和青绿山水画创作了《潜龙藏幽》《深山绝岭方有黑山白水之致》《太史公祠颂》《高塘水甜》《龙门消夏图》《渭河抽水灌溉》《青绿山水图》《罗敷女》《华山》《禹门口》《读画偶笔》《群雀鸣晓》《秋塘小趣》《双鸭》《对话》和《香莲告状》《骑驴艺人》等作品；这些绘画作品笔墨清新、明快，构图严谨，功力非凡。在诗词和散文创作方面，阎新立创作了《题林县留影照》《华县农民书法颂》《华州赋》《游宁山寺》《登华山南天门》等作品；阎新立对中国历代书法作品长期进行深入研究，并结合自己对书法的创作体会，撰写了五万多字的《笔法笔意浅论》一文，在中国书画函授大学陕西金堆分校和渭南书画夜校等培训班上，用作授课讲稿。阎新立的书作作品，既有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书法的神韵，又更多的吸取了魏体书法笔意并揉合了清代书法家傅山、何绍基以及近代于右任等书法家的笔法笔意精髓。章法布局结构，仰俯参差，错落有致，风格独具。先后创作出百余幅书法作品，曾得到陕西著名书法家卫俊秀、上海著名书法篆刻家韩天衡等人的赏识和肯定。阎新立与长安画派的康师尧、修军、张建文、罗铭、王子武等人，有着深厚的友情，时常切磋技艺。

阎新立客居华县四十余载，几乎走遍了华县的山山水水，对华县的风土人情、自然风光，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以画笔画华县的自然风光，用诗歌讴歌勤劳朴实的华县人民，这种感情渗透在他创作的绘画作品和诗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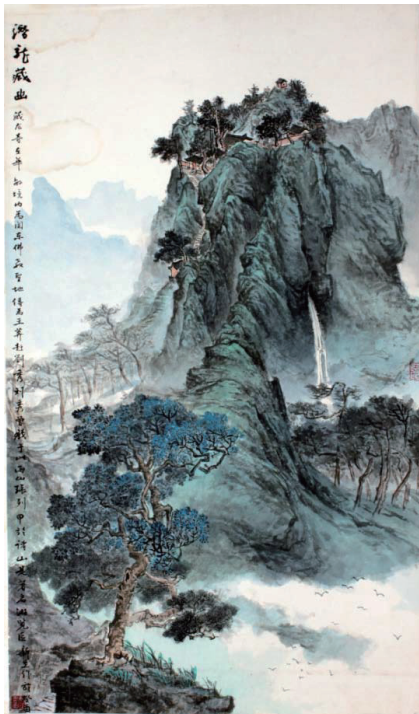
阎新立是一位自学成才，多才多艺，诗、书、画皆能的文人画家和基层美



术教育家，他一生勤敏谦和，授业育英，苦心孤诣，献身华县的群众文化艺术事业，数十年如一日，桃李遍地。是渭南地区美术界德高望重的元老，被誉为“关中三阎”（“三阎”是指 20 世纪 50 年代，渭南地区美术教育界具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固市中学的阎德馨，瑞泉中学的阎爽飞和少华中学的阎新立）。名闻全国的金堆铝业公司职工业余书画美术活动，与他十余年的辛勤培育紧密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阎新立是华县群众美术和书法创作活动的奠基者。1994 年元月，渭南地区文联和华县学生联谊会举办了“阎新立先生美术教育展览会”。阎新立逝世后，曾授业于他的莘莘学子，咸集凭吊，并于 1995 年的清明祭日，集资刻碑，集会祭奠，以寄学生脉脉怀念之情。

作者简介

刘合心，生于 1942 年，陕西省文物鉴定研究中心文博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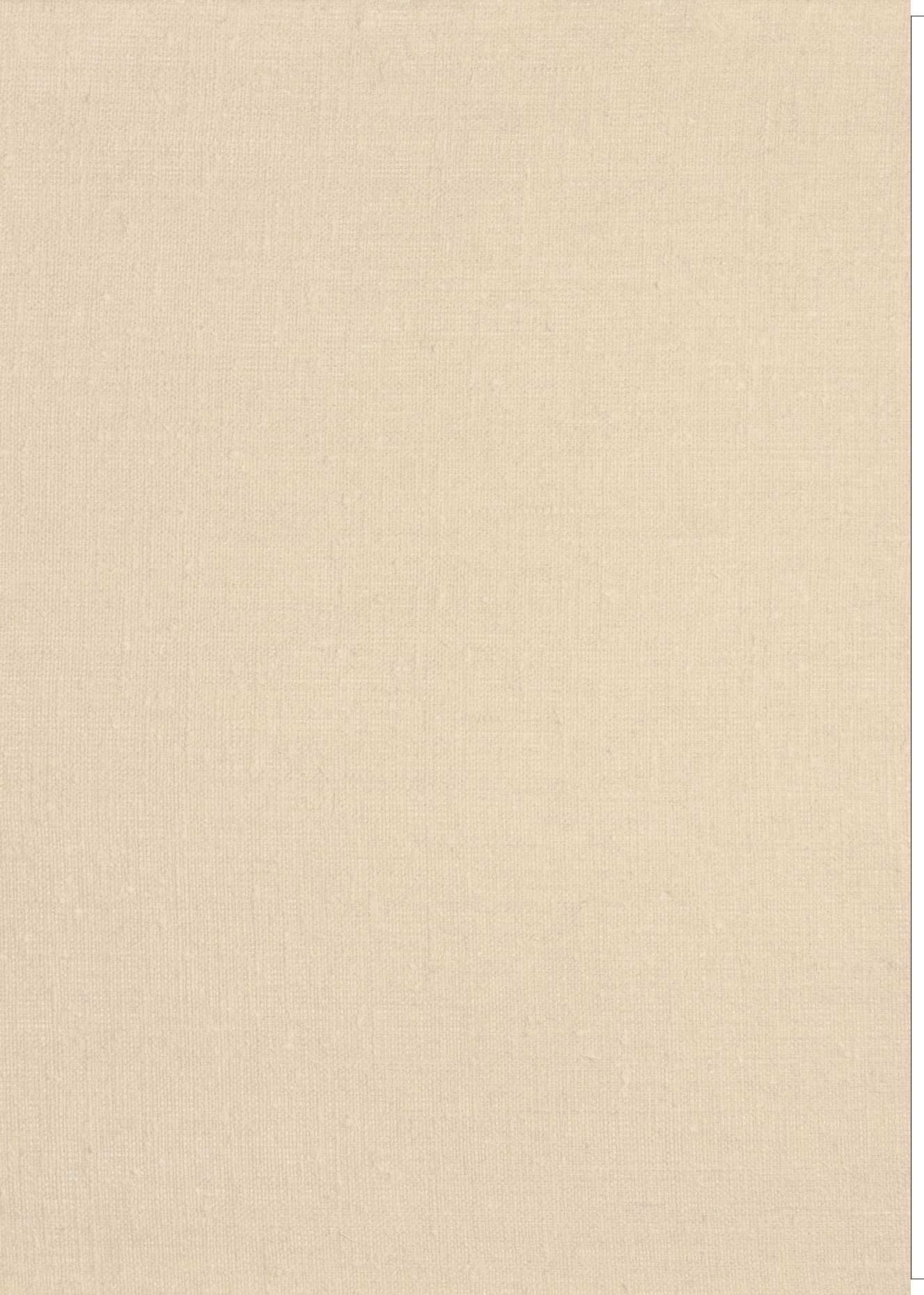
阎新立的美术作品《潜龙藏幽》





郭子仪研究





唐代名将郭子仪

闫广勤

在华州区的古代历史中，曾出过许多有名的人物，但能在中国历史上占一席之地，彪炳史册，经久不衰的著名人物，当首推唐代名将郭子仪。他平定安史之乱，抵御吐蕃入侵，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军事家。

郭子仪于武则天当政时期的神功元年（696）出生于华州郑县，即今华州区，其出生的村庄今称西马村。郭子仪曾在《让华州及奉天县请立生祠堂及碑表》一文中说：“华州是臣所生之地。”郭子仪家族是华州的世家大族，其先祖于西汉时已定居于此。历代祖先多任官吏，为仕宦之家，郭子仪的父亲郭敬之，曾任渭、吉、绥、寿四州刺史。郭子仪自幼练文习武，20岁左右时参加武举考试，以成绩优等补为左卫长上（一种低级武职），从此步入军伍，成为职业军人。以后累迁，至唐玄宗天宝十二载（753），做到天德军使（一种高级武职）兼九原（今内蒙临河县东）太守。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郭子仪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了朔方节度使，率军平叛。朔方节度位于今宁夏、内蒙交界一带，是唐王朝的重要军事力量。郭子仪受命后，率强悍的朔方军自西向东，直捣叛军占据的今山西、河北一带，屡战屡胜，沉重打击了叛军的后方及补给基地。但叛军前锋相继攻陷了唐朝的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唐玄宗率太子等出逃。太子来到朔方节度的大本营灵武（在今宁夏），即位为唐肃宗（唐玄宗被尊为上皇）。



郭子仪画像（选自南熏殿《历代名臣像》，宋代人绘，佚名）



郭子仪率军回师灵武，成为唐肃宗当时唯一依靠的军事力量。郭子仪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仍兼朔方节度使。至德二载（757），郭子仪担任关内、河东副元帅，率15万大军相继收复了长安、洛阳二京。此战使郭子仪获得极高的声望，被史臣裴垍称为“功盖一代”。唐肃宗也当面对他说：“国家再造，卿力也。”郭子仪还因此功兼任了中书令（宰相之职）。中书令一职，郭子仪担任了24年，因而当时人尊称他为“郭令公”。乾元二年（759），在与安史叛军的相州（今河南安阳）会战中，唐军大败，郭子仪被解除兵权。宝应元年（762），他又被起用，任命为兴平、定国副元帅，进封汾阳郡王，平定了绛州（今山西新绛）兵变。唐朝时的“郡王”是爵位的一种，是表示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的荣誉称号，并不是分疆裂土的某一地之王。郭子仪封“郡王”而命名为“汾阳”，是因为当时为了对获得同一级爵位的人加以区别，而在各自的爵位前加一名称。这个名称往往以受爵者姓氏始祖得姓之地命名。天下郭氏公认其得姓之地在汾河（在今山西省）之北，故称“汾阳”（水之北为阳）。郭子仪被封为汾阳郡王，并不是在今山西汾阳县为王，更何况今汾阳县在唐时并不称汾阳，而称西河。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安史之乱被平息，但吐蕃却从西大举入侵，占领了长安。郭子仪以关内副元帅的身份，组织关中各地的唐军，赶走吐蕃军队，再次收复了长安。永泰元年（765），吐蕃、回纥等部族30万人再犯关中西部，长安危急。郭子仪只有一万人马驻守泾阳，他“单骑见回纥”，说服回纥与唐军联合共击吐蕃，大获全胜。以后，郭子仪率朔方军驻防关中西部，防备吐蕃入侵长达数十年。大历十四年（779），唐德宗即位后，诏郭子仪回朝，赐号“尚父”，进封太尉，免去全部军职。建中二年（781），郭子仪病逝，享年85岁。

郭子仪为唐室中兴，国家安定而披肝沥胆，凡遇危难，都欣然受命，锐身赴任，亲解其纷。他功高位显，招来皇帝的疑忌和权臣的倾轧，却表现了顾全大局，大智若愚的态度。他掌兵处外，并不拥兵自重，朝廷诏命回京，一向是“朝闻命，夕就道”。把持朝政的宦官鱼朝恩，忌恨郭子仪，派人掘了郭子仪在华州的先人坟墓，朝野人士恐引起两派争斗，但郭子仪却说：“此天遣，非人患。”委曲求全，

避免了内部纷争。他忠诚国事，不徇私情。绛州兵变的首犯王元振原为郭子仪的部将，郭子仪到了绛州，王元振得意非常，认为自己为郭子仪重掌兵权立了大功。但郭子仪斥责他说：“大敌当前，你倡乱作恶，如安史叛军乘乱而入，绛州则失。我岂能领你的私情而破坏国家法度。”遂将王元振及同党斩首。

郭子仪一身担国家安危 20 多年，平乱复安，抵御外寇，功盖一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二十四史中的《旧唐书》《新唐书》皆为他立传，当代权威工具书《辞海》《辞源》《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大辞典》等都有对他的介绍。历代各种历史专著、历史教科书，凡讲到唐史，讲到安史之乱，无不提及郭子仪。从郭子仪建功立业时起迄于今，对他的评价都很高。郭子仪的同时代人、著名诗人杜甫称“郭相（指郭子仪）谋深古来少”“仆射（指郭子仪）如父兄”。郭子仪的同时代人、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称赞郭子仪“文经武纬”，“宽身厚下”，“沉谋秘于鬼神，精义贯于天地”。唐末诗人司空图写道：“华郭惟郑，郭氏旧乡，始终敬慎，千古汾阳。”到了现代，中华书局出版的《古代名将传》一书，称“郭子仪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的军事家”。毛泽东主席对郭子仪也很熟悉，认为“郭子仪这个人很有政治头脑”。

郭子仪功高德广，得到历朝的尊崇。他去世后不久，就由唐德宗批准，配享武庙，绘图凌烟阁，这是对去世武将很高的褒奖。以后各代的皇帝朝廷对郭子仪也很推崇。南宋高宗赵构，就经常以郭子仪的忠君不二要求自己的臣下，曾称赞武将杨存中为“朕之郭子仪也”。郭子仪寿命长、官职高、子孙多、财产广，这是封建社会人们的最高理想，故在民间对郭子仪也是尊崇有加。许多地方都有或曾有过郭子仪的祠、庙（如陕西的华州区、彬县），有塑像、壁画（如陕西韩城大禹庙），有年画（如天津杨柳青年画《卸甲封王》），有戏曲（如《打金枝》等）。有关郭子仪的传说及工艺品更是不胜枚举。

郭子仪八子八女，孙辈数十人，因而后裔繁衍，人数众多，许多省市及台湾地区都有郭子仪后裔，海外华人华侨中的郭子仪后裔也很多。他们缅怀祖德，慎终追远，经常回到华州寻根祭祖，向这位为中国历史做出卓越贡献的著名军事家，表达自己的尊敬怀念之情。



郭子仪的政治智慧

秦 寂



郭子仪像（王志军绘）

郭子仪是以一个军事家的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但他不是一介武夫，而是一个富有政治智慧的将军。毛泽东主席曾评价说：“郭子仪这个人很有政治头脑。”

郭子仪出将入相、地位高升、兵权在握时，他的外部环境却极其险恶。安史之乱的首恶安禄山、史思明等，都是重兵在手的大将；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各地军阀又拥兵自重，裂土一方。因此，皇帝、朝廷对于手握兵权的郭子仪虽然表面尊崇，其实并不放心，对他总是处处提防，总想借机剥夺他的兵权，倾轧、疑忌一直伴随着他。郭子仪忠贞许国，没有个人野心，

但如果在险恶的官场上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而在中国古代，军事将领功高震主，权大遭忌的例子不胜枚举，西汉的韩信、宋朝的岳飞、明朝的袁崇焕就是最著名的事例。历史上的名将，大多结局不好，而郭子仪如何面对这种局面呢？

郭子仪侍奉的唐肃宗、唐代宗都是心胸狭窄，阴险狠毒之人，他们信任的宦官鱼朝恩、程元振等人，把持朝政，都是嫉贤妒能之辈。而郭子仪功高位显，威望极高，他们既要利用郭子仪以安天下，又怕郭子仪拥兵割据，甚至夺得朝纲，取而代之。面对此种险恶局面，郭子仪却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左右逢源，独善其身，

完全名节，渡过难关，处处表现出顾全大局、襟怀坦白、大智若愚的政治家风度。下面举几个例子：

相州会战失败后，把持朝政的宦官鱼朝恩将责任全都推给郭子仪，并屡进谗言，唐肃宗就召郭子仪入朝，罢去他的兵权。郭子仪接到圣旨，马上就要动身。他的部下怕他失去兵权后遭遇不测，就拦住不让他走。郭子仪假说：“我要为钦差大臣设宴饯行。”脱身后立即赶回长安。史书记他是“朝闻命，夕就道”，就是说，他早晨接到回京的命令，日落时就上路。他从不贪恋兵权，因而解除了唐肃宗的疑忌。要知道，当时许多领兵在外的将领，都不愿回朝，怕朝廷借机夺了他的兵权。

唐肃宗死后，唐代宗即位，宦官程元振总揽朝政。他怕郭子仪功高威重，不好驾驭，就在代宗面前挑拨离间，肆意诽谤郭子仪。郭子仪当时为副元帅，于是上奏代宗，请求解除自己的兵权。唐代宗未上台前，为广平王，曾与郭子仪一起平定安史之乱。郭子仪将代宗给他的亲笔书信诏敕，加以整理，进呈御览，并上奏折说：“您先后给我的书信诏敕有一千多篇，虽然是表彰我的一时之功，却成为我的子孙后代的传家宝，现冒死呈上，请陛下过目。”此举为自明忠谨，委婉表达畏惧谗言的苦衷。代宗见后，心中悔悟。

“打金枝”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下嫁给郭子仪六子郭暖，小两口都年少气盛，不免吵架拌嘴。一次吵架时，郭暖口出狂言：“你依仗你老子是皇帝吗？我父亲要当早当了，只是不愿当罢了！”升平公主听到此言，十分生气，就跑到宫里告御状。代宗说：“此话不假，郭子仪要当皇帝，这江山就不是咱们的了。”劝慰升平公主回到郭家。郭子仪听说此事，大为惊慌，立刻叫人把郭暖关了起来，马上入宫请罪。代宗安慰郭子仪说：“不聋不痴，不做公婆，儿女闺房之言，何必当真。”郭子仪回去后，杖打郭暖，教训了他一顿。这件事说明了郭子仪虽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仍谨慎小心的秉性。

还有一次，郭子仪在华州的祖坟被人盗掘，罪犯没有抓到。朝野上下都怀疑是与郭子仪作对的宦官鱼朝恩所为，担心郭子仪会与鱼朝恩过不去，引发争斗。代宗也怕郭子仪闹事，影响政局，就在郭子仪入朝时加以抚慰。郭子仪流着



泪说：“臣长期带兵在外，没能禁止部下的暴行，士兵们常有盗掘他人坟墓的。如今落到自己头上，这是上天对我的谴责，与别人无关。”他忍气吞声，息事宁人，化解了一次政治危机。

另一次，鱼朝恩要宴请郭子仪，有大臣告诉郭子仪，鱼朝恩会乘机害他。郭子仪的部下要他内穿铁甲随从护卫，郭子仪不许，只带十几个家僮赴宴。鱼朝恩见了问：“随从怎么这么少？”郭子仪说明情况，鱼朝恩深为感动，不禁泪下，说：“不是你这样有德行的人，能不产生怀疑吗？”要知道，鱼朝恩心狠手辣，残害了不少大臣、将领，并不是容易感动的人。

郭子仪的府第在长安，他平常将府第的各个大门都敞开，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自由出入，不加过问。儿子们不满，对父亲说：“大人功业盖世，应当自重。如今咱们家门户洞开，不论贵贱，随意出入，有失身份。”郭子仪回答：“我们郭家有国家供给草料的马二百匹，吃国家粮食的仆人一千多人，已是进无可往之处，退无可据之地。如果严防门户，内外不通，一旦有人心怀不满，捏造事实，加以陷害，那么，我们郭家上百口老小，将会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我这样四门洞开，坦荡自然，不存秘密，即使有人想陷害，也无从谈起。”儿子们听后，叹服不已。

郭子仪晚年，重病卧床，探望他的朝中官员络绎不绝。郭子仪会见来客时，侍奉他的姬妾丫环并不回避。但在大臣卢杞前来时，郭子仪闻报，立即让姬妾丫环全部退下，独自一人接待。过后，家人询问其故，郭子仪说：“卢杞这个人身材矮小，相貌丑陋，面色如蓝，而且用心险恶，心胸狭隘。女人们见了他的相貌，一定会忍不住发笑。一旦让他感到难堪，肯定会记恨在心。如果卢杞日后得志的话，定会加倍报复，那样的话，我们郭家怕是要灭族的。”从中也可以看出郭子仪认人之准和深谋远虑。

郭子仪的政治智慧，就是他在险恶的宦海沉浮中，具有襟怀坦白、豁达大度、大智若愚的风度，这种气量和旷达精神使他顾全了国家大局利益，并有效长期地发挥了自己的政治作用。许多将领军事才能并不在郭子仪之下，但在政治上不够成熟，而落得悲惨下场，因为皇上、朝廷猜忌一个功盖天下的将军，是封



郭子仪的政治智慧

建社会的顽症。而郭子仪却以自己的政治智慧，完名全节，哀荣终始，充分发挥了自己对历史应负的重大责任，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家中独树一帜的杰出人物。



华州公园内的郭子仪塑像



郭子仪故里风物散记

闫广勤

在陕西渭南市华州区的华州公园里，耸立着一尊高大的古代武将的塑像，这个武将就是唐代名将郭子仪。华县是郭子仪故里，这尊塑像，是故里人民对郭子仪的纪念。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抵御外族入侵，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他不但永远留在故里人民的记忆里，而且在其故乡的大地上还保存了许多有关他的遗迹，虽经 1300 多年的岁月沧桑，仍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四方游客和众多仰慕者。



一、西马村中话故园



西马村

从华州城东行 5 公里，跨过罗纹河桥，转向北行，迎面出现一个极为普通的村庄，这就是郭子仪在华州的故园——西马村。

西马村坐落在一马平川的关中平原东部上。东面 20 多公里处是直插天际的西岳华山，南面数公里外是与华山齐名，并称“二华”的少华山，大小两座华山山势相连，高雄挺拔，遮住南天；村北数公里处是宽阔曲折的渭河；西面从村边流过的是渭河支流罗纹河（唐代称小敷溪）。围绕于西马村的这些名山大川钟灵毓秀，也是中国历史名人郭子仪的故园所在。

西马村南公路旁，立有一石碑，上题“唐汾阳王故里”六个大字，“汾阳王”

是郭子仪因功得到的爵位。这座碑是明朝嘉靖己未年，即嘉靖三十八年（1559）正月，由华州知州朱茹所立。碑高 1.3 米，宽 0.65 米，厚 0.20 米，现由华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藏，1994 年 8 月，华县人民政府照原碑样式复制后在原地重立。

据西马村中父老们讲，此村是郭子仪先祖世居之地，郭子仪也出生在这里，原村名已失考。后来，郭子仪六子、唐代宗驸马郭暧的后裔们在此繁衍，而被称为“驸马村”，后又演变为今名西马村。

西马村居民原来绝大多数是郭姓，皆为郭暧后裔，是一个大家族。后因陆续有移民迁来，他姓才有所增加。现在全村 150 户，郭姓为 80 户；全村 550 人，郭姓人家有 320 人，仍占多数。

西马村原址在现址北 0.5 公里处，因地势低洼，常受洪水威胁，故于 1977 年后陆续搬迁到现址。

村中父老们说，老村共有北、中、南三道巷。当年很大一部分都是郭子仪的故宅，他出生的房间，在老村南巷。故宅书房在老村东南，至今人们仍称此处为“书房前”。他们还说，郭子仪故宅有一口井，曾一直留存到老村搬迁时。这口井很古老，还盖有井房，现已填没。这一说法，明朝《华州志》也有相同记载：“郭令公故里……其故宅有遗井，土人称汾阳王井。”



明代的汾阳王故里碑

唐朝武则天统治时期的万岁通天二年，即公元 697 年，郭子仪就出生在这个村子里。郭家是仕宦之家，郭子仪的父亲郭敬之历任各种文职和武职，最后做到寿州刺史。郭子仪从小就喜欢读兵书，练武功。在二十岁左右时，经州县选拔后，参加了朝廷的武举考试，以优异成绩步入军界，开始了他 60 多年的戎马生涯。

从那以后，一千多年过去了，沧海桑田，世事变迁，但郭子仪故里——西马村，



却永远铭刻着这位伟大先贤的名子，就象村庄南面那耸入云天的少华山和北面长流不息的渭河水一样不朽。

二、招魂冢前祭英灵

从西马村出来，南行一公里左右，有一片高亢的台地，这里有郭子仪招魂冢遗址。招魂冢又名衣冠冢，是葬时不得其尸，即用死者生前衣物招魂而葬的坟墓。相传，郭子仪招魂冢埋的是郭子仪的一双战靴。

郭子仪真身葬在何处？为什么他没有葬在故里而要修招魂冢呢？



郭子仪招魂冢

郭子仪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六月十四日，以85岁高龄在京城长安（今西安）去世。为表彰他的盖世功勋，德宗特予以他陪葬建陵的荣誉。建陵为唐肃宗之墓，在今陕西省礼泉县。唐肃宗是唐德宗的祖父、唐代宗之父。唐玄宗天

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安禄山叛军很快控制了黄河南北，并于次年6月占领了京城长安。唐玄宗仓皇逃到四川；太子李亨逃至灵武（在今宁夏）即位，为唐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肃宗朝廷仓促建立，兵微将寡，无力保护自己，更无力指挥平叛战争。郭子仪当时为朔方节度使，正在河北与叛军作战。闻讯后即率领5万朔方军来到灵武，肃宗朝廷军威始盛，才有了可直接指挥的雄厚军事实力。郭子仪辅佐肃宗，于至德二载（757）收复了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建立了盖世奇功，稳定了肃宗的地位。肃宗曾十分感激地对郭子仪说：“吾之家国，由卿再造。”因此，郭子仪死后为唐肃宗陪葬，是对他奠定肃宗地位这一功绩的充分肯定。

郭子仪为唐肃宗陪葬于礼泉县，是对他的极大褒奖，但给其故里后裔祭坟扫墓带来不便。因而郭子仪后裔在西马村南边高燥、宽展的风水之地建起了招

魂冢。

此冢建于何时？不得而知，但不会晚于明朝。明朝万历二年（1574）至万历七年（1579）任华州知州的石元麟，在此立一块“汾阳王之墓”的石碑。清朝康熙（1662—1722）时，曾有一次扩建。清乾隆（1736—1795）时，陕西巡抚毕沅，也在此立碑以志。

民国时，郭子仪招魂冢连同附属耕地约几十亩地。墓园占地5亩，有墙圈起。园内柏树参天，浓郁苍翠，密布成林。墓冢坐北朝南，底面周长约20多米。墓园前有一砖门楼，上有一石刻颜体“敕建王坟”的横眉，可证此冢为皇帝批准所建，但为何朝哪位皇帝，则无记载。

可惜的是，郭子仪招魂冢已于“文革”中被毁，改建为白家河小学，墓园中的石碑也仅存明朝石元麟所立“汾阳王之墓”残碑，还为招魂冢留下一点痕迹。此碑现立于华州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院内。

三、故国犹存子仪祠

从西马村和招魂冢返回华州城区，在距城区一公里处的东关，有一座年代久远，饱经风霜的建筑，这就是郭子仪祠。

东关在唐、宋时，为华州城内东北角。相传，这个地方为郭子仪平定周智光之乱时，周智光被擒之处。唐代宗大历二年（767），郭子仪起兵讨伐割据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华州的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周智光部下迫于大军压境，在此处捉住周智光并将其斩首来献。后来，华州百姓为纪念郭子仪，在周智光被擒处之侧，祭祀郭子仪。

北宋初，华州城内有一座韩建祠。韩建是唐朝末年的镇国节度使兼华州刺史，辖同州、华州，割据一方，对抗朝廷，参与军阀混战。他曾挟持唐昭宗到华州达两年之久，阴谋挟天子以令诸侯。韩建后降于大军阀朱温，在朱温篡唐建立后梁王朝时，又曾任宰相。

北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崔辅任华州知州。他上任后，发现郭子仪故里没有郭子仪祠，却为唐朝叛臣韩建立庙，还有为韩建歌功颂德的石碑，不禁



大为气愤，认为这是“忠义之晦而叛逆之昭”。遂令毁去韩建画像及碑，于州城东北角，即唐时华州百姓祭祀郭子仪之处建起了郭子仪祠。祠建成后，崔辅上奏朝廷，得到宋仁宗的赞扬并予以批准。崔辅以后的第四任华州知州赵刚上任，对崔辅的建祠之举深为敬佩，并请太原文人王彰撰写了《唐尚父汾阳忠武王碑记》。碑文追叙了郭子仪的业绩，歌颂其功德，记述了郭子仪祠的建造过程。嘉祐六年（1061），赵刚派人将其碑文楷书勒石，立于郭子仪祠院内。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即公元1556年1月，华州发生8级大地震，郭子仪祠被毁，王彰撰文的石碑也断为两截。震后，祠堂得以修复，石碑也重新镌刻。

清朝时的文献记载，郭子仪祠还有两个旌功坊。一为门坊，上题“诚孚中外，威振华夷”；一为路坊，上题“功盖天下，再造唐室”。清同治元年（1862），华州爆发了回民大起义，清王朝官军、民团与起义军发生激烈而残酷的战斗，华州境内的官署、庙宇、民居等建筑物在战火中几乎破坏殆尽，郭子仪祠及旌功坊也全部被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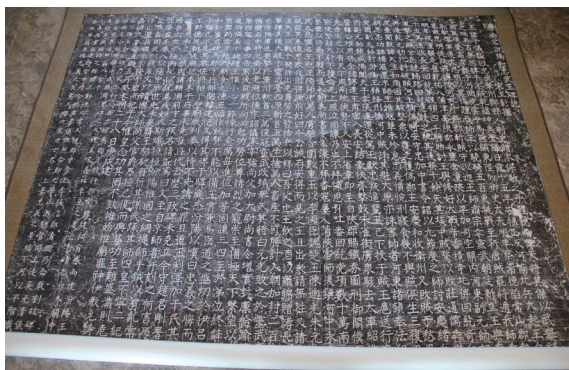
回民起义被清王朝镇压后，郭子仪祠于原址处再次修复，具体时间不详。路坊于同治十三年（1874）重建。重建后的郭子仪祠坐北朝南，位于官道北侧，有上殿三间，前殿三间。上殿内塑有郭子仪像，北宋王彰撰文的石碑则立于院内东旁。重建的路坊，俗称“郭子仪牌楼”，位于祠前东侧，横跨东西向官道，正面向西。牌楼宽约七八米，高约五六米，四柱三间，歇山顶，八角翘起，檐下斗拱排列，除四柱下方为石礅及顶上覆盖绿色琉璃筒瓦外，全部为木制。牌楼右面一间横额题“功盖天下”，左面一间横额题“再造唐室”，当中一间横额题“敕建唐汾阳王祠”。横额全部为蓝底金字。这个牌楼建成后，一直是华州人的骄傲，民间素有各级官员到此要“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一说。

民国时，官道改建为公路，路北的祠和横跨公路的牌楼，仍屹立在原处，迎接东来西往的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郭子仪祠及牌楼作为文物受到保护。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受到很大破坏。牌楼于1966年被拆毁，上殿因年久失修而倾颓，前殿也很破败。北宋王彰撰文的石碑也险遭厄运，因当地群众将其嵌于前殿东山墙内而得以保存下来。这个碑现高2.7米，宽1.5米，



厚 0.36 米，字迹还非常清晰。

1994 年，华县人民政府重修郭子仪牌楼，郭子仪后裔、旅居台湾的华县人郭振武慷慨捐资助修。修复的郭子仪牌楼移建于县城南，长 20 米，高 13 米，基本照原样而建，但比原牌楼更加壮观宏伟，现已成华州标志性建筑。



郭子仪祠中郭子仪碑记拓片



重建的郭子仪牌楼



华州区的郭子仪后裔

闫广勤

唐代名将郭子仪有8个儿子，孙辈有数十人，以致郭子仪不能全部认识。其子孙繁衍，支宗繁盛，后裔为数众多。郭子仪后裔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原因，有的留居故乡华州郑县（今陕西渭南华州区），有的迁徙外地，经一千多年的发展变化，形成遍布海内外的庞大郭氏宗亲。

留居华州故里的郭子仪后裔，生活在曾哺育了伟大先祖的故土上，秉承先祖遗志，为国家、为社会、为家乡一代一代奋斗不息，其中也涌现出一批卓越人物。

蒙古汗国（1271年后为元朝）时的郭宝玉祖孙四人，为华州郑县的郭子仪后裔，都是威名远扬的一代名将。郭宝玉，原是金朝的武官，被封为汾阳郡公。成吉思汗六年（1211）归于蒙古，追随成吉思汗征伐金朝、西域、西夏，屡立战功。郭宝玉长子郭德海，曾从大将柘柏远征到俄罗斯境内，参加过灭亡金朝的战争。郭宝玉次子郭德山，曾任蒙古军队万户。郭德海之子郭侃，曾随蒙古宗王旭烈兀西征，攻至西亚的今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地。郭宝玉祖孙作为华州故里的郭子仪后裔，承继了郭子仪戎马一生，建功立业的大将之风，在中国历代军事将领中，有其应有的地位。

明朝时，华州的郭子仪后裔形成了在当地举足轻重的名门望族，其中尤以郭性之家族最为显赫。

郭性之，华州甘泉里人（今县城三门巷一带），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进士，官至河南左布政使，为河南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为政廉明，关心民间疾苦。郭性之的长子郭宗周，是小有名气的诗人，著有《高闲斋诗草》；二子郭宗仪，是研究诸子百家的学者，著有《四礼考》等书；三子郭宗振，万历三十一年（1603）



华州区的郭子仪后裔

举人，曾任知县、知州、刑部员外郎等；四子郭宗昌，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善于鉴别金石书画，在金石学上有突出贡献。郭性之的几个侄子也都是官宦文人。郭性之家族在当时影响颇大。



华州郭子仪后裔建的“忠武祠”

清朝时，华州郭子仪后裔中较为突出的是郭德元家族。郭德元是西关里人（今城区西关一带），乾隆三十三年（1768）中武举，开始军旅生涯。乾隆五十三年（1788），廓尔喀（今尼泊尔）入侵西藏，郭德元随军征讨，击退侵略，因功授为千总，后升为守备。郭德元之子郭茂京、长孙郭大鹏、次孙郭大定、曾孙郭际唐都是清军武官，可谓继承了郭子仪的将门武风成为军人世家。

明清两代，华州郭氏共有 12 名举人，3 名进士，秀才更多。

至今，郭子仪后裔广泛分布在全区各地，除郭子仪在华州区的故里西马村外，郭氏的主要居住地有莲花寺镇赵村，杏林镇的梓里、城南、高崖，下庙镇的甘村，高塘镇的二合、腰村、柿村等地。

西马村位于城区东的莲花寺镇，是郭子仪的故里和出生地。至今，村中大多数仍然姓郭，有 80 多户，300 多人，是郭子仪六子郭暖的后代。“文化大革命”前，郭氏家族设有会长（即族长），一般由德高望重的长辈担任。会长保存着家族宗谱和神轴。宗谱保管至密，常人不能见到。20 世纪 40 年代，陕西



蒲城郭氏宗亲来这里寻根，特被允许抄录宗谱，一人抄了7天才抄完。可惜的是，这个宗谱毁于“文革”之中。神轴是3米长、2米宽的白绸子，上面绘有郭子仪及其以下各代先祖的画像。每年正月初一，郭氏家族的各户男子，不论老少，都要在张挂起来的神轴前烧香叩头。此神轴也于“文革”中被毁。

杏林镇梓里村的郭氏也是郭子仪后代，他们的祖根在西马村，后有兄弟二人从西马村迁到今城区三门巷一带居住。明朝时，又有郭氏从三门巷迁到今杏林镇梓里、城南、段巷（又称杨段巷）三村居住。梓里为长门，城南为二门，段巷为三门。这三村因相对西马村而言，方位靠南，故此地郭氏称南户，西马村郭氏为北户。20世纪50年代以前，梓里村郭氏每年清明节前几天都要去东关郭子仪祠祭祖。他们的直系先祖是上文提到的明朝河南左布政使郭性之。郭性之墓在今莲花寺镇潭峪口，人称“郭家楼子”，原有牌楼、石碑、石马、石羊等。梓里村郭氏一直于清明节时来这里祭扫祖坟，直至“文革”时郭性之墓被毁。梓里村郭子仪后裔现有20多户，90多口人。

莲花寺镇赵村的郭子仪后代，原也有家谱，名为《郭门世志》，20世纪60年代失轶。

杏林镇高崖村郭氏，为郭暖次子郭钊的长子郭仲文之后。郭仲文这一支，早年可能由今莲花寺地区迁到今华州镇崖坡村或杏林镇南王堡一带（此二村相距不远）居住。据说，郭仲文墓曾在崖坡村南的南王堡之东。后又有一支郭氏迁到高崖村定居，这就是高崖村郭氏的由来。高崖村郭氏中的郭振武先生，1949年后到台湾，为著作颇丰的学者。他潜心研究儒家学说，出版《孔子女弟子考》《朱子道心人心之辨》《大学今论》《儒家命学》《朱子哲学》《郭振武文集》等专著20多种。郭振武乐善好施，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共捐献各种义款新台币数百万元。华州区的地标式建筑——郭子仪牌楼，就是郭振武先生捐款重修的。

除上述村庄外，华州区的下庙镇、高塘塬区及其他地方，也分布有众多郭子仪后裔。据不完全统计，总数约为两三千人。



汾阳王郭子仪的“汾阳”，与汾阳县无关

秦 寂

郭子仪因功勋卓著，被唐王朝封为汾阳王，许多人就认为他的封地、食邑地在山西汾阳县（市）。这其实是错误的。

人们通称郭子仪为“汾阳王”，而正式名称应是“汾阳郡王”。郡王是一种爵位，爵位是享有某种特权的称号。唐时，爵位共分亲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县侯、县伯、县子、县男九等。郡王是二等爵位，因一等爵位亲王只有皇子才能被授予，因而郡王是皇族之外文武大臣的最高荣誉。

为加区分，每个被授予爵位的人，其爵位之前要冠以名号，如汾阳郡王、代国公、太原郡公、寿阳县男等，这里的汾阳、代、太原、寿阳都是地名。至于取什么地名作名号，情况比较复杂，但不管什么情况，这个作为爵位名号的地名，并不是其本人的封地。历史学家王仲荦曾指出：“唐制，王、公等没有实际的封地。”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148页）。唐朝实行中央集权制，并不实行商周时期的分土封侯制度。当时，连皇室封王者都不准出京城一步，何况郭子仪这样的异姓王，更不可能有封地。所以，汾阳王郭子仪有封地一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更不是在今山西汾阳县为王。



华州公园中的郭子仪塑像



至于郭子仪封王称“汾阳”，不是因为山西汾阳县（市），而是因为天下郭氏共认其得姓之地在汾河（在今山西省）之北，故称“汾阳”（水之北为阳）。更何况今汾阳县在唐时并不称汾阳，而称西河。今汾阳县，迟至明朝万历二十三年（1595）才设立，已距郭子仪封王的宝应元年（762）有800多年了。

那么，郭子仪的食邑地是否在汾阳县呢？答案是否定的。

历史学家王仲荦说：“受封的功臣和贵族，虽然都没有实际的封土，但加食实封的，可以根据所食实封的户数，征收租庸。”（《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480页）就是说，唐代对封爵者虽不给封地，却有食邑若干户的名义，但实际上也是徒有其名，称为虚封，只有加上“食实封”若干户之类的名号，才能拨出若干民户的赋税归食邑者享用（参见杨志玖、张国刚《中国历代官制讲座》，载《文史知识》1985年12期）。郭子仪去世前，食实封二千户，就是实际享用二千民户的赋税。食邑地点，并不以封爵名号的地点确定。撰于唐朝的《唐六典》一书说，封爵“皆以乡亭，多假空名，不食本邑”，《新唐书·百官志一》记：“食实封者，得真户，分食诸州。”这就是说，给食实封者缴纳赋税的民户，分散在各州，并不专在一地。而且，食实封的地区，也往往由受封者自由选择，他们大都“专择雄奥”，“莫居瘠瘠”（《唐会要》卷九十引宋务光语）。

由以上史料可以看出：(1)汾阳郡王的“汾阳”与郭子仪的食邑地没有必然联系，作为食邑地来说，它只是“空名”；(2)郭子仪的食邑地不专在一处，而是分散在相关各州；(3)他的食邑地不会在贫瘠凋敝之处，必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所以，今汾阳县是郭子仪食邑地的可能性很小。

郭子仪的食邑地到底在哪里呢？新旧唐书的郭子仪传和《资治通鉴》等均未明书。但有一条记载，值得注意。《新唐书·郭子仪传》：“李灵曜据汴州，公私财物一皆遏绝。子仪封币道其境，莫敢留，令持兵卫送。”其中的“封币”一词，指封户向郭子仪缴纳的财物（参见《中国古代军事家传记选注》，岳麓书社1985年1月版）。这里说的是，驻在汴州（今河南开封）的军阀李灵曜拥兵割据（约为大历十一年），从这里路过的朝廷和食邑者的赋税财物一概被李



汾阳王郭子仪的“汾阳”，与汾阳县无关

灵曜劫取，只有郭子仪食邑地向郭子仪缴纳的赋税，李灵曜却不敢扣留，还派兵护送。当时郭子仪家在京城长安（今西安），他本人驻防在邠州（今陕西彬县），都在今陕西中部。从郭子仪的食邑地向陕西中部运送财赋，要路过今开封，一查地图就会明白，其食邑地只有在开封以南或以东才合理。从当时的军事、经济形势分析，北方受到战争严重摧残，经济凋敝，财源枯竭。而南方江淮一带战争较少，经济相对繁荣，是当时唐朝的主要财赋之区。从江淮向长安一带输送财赋，汴州（今河南开封）是必经之地。因此，郭子仪食邑之地可能就在江淮，但肯定不在今山西汾阳，因为从山西汾阳到陕西中部，不用绕道开封。



民国时的郭子仪牌楼



华州郭子仪

闫广勤



民国《华县志》收录的郭子仪像

唐代名将郭子仪是华州郑县（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人。这为正史、文献所证，本不是问题，但在各地民间却长期流传有郭子仪是山西人的说法。便不能不多说几句，以正视听。

华州区，古称郑县，春秋时秦国于公元前 687 年所设。公元 554 年，南北朝的西魏在郑县设华州。元朝时，省县入州，撤消郑县建制，其地由华州直辖。民国二年（1913），改华州为华县。2016 年，改华县为渭南市华州区。

郭子仪是唐朝华州郑县人，即为今渭

南市华州区人，这有以下证明：

一、郭子仪本人自认

郭子仪曾向唐代宗上《让华州及奉天县请立生祠堂及碑表》，文中说：“华州是臣所生之地。”（《全唐文》卷四百五十二）

二、郭子仪之父、子孙的碑记、墓志铭

1. 郭子仪之父郭敬之的《寿州刺史郭公神道碑》，是唐肃宗时的宰相苗晋

卿所撰，文中说：“公（指郭敬之）先祖后徙宅与华山下，今为华州郑县人。”（《全唐文》卷三百五十三）

2. 郭子仪之父郭敬之的《郭氏家庙碑》，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撰文，文中说：“其先盖出周之虢叔，……后转徙于华山之下，故一族今为华州郑县人。”（《金石萃编》卷九十二）

3. 已发现的郭子仪长子郭曜、三子郭晞、六子郭暖、郭暖之子郭仲恭、郭子仪七子郭曙之子郭锬的墓志铭，皆记墓主为“华州郑县人”。（郭青萍编著《太原郭氏金石注集》）

三、正史记载

《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皆记郭子仪为华州郑县人，或记“郑人郭子仪”。（《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

四、当代著名辞书

《辞海》《辞源》《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等辞书都记郭子仪为“唐华州郑县人”，大部分都加注“今陕西华县”。



五、当代历史专著

中华书局出版的《古代名将传》，岳麓书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军事家传记选注》，三秦出版社出版的《郭子仪评传》，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的《郭子仪》等，都记郭子仪为“唐华州郑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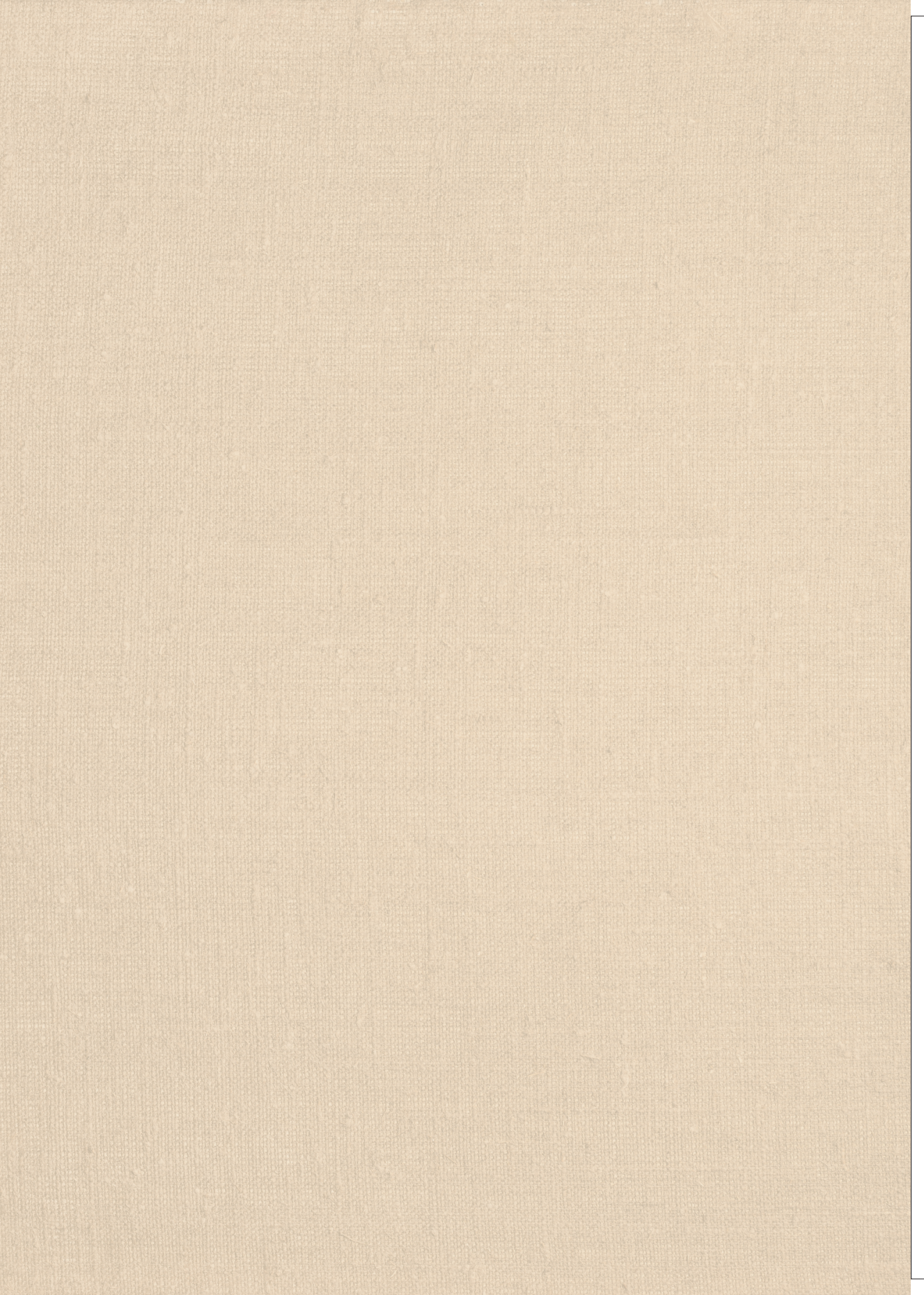
有些文章记郭子仪为太原人，这其实是说郭子仪的祖籍。其先祖郭孟儒于西汉时因任冯翊（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太守，子孙开始从太原到此安家。后来又迁居在郑县，遂为华州郑县人。所以，郭子仪祖籍在太原，而郭子仪一族至唐朝时，入籍扎根华州郑县已六七百年了，是地地道道的华州郑县人。

还有郭子仪是山西汾阳县（市）人的说法，此为郭子仪封为汾阳郡王而望文生义，没有史实依据，不值一驳。

郭子仪虽然祖籍是太原人，但其先祖迁居于此，血脉延续到郭子仪时已

六七百年，其家族已是华州的世家大族。唐朝人胡璩所撰的《谭宾录》一书中，有一则资料记到：“子仪有功高不赏之惧。中贵人害其功，遂使盗于华州，掘公之先人坟墓。”郭子仪祖先的坟墓在华州，也就证明他的家族已世代代在此繁衍生息。郭子仪是华州郑县人，为不争之事实。





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华州文物

闫广勤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珍藏着无数国宝级文物，其中有一件出土文物是来自华州的陶鹰鼎。



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陶鹰鼎

陶鹰鼎（又称陶鸮鼎），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塑艺术品，高36厘米，整体造型为一只蹲踞的鹰，体态丰肥，两翼微微撑起，两足敦实有力，宽扁的鹰尾下垂落地，与粗大的双腿做成陶鼎的三个支足，构成“三足鼎立”。鼎的腹部塑为鹰强壮的躯干，器口开在鹰的背部，器身上部前段加塑鹰头，其尖喙和双目极形象。圆凸的眼睛正视前方，炯炯有神，增添了威猛之势。

陶鹰鼎出土于华州（当时称华县）柳枝镇孙庄行政村太平庄。说起来，还有一段有趣的过程。1957年的一天，太平庄农民殷思义在村东犁地，猛然一震，犁铧碰上硬物，他以为是地里的石头，就准备将石头挖出来，谁知挖开犁松的虚土，却是一件鸟一样形状的陶器，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陶鹰鼎。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挖到一件国宝，随手带回家，做了鸡食盆。1958年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组成的考古队在华县发现了著名的泉护村仰韶文化遗址。考古队在泉护村遗址进行发掘的同时，还在附近作调查工作。太平庄是泉护村的西邻，两个村庄村连村，地连畔，殷思义见到考古队热火朝天的工作，就主动向来村里调查宣传的考古队员讲了自己曾



挖出一件陶器，并将陶鹰鼎送交给考古队，这才使这件珍贵文物见于世人，最终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华县农民殷思义发现的这件国宝，有很高的考古价值和艺术价值。国家博物馆的刘钧评价说：“在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中，鸟类造型的陶器，目前仅见此一件，是原始制陶工艺的杰作。其设计巧妙，比例相宜，造型优美，形态逼真，制作精致，注重造型与实用的完美结合，至今仍是国内少见的珍品，是五千年前我们祖先聪明智慧的结晶。同时，以陶鹰鼎为首的动物造型陶塑开启了商代鸟兽形青铜器造型之先河。”

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华州出土文物陶鹰鼎，不但是“五千年前我们祖先聪明智慧的结晶”，也见证了华州深厚文化底蕴的源远流长。



郭暖墓在何处？

闫广勤

唐代名将郭子仪是华州人，他有八个儿子，最出名的是六子郭暖，他的妻子是唐代宗之女升平公主，人称“郭駙马”。郭暖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建树，但他夫妇二人因是戏剧《打金枝》的主角而闻名遐迩。

郭暖在二十四史的《旧唐书》《新唐书》都有传，《新唐书》记其于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七月卒”。他去世后葬于何处？新旧唐书均无记载，而明朝万历初年刊行的《华州志》卷三记“郭駙马墓，州西南山之岭”。许多人就以此为据认定郭暖墓在五龙山顶。但成书于清朝康熙年间的《续华州志》，却认为此为讹传。其书卷一的《辩讹考》中记，有人听说五龙山顶有郭暖墓，就去“挖掘”，结果挖出的是唐朝的一块镇风塔题铭，又称“秦皇观基浮图铭”，由唐初的检校华州刺史乔师望撰文。《续华州志》的编纂者由此认为所谓的郭暖墓是唐朝的一座塔基遗迹，并批评郭暖墓在五龙山顶的记载说：“何考覈者之未详若此乎？”可此说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清朝道光年间的《陕西省志辑要》卷三依然记“唐郭駙马墓，在华州西二十里五龙山之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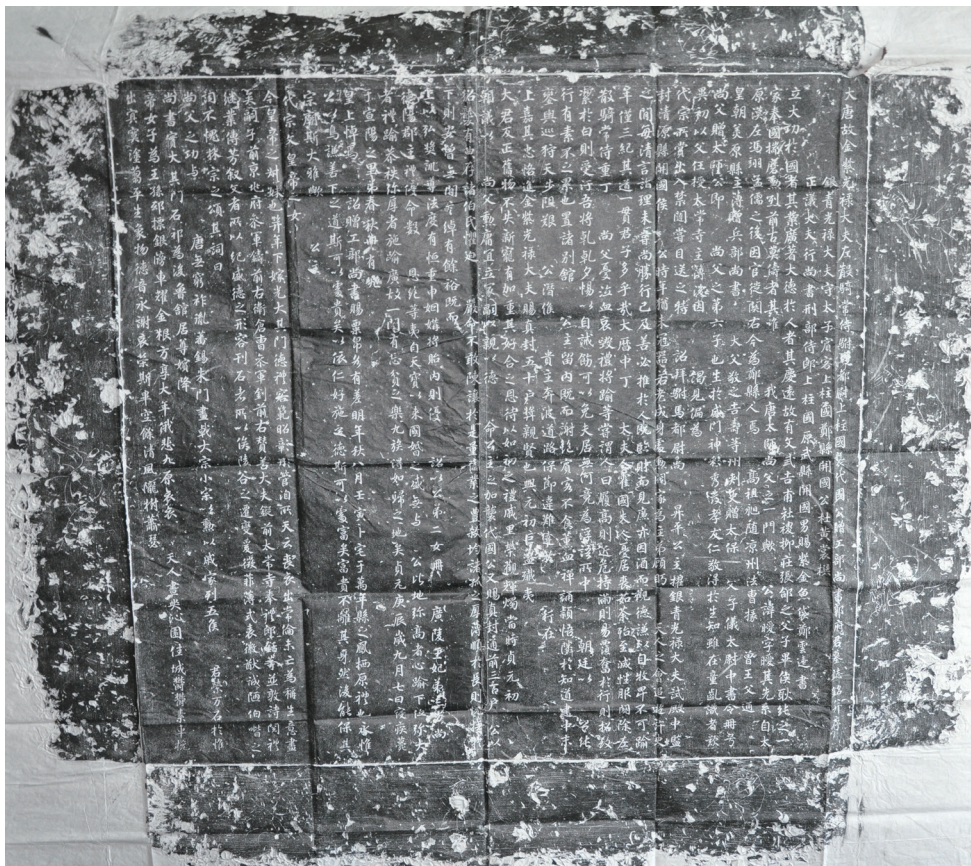
华州民间也盛传郭暖墓在五龙山上，还演绎出“升平公主五龙山吊孝”的民间故事。郭子仪故里——莲花寺镇西马村的郭氏是郭暖后裔，他们有清明期间到五龙山上“郭暖墓”前祭拜的传统。但历来也有人质疑：五龙山山脚到山顶海拔相差一千米，郭暖为什么葬在那么高的山顶？这与传统的丧葬习俗很不相同，令人费解。郭暖墓在不在五龙山？或者说，郭暖墓究竟在哪里？成了一个谜。

谜底终于在2012年被揭开了。据2012年7月13日的《南方周末》载，



在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一期工地上，挖掘出郭子仪家族古墓，其中就有郭暖及其妻升平公主的墓，具体位置在西安市长安区杜陵乡东兆余村。墓中出土了郭暖夫妇的墓志铭各一块，郭青萍编著的《太原郭氏金石注集》收录了这两块墓志铭的拓片图照。郭暖的墓志铭记其：“贞元庚辰岁九月七日寝疾，薨于宣阳之里，春秋卅有九。……明年秋八月壬寅，卜宅于万年县之风栖原。”也就是说，郭暖于唐德宗贞元十六年，即公元800年去世于京城长安的宣阳里，次年葬于长安之南的万年县凤栖原。万年县凤栖原在今西安市长安区杜陵乡一带，郭暖墓即在此地，就是上文提到的被挖掘的郭子仪家族古墓所在地区。

至此，郭暖墓及墓志铭的发现，回答了郭暖墓究竟在哪里的疑问。



郭暖墓志铭拓片



李元谅功德碑

秦 寂



李元谅碑

“李元谅功德碑”位于华州区公安局（原华县人民政府）大门东旁，作为有 1200 多年历史的唐代古碑，它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李元谅是唐朝时的镇国军节度使兼华州刺史，祖籍安息，是中亚胡人。这个“安息”不是汉朝时的安息王国（今伊朗），而是“昭武九姓国”中的安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布哈拉。安国在唐高宗时，曾一度内附，设为安息州。故李元谅的祖籍为安国，也表述成

祖籍安息。

李元谅的先祖很早就迁至中国定居，他也从年轻时就投身唐军，是骁勇的武将。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初，因平定“朱泚之乱”有功，而被任命为镇国军节度使兼华州刺史。贞元四年（788）正月，李元谅又兼任陇右节度使，并率部移防良原（今甘肃灵台县西北）。离开华州时，华州百姓要为他立功德碑，李元谅的行军司马董叔经上奏唐德宗，得到许可。第二年，即贞元五年（789）八月十一日，功德碑建成，这就是迄今仍屹立于华州区公安局（原华县人民政府）大门前的“李元谅功德碑”。据文物部门测定，此碑高 4.45 米，宽 1.57 米，



厚 0.41 米。碑头为六螭首，雕刻雄健，碑侧刻蔓草花纹。碑文共 32 行，每行 65 字，为隶书，由张濛撰文，韩秀弼书写。额题“大唐镇国军陇西节度使右仆射李公懋功昭德颂” 20 个篆字，是李彝书写。张濛是唐玄宗时的名相张说之孙，撰文时任中书舍人，韩秀弼是唐代以隶书见长的书法家韩择木的嫡派，时任卫尉少卿。李彝是唐朝宗室之后，“以学术辞藻著称”，时任宗正寺丞。



李元谅碑文拓片（局部）

碑文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散文体，主要内容是转述董叔经奏表中的李元谅徇国十大功劳，还简述了李元谅的身世经历。后一部分是“颂”，韵文，骚体诗 22 句，歌颂李元谅的功德。碑文为当时人记当时事，较为可信，故有多处可补史之缺，辨史之误。

李元谅功德碑岿然高耸，雕磨精工，不为苟就。虽然当时唐朝已从盛转衰，但此碑的

大气仍显大唐雄风。其初立处不详，可能在当时的州署，因为李元谅虽由华州移镇良原，但仍是华州刺史，还是华州的最高长官。岁月荏苒，历经五代、宋、金、元各朝，到了明朝后期，李元谅功德碑已倒卧在旧州署的荒草之中，污秽不堪。万历六年(1578)，时任华州知州的石元麟见此碑惨状而不忍，遂将此碑移至州衙，于当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重新树立，其位置大体与今位置一样。清道光九年(1829)，华州知州张坦又建碑楼予以保护。后碑楼被毁而碑如故。公元 1957 年 5 月，此碑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即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公元 2007 年 6 月，华县人民政府为此碑建了仿古碑亭，为这通有 1200 多年历史的唐碑遮挡风雨，以长久保留这历史的见证。



赤水桥上桥的上桥建于何时？

闫广勤

赤水街西头，华州区与临渭区交界的赤水河上，双桥上下相叠，横跨赤水河，形成“桥上桥”的奇观，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桥上桥

各种介绍“赤水桥上桥”的文章，大多是记此桥建于清康熙六年（1667），到清道光十二年（1832），由于山洪挟泥沙而下，河床渐高，桥孔壅塞，因而在原桥之上又砌石增高，从而形成桥上桥的奇观。其资料基本来源于成书于清



光绪八年（1882）的《三续华州志·山川志》。此桥的下桥建于清康熙六年（1667），没有问题。而上桥建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是错误的。

《三续华州志·山川志》原文是：“赤水桥自康熙丁未中丞白公捐金创建，至道光中百六十余年，河身渐高，桥眼壅塞，水难流畅，以致堤岸屡决，淹没民田无数，赤水南北几成泽国，居民苦之。壬辰岁，郡侯张公稟请道宪，捐集多金，派武生梁清选、耆民马声远等，督工重修，砌石增高，两边添设石栏，以防车马倾陷，自是河流复畅，藉免冲决。”

文中“康熙丁未”即康熙六年（1667），“壬辰岁”即道光十二年（1832）。“郡侯张公”，据《三续华州志·官师志》指华州知州张坦。《三续华州志·官师志》记其“道光元年实任”，曾“捐廉重修赤水桥，从渔村川（今大明川道）开道，自千顷漫（今大明马厂）运石”。又据《三续华州志·艺文志》中鄂山所撰《重修庙学碑》，道光三年（1823）时，张坦在华州知州任上。据《三续华州志·官师志》，道光十二年（1832）的华州知州是龚启。

由此可证明张坦修赤水桥的上桥时间，应在其任期内的道光元年至道光三年之间，而不可能是道光十二年。道光元年至道光三年之间的道光二年为壬午岁。《三续华州志·山川志》所记的“壬辰岁”，应是“壬午岁”，可能为作者笔误。

因此，“赤水桥上桥”建上桥的时间，应记为道光二年（1822）。



华州文庙

秦 寂



文庙

文庙又称孔子庙，华州文庙位于城区少华中学西侧。其始修年代无考，仅据《续资治通鉴》的一段记载，可知北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华州知州张舒曾“修孔子庙”。

明清以后，华州文庙兴衰有了连续的记载。明正德十四年（1519）知州桑溥兴工改修，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1556年1月）毁于大地震。嘉靖三十八年（1559）知州朱茹重修，后于清乾隆四年（1739）、乾隆四十八年（1783）又相继重葺。清同治年间又毁于战乱，当时春秋两季祭祀孔子时，不得不搭席棚进行。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才得以重建。民国十八年（1929），驻军对文庙大肆破坏，先后拆毁文昌宫、东庑、礼门、义路及忠孝、节义各祠，共房五六十间。泮池砖墙，簧宫古柏，均遭破坏。民国二十四年（1935）对残存的大成殿、两庑、戟门、棂星门等建筑进行了修整。民国二十五年（1936）西安事变时，国民党中央军进攻驻华县的东北军。因为东北军弹药在此，中央军的大炮遂以孔庙为目标，大成殿脊瓦倒塌，后背墙亦垂危。民国三十二年（1943），又重新修理。1949年后，用途屡变，仅存大成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成殿的科学艺术价值得到政府的重视，1984年至1986年，省文化文物厅拨款近20万元，由县文管会组织对大成殿进行了落架大修。

文庙大成殿以外围基座计算，长23.4米，宽19米，总面积444.6平方米，



屋脊距地面高达 11 米，虽经多次重修，但仍保存着明清时的建筑风格，歇山顶，四角挑，四面檐，升斗狼牙，雕梁画栋，黄绿色琉璃瓦盖顶，属抬梁式木结构建筑。文庙大成殿已于 2008 年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的华州会馆

闫广勤



北京華州會館正院大門圖

民国时的北京华州会馆图

会馆是旧时代科举制度和工商业活动的产物，是北京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明清两朝定都北京，每三年在京进行一次科考会试，全国各地进京应试的举子众多，每科应试的人数有六七千人，再加上一些随行的人员，多至上万。为方便这些人的食宿，于是，各省及一些府、州、县纷纷在京设立了会馆，专门接待本乡本土的举子及其他赴京人员。华州会馆就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

北京的华州会馆始建于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位置在今北京市宣武门外、琉璃厂西街南侧的南柳巷路东。清朝末年，华州会馆面积二亩一分八厘，有大小不等的各种房屋共四十五间；路西还有较小的庄基一块、房屋若干。华州会馆建成后，于明朝的弘治、嘉靖、隆庆、万历，清朝的康熙、同治年间，多有重修。明清两代，华州的众多举人赴京赶考，多在此住宿。其中不乏后来成为达官贵人的王维楨、东思忠、郭性之、王士棻等。辛亥革命前后，废除了科举制度，新教育兴起，赴京在各大学求学的华县（由华州改名）人不少，为节省食宿费及得到同乡之间的照应，许多人仍住在华州会馆。1917年，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华州人杨钟健，在北京求学期间就曾在其居住。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



北京人心骚动，有人企图变卖会馆，旅京学生王日新、杨鹤瑞等数十人极力阻止，并订立章程，民主管理。从1913年至1918年，还修筑房舍，合新旧建筑共成六院，以天、地、玄、黄、宇、宙六字，分别命名这六院。1916年，旅京华县学生为便于管理，推举段大成、顾步瀛为华州会馆经理。1933年，重新订立章程，设北平（北京改名）华州会馆管理委员会，有正副委员长各一人，设会计、监察、文牍、庶务等职。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会馆也为敌伪占据，内部器具物什大都失没殆尽。抗战胜利后，华县参议会曾致函在北平的华县人王旭哉，托他代为管理。1949年后，华州会馆与其他各地在京会馆一样，产权收归北京市。



“五间厅”漫话

秦 寂

原华县人民政府大院是古代华州公署所在地，大院的最北边，有五间上房，青砖灰瓦，古雅窗棂，有鲜明的清代建筑风格，人称“五间厅”。但民间称其为“老爷大堂”，据说是古代华州州官老爷升堂审案之处。其实，历史文献对“五间厅”沿革有不同的记载。

据华州旧地方志记载，古华州初设于南北朝时的西魏废帝三年（554），华州公署及州城在今赤水镇郭村，唐永泰元年（765）华州州城迁于今城区，华州公署即位于原华县人民政府大院处。唐朝华州公署内有一座栖云楼，唐末皇帝唐昭宗曾在华州留居两年之久，期间登临栖云楼远望观景，赋诗作词。栖云楼后不知何时毁圮，而“五间厅”即是在栖云楼旧址上建起的，时间是清朝同治年间。

据《三续华州志》记，清同治元年（1862），华州爆发了回民大起义，州署毁于战乱。同治七年（1868），战乱平息，知州王赞襄重建华州公署。首建，即在栖云楼故址上建五间正房，即此“五间厅”，为华州知州正宅。同治十一年（1872），知州胡焘在“五间厅”南建了复堂（俗称二堂），复堂南建了大堂。可见“五间厅”只是知州的住宅，而不是“老爷大堂”。

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时，华州会党起义，冲进州署，结束了清政府在华州的统治，但将大堂烧毁。民国建立后，华州公署变为华县政府。民国二年（1913）12月，时任华县知事的李培材重修了五间厅和复堂，大堂没有修复。五间厅在民国时作为县长室和秘书室，复堂为法庭（《重修华县县志稿》卷十三）。

1949年后，华县人民政府依旧设在这个大院内，五间厅的具体用途多变，



但基本上是县政府内的重要办公场所。2012年县政府迁址，五间厅归于咸林中学校园内。2016年初，华州区人民政府为彰显此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进行保护性整修，在保持原来清代建筑风格的基础上，将其修葺一新，使这座148年的老建筑成为华州城区的一个重要历史文化景点。



修缮后的五间厅

华州西岳庙——下庙

刘合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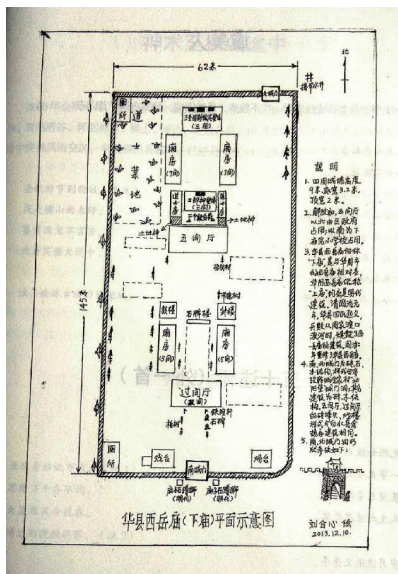
华阴西岳庙是历代帝王祭祀西岳华山神的庙宇，现已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华州下庙镇的西岳庙，历经沧海桑田，今已变成下庙中学校园，逐渐被世人遗忘，可叹可惜。

华州下庙镇的西岳庙与华阴市西岳庙相对应，华阴西岳庙俗称“上庙”，而华州的西岳庙则称“下庙”。下庙镇原为李家村，因西岳庙迁建在村西南而改名为“下庙镇”。虽然下庙镇的西岳庙建筑、规格、规模、占地面积等远不如华阴西岳庙，但下庙镇西岳庙的布局与华阴西岳庙的布局相差无几。

古时，因该庙距李家村最近，加之从周家渡口往来做生意的人日益增多，李家村集市贸易日渐兴隆，逐渐形成商贸、集市交易之地，遂以西岳庙的俗名“下庙”而命名。特别是西岳庙每年农历三月初八和八月初八两个古会，渭河以北的大荔、朝邑、蒲城、澄城等县的商人，群众等都来赶庙会。

西岳庙的建筑，在同治元年（1862）回民起义时，被付之一炬。同治二年（1863）五社群众又一次集资，重修了西岳庙。在西岳庙五间厅屋架梁的字梁板上有墨书题记。

西岳庙由周围五个社集资修建，也由五个社共同管理。五个社分别是：周家庄社、康甘社、下庙社、甘村社、车家堡社。



华州西岳庙——下庙平面示意图



五社中凡集资捐款的群众，均为社员。每社推选三人为会长，共 15 人，再从 15 人中推选 5 人，管理全社事务和西岳庙的一切事务。五社共设 20 个锣鼓和两个背花鼓，组成社火队。

到华山取水的时间及程序

华阴华山，共设 36 瓶水，每年的农历三月份，取水的各地必须在三月三十日前将 36 瓶水取完。同时规定，各地取水时，不得相互见面。华州下庙五社的西岳庙为第一瓶水，务必在三月一日的零时取出；耀州是最后一瓶水，另外，还有扶风县法门寺、周至县的楼观台等地也到华山取水，他们也必须在三月三十日晚 12 点前取走。

华州下庙五社，在农历二月二十八日，由 5 名会长组成取水队，抬着装水的红楼，带上 5 个 12 岁以下的男童（俗称“取水娃”）到华山，在三月初一零时前将水取出，三月初二前将水抬到罗纹桥东的庙内。三月初二这天，各社组成社火队前去接水。

接水程序：三月初二这天，以“着重社”（每年轮流做主的社称为“着重社”）为主，会长组织全社所有男社员出动，组织 20 副锣鼓与两个背花鼓和按规定应出动的社火队，以及 12 名 12 岁以下的男童（称“拜水娃”）接水队伍，到罗纹镇接水。

接水队伍排列顺序是：最前头为 15 杆三铳枪开道；接着是 12 名拜水娃；再是 15 名会长及抬着装神水的红神楼；再是按鼓次序排列，“着重社”在后；最后为社火队。接到水后，将神水先抬到“着重社”的老爷庙（老爷庙是指敬奉关羽的“关帝庙”，俗称“老爷庙”）内安置。

三月初六水进庙及其活动

三月初六这天早晨，各社群众抬上锣鼓，在 9 点以前必须到“着重社”的老爷庙前准备送水。“着重社”事先安排社火队，9 点开始，按次序排队，抬上神水，依规定路线，先从着重社的老爷庙起步出发，先后经过五社的老爷庙，最后到西岳庙南门。此时，15 名会长站在最高台阶上，向送水的群众鞠躬行礼，



表示感谢。这时，社火队可以回去，但锣鼓队、背花队则必须到西岳庙的五间厅前，特别是“着重社”的锣鼓队必须在场进行表演，一直要到晚上八点才能离开。

三月八古会

原西岳庙未搬迁之前，一年共有三个会（农历的三月初八、八月初八及十一月西岳神的生日）后因天冷改为二会（即农历三月初八和八月初八），由原来每会二天，改为每会三天。每会必有两台大戏演出。每次古会均由会长负责组织，由各社指派专人负责大会安全，对各地商人来参会的，一律不收地摊费。（因西岳庙有一百亩产地的收入，五个社也各有十亩公产地的收入。如古会的各项开支不够时，再由着重社的大户人家出钱补足）。

古会期间，对演戏的规定是：三天共演十八场，七场本戏。初七日晚，先在五间厅的西岳神前演三场，再到戏台上开演本戏。初八、初九、十三日，每天早上，为五社的家庭妇女演三场孝敬父母的戏，中午演本戏，下午再演两场为老年人看的戏。因此，这几天剧团非常忙累。华州下庙的三、八两会，演戏多是从西安请来的大剧团，或者是几个剧团共同合作到下庙演出。每次开演戏前，都要先鸣放三铳枪为号，表示戏将要开演了，让人们前来看戏。

三、八古会，主要交易家具、布匹、各种药材、牲畜、粮食、金银、瓜果、蔬菜以及各种小吃（醪糟、炒粉、麻花、油糕、荞面饸饹、蜂蜜凉粽子、凉粉、豆腐脑、包子、蒸枣、蒸红苕等）。

重建于同治二年（1863）的西岳庙，庙堂巍巍，城垣整齐，树木森森，神像威武。但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拆除了东戏楼；并拆除东西厢房内的泥塑神像，改作乡政府驻地，旧称莱公乡。后又将五间厅、东西厢房、过间厅等建筑，改作下庙小学。

1952年，将庙内所有泥塑彩绘神像拆毁，改为下庙完小。

1958年，拆除了铁旗杆、石碑、石碑坊、石狮、铁钟，砍伐了柏树等。

“文革”期间，拆除了过间厅。五间厅是最后被拆除的，改建成了下庙中学教学楼。



华州区出土的明朝郭宗仪棺椁

闫广勤



郭宗仪棺椁上的篆书

2004年，在华州农业局家属楼建设工地出土了一副棺椁。棺椁上用篆字书写着：“明处士郭公，华州人，字胤父，别号九华山，生大明嘉靖四十四年乙丑正月二十八日。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十二月二日终，丙辰十二月二十五日辛酉，归墓郡城西南五里新阡，子孙世系德履及讳详志传中。”

“处士郭公”是明朝华州人郭宗仪。清康熙年间的《续

华州志》卷三《明孝子郭公传》记：“公讳宗仪，字胤父，号肖坪，一号九华山，方伯公仲子也。”“大明嘉靖四十四年”是公元1565年。“万历四十二年”是公元1614年。“方伯公”是明朝万历年间任河南左布政使的郭性之。郭性之有四个儿子，他们是：长子郭宗周、次子郭宗仪、三子郭宗振、四子郭宗昌。兄弟四人皆为一时之选，《续华州志》分别为其立传。他们都为士人，擅长诗文，皆有著作问世。郭宗仪一生没有做官，故称“处士”，但他“其于诸史百家无不综览，尤精《左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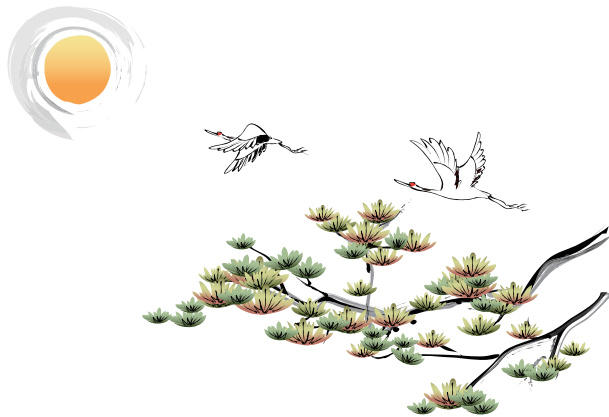
其棺椁的文字由谁书写？棺椁上没有注明。据推测，应是郭宗仪之弟郭宗昌。

郭宗昌是明末清初的著名金石学家，著有《金石史》一书，其书法亦名重一时。清初杰出的诗人、文学家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云：“华州郭宗昌……篆刻书法，为当时第一。”清初著名文人王弘撰在《砥斋集》中称赞郭宗昌的书法是“四体各臻其妙。”

留存至今的郭宗昌书法作品不多见，据当代人郑璐在《明郭宗昌及其金石史研究》一文中说：“郭宗昌真正保存下来的墨迹很少，仅见其在《西岳华山庙碑》华阴本后的题跋（楷书）和王弘撰所藏《汉曹全碑初拓未断本题签》（行书），隶书有保存在西岳庙内的《太华山记石幢》《辋川真迹》和《寇平祭告碑》。”此文没有提到郭宗昌的篆书真迹，应该他没有发现。

华州区出土明朝郭宗仪棺椁，上书的篆字，应是郭宗昌亲笔。清康熙《续华州志》卷四《明征辟郭公传》记：“四方求书者攬集，应接不暇。”民国《重修华县县志稿》卷十四记郭宗昌“篆楷俱工，四方求字者麇集其门。”有这样的书法大家弟弟，谁又能在郭宗仪棺椁上题字？

如果此说成立，这应该是郭宗昌篆书真迹的首次发现。



明朝东思忠墓志铭

马振刚

2014年7月，华县地方志办公室（今华州区地方志编纂中心）工作人员，在华州镇某村民家中，发现一块明朝的墓志铭，据该村民反映，此墓志铭出土于今崖坡村一带。墓主人为明朝华州人东思忠。此墓志铭长宽各76厘米，共有39行，1000余字，作于明成化二十二年，即公元1486年。撰文者为时任翰林院编修的王敕。

东思忠是明朝华州故县里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后长期在刑部任职，官至四川按察副使，最后积劳成疾卒于任上。

东思忠在明朝华州是有影响的乡贤达人，其东氏家族是当时受人尊敬的名门望族。



东思忠墓志铭

墓志铭对东氏家族的谱系源流，对东思忠的生平事迹都作了详尽的记述，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东思忠墓志铭的发现，对研究东氏家族，研究东思忠，对了解当时的华州人文状况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作者简介

马振刚，1977年出生，现于华州区地方志编纂中心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

明代华州井濂买地券考略

赵建文

2011年5月，华县杏林镇龙山行政村井氏东户宗亲在迁葬先祖井濂时，从其坟茔中挖掘出土砖质买地券一方。青砖为正方形，边长31公分，厚4.5公分。券文用朱砂书写，共13行，334个字，其中15个字辨认不清。形成时间为明万历九年（1581），距今435年。经过对券文文字的辨认与标点，现辑录如下：

□明万历九年正月辛巳，有十九日大吉立春，□□□二十五日大吉安葬。陕西西安府华州南□兴义里，见在小山底仪门基居住。奉□大葬已故□□□□丘承墓伯、王氏二位，今因湿丧，改葬于住宅正南偏东□□之原，堪为宅兆。梯已出备钱九九万九千九百贯文，买到墓地一方。南北长六步，东西阔六步。左至青龙，右至白虎，前至朱雀，后至玄武。内方勾陈，管分擘四域；丘承墓伯，封步界明；道路将军，齐整阡陌，致使千年百载，永无殃咎。若有干犯，并令将军亭长。今备牲牢、酒脯、百味、香新，共为信契。安厝已后，永保吉昌。幽堂知见神、岁主功曹之神、月主从魁之神、日主胜光神代保人值符。故气邪精，不得干吝。先有居者，永避万里。若违此约，地府主吏，自当其禡。助葬主里外存亡，悉皆安吉。急急如□使者女青律令。券立二本，一本奉付后土；一本给付墓中亡人井濂、王氏二位，□把准备付身，永远兆用。今分券皆上又书合同，享故气伏尸永不侵□。

买地券，是秦汉时期流传下来的一种随葬文书，一般朱书或镌刻在陶罐、陶瓶、石柱、石羊、铅人俑、柏人俑、铅券、铁券、石碑、青砖等器物上。与现实生活中土地买卖双方签订的合同不同，它是作用于阴间地府虚拟的土地买卖契约，类似发给死者的“墓地所有权证书”，以证明死者葬身地的合法性，



同时告诫冥界各方鬼神不得侵犯，并安抚死者亡魂，让其安分守己呆在棺槨中，不要到阳间作祟生者。井濂买地券就是一篇具有道教色彩和明代特色的买地券。券文中虽然有些文字缺失，对研读全文有一定影响，但基本内容是清楚的。券文的大意是：墓主井濂及妻王氏，生前居住在陕西西安府华州南部兴义里（今华州区杏林镇龙山行政村一带）小山底仪门附近，在死亡若干年后（死亡时间不详），因墓地长期受到积水浸蚀，致使墓地风水气脉不畅，其后人在死者居住地正南偏东方向，为其购买长宽各六步新墓地一块，并于明万历九年（1581）正月二十五日予以改葬。改葬时，书写了地券契约阴阳二券，阴券书写在青砖上付给死者，随葬于墓内；阳券付给土地买方，可能刊刻在石碑上，立于墓旁，后遭损毁。

由于明代道教盛行，该地券呈显浓厚的道教色彩，道教神仙谱系中诸多神煞都在券文中出现，套用道教文化用语的现象十分突出。如把墓地卖方确定为掌管阴阳生育、万物之美、山河之秀的“后土”女神；墓地的范围四至，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代表东西南北四方的方位神代称；购买墓地花费的钱财不说真实数字，而是用道教习惯用语九万九千九百贯文，多多益善，以示买方的虔诚。并郑重其事的请天将“勾陈”、山丘之神“丘承”、墓地之神“墓伯”、墓地道路之神“将军”、墓门门卫“亭长”等道教神煞各司其职，管好山丘、墓地边界、通往墓地的各条道路及墓门，永远不要让阴阳二界的盗人和孤魂野鬼侵犯死者和墓地。还请“幽堂知见神”“岁主功曹之神”“月主从魁之神”“日主胜光神”为契约的担保人，更显买地活动程序内容的完备。最后强调该地券如同五帝传令使者、掌管鬼律的“女青神”发布的天条律令一样，具有不可抗拒的神力和法威，各方神鬼不得违犯，否则就会遭遇凶煞。这些神化虚幻的内容，是明代买地券的老套路。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收藏的明代万历四年（1576）石麒麟买地阳券，其内容、格式、风格与井濂买地券相差无几，其中的道教神煞名称、道教咒语几乎完全一致，基本反映了明代中晚期买地券的特色。

根据有关民俗文化研究资料和出土文献实物，买地券、镇墓文之类的丧葬礼俗活动，起源于秦汉时期，东汉时在中原、北方一带流行，后逐渐向长江、



岭南扩散。它的产生是基于秦汉时人们畏惧鬼魂作祟的思想观念，认为父母、祖父母的亡魂返回阳间纠缠家人，会造成家人生病乃至死亡或家中横生灾祸。出土的秦简日书之“病”篇云：“甲乙有疾，父母为祟。”“丙丁有疾，王父为祟。”就是这种观念意识的真实反映。因此，阻止亡魂回家，就成为秦汉时丧葬活动的一项重要诉求，为死者立地券的习俗应运而生。



井濂买地券

在买地券存续的一千多年中，畏惧和排斥死者亡魂的观念始终存在，只不过在不同时代表述的方式有所变化，或直接，或隐晦；或决绝，或委婉。汉唐时期的买地券，除契约内容外，强调“死生有别”，告诫死者不得返回阳界与生者交往的内容比比皆是，如“乐勿想念，苦勿相思，千秋万岁，莫相来索”；“死者魂归棺槨，无妄飞扬而无忧，万岁之后乃

复会”；“生死异路，不得相妨”；“生人上就阳，死人下归阴，生人上高台，死人深自藏，生人南，死人北，生死各异路，千秋万岁，不得相注忤”；“生属西长安，死属东太（泰）山”……大意都是生死异路，阴阳两界不得交往，死者不要返回阳间作祟生者。这些语句，都是委婉的表达方式。到后来，一些决绝的激烈的言辞逐渐出现，为死者返回阳间与生者相会设定了种种难以实现的条件，如黄河水变清，太（泰）山变平地；烧焦的大豆发芽，铅券像草木一样开花，鸡蛋像公鸡一样打鸣；乌白头、马生角，石羊回头说话；天翻地倒，方始相会……实际上是让亡魂老老实实呆在地下，永远不得返回地面与生者交往。东汉以后，佛道文化广为传播，宗教活动不断融入丧葬活动中，“东王公、西王母，皇天后土”“观世音、维摩大士”“为佛采花”等大量宗教用语出现



在买地券中，使买地券充满宗教色彩，但“死生有别”、排斥亡魂的思想依然存在。

明代井濂买地券与汉唐时买地券相比，内容形式、表达手法等发生了很大变化，除道教色彩外，直接排斥亡魂的文字似乎看不到了，大量的内容是反映生者如何采取各种措施，包括动用神灵的力量，为死者在阴间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栖身环境。表面看是为了死者的安全，实际上还是为了生者的福祉，要阻止死者返回阳间作祟生者，只不过是在对待死者的态度上由惧怕变为敬畏、排斥变为抚慰罢了。万变不离其宗，既不让故气邪精侵犯死者，也不让死者作祟生者，二者兼而有之。这种观念上的些微变化，应该是与儒家孝道文化的深入人心有关联的。

买地券是一种古老的丧葬礼俗，迷信、虚幻成份充斥其间，令人感到荒诞滑稽。清人洪亮吉曾说：“古人下葬，必先作买地券，或镌于瓦石，或书作铁券，盖俗例如此。又必高估其值，多至千百万；又必以天地日月为证，殊为可笑。”买地券这种延存了一千多年的丧葬习俗，虽然早已消亡绝迹了，但其中某些文化基因仍然存在于当代的丧葬活动中。井濂买地券的出现，为今人研究华州民俗文化演变提供了一个实物佐证，无疑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但买地券不同于墓志铭，一般不涉及墓主的家世渊源、生平经历、社会背景等情况，井濂买地券更无井濂的死亡时间、初葬墓地、立券人等重要信息，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对该地券的深层解读，笔者才疏学浅，还期待方家的考证解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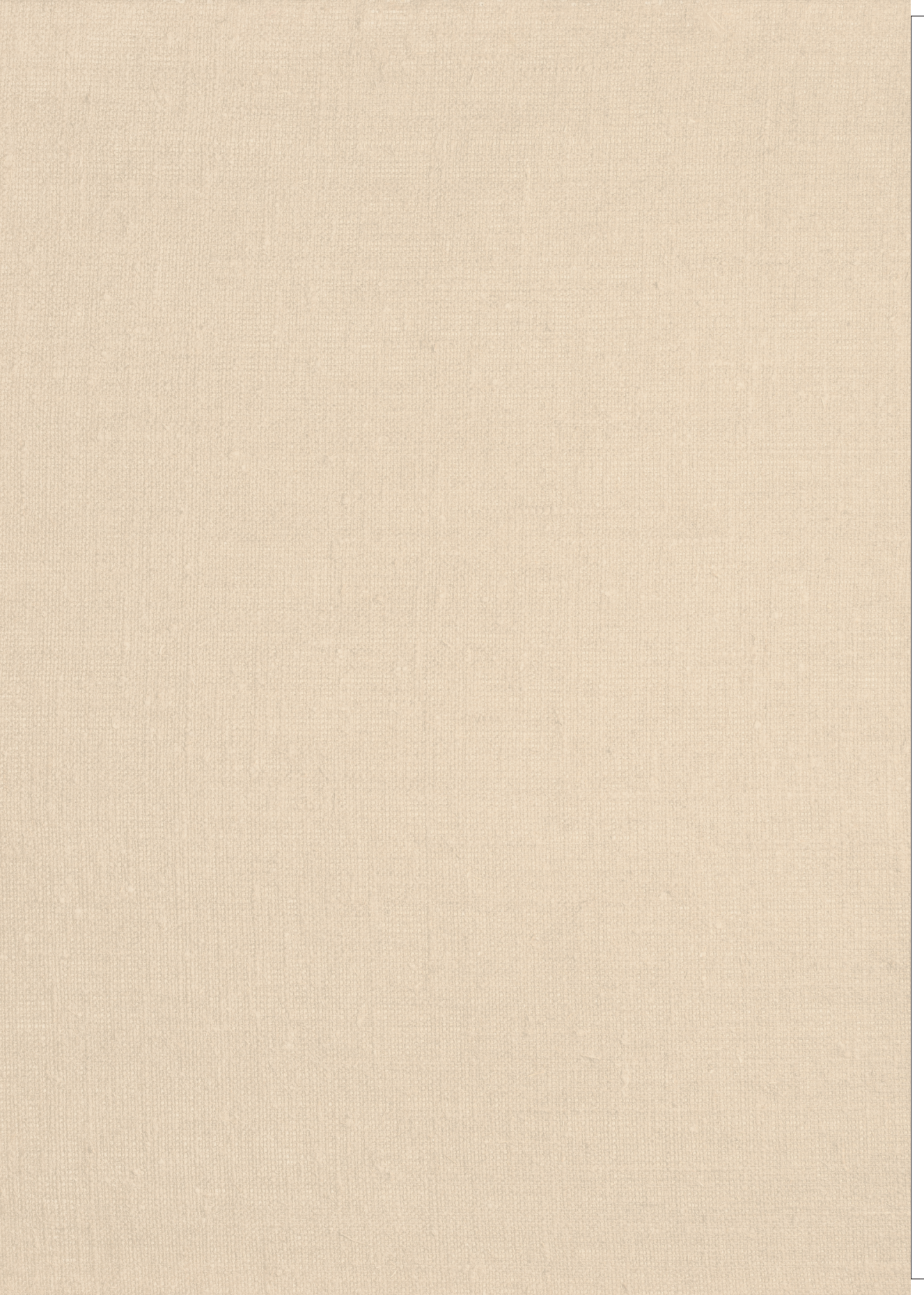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赵建文，1950年出生，曾任华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





史海钩沉



“华封三祝”辨误

闫广勤

“华封三祝”是一句成语，这句成语与远古圣人尧有关，其中的“华”字，自古至今都有人认为是华州（华县）之“华”，因此演绎出尧曾到过华州（华县）的种种说法。其实，识“华封三祝”之“华”为华州（华县）是不对的。



《庄子》

我们先看这句成语的出处。据《辞源》“华封三祝”条目，其出处是《庄子》。《庄子·天地篇》中的原文是：“尧观乎华，华封人祝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使圣人富！……使圣人多男子！’”大意是，尧在华视察，

华的封人祝他长寿、富有、多生儿子。以后人们以此为典故，生成“华封三祝”一语，作为祝颂之词。其中的“封”，是“封人”之意。封人，据《辞海》《辞源》的解释，是周朝时司徒的属官，掌分封诸侯之事，春秋时各国也设有此官，掌典守封疆。而“华”字，是一地名，其地指今何处？是不是指华州（华县）？则需要作一辨析。

庄子是战国时人，华州作为地名出现，在七八百年后的南北朝时期，这个“华”，肯定不是指华州。而从庄子起，上溯到更早，“华”，作为地名及其实体，还是存在的，不过不在后来的华州（华县）境内。据《中国历史地名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西周时有一华国，在今河南新郑市北。春秋时郑国



有一地叫“华”，战国时属魏国，仍在今河南新郑市北。另据古代文献《通志》《元和姓纂》及许多姓氏探源的书籍，春秋时的宋国国君宋戴公将其子考父，封于“华”地，考父的后代就以华为姓。这个“华”地，具体位置不详，但应在宋国境内。宋国的都城在今河南商丘，疆域大体在今河南、山东、江苏、安徽交界处。宋国是个小国，“华”地不会超出这个范围。

而今华州区地区，在南北朝的西魏在此设华州以前，没有资料表明这里有“华”地。据刘泽华等人编著的《中国古代史（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中的《商代形势图》，今华州地区是郑地。西周时，这里仍为郑地。周懿王元年（前899），在郑地出现破晓时分发生日全食的现象，被记入史册，即古书《竹书纪年》所记“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周宣王二十二年（前806），“友（周宣王之弟）初封于郑”（《史记·郑世家》），郑国创建，“友”即郑桓公。这证明，郑国建立以前，这里就是“郑”地，郑国因此而得名。假设今华州地区那时称“华”地，那郑国就可能叫华国，郑桓公叫华桓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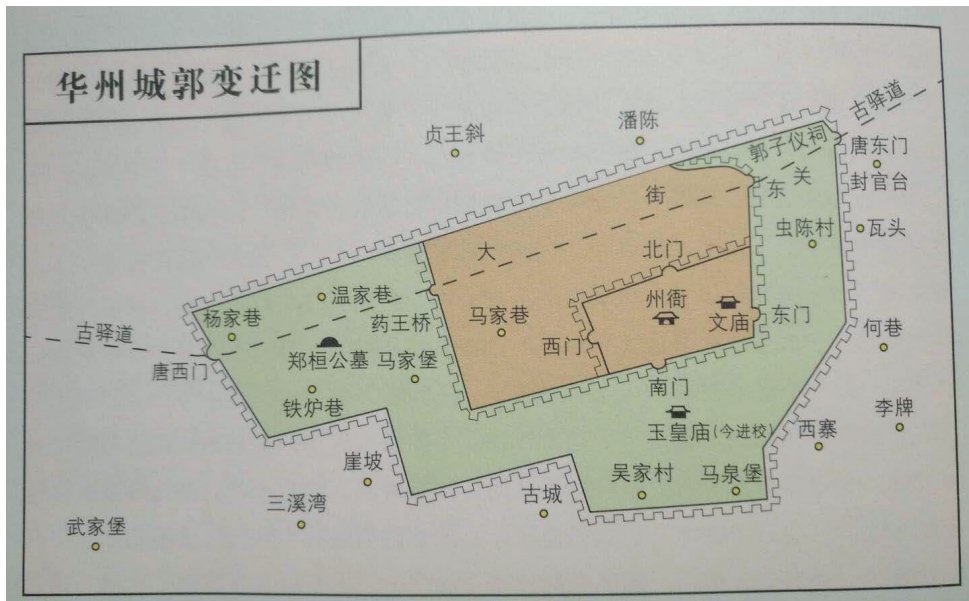
还应提一句，庄子是宋国人，上文提到的宋国华地，应在他的记忆中。



三筑华州城

秦 寂

早年听老人们谈及“三筑华州城”的掌故，说是古代华州城建了三次，一次比一次小，但详情都不甚了了。20世纪80年代，县城建局派人在县城对古城遗址进行了一次勘查，确认有三次不同大小的城郭遗址。在这次勘察结果的基础上，笔者又查阅了相关文献资料，加上走访调查，现场踏勘，对“三筑华州城”有了一个较为详细的了解。这就是：在今县城位置，于唐朝、明朝及清朝末年，曾有过三次重要的城郭建设（小规模整修不算），形成了华州城墙的三次变迁。



古代华州城郭变迁图

南北朝的西魏恭帝元年，即公元554年，设置了华州，从那以后，华州城的位置多有变迁，但翔实资料缺乏，这里暂且不论。

有文献可证的，在今城区位置建的华州城，最早是唐代宗永泰元年（765），由镇国军节度使周智光所建，元代曾拓修了西北隅（清《关中胜迹图志》卷九）。

经勘查，唐代华州城（包括元代拓修部分）的北城墙，东起今东关以北一二百米处，向西经华州街道办事处的潘陈村、张场村之南，温家巷以北等处，至华州街道办的杨巷村北二三百米处为止。今城关棉绒厂厂区北墙，有一段30多米长、3—5米高的土夯高台，就是这一段城墙保存至今的珍贵遗迹。

唐代华州城的西城墙，北起今华州街道办的杨巷村村西，向南经华州街道办的铁炉巷村西，变成东西向，经铁炉巷村南，又折向南，经华州街道办的崖坡村东，再折向东，在今华州街道办的吴家村南、马泉堡南，变成东西向的南城墙。

唐代华州城的东城墙，北起东关郭子仪祠东二三百米处，向南经莲花寺镇封官台村西、瓦头村西、虫陈村东，再折向西南，经西寨村西，在马泉堡村东与南城墙相接。

据县城建局20世纪80年代的勘查结果，唐代华州城的遗迹共长约8500米，也就是说，唐华州城的周长大约十七华里（清《续华州志》记唐城为“周七里”，应为“周十七里”之误）。这是“三筑华州城”中面积最大的一次。当时的华州是唐代京城长安的东方门户，近畿上辅之地，“百郡之首”（韩愈语），辖郑县（即今华县）、华阴（含潼关）、下邽（今渭南临渭区北）等县，因此唐代华州城的规模，是当时华州政治军事位置重要性的体现。

唐以后的五代、北宋、金各朝，华州城基本维持了唐代格局，元朝时虽在西北隅有拓修，但变化有限。明朝嘉靖三十四年（1555）华州发生了毁灭性大地震，包括城墙在内的所有建筑物均倒塌。嘉靖三十五年（1556），当时的华州知州朱茹重建了华州城墙（明《华州志》卷四）。这次建的州城比唐城缩小，其北城墙仍为唐华州城的北城墙，但西、南、东三个方向向里收缩。西城墙和北城墙的连接处，大体在北环路与新秦北路相交处附近，然后西城墙向南，经



三筑华州城

今西关街东口，沿新秦北路西侧延伸，约止于今酱园住宅小区一带。南城墙约西起酱园住宅小区一带，东经物资局住宅小区南、南街南口，再向东延伸到今莲花寺镇西寨村西二三百米处。东城墙大体南起西寨村西，经今少华中学校园内，再向北，至老西潼公路（柳枝至赤水公路）三门巷北口与东关之间，然后沿西北方向与北城墙相接。

明朝大地震后重建的华州城，周长九里（民国《重修华县县志稿》卷三），东南西北各有一城门，门上皆有城楼。其西门约在今西关街东口，门曰“望安”，楼称“挹渭”。东门约在今三门巷北口与东关之间，门曰“镇潼”，楼称“镇华”。南门约在今城内村南街南口（教师进修学校大门北百米），门曰“见山”，楼称“瞻华”。北门位置不详，门曰“带渭”，楼称“通渭”（清《续华州志》卷一）。

这个时期的华州，虽已不是近畿之地，地位较唐代大为下降，但仍为关中东部重镇，辖华阴（含潼关）、蒲城等县（郑县已省县入州）。州城规模虽然比唐代缩小，但仍相当可观。

时至清朝，相当长的时间里，华州城的规模仍与明代相当。乾隆元年（1736）始，华州不再管县，降为相当于一个县的散州（虽仍称为州，实为一县）。政治地位进一步的下降。再加上清朝末年的战乱仍频，天灾不断，经济凋敝，人口锐减，华州城已是“幅员寥阔，年久坍塌，居民鲜少，难资守卫”（清《三续华州志》卷二）。同治七年（1868），华州知州王赞襄遂再次收缩州城，重修了一个小城。这个华州城的东城墙、南城墙依原来的旧城墙，另新筑西城墙、北城墙。西城墙北起今咸林中学教职工住宅区西北角，向南经咸林中学西校门，延伸到法院住宅小区，再向南与旧南城墙相接。北城墙西起今咸林中学教职工住宅区西北角，沿咸林中学北院墙向东，经少华中学北二百米处，与旧东城墙相接。第三次建筑的华州城周长“四里一分”（清《三续华州志》卷二），民国时，有人精确测量为2394.55米（民国《重修华县县志稿》卷三）。这个规模，不但难与唐华州城相比，就是与明华州城相比，也难以望其项背。王赞襄修筑的华州城西门，建在今丝巷路北口与法院住宅小区之间，门曰“镇乾”。北门建在今三门巷路与咸林中学北院墙相交处，门曰“拱极”。当时未建东门。



到了光绪元年（1875），知州俞志敬添修了东门，位置约在今华州镇城内村民委员会办公室东一二百米处（莲花寺镇西寨村西北），门曰“延春”（清《三续华州志》卷二）。

这就是“三筑华州城”的来龙去脉。农耕时代，战争以冷兵器为主，都邑多筑城墙，以防入侵。清末乃至民国时期，虽热兵器渐盛，但火力相对较弱，城墙还有一定的防御功能。时至现代，城墙的军事防御作用已无。华州知州王赞襄修筑的华州城一直保存到20世纪50年代初，在社会发展的浪潮中，也逐渐消失了，只在咸林中学校园北墙，还残留约几十米的残垣断壁。



位于今城区大街北侧的唐华州城墙遗迹

“华州”趣谈

闫广勤

2015年年10月13日，国务院批准华县撤县设区，新设立的渭南市华州区，以原华县的行政区域为华州区的行政区域。“华州”这一地名历史很悠久，但其地理和文化内涵却有很大变化，也有几件趣闻。

一、历史上有七个“华州”

今“华州区”的华州，是历史地名，不只是今“华州区”叫华州，历史上还有另外六个“华州”。

(1) 北魏皇兴二年(468)置华州，治所在定安县(今甘肃宁县)。辖境相当今甘肃宁县地。此华州时间很短，四年后就改置为三县镇。

(2) 北魏太和十一年(487)置华州，治所在李润堡(今陕西蒲城县东北)。永平三年(510)移治华阴县(今陕西大荔县)。西魏废帝三年(554)改名同州。此华州延续了67年。

(3) 南朝梁大同元年(535)置华州，治所在上川郡(今河南桐柏县东固县镇)。西魏废帝元年(552)改为淮州，旋又改为纯州。此华州延续了17年。

(4) 南朝梁置华州，治所在华阳郡华阳县(今四川广元市北)。辖境相当今四川广元市北境。西魏废。此华州延续了约数十年。

(5) 西魏废帝三年(554)置华州，治所在郑县(今华州区)。此华州延续了1359年，直至公元1913年改为华县。2015年10月又改华县为渭南市华州区。

(6) 唐朝时的渤海国置华州。渤海国(公元698年~926年)，是我国唐朝时期以粟末靺鞨族为主体建立，统治东北地区的民族政权。此华州治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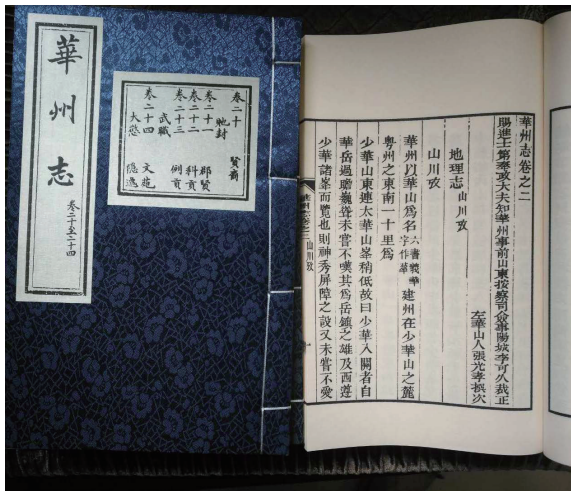


在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北乌苏里斯克（双城子）。辖境约当今俄罗斯绥芬河下游一带。此华州延续了大约数百年，辽朝时废。

（7）明代交趾承宣布政使司下辖的华州。交趾承宣布政使司是明朝设置的一个地方一级行政机构，辖境为今为越南北部。此华州治所在万安县（今越南广南——岷港省三岐县），存续时间大约为明永乐末年至宣德初年，约十几年。

从上可以看出，今“华州区”的华州，历史上虽然有7个地方先后使用此名称，但只有今华州区使用的时间最长，且最有名。

二、“华州”因何得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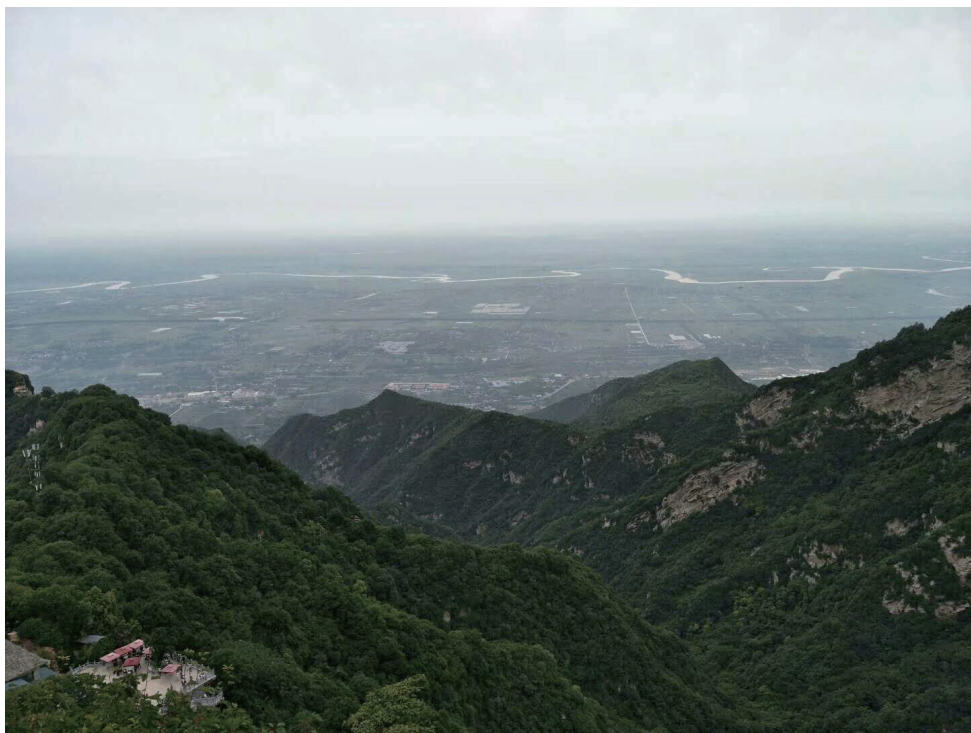
明《华州志》记“华州以华山为名”

华州区的“华州”之名，来历是什么？答案是来源于华山。有人置疑，华山在华阴市（县）境内，为何会命名华州区？寻根溯源，华州的命名，因为当时的州境内有华山。南北朝时的西魏于公元554年在郑县设华州，辖今华州区、华阴等关中西部数县，华阴县及境内的华山在华州辖境，并因华山为天下名山而作为华州之名。

隋唐宋金各朝，华州所辖县变化较多，但华州州治始终在郑县（今华州区），华阴也一直属于华州管辖，自然华山也在其辖境内。南宋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三中记：“华州以华山得名。”明代所修的《华州志》卷二云：“华州以华山为名。”清朝时，华州不再管县，只治理原郑县地区，降为县一级的散州，华山已在其辖境之外，但州名因循未改。到了民国二年（1913），由于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政策，所有“府、州、厅”均改为“县”，华州也被改成了华县。

三、“华州”一词内涵随其管辖范围而变化

今华州区的管辖范围在清朝时固定下来，但在此之前，华州管辖数县，最大辖境涵盖今渭南市华州区、临渭区，蒲城县、华阴市、潼关县，商洛市的洛南县。最小时，也领今渭南市华州区、华阴市、潼关县、蒲城县。当时的“华州”一词，其内涵始终是关中东部的统县重镇。清朝雍正十三年（1734）后，华州降为不统县的散州，只辖今华州区地域。这时的“华州”，内涵仅为一县之地。公元1913年以后，民国政府将华州改成了华县，“华州”一词作为行政区之名，从官方文件中消失。至1959年1月，“华州”又以渭南县华州人民公社的名义出现，但其内涵仅为今华州区的塬下平原地区。1961年9月，又设立了华县华州人民公社，其管辖范围仅为一乡之地。以后华州人民公社于1984年改为华州乡。2001年设立华州镇。2014年撤华州镇设为华州街道办事处。“华州”



华州山川



的内涵，从明朝及其以前的关中东部的统县重镇，演变为清朝的一县之地，民国时，“华州”作为行政区划消失。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又以乡镇之名出现。直至2015年10月，华县撤县设区，华州区的管辖范围大体与清朝雍正十三年（1734）以后的华州相当。

四、“华州”的“华”怎么读

“华州”的“华”，按普通话读：huà，音同“化”。但很多人读 huá，音同“中华”的“华”，这是不对的。“华”是多音字，有 huá、huā、huà 三种读音。《辞海》记，华山、华州、华县、华阴、华佗等词中的“华”，都读 huà。而中华、华夏、华侨等词中的“华”，都读 huá。发 huā 音的“华”，古同“花”，是花朵之意。我们不能见“华”，都读 huá，尤其是渭南市所属的华州区、华阴市、华山、少华山等，更不能读错。

五、华州火车站

民国二年（1913）1月8日，袁世凯政府命令全国范围内废府、州、厅，一律改为县，华州也被改成了华县。不过，“华州”的名称仍然在使用。1936年陇海铁路延长至华县时，所修筑的火车站仍然叫“华州车站”，当时陕西省政府秘书处曾致函铁道部，请将“华州车站”改称“华县车站”，但铁道部下达指令至陇海铁路潼西段工程局，令仍称“华州车站”。并要求在站名牌“华州”两字之下，加注华县字样。

直至1949年以后，华州车站才切合实际地改为“华县车站”。



漫谈《打金枝》

秦 寂

在教育不普及的古代乃至民国时期，乡间百姓的历史知识大多来自传统戏曲。华州的历史名人郭子仪及其儿子郭暧，那个时候的许多人就是通过戏曲《打金枝》知道的。《打金枝》的故事，说的是唐代大将郭子仪的儿子郭暧是驸马，他的妻子是皇帝的女儿升平公主，一次，郭子仪寿辰之日，百官、子婿往贺，朝笏满床。升平公主自恃金枝玉叶，不肯拜寿，郭暧心怀不满，怒打公主。公主进宫向父皇哭诉，皇帝反斥公主无礼，适郭子仪绑子上殿请罪，皇帝将郭暧带进后宫，温言相劝，使其夫妻言归于好。《打金枝》是戏曲传统剧目，也叫《满床笏》，为清初范希哲撰写的传奇剧本。秦腔、晋剧、汉剧、徽剧、京剧、越剧、粤剧、评剧、湘剧（名《福寿山》）、川剧（名《汾阳富贵》）等许多剧种均有此剧目。晋剧《打金枝》还于1955年被拍成电影，这个故事就流传更广了。戏剧、电影的《打金枝》是文艺作品，自然有虚构，有演义。但还是有所本的，《资治通鉴》等史籍有记载，只是不像文艺作品那样情节生动、曲折、丰富罢了。

据《资治通鉴》，郭暧与升平公主结婚在唐代宗永泰元年（765），那时郭暧才十三岁，“打金枝”时也不过才十五岁。升平公主是唐代宗之女，其年龄与郭暧相当。“打金枝”发生时，一个是十五岁的娃娃，又是将门虎子，心高气傲，口出“我父薄天子不为”的狂言，意思是：我父亲的地位接近皇帝，只是不作罢了。升平公主也是十来岁的少女，又是皇帝之女，金枝玉叶，比郭暧更心高气盛，咽不下这口气，抓住郭暧“大逆不道”的狂言，就向皇帝父亲告御状。皇帝最怕大臣谋反篡逆，这一对少男少女年幼无知、不计后果的行为，如果碰上不明智的皇帝，那结局对郭子仪父子是极为严重的。所幸唐代宗还算



明白，息事宁人，劝慰公主，郭子仪也力求主动，责罚郭暧，向皇帝请罪，唐代宗说：“不痴不聋不做阿家翁，儿女闺房之言，何必当真。”。双方的豁达大度，化解了一场危机。毛泽东在看了《打金枝》这出戏后曾说过，郭子仪的儿子同皇帝的女儿结亲以后，闹矛盾，郭子仪和皇帝各自批评了自己的孩子，解决得很好。这就是说解决内部矛盾要各自多做批评。



打金枝剧照

《打金枝》这出戏是以喜剧结束，双方皆大欢喜，小两口和好如初，两亲家也君臣无猜。但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并不如此完美。当时藩镇割据一方，军阀拥兵自重，朝廷威权大减。唐代宗对屡建战功、军权在握的郭子仪，一方面借其力量威震藩镇，另一方面，又心怀戒心，恐其功高震主。他上台后

头一年，即宝应元年（762）的八月，就借故解除了郭子仪的军权。第二年，因吐蕃入侵，逼近长安，形势危急，唐代宗才又授郭子仪为副元帅。后长安陷于吐蕃，郭子仪又予以收复，再立大功。但唐代宗对郭子仪的猜疑之心并没有解除，只是因为吐蕃频频入侵，大敌当前，只有威望极高的郭子仪才能挽救李唐王朝，唐代宗不能不重用他。而郭子仪赤诚报国，忠于朝廷，并无野心，面对唐代宗的猜忌，只能小心翼翼，谨小慎微，处处防范，克己奉公。他屡次请求解除兵权，多次辞去高官厚赐。率兵在外，只要朝廷令他回长安，立即离军上路，以示自己不拥兵自重的忠心。君臣之间，这种一方不能不使用将领，又对其极不放心；一方要指挥大军挽救朝廷危难，又要避免军权太重而引起皇帝猜忌的微妙处境，使为君为臣都很难。所以，“打金枝”一事发生，郭暧说出“我父薄天子不为”的狂言，就是对二者的极大考验了。从唐代宗这一方来说，要利用这句话大做文章，以大逆不道解除郭子仪的军权乃至治罪，从封建法统出发，是顺理成章的。

漫谈《打金枝》

但当时除了郭子仪，又没有德高望重、威权有加、忠心可鉴的高级将领来代替他。面对内地藩镇割据，外部吐蕃威胁的唐代宗，是离不开郭子仪的，而且他也从郭子仪的行为中知道郭可能有篡权的能力，但决无篡权的野心，所以才采取明智豁达的态度对待此事。从郭子仪这一方面说，他千方百计避免皇帝猜忌的努力，会因郭暖的一句狂言而毁于一旦，因而他对此大为震惊，忧惧愤怒是情理之中的事。他“拘暖，自诣朝堂待罪”，在代宗原谅后又“杖暖数十”，也是向皇帝表示自己忠贞不二的态度。这出喜剧之中，君臣双方心中的这些曲折波澜，却又使人生出丝丝悲哀。郭子仪富贵荣康，福禄永终的背后，有着多少难为人道之苦衷。



郭太后的荣耀与悲剧

闫广勤

郭子仪的孙女、郭暧与升平公主的女儿郭氏（名不详），曾为五朝皇太后，是他们家族中除郭子仪外，最为显赫的一位。《旧唐书》说她：“历位七朝（指历唐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七个皇帝），五居太母之尊（指从穆宗至宣宗五朝皆为太后），人君行子孙之礼，福寿隆贵四十余年，虽汉之马（东汉明帝马皇后，后为太后）邓（东汉和帝邓皇后，后为太后），无以加焉。识者以为汾阳（指郭子仪）社稷之功未泯，复钟庆于懿安（指郭太后）焉。”似乎她终生荣耀，尊贵已极，事实并不完全如此，而且掩盖了她最后悲剧性的结局。

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十二月，郭氏嫁给了德宗长孙、太子李诵的长子广陵王李纯。贞元十一年（795），她生子李恒。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去世，太子李诵即位，为唐顺宗。三月，顺宗立广陵王李纯为太子，郭氏为太子正妃。八月，顺宗因病退位称太上皇，郭氏的丈夫太子李纯即位，为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八月，郭氏被册为宪宗贵妃。元和七年（812）七月，郭贵妃之子李恒被册为太子。母以子贵，群臣累次上表，请立郭贵妃为皇后。当时郭子仪已去世三十多年了，但他的威名仍存，郭家门宗强盛，多为权臣，郭贵妃的几个兄长也都官位显赫。宪宗恐立郭妃为皇后之后，外戚郭家之势更加膨胀，所以托辞不立皇后，这对郭贵妃是不小的打击。

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宪宗暴崩，郭贵妃的儿子、太子李恒即位，为唐穆宗。穆宗封她为皇太后。长庆四年（824）正月，穆宗去世，其长子李湛即位，为敬宗。敬宗尊她为太皇太后。以后，穆宗次子即位为唐文宗，穆宗五子即位为唐武宗，皆尊他们的这位祖母为太皇太后，郭太后也一直享受着古代妇女所



能达到的最高尊荣和富贵。



在蒲城的唐宪宗景陵，郭太后陪葬于此

郭太后位居太母之尊，在政治上也表现的非常贤明，深明大义。她的儿子穆宗病危时，把持朝政的宦官因太子年少，请郭太后像武则天那样临朝称制，执掌朝政。郭太后说：“昔武后称制，几危社稷。我家世守忠义，非武后之比也。太子

虽少，但得贤宰相辅之，卿辈勿预朝政，何患国家不安？自古岂有女子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治乎！”并将宦官预先准备好的临朝称制的诏书撕碎。郭太后的哥哥郭钊，时任太常卿，听说宦官企图让郭太后临朝称制，立即上书郭太后说，如果那样的话，他就率子侄们辞官，返回故乡华州为民。郭太后见到郭钊之书，流着泪说：“祖父（指郭子仪）的余庆，又聚于我兄。”唐文宗时，郭子仪的侄子、郭太后的叔父郭旼的两个女儿入参郭太后，郭太后留她们在自己居住的兴庆宫。此时，郭旼被任为邠宁节度使，许多人认为是郭旼送二女给文宗作后宫而换得此官。翰林学士柳公权将这一议论告之文宗，文宗转达给郭太后，郭太后立即送二女回家，外议自息。武宗即位后，颇好游猎，朝官上谏劝阻，武宗不理。郭太后劝武宗虚心纳谏，武宗游猎才减少。

但这样一个表现还不错的太皇太后，在晚年却遇到料想不到的厄运。会昌六年（846）二月，武宗去世。在把持朝政的宦官操纵下，即位的却是武宗的叔父、宪宗十三子李忱，即宣宗。宣宗虽是郭太后丈夫宪宗的儿子，却不是她亲生，其生母是郭太后的侍女郑氏。宣宗上台后，尊郑氏为太后，待郭太后之礼殊薄。但对郭太后更不利的，却是宣宗怀疑宪宗之死，是郭太后母子与宦官共同谋害的。

事情还要回溯到二十多年前。郭太后的丈夫宪宗，因服用所谓长生不老药金丹而上火爆怒，身边宦官往往无故获罪，甚至被杀。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宪宗暴崩，死因不明，但社会传言是被宦官杀害。二十多年后，宣宗即位，对



其父暴亡一事，仍然耿耿于怀，并怀疑郭太后、穆宗母子伙同宦官一起加害宪宗。他一上台，不分青红皂白，就惩罚那些他认为是杀害宪宗的人。首先诛戮被怀疑的宦官，又杀穆宗为太子时的东宫属官，对郭太后也加以迫害。但郭太后虽不是亲生母亲，却是父亲的正妃，不好直接下毒手，就不给她应有的礼仪，在精神上进行折磨，并迫害郭太后的娘家人，即郭子仪的后代们，郭太后因而十分痛苦。大中二年（848）五月二十一日，郭太后登上她居住的兴庆宫勤政楼，欲跳楼自杀，被左右侍女拉住。宣宗闻讯后大为震怒，当晚，郭太后就死于兴庆宫。郭太后是怎么死的？是病死？是自杀？还是被谋杀？现已搞不清楚了，但说是宣宗逼死的，不会有错。当时人对郭太后的死因就有种种议论，并认为郭太后之死，正符合宣宗的心意。

郭太后死后，宣宗对他的迫害还不停止。按当时的皇家礼仪，皇后（或相当于皇后的正妃）死后，应与皇帝合葬，而其他妃嫔却无此殊荣。但宣宗却以郭太后参与谋害宪宗为理由，不准郭太后与宪宗合葬。礼院检讨官王皞上奏反对，他认为，郭太后是汾阳王郭子仪的孙女、宪宗的正妃，岂能以暧昧无据之事为理由而破坏国家礼制。宣宗闻奏大怒，将王皞贬官处罪，坚持不准合葬，将郭太后葬于宪宗景陵（在今陕西蒲城县）之侧的外园。

宣宗对所谓的杀害宪宗的“乱臣贼子”之惩罚，还扩大到他们的亲属，将这些亲属指为“余党”，被杀、被流放的不计其数。从唐肃宗时就开始声势显赫的郭子仪家族，经过近百年的强盛后，到此时，就可能因宣宗的迫害而衰落了。郭太后娘家郭氏亲属有没有被杀的不清楚，但被流放到远离长安，远离家乡华州郑县的外地，却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散布于海内外郭子仪后裔的祖先们，可能就是从这时开始迁徙的。

宣宗对所谓的杀害宪宗之党的迫害，引起人情不安，舆论不利。所以到大中八年（854）就停止了。宣宗下诏说，乱臣贼子的余党，现在已惩治完毕，其余疏远族人，一切不在追究。到宣宗的儿子即位为懿宗后，王皞又官复原职，再次提出郭太后应与宪宗合葬。在当时舆论的压力下，懿宗不再坚持其父的决定，按王皞之议办理了郭太后的迁葬事宜。



郭太后的悲剧性结局，有许多令人玩味之处。宪宗可能是宦官杀死的，但郭太后却不大可能参与其事。第一，我们从前文提到的长庆四年（824）宦官劝她临朝称制，而她大义凛然，义正词严的拒绝之言中，可以看出她并不是权欲熏心、权势欲强烈的人。如果她要害死宪宗，其目的只能是为权力，但这个人并不争权，那她又为何要害死自己的丈夫呢？第二，如果她不为自己争权，而为儿子争权，那也可能要害宪宗。但事实是：宪宗去世前，有些宦官要宪宗改立泮王李恠为太子，威胁到郭太后的儿子太子李恒的继承权，而宪宗不准改立太子。在这种情况下，对郭太后母子来说，在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宪宗站在自己一边，为何要害死靠山而独立与对手竞争？第三，郭太后如要争夺权力，必然依靠自己显赫的郭氏家族，那么，郭氏家族对宪宗病重时发生的这场继承权之争采取什么态度，就会决定郭太后的动向。太子李恒在宪宗病重时，恐泮王李恠夺了自己的继承权，向其舅父、郭太后的哥哥郭钊问计。郭钊劝他对宪宗尽孝等待，不要考虑其他。这说明郭太后母子及郭氏家族并没有谋害宪宗之意。第四，如果郭太后能与宦官一起谋害自己的丈夫，就说明她是一个很有心计，颇有手段，心狠手辣的人。但她在自己的孙子武宗去世，宦官们欲立不是自己亲生儿子的李忱继位，直接威胁到她的切身利益时，却听之任之而毫无动作，这说明她在性格上、手段上都不是那样的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郭太后没有，或很不可能参与谋害宪宗的行动。

而宣宗迫害郭太后，却是容易理解的。宣宗以叔父继侄子为帝，这对他是非别别扭扭的，这从以下两件事实可以证明。一是大中十年（856），吏部尚书李怀让看透宣宗的心思，迎奉宣宗之意，上奏说，穆宗是陛下之兄，敬宗、文宗、武宗是陛下之侄，陛下参拜太庙先帝神主时，拜兄尚可，拜侄子怎么能行呢？应当将上述四帝的神主迁出太庙。宣宗见奏，大喜过望，令百官商议，冀百官同意李怀让之奏。虽因百官意见分歧，最终议而不决，但由此可见宣宗心理。二是在大中十二年（858），宣宗禁止公卿大臣参拜穆宗的光陵，并不准为穆宗行香。这些事实就足以证明宣宗力图以宪宗的直接继承人自居。他诬蔑郭太后与穆宗母子谋害宪宗，那穆宗就成了叛逆，自然穆宗的儿子敬宗、文宗、武宗



也是叛逆，自己就可名正言顺地成为继宪宗之大统的正统皇帝，就抬高了自己的身份。另外，宣宗的母亲郑氏，原是镇海节度使李琦的妾。宪宗时，李琦谋反，于元和二年（807）兵败被杀，宪宗将郑氏纳入宫中，做郭太后的侍女。此后郑氏虽御幸于宪宗，但在宪宗的正妃郭太后面前，永远抬不起头来。不知何时，郑氏与郭太后结下了宿怨。曾为郭太后侍女和宪宗小老婆的经历是郑氏母子的最大心病，与郭太后的宿怨是郑氏母子仇恨的种子。在宣宗当上皇帝后，置郭太后于死地，并不准郭太后与宪宗合葬，就是为了出口恶气并抬高自己的身份。后来郑氏去世，宣宗将她与宪宗合葬，似乎证明郑氏是宪宗正妻了。但到宣宗儿子为帝时，在朝野的舆论压力下，又不得不遵从礼法制度，将郑氏移葬于陵侧，而将郭太后与宪宗合葬。但这对郭太后本人已毫无意义了。

现在提起一千多年前的这段公案，并非要评价这场权力地位之争的是非，而是要指出封建社会中的宫闱争斗、宗法制度是多么黑暗、多么惨无人道。郭太后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牺牲品，郭太后的悲剧，不过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悲剧中的一个。在那种社会里，在那种制度下，无数的平民妇女被宗法制度所摧残。而身为皇宫贵妇、位居人母的许多皇后、太后们又要增加宫闱争斗的一层枷锁。那些毫无政治斗争经验，心慈手软的郭太后们，只能呻吟、匍匐于争权夺利的刀光剑影之下。在她们荣华富贵、尊崇已极的背后，也有封建社会史官们所不屑一顾的血与泪。这正是郭太后的悲剧给予人们的启示。“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白居易诗），这就是无数郭太后们的悲愤心声。



少华山、“九纹龙史进”及其原型

秦 寂

少华山是历史名山，也是华州区的旅游胜地，但很多人知道少华山，是通过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中的九纹龙史进。在《水浒传》中，九纹龙史进是梁山好汉中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据小说中的描写，他是华州人，居住在少华山下，被官府逼迫，到少华山上落草，后带着弟兄们投奔了以宋江为首的水泊梁山。因华州贺太守霸占民女玉娇枝，史进气愤不过，刺杀贺太守不成，反被捉拿。宋江带七千多弟兄，千里迢迢，从山东赶到陕西，大闹华州，救出史进。在华州民间，也有这样一个传说：说史进是少华山下史家村人，全村人都姓史，史进造反以后，村民遭到官府迫害，被迫改姓，取“史”的谐音“司”为姓，“史家村”也就变“司家村”。这个“司家村”今天还在，就位于华州区莲花寺镇长寿坡村，恰在少华山山下。当然，文学和传说不能当成信史。但史进这个形象，却有一个生活中的原型，据史家考证，这个人就是历史上实有其人的史斌。而宋江起义，历史上也确有其事。

史斌不知是何方人氏，早年经历也无记载，只知他是宋江起义中的一员勇将。历史上的宋江，领导了梁山泊农民起义军，北宋徽宗时，以山东东平的梁山泊为基地，活动于今山东、河北、江苏、安徽一带。当时的亳州（在今安徽）知州侯蒙曾上书朝廷，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这所谓“三十六人”，应是梁山泊起义军的主要干将。《水浒传》上的一百单八将，是将这三十六人扩大三倍而成。而史斌就是这三十六人之一。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梁山泊农民起义军失败，宋江接受招安，投降了朝廷。宋江等三十六人的下场，不外乎三种：一是为朝廷作爪牙，二是回乡为民，三是重上江湖。而史斌就在数年后，在陕西重新走上反抗朝廷的道路。



史斌在梁山泊起义失败后，辗转来到陕西。靖康二年（1127）春夏之交，金朝大军灭亡了北宋，分兵攻掠各地。虽然康王赵构建立了南宋王朝，但当时已天下大乱，史斌乘机在陕南起兵反宋，拉起一支队伍。当年七月，史斌一举攻下了兴州（今陕西略阳），并在兴州建号称帝，公开与宋朝决裂。史斌接着攻下凤州（今陕西凤县）、武休（今陕西留坝）。十二月，又进攻宋朝陕南重镇兴元府（今陕西汉中），被官军击退。史斌再南下利州（今四川广元），企图进军四川，但宋军依剑门天险，严密防守，史斌便回师北上，进入关中。

这时，金朝大军已攻占关中东部的同州，并于建炎二年（1128）初，相继占领了长安、华州等众多州县。关中各地人民组织义军反抗金军入侵，并收复了一些失地，如刘希亮收复了凤翔（陕西今县），张宗谔收复了长安。进入关中的史斌也加入了抗金斗争，伺机收复了华州。附宋抗金的义军领袖张宗谔并不赞成史斌的反宋抗金，决心为朝廷“除患”，他诱使占据华州的史斌到长安并解散其部队，想慢慢解决掉史斌。这时，在关中的宋军将领曲端命其部将吴玠突袭史斌，史斌逃到鸣犂镇（在今西安市长安区东南），为吴玠所擒并杀害，时间约为当年的十一月。在对外族入侵的紧急关头，宋王朝并不放过造反的史斌，虽然他也

抗金。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曲端也不放过附宋反金的义军张宗谔，竟然亲自攻击张部，并杀了他。这是那个时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一个侧影。

史斌虽然反宋称帝，但没有放弃自己的民族责任，积极投身到抗金斗争中，并从金人手中收复了华州，这一段历史是不能遗忘的。史斌是不是华州人，我们并不知道，但从元杂剧到施耐庵的水浒故事里，以史斌为原型塑造出一个文学形象——九纹龙史进，并认定他为华州人，还让他在少华山占山为王，这决不是偶然的。华州区关于史进的民间传说，也应该有历史的影子。史斌—史进—华州—少华山，这里有多少值得我们探索、发现、回味的故事。



九纹龙史进

少华山崩与王安石变法

赵建文



王安石

发生在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8）的少华山崩和王安石变法，一个是自然灾祸，一个是社会变革，二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却机缘巧合相遇一起，在庙堂之上演变成一段鲜为百姓所知的政治论争，为后世的华州人留下许多回味与感慨。

据《宋史·五行志》记载：“熙宁五年（1072）九月丙寅，华州少华山前阜头峰越八盘岭及谷，摧陷于石子坡。东西五里，南北十里，溃散坟裂，涌起堆阜，各高数丈，长若堤岸。至陷居民六社，凡数百户，林木、庐舍亦无存者。并山之民言：‘数年以来，峰上常有云，每遇风雨，即隐隐有声。是夜初昏，略无风雨，山上忽起雾，有声渐大，地遂震动，不及食顷而山摧。’”又据明代张光孝《华州志》记载，“山裂，其下出水，其深无际，名曰移山潭（亦有人称其为‘白崖湖’）。其崩山遗址，名半截山，又曰复成山。”至近现代，有地质人员经野外调查认定，少华山崩就是一起由地震引发的山体大滑坡，山崩形成的泥石流依山势向北涌流，滑体方量约0.1亿立方米，滑距约8—10公里。在滑体的后缘凹陷处形成堰塞湖，前沿形成乱石堆积体，最北可达今柳枝镇乱石堡子（今联社村）一带。今天，白崖湖早已干涸不复存在，但半截山仍存，湖周围的乱石堆积体依然清晰可辨，是一处难得的地震遗址。

此次山崩造成的损害，波及今莲花寺、柳枝一带六社数百户，山体大滑坡



使该区域内的林木、房舍荡然无存，灾民伤亡人数史料虽无明确记载，但从林木房舍的损毁程度推断，应不在少数。当年十月，华州知州吕大防关于少华山崩的奏章呈报至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北宋朝廷，宋神宗赵顼即诏赐钱财赈救灾民。

地震、山崩、洪水、甘露等自然现象，对今天大多数人来说，仅是一个常识问题，但在古代社会却被高度神化了。受天人感应思想影响，人们认为天象和人事是相通的，天象是神的意志的体现，是对社会人事的一种态度，因此就有“天降祥瑞”“天象示警”之说。这种天人互动的政治神话，历朝历代屡屡上演，层出不穷。一种自然天象，加上人为操弄，往往都会引发一场政治风波、社会动荡，甚或改朝换代。发生于熙宁五年的少华山崩，由于时机和节点的契合，即与当时朝廷正在推行的王安石变法发生了关联，使朝廷变法争斗更加激烈复杂。



宋神宗赵顼是一个励精求治的皇帝，为富国强兵，他起用主张革新的王安石，改革旧法，推行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江西临川人，在熙宁年间，历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同平章事（宰相），是变法的领军主帅。按照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才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治国方略，自熙宁二年（1069）起，相继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九项新法。或因谋划不周，或因操之过急，或因触犯了官僚贵族的既得利益，新法的施行阻力重重。在朝廷内部，围绕变法形成了新旧对立的两大政治派别：以王安石、韩绛（参知政事）、吕惠卿（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为主要代表形成革新派（后称新党），主张大力推行新法；以司马光（翰林经筵学士）、文彦博（枢密使）为主要代表形成保守派（后称旧党），以“祖宗之法不可变”为旗帜，坚决反对实行新法。当时朝廷名臣程颢（监察御史里行）、苏轼（杭州通判）、吕公著（御史中丞）等都站在保守派一边。两派斗争异常激烈，情同水火，相互不容。

熙宁五年四月，市易法开始施行。九月，少华山崩。十月，朝廷获悉山崩奏报，保守派便利用山崩大做文章，又一次向革新派发动攻击。枢密使文彦博首先发难，据《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七记载：“及市易司立，至果实亦官监卖，

少华山崩与王安石变法

彦博以为损国体，敛民怨，致华岳山崩（即少华山崩），为帝极言之。”且在一次朝会上朗声奏曰：“衣冠之家罔利于市，晋绅清议尚所不容，岂有堂堂大国，皇皇求利，而天意有不示警者乎！”王安石听后，针锋相对，立即厉色反驳：“华山之变（即少华山崩），殆天意为小人发。市易之起自为细民久困，以抑兼并尔，于官何利焉。”二人对垒激辩，指斥不休。事后不久，文彦博即辞去枢密使之职，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到河阳地方赴职去了。少华山崩以及之后其他地方出现的旱灾对王安石变法产生了巨大的威胁，连后宫皇太后、皇弟等皇室成员对此也惶恐不安，纷纷向皇帝施加压力，要求罢免王安石，停止推行新法。保守派的攻击更是不余遗力，一浪高过一浪。

少华山崩的发生，虽然为保守派向革新派攻击提供了一次机会，但最终未



熙宁五年少华山崩后形成的半截山



能阻挡住变法的步伐。熙宁九年（1076）冬十月，王安石内外受困，被迫辞去同平章事宰相一职，从此离开了政坛，但新法仍在继续推行。直至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驾崩，宋哲宗赵煦（时十岁）即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司马光等旧党势力重新执掌朝政后，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才一一被撤除，而因变法引起的新旧党争，直到徽宗朝才算彻底消停下来。

对于少华山崩而引发的变法争斗，宋神宗虽然站在革新派立场上，但仍敬畏于天神的意志和力量，不敢有丝毫的轻慢和藐视。在山崩之后不久，就对少华山神进行了封禅，封其为“显应侯”，以帝王之尊，祈求神灵庇佑华州一方风调雨顺，百姓平安。华州百姓先罹少华山崩的祸害，后蒙少华山神的庇护，算是因祸得福，润泽后世了。对今天的人来讲，无论是少华山崩，还是在当年王安石变法中，因山崩引发的朝廷政治争斗，仅是一段历史插曲而已，且已过去了900余年，但毕竟是一笔历史遗产，作为华州地方历史文化的一部分，要弘扬光大，并汲取其中的历史经验，这才是重要的。



蕴空禅院的历史与传说

闫广勤

位于大明镇里峪口的蕴空禅院(又称蕴空寺),不但是香火旺盛的佛教寺庙,也是游人不绝的风景名胜区,而明朝崇祯皇帝第四子在此隐居的传闻,更使这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引起人们的种种遐想。这里,笔者试图通过史料,探求一下蕴空禅院的历史与传说。

蕴空禅院始建年代无考,从禅院内北宋治平三年(1066)和熙宁二年(1069)的两块碑铭看,此禅院在北宋治平三年(1066)以前很久就存在了。佛门女弟子杨氏的碑铭记,这里原有一个圆寂的和尚法号“蕴空”,杨氏于治平三年(1066)将蕴空和尚重葬建塔,但她也不知蕴空是何代人,可见禅院历史之久远。另据“鱼池社众”署名的熙宁二年(1069)的碑铭,此禅院名“云寂院”。由此可知,蕴空禅院应是后来为纪念蕴空和尚而改的名,改名时间不得而知。但明朝万历九年(1581)刊行的《华州志》卷二、卷四,都有蕴空寺的记载,可见“云寂院”改为“蕴空寺”应远在明朝万历九年(1581)以前。此后,历代的州志、县志对蕴空寺(蕴空禅院)都有不间断的简要记载。

在蕴空禅院的历史中,绕不开的话题是明朝崇祯皇帝第四子在此隐居的传说。传说大体是,清灭明后,崇祯四子隐姓埋名到华州蕴空寺出家,法号为普乾。在华州,他暗地规划恢复大明江山,在乔峪口外,建了一个至今人们还在叫的十里“马厂”,招兵买马,训练军队。为了反清复明,唤起百姓对



蕴空山北宋塔



大明江山的拥戴，短时间内他相继建起大明寺、兴国寺、护国寺、兰若寺等庙宇，并命名了“朱张”等村名（明朝皇帝姓朱）。他曾发誓：“生不做清朝官，死不沾清朝土。”故圆寂后，弟子遵从其遗愿，将其棺用铁索悬于墓穴之中，四周悬起，不着其土。人称“悬棺”。如今游览蕴空禅院，还能够看到“悬棺”。

这些传说有没有历史文献的支撑呢？

《明史》卷一百二十记，崇祯共生七子，其中的四子朱慈炤，曾被封为永王。明亡后，朱慈炤“不知所终”。“不知所终”的朱慈炤，有没有流落到华州出家，至今没有发现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其实，崇祯四子在明朝灭亡后隐居江湖的传说，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如：福建泉州安溪县湖上乡飞亚村柏翠山狮子岩，宁夏中宁县四百户（恩和乡），山西省宁武县涔山乡王化沟村等，都传说崇祯四子在当地隐居终老。到底何处为是？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结论。



华州的传说中，所谓“崇祯四子为了唤起百姓对大明江山的拥戴，短时间内在华州相继建起大明寺、兴国寺、护国寺、兰若寺等庙宇，并命名了‘朱张’等村名”的说法，也得不到历史文献的支持。因为在明朝万历九年（1581）刊行的《华州志》卷二、卷四中，这几个寺庙和朱张村已有记载。这些记载，比明朝灭亡的崇祯十七年（1644）要早70多年。这就证明，这几个寺庙、村庄的修建与命名，与崇祯四子和“对大明江山的拥戴”无关。至于“十里马厂”，乔峪口确有一村叫“马厂”，但据民国时编撰的《重修华县县志稿》卷三记，明永乐年间（1403—1424），乔峪水暴涨，从乔峪口到龙湾，约五六方里，大石山积。几成不毛，积久野草繁殖。明朝的潼关驻军在此牧马，故称马厂。这比崇祯四子在华州建马厂训练军队的传说，应早了一二百年。附带说一下，大明乡、大明镇的得名，是因乡、镇政府设在原大明寺内，而大明寺在明朝灭亡前70多年时就有记载，故大明乡、大明镇的得名也与崇祯四子力图恢复大明江山无关。

至于普乾法师与崇祯四子朱慈炤是不是同一个人，以目前掌握的史料看，还无法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答案。《明史》记朱慈炤“不知所终”，给人们想象的空间，因而有无数个可能性。要证明朱慈炤流落到华州，在蕴空寺出家，成为普乾法师，还需要确凿史料和考古发现的支撑，以及严谨、科学的研究。

明朝四溪绕华州

宋朝峰

“少华苍苍，渭水泱泱，君子之风，与之久长。”这首书写在少华山石壁上的游人题诗，是古人对华州山水满怀人文情怀的诗意描写。古华州历经宋熙宁五年（1072），明嘉靖三十四年（1556）两次地震，原有的湖光山色均有毁坏，但仍遗存有几条涓涓溪流，滋养丰润着勤劳的华州百姓。从明《华州志》对华州时境的只言片语描述里，我们依稀能领略到当时华州的怡人景色。

古华州城曾被东、南、西、北四条溪流环绕。尤以南溪为州城水系之根源。南溪水出自太平峪内的五眼泉，五眼泉又名海眼泉。时任知州陈应麟曾作华州十景《五泉细流》诗：“谁将一线水，引入郡城中。”南溪水常被两岸百姓用来浇灌庄稼植被，余水流入华州城内后，官署府邸及士绅名门将其引入私人宅院，用作园林用水。在南溪上，曾建有“芙蓉园”，明时有“万春园”“新柿园”及“静远亭”。明代张潜曾作诗描写“静远亭”外的南溪：“郭外茅堂路不遥，偶然相约过溪桥。”在五眼泉的侧面洞岩内，有百姓为旱时祈求降雨所供的韩湘子像，此泉在大旱之年仍能保持溪水长流。

与南溪相比，东溪离州城相对较远。东溪水出自小敷峪。《华州志》中对东溪景色做出如下描写：“客有好林薄者，憩之，叹之，以为宛若小瀛台也。”东溪水与附近的泉水浇灌着此间的农田，形成以水稻荷莲为特色的浩荡池塘。在东溪沿岸，村落林立，明代的党氏村和水庄，即为今天的莲花寺镇党家河村和水旺村。这里多说几句：在《这里是华州》系列文章里，曾有作者仅凭《续华州志》中一段26字记载，就断定“水庄”即现在的赤水瑞凝庄有些勉强。在华州民间，老百姓把赤水瑞凝庄俗称为水凝庄，但不一定是《续华州志》中记



载的“水庄”。

从东溪党氏村向西远望，朦胧可见柳绿苗青，一派田园风光，这里即是离州城不远的北溪。北溪又称泥河，约在今华州城西北的宜合村一带。北溪水出自太平渠。北溪水势大小取决于太平渠的水势，清嘉靖华州知州吴旻对北溪曾做过描述。华州的北溪虽经常缺水干涸，然而，远望着岸边的柳树及田间种菜的百姓，仍禁不住要吟诗赞美一番。

华州城西有一大片水域，这里即是有名的华州“西溪”，因杜甫常在西溪河畔登高游览，曾题西溪为“小曲江”，后人便以此取名。有关西溪的记载，古代诗文中多为赞美之词。宋朝诗人李及之曾作诗《游西溪》：“漾漾一溪春，清华隔路尘。涵云红渡眼，蘸岳碧惊神。”西溪在唐时曾可搭船竞渡，水域宽广，西至今老官台，东至武家堡/李庄一带，水源出自南山及石堤河回流之水。



明朝的南溪——今日太平河

咸中历史笔谈

闫广勤

咸中校名的来源及寓意

咸林中学的校名典雅古奥，给人以文化厚重之感。而“咸林”何意？来源为何？该校的创办人杨松轩先生1921年8月20日的一篇文章中说：“定名咸林，系地点关系。”也就是说，所以命名为“咸林”，是因为今华州区古代曾有咸林之名。

据相关史籍，公元前806年，西周统治者周宣王封其弟郑桓公于郑，郑桓公即为春秋时郑国的建立者。而郑桓公时的郑国即在今华州区一带，其都城是棫林（据冯其庸等选注的《历代文选》中的《郑伯克段于鄢》），后棫林改称咸林（明《华州志》卷一）。棫林或咸林的位置大约在今县境东北。

“棫林”一名的含义是什么呢？“棫”，是一种树木，也称白桤。据我国最早的解释词义的专著《尔雅》的释义，此树为“小木，丛生有刺。实（果实）如耳铛（耳饰品），紫赤可啖（吃）”。“棫林”，可能因为此地当时棫树成林而得名吧？至于“棫林”变成“咸林”的原因，可能是传写而误，也可能是求简所致。

古郑国在立国30多年后，东迁至今河南省新郑一带。但棫林、咸林之名一直作为华州、华县的代称，这可在一些古代诗文中略见一斑。唐朝著名诗人储光羲有两首分别描写在华州征兵的诗歌，曾有“帝念霍嫫姚，诏发咸林兵”“朝集咸林城，师言乱啁啾”等句。县政府门前的唐朝李元谅碑中，记述叛唐之军在华州肆虐，有“垦掘咸林”一句。明代伟大戏剧家汤显祖有诗云：“宝莲开



华岳，仙树出咸林。”清初潼关进士杨端本为华州人武南浦所作的诗文中曾云：“械林文藻风翩翩，卓然郑社推名贤。”清末沈文荧在《新建驿馆颂》中描写华州是“岩岩咸林，襟河带岳”。“械林”“咸林”作为华州（华县）的代称，可谓源远流长。

上文足可证明杨松轩先生所谓咸林中学定名“系地点关系”之言不误。那么，“咸林”之名，是否还有其他的寓意呢？《华县教育志》在评析咸林校名的由来时，认为“按字词意义，咸：全、都。林：树木。寓意：办校目的在于培育莘莘学子，全都成为社会有用之材”。这种解析，在语法上是不准确的。“咸”，在古汉语中，是范围副词，可译为“全”“都”。它作为状语，修饰动词、形容词，如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咸来问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中的“少长咸集”。但“咸林”中的“林”，是名词，“咸”不能直接修饰“林”。因而，《华县教育志》对“咸林”的解析，有可商榷之处。其实，“咸林”一词，从“械林”演变而来，字面上已无意义，其寓意应从“械林”一词来分析。“械林”，指械树成林。械树在周朝，人们赋予它特殊含义。《诗经·大雅》中有一首为《械朴》，是歌颂周文王善于选拔人才。其诗有“芄芄械朴”一句，“芄芄”，指树木茂盛；械、朴，指两种树木。此句意谓用人有方，人才众多。“械林”一名，除作地名外，还可用“械朴”的典故，赋予它人才茂盛之意。而从“械林”一名演变而来的“咸林”被定为咸中校名，也寄托了咸中开创者们培育人才，百年树木，使学校能人才辈出，成为社会栋梁的理想。杨松轩先生之弟杨叔吉（鹤庆）先生在《纪念咸林中学三十周年文》中有云：“械朴作人，菁莪造士，校名咸林，取义如是。”证明了“咸林中学”之名的寓意，正是如此，而咸中百年来，确实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可谓人才济济，不愧“咸林”（械林）之名。

咸中与少华书院的渊源

少华书院建成迄于今已有 400 多年，其与咸林中学有渊源，皆因此书院为咸中校园的肇始之基。

书院为封建时代士人读书学习之处或准备科举的场所。少华书院建于公





1920年咸中师生合影

元1512年，即明朝正德七年。位置在今咸中大操场东南，后废。清朝乾隆年间（1736—1795），郡人史芝于崖坡村东，捐资施地重修少华书院。1862年毁于战乱，10年后重建，院址迁至今咸中校园西部，咸中的创办人杨松轩1893年至1895年曾在此学习。当时少华书院位于郡城内西北隅，占地4.4亩，有房十余间。清末“废科举，兴学校”，少华书院的历史作用结束，1904年将院产移交给刚建立的州立中学堂，院址被州判余某作为官署。当时华州的行政长官称知州，州判是知州的属官，分管巡捕等事。1907年，杨松轩等人创办咸中的前身—教育会小学（简称教高）时，校址无着，借耐村太王庙小学堂才勉强开学。杨松轩此后多次请知州将少华书院拨给教高，但因州判占用而未果。1908年初，华州知州褚成昌欲聘杨松轩为州立高等小学堂（简称州立小学，为今城关小学前身）校长，杨以负教高之责而固辞。褚成昌于是提出，可将少华书院拨给教高为校址，与州立小学（位于老县医院一带）相距不远，杨松轩可以两校兼顾。杨于是允诺。教高遂于1908年3月迁入少华



书院西正院，而书院东院仍为州判官署。因为州判负责地方治安，所以押有许多囚犯，这对在西正院上学的教高学生影响甚大。教高第一届学生杨钟健后来回忆：“初移入（少华书院）时，我印象最深之事为每夜听见后边（指州判所占之处）过堂，审讯拷打囚犯，哭叫之声惨不忍闻。白天则可看见这些囚犯带着很重的脚镣，做着各种工艺，多数是竹工。这样的环境对小学生甚不相宜。”因此，杨松轩又多次交涉，终使州判官署迁走，少华书院旧址全部归教高所有。

此后，教高、咸中以少华书院 4.4 亩院址、十余间房屋为基础，向东、向南扩展，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成就了今天咸林中学 135 亩校园，十几幢现代化高楼的崭新面貌。世事沧桑，面貌全非，但咸中与少华书院的渊源是不能忘记的。

杨松轩与顾熠山

在咸中的发展史中，杨松轩与顾熠山是一对双子星座，他们为这所学校的创立和发展都作出了各自不朽的贡献。

他们的生活道路和事业轨迹，有许多相似、相同、相交之处。二人年龄相仿，杨松轩仅比顾熠山大一岁。二人都是清末秀才，同游学于泾阳味经书院，都接受了老师刘古愚的“教育救国”和维新变法思想。他们共同开拓华县的新教育，一起成立了教育会，筹建教高，都当过教育会会长和教高校长。二人都加入了同盟会，积极参加辛亥革命。1918 年，二人一起赴汉口、上海、天津、北京等地考察，开阔了眼界，共同发起成立了咸林中学，同为校董会校董，一个为董正，一个为学监。二人都忧国忧民，渴望通过新教育的开拓，启迪民智，提高国民素质，挽救国家危亡。在他们共同生活的 20 世纪初叶，杨松轩、顾熠山都站在时代的前面，成为华县历史上交相辉映的双子星座。

教高和咸林中学的创办，杨、顾二人同心协力，共同奋斗，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才智。1921 年，当时的华县知事（县长）侯旬，为褒奖杨松轩、顾熠山的功业曾书赠一幅对联：“咸林自古宜桃李，少华于今仰顾杨。”

然而，1922 年学校的一场风潮中，顾熠山却离开了咸中，没能和杨松轩继



续在这个学校携手共进。这场风潮的起因很复杂，恩怨误解，宗派斗争都可能在其中相互交错，但其根本原因，却是学校中新旧教育思想矛盾斗争的结果。这场风潮的结果，是代表革新改革力量的教务长魏野畴等一些教员被迫离开了学校。顾熠山在一次校董会上与守旧势力据理力争以后，为避免矛盾扩大，影响学校，也离开了咸中。当时的咸中学生关中哲后来回忆到：“如果顾师（顾熠山）离开咸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学校发生了风波，便可理解到顾师并不计较个人荣辱，而以学校前途为重的高尚品质，自愿离开咸中了事。”

杨松轩在这次风潮发生时，正在为其父服丧，有4个多月未到学校。事后，他对矛盾双方进行调解，也采取了一些行政措施，使学校恢复了正常。杨松轩对魏野畴、顾熠山等人的教育改革是支持的，他曾认为魏野畴“鞠育”咸中一年，进行的改革，使“幼稚之咸中……生气勃勃”。魏野畴离校后，杨松轩曾三次致信予以挽留，证明他对教育改革的赞同。但对风潮中，学校“职教员纷纷去职，几成瓦解之势”是非常痛心的。因此，他对顾熠山产生了一些误解。但事过境迁以后，他们都能给对方以客观评价。杨松轩在1926年的《咸中小识》一文中，对咸中创办时顾熠山的作用予以肯定的记述。顾熠山在后来编纂的《重修华县县志稿》中，专门为杨松轩立传，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而且充分肯定了杨松轩在创办教高、咸中时的领袖地位和主导作用。顾熠山在“杨松轩传”中记：“（杨松轩）清末纠同志创教育研究会，附小学。”强调了杨松轩“纠集、集结”的主导作用。传中又记：“（杨松轩）鼓全副精神，筹办中学，同仁均感困难，而卒展为陕东最高学府。”强调了在“同仁均感困难”的情况下，杨松轩领导咸中筹办而最终使之发展壮大。顾熠山在此传中，还总结杨松轩“遇大事当机立断，见解独超”，“重大事务，多出自擘划，成败利钝，悉取决焉”的领袖风范，从而充分肯定了杨松轩在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在咸中创建过程中的为首者地位。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1年，顾熠山在其《自传》中，仍然说自己是“协同杨松轩创办咸中”。

顾熠山先生不计前嫌，对曾经误解自己的已故战友，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显示了他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赢得后人的尊重。



顾熠山先生离开咸中后，杨、顾二人在不同的领域继续自己早年的追求和理想，都取得了伟大成就。杨松轩继续引领咸中的发展，直至积劳成疾，于1928年病逝于学校，他的办学精神和教育思想成为咸中的宝贵遗产。顾熠山则在继续教育事业的同时，关心社会公益事业，为民争取权益，揭露官吏贪腐，参与革命进步活动。尤其在编纂《重修华县县志稿》时，惨淡经营，苦心孤诣，积十几年之功，编成这部为方志界公认的佳作，为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杨松轩和顾熠山都是华州（华县）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魏野畴咸中事迹钩沉

魏野畴是中国共产党陕西地方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在陕西学校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这个学校就是咸林中学。1921年至1922年，他在咸中任教，不仅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带给了咸中，并深刻影响了这个学校以后的发展。

魏野畴能来咸中任教，是经杨松轩之子杨钟健的介绍。魏野畴是陕西兴平人，1913年他与杨钟健同时考入西安三秦公学（后称省立三中）学习，二人曾一起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斗争。1917年毕业后，二人又同时到北京求学，魏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杨在北京大学。他们在北京求学期间，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二人都积极投身其中。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他们二人与其他几位陕籍学生一起，整顿了“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创办了《秦钟》月刊，向陕西青年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杨钟健与魏野畴等陕籍学生，不仅是同乡、同学，而且是志同道合的朋友，魏与杨分别于1920年和1922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杨钟健后来在回忆录中，称他与魏野畴等人在这一时期“朝夕相处，常在一起，谈许多有关学生运动及陕西学生的事情”。

1921年，魏野畴在北京高师修业期满，时值杨钟健遵其父杨松轩之嘱，正为咸中物色教员，所以，杨就介绍好友魏野畴到咸中任教。魏到咸中任教的时间，许多魏野畴的传记或相关党史研究资料，都记为1921年夏，或1921年7月，这不是太笼统，就是不准确。魏野畴1921年7月16日写给杨钟健的信中，写



明他是7月12日从北京到达华县咸林中学。而现存的一份1922年的咸中档案中，记魏野畴到职时间为1921年8月，当时的咸林中学章程规定，学校“每年以8月1日为学年之始，翌年7月31日为学年之终”。据以上资料，精确地记魏野畴咸中任教时间，应为1921年8月。

魏野畴在咸中时，任教员兼教务长。许多魏的传记或党史资料，都记为教务主任。但据杨松轩撰的《咸中大事记》（1916—1927）：1920年元月，咸中、教高“各设教务长一人”，教务长改称教务主任，已是1924年8月以后。

魏野畴在咸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五四”精神，进行教育改革，但相关论述、著作中有一个错误，即魏在咸中进行缩短学制的改革，“将中学四年制改为三年制”。咸中当时执行的是教育部的“壬子癸丑学制”，中等学校学制四年，不分高中、初中，毕业后可直接考大专。从杨松轩撰的《咸中大事记》（1916—1927）看，咸中1919年至1922年招收的四届学生，都是学完四年毕业，并没有学制的改革。魏野畴1922年3月5日曾给杨钟健写信，提到当时有改革学制，分设高、初中的呼声。魏野畴在信中认为咸中不具备办高中条件，只能办初中，而初中的年限，魏野畴认为：“四年初级中学也可，三年初级中学也可，……还是设三年初级中学经济多了。……我已写成一副计划书，打算在咸中试办。”从信中可以看出，魏、杨之间仅就学制问题进行讨论，魏野畴只有计划、意向而已。从他一个月后即辞教务长，5个月以后，咸中仍招四年制学生的实际看，魏的计划并未实行。而且魏的计划并不是缩短学制，而是希望咸中由不分高中、初中的四年制，改为三年制初中制。1922年，教育部公布“壬戌学制”，规定中等学校分初中、高中，学制各三年，即“三三制”。咸中接到部令后，没有设高中，而是实行三年初中制。其具体时间，据杨松轩1926年4月15日的《谕三年级改为四二制文》，应当在1923年8月招收第五学级学生时。

魏野畴在咸中传播“五四”精神，宣传马克思主义，为这个地处穷乡僻壤的学校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使学校充满活力。咸中董事长杨松轩对魏野畴十分器重，非常赏识，他曾说：“野畴任事热心，余自来尚未见过，真是为咸中前途幸！”“幼稚之咸中经兄（指魏）鞠育一年，生气勃勃，前途正未可限量。”1922



年夏，在魏野畴离校后，杨松轩曾三次去信挽留，言词恳切，虽魏没能复来，但杨松轩的拳拳之心可见。

魏野畴在咸中，不但受到董事长杨松轩的器重，也与学监顾熠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魏到咸中时，不过23岁，而顾已经48岁，但顾熠山思想锐进，追求进步，与魏野畴志趣相投，成了“忘年交”。魏野畴在学校教育改革和革命宣传，都得到顾熠山的全力支持。魏负责教务，顾负责管理，二人珠联璧合，配合紧密，一时使学校成为华县乃至陕西传播“五四”精神的重要阵地。但这不可避免地遭到顽固保守势力的反对，从而引发了1922年春的咸中风潮。当年夏，魏野畴和顾熠山都被迫离开了咸中，各奔东西，但他们的友谊却未中断。顾熠山1923年到陕西省立三中任国文教员，兼省立一中地理教员；魏野畴先到北京，后到陕北榆林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魏野畴因受陕北军阀井岳秀的迫害而来到西安。顾熠山得知后，即向省立三中校长、自己的学生刘依仁推荐，聘请魏到省立三中任教，并任教务主任，后又转到省立一中任教。二人联手进行教育改革，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一起带领学生参加反帝反军阀的爱国运动。魏野畴并以此为基地，开展了陕西党团组织的建立工作。顾、魏二人在省立三中、省立一中共事达三年之久，这对从咸中走出的战友，在陕西教育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王子休出任校长之缘起

杨松轩去世后，咸中曾经过一个困难的时期。1929年至1932年，特大旱灾、罕见瘟疫、军阀混战接踵而至，省教育厅甚至欲将咸中予以撤消。常务校董关秀卿、张益斋，校长刘竹轩等人竭力维持，勉强渡过难关。但学校发展停滞，毫无生气，校务中衰，因循保守，以至杨钟健1930年在一篇文章中说：“最近陕省统计教育，据云以咸校成绩为最劣，此等统计固未必可靠，然外界声誉，即此已见一斑。”（杨钟健《父丧记》）咸中校友，面对此状，莫不痛心疾首，普遍认为，客观原因之外，学校内部“管理乏人”，“精神涣散”是重要原因，另聘校长之议遂起。杨松轩的女婿关中哲就认为：“以今日学校之基础，如有



一得力之人，即不难望其蒸蒸日上，其不然者，唯有奄奄待毙，以至就木耳。”（杨钟健《父丧记》）当时的校长刘竹轩也几次请辞，校董会遂接受刘竹轩辞职，于1932年9月另聘王子休为校长。

在咸中作为私立学校的历史上（1949年前），历任校长非本县人士，即本校学生，但王子休是个例外。他是陕西高陵人，也未在咸中读书，能来此掌校，皆因杨钟健慧眼识珠，极力推荐之故。王子休早年求学于天津南开中学和北京大学，参加过“五四”运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因失掉了组织关系而脱党。1929年北大毕业后，先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校长秘书，后任西安高级中学注册主任。王子休与杨钟健在北京求学期间因共进社和《共进》杂志而相识。共进社是“五四”时期创立的旅京陕西学生的进步社团，《共进》杂志是其机关刊物。杨钟健是共进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长期担任《共进》杂志主编，王子休也是共进社骨干。1923年暑期，杨钟健北大毕业，准备赴德国留学，就将自己在共进社的工作交给了王子休，甚至带不走的个人物品也托王子休保管。王子休后来成为共进社的主要领导人。杨钟健从德国留学归来后，与王子休仍然保持良好的友谊。当1932年咸中急需一个担当发展重任的校长时，杨钟健就将年青有为，精明干练，勇于任事，北大教育系毕业，并经过实际锻炼的王子休推荐给校董会，由校董会聘为咸中校长。王子休不负众望，短短三年时间，就将这个一度死气沉沉、苟延残喘的学校，改变成在陕东地区首办高中班，首先男女合校，全省也少有的集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于一校之学府。咸中的优良学风校风、较大校园规模，从杨松轩起开创，在王子休手中基本成型，当时被誉为“陕东最高学府”。王子休为咸中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而杨钟健的推荐得人也功不可没。



是陕东学府 不是关东学府

20世纪30年代，社会上对咸中就有“陕东最高学府”之誉。但不知何故，竟以讹传讹迄于今，“陕东学府”变成了“关东学府”。不但留传于口头，且见诸报刊、书籍。如1988年12月20日的《陕西日报》载有介绍咸中的一篇文章

章，标题就是《关东学府——咸林中学》。1992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杨松轩诞辰120周年纪念文集》第221页，有“在马列主义最早传入陕西的关东学府咸林中学，……”等，不一而足。

20世纪前半叶，陕西关中东部地区统称陕西东路或陕西东府，简称“陕东”，大体包括今渭南市所属各县市及临潼、蓝田等地，华县就属于陕东地区。如《杨钟健回忆录》记1909年时，“省上提学司余某来陕东视察”，参观教高后，称誉它为“陕东特色”（《杨钟健回忆录》，地质出版社1983年版第11页。）。1925年，关中东部各县组织成立了“陕东学生联合会”。1928年10月，杨松轩在一篇文章中说：“今后咸林学校，能如教高、咸中时代长足进步，为陕东放一异彩。”杨松轩去世时，有一付挽联题为：“千载声名著陕东，一世心血留咸林。”

而“关东”，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潼关或函谷关以东地区，二是指山海关以东的东北地区。无论何义，华县所在的关中东部地区均不在其内。“关东”不是关中东部的简称，关中东部可简称“陕东”或“秦东”。如果一定要用“关”字的话，华县所在地区可称“关西”。如华阴东汉时一个名臣杨震，人称“关西夫子”。杨松轩的一篇文章中曾云：“惟华县距省城数百里，而关西一带无一中学。”但社会公认的原词是“陕东最高学府”，不可妄改为“关西学府”。

总之，今后用“陕东最高学府”或“陕东学府”赞誉咸中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可以的，但切不可再用“关东学府”，以免谬误继续流传。

咸中为何被誉为“陕东最高学府”

20世纪30年代以后，社会上对咸中就有“陕东最高学府”的美誉。据故老相传，这是1934年时，国民政府考试院长戴季陶来校视察后的称赞之词，但无史料佐证。笔者现见到的最早文字记载此美誉者，为民国时的《重修华县县志稿》卷五，其记咸中“不特为陕东最高学府，在全国私校中，亦有声色”。此书撰于20世纪40年代，但此美誉肯定要产生的更早一些。

咸中被誉为“陕东最高学府”并非溢美之词，而是因为这个学校在陕东地





20世纪40年代的咸中教师合影

区教育界有独特的历史地位。1919年咸中成立时，是陕东地区唯一的中学，很长一段时间，也是陕东的教育中心。当时，大荔县同州实业中学堂（1905年设），已于1914年改成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15年创立的合阳中学开办5个月后即停办，1924年才复建。其他各县，都没有中学。所以，咸中的创立，使陕东地区的小学毕业生纷纷奔赴华县，到咸中求学。杨松轩1922年的一封信中说：“学生现共四级，共一百四五十名，外省外县占三分之一。”1926年咸中第四学级毕业31人，其中渭南（今临渭区）10名，蓝田、华阴各3名，华县只有15名。周边各县学子前来求学的趋势，在那以后继续发展，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高潮，并维持到20世纪50年代初。据咸中1946年的一个统计，全校793名学生，本县为546名，其他县的学生247人，其中渭南（今临渭区）有45名，华阴有54名，大荔、平民、朝邑三县共67名（平民、朝邑二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并入大荔县），潼关有13名。其他还有白水、合阳、澄城、蒲城、长安、蓝田、临潼、洛南各县及一些外省人。

咸中还是陕东地区最早设立高中的学校和第一所完全中学。1933年咸中设立高中班时，陕东地区各中学仅没有初中，“陕东最高学府”之称，也就是此时产生的。以后设高中班最早的是蒲城尧山中学，为1937年。其他如韩城设高中班是1944年，富平立诚中学设高中班为1945年，澄城中学设高中班为1955年，合阳中学始设高中班已到1956年。

咸中于1932年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合校，20世纪40年代又实行男女同班，在陕东地区的中学里也为最早，开风气之先，也是咸中校史上的精彩一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育事业大为普及，陕东各县的各级中学普遍建立完善，咸中也逐渐失去陕东教育中心的地位。但“陕东最高学府”的美誉，



却永远记载着这所百年名校的辉煌。

咸林中学与几位中国历史名人

咸中不但在陕东乃至全省声名遐迩，也曾与几位中国历史名人发生了一定关系，而且大多与杨松轩之子杨钟健有关。

1. 毛泽东

咸中成立后，杨钟健曾推荐了许多杰出才俊到学校任教，如魏野畴、王复生等。1923年春，杨钟健还打算聘请毛泽东到咸中任教，但未能如愿。此年5月26日，他在给其父杨松轩的信中写道：“咸中教员，不知发生问题否？前之言手工教员，现已他就。前竹轩托请润之（毛泽东的字），儿日来尚未见他面，但以儿推测，恐不能就。”

杨钟健与毛泽东相识较早，据杨钟健回忆说：“我同毛泽东先生，早在五四之前，在北大便有过接触。”当时杨钟健在北京大学读书，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职员。两人后来还有书信往来，1921年9月29日，毛泽东给杨钟健的一封信，被杨钟健一直保存下来，成为珍贵史料。

杨钟健欲聘请毛泽东到咸中任教一事，虽因毛泽东已投身于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之中而未能实现，但成为咸中历史上的一段遗闻轶事。

2. 蔡元培、李大钊

杨松轩去世后，应杨钟健之请，蔡元培先生曾撰《杨松轩君家传》一文，记述了杨松轩生平事迹，称赞杨松轩“所谓以教育事业终其身，如君者洵无间然焉”。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中国著名教育家，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杨钟健在北大求学期间，蔡元培正在北大校长任内。蔡元培不但撰《杨松轩君家传》，还曾为杨松轩之母、之父的墓表撰文，于1920年和1924年分别刻石碑于墓前。而杨松轩之父墓表中的铭文为李大钊撰。李大钊（1889—1927），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他不但是杨钟健的北大老师，还与其在五四运动及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有过亲密交往。杨钟健曾参加李大钊



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还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了由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蔡元培、李大钊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巨人，他们通过上述文章，向世人宣传了杨松轩，介绍了咸林中学。

3. 张伯苓、于右任

张伯苓（1876—1951），天津人，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中国著名教育家，周恩来总理敬重的老师。1930年，杨钟健请其为杨松轩墓表撰文，张伯苓欣然命笔。张伯苓于1904年创办私立南开学校，后发展成南开大学，对办私立学校，“深知其艰苦”，因此在此文中说：“陕西华县杨松轩先生，亦为办私立学校者，其生平所遇之困穷，正多为余所深受。”张伯苓写道：“先生与余从事教育事业，均远在二十余年前，时风气未开，新学为人所反对，社会上对于办学之阻挠，诚有吾人今日梦想弗及者。幸余所办学校，在通商口岸，地方平靖，风气较易转移。而先生辟处西陲，只身奋斗，其所遇之艰难困苦，实百倍于余。”张伯苓在历数杨松轩办学成就后说：“设先生办教育，不在县城而在省会，不在西北而在东南，以先生精神毅力，其成效当不止此。”他称赞杨松轩“实不愧为时代之先驱”。

张伯苓撰文的《华县杨松轩先生墓表》，由于右任书丹，马衡篆额，李书华撰铭，于1932年立石于杨松轩墓前。于右任（1879—1964），陕西三原人，国民党元老，曾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还是著名书法家。马衡（1881—1955），浙江鄞县人，著名考古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故宫博物院院长。李书华（1889—1979），河北滦县人，著名教育家，曾任北大教授、中法大学代理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

上述蔡元培、李大钊、张伯苓、于右任等人撰文、撰铭、书写的几通石碑，现已成为珍贵文物，1982年被收藏于西安碑林。2002年重修松轩墓园时，这几个墓表被刻石立于园内，供人瞻仰。

4. 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

1936年10月，咸中举行三十周年校庆活动（提前一年举行），陕西各界名流数十人赠送礼品，题词致贺。其中最显赫的是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



张学良（1901—2002），辽宁海城人，东北军将领；杨虎城（1892—1949），陕西蒲城人，西北军将领。两位将军共同发动“西安事变”，促成全民族团结抗战，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邵力子（1881—1967），浙江绍兴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曾与李达一起介绍杨钟健加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他们为咸中三十周年的题词分别是：张学良的“菁莪造士”，杨虎城的“继往开来”，邵力子的“成德达材”。杨虎城除这次题词外，还曾于1930年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到咸中视察，并念学校之艰苦，特批省政府每月补助咸中500元。

咸林中学与这些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人物的关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所学校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记述华州历史的三则讹误

闫广勤

记述历史，贵在求真求实。要始终怀着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坚持科学严谨、实事求是、说实道有的理念。在编著中不牵强附会，不演义戏说；对资料严加考证，认真鉴别，严肃谨慎。但现实中，有些记述华州历史的文字，却随性随意，没有严谨的考证鉴别，出现一些讹误。

潜龙寺“始建于东汉明帝时”吗？

少华山森林公园中的蟠龙山和潜龙寺（俗称藏龙寺），是一处风光别具的旅游区。潜龙寺始建年代，众多有关文章，包括百度，都记始建年代在东汉明帝时，或东汉初年，这在佛教历史上是不对的。

民间传说，东汉光武帝刘秀，早年被王莽追赶时，曾在此藏身，其子汉明帝建此庙纪念，人们俗称藏龙寺。“王莽赶刘秀”是全国许多地方都流传的民间故事，不是信史，寺庙建于何代，当然不能以此为据。寺中有一块清代康熙四十六年（1707）的碑石，上说“自汉明帝时有其寺”，这应该是1600多年后的附会臆测。

汉明帝是东汉初期的皇帝（公元58—75年在位），公元64年，汉明帝遣使西域拜求佛法。三年后，汉使同印度高僧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返回东汉京城洛阳，在洛阳西雍门外建起了寺院，即著名的白马寺，这是佛教在中国内地流传之始。潜龙寺这时是否建立，存很大疑问，因为佛教的传播流传是一个长期过程。作为外来宗教，佛教融入中国社会，应逐步由简单向复杂转变，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偏僻地区流传，仪轨也得逐步完善。始建佛教寺庙，没有一



定的社会基础和宗教氛围，不可能在佛教刚刚传入时，就在远离京城洛阳的深山老林里建潜龙寺。

著名历史学家王仲荦在《魏晋南北朝史》一书中说：“汉献帝（公元189—220年在位）时，佛教在这一时期在人民群众间逐渐传播开来。”他在此书中又说：“在曹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的稍前一、二年，才有颍州人朱士行，第一个出家当和尚。”

佛教由公元67年传入中国内地，到有人第一个出家当和尚，将近200年，可见汉明帝建潜龙寺多么不可思议。

潜龙寺中康熙四十六年碑石“自汉明帝时有其寺”的说法，是孤证，寺内其它碑石以及权威文献并没有相同记载。有些寺庙，喜欢将自己的建庙史上溯到佛教传入内地的汉明帝时，以示久远，取其说法需慎重。

永庆寺：对“始于汉室，隆于唐世”的误读

柳枝镇南关村南部的凤居山下，有一寺庙，即永庆寺，也称永庆禅院。网上的许多介绍永庆寺的资料，皆认为该寺“始于汉室，隆于唐世”。如百度百科就说：“据永庆寺中明宣德八年（1433）的《凤居山永庆寺禅院碑记》所记载，该寺‘始于汉室，隆于唐世’。”其实此为对碑文的误读。



永庆寺

明宣德八年（1433）的《凤居山永庆禅院碑记》，至今仍竖立在寺内。其碑文的主要内容，先是佛教的起源，然后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叙述：“……三教阐时而教法隆，是以白马东行，如来归化，无非慈悲为怀，方便为门，三代轶叙，始于汉室，隆于唐世，四海弥教，建迹法像，演教法场，实化愚之一端也。

……”接下来记凤居山的形胜及得名。再记凤居山下永庆禅院的法师名号，记述其寺建筑“俱完，惟有罗汉圣相未饰”。又记各界捐款修缮功德。

碑文始终未记永庆禅院的始建年代，而“始于汉室，隆于唐世”，从上下文看，不是记永庆禅院，而是记佛教在汉明帝时传入中国内地，唐朝时达到兴盛的状况。因此，从碑文看，永庆禅院的始建年代不详。能证明的是，明宣德八年（1433），永庆寺修缮并立碑。

西河郡与华县无关

前些年，出现一种说法，认为“陕西华县（今已改为渭南市华州区），古代属于西河郡。”

西河郡是古代地名，历代所在位置各不相同。据《辞源》《辞海》《中国历史地名词典》等各种历史地理工具书：春秋时，卫国西境沿黄河地区，称西河，即今河南浚县、滑县等地（注意：“滑县”与“华县”音同字不同，易混淆）。战国时期的魏国设置西河郡，《辞海》云，其“辖境相当今陕西华阴以北，黄龙以南，洛河以东，黄河以西地区”；汉朝也设西河郡，在今内蒙、陕西、山西交界处一带；三国曹魏时的西河郡在今山西汾阳一带的吕梁地区；唐宋时，西河郡是汾州的别称，治所在今山西汾阳。上述各代的西河郡，没有一处与陕西华县（今华州区）有关。

西河郡也是古代的一个行政区域。历代各种地方志都注重记载当地的行政区划沿革。但是，华县（华州区）现存的自明朝至今的7部主要志书，没有一处提到今华县地区与西河郡有任何关系。查阅权威性史籍“二十四史”中的《地理志》，在记述华州（华县古称华州）的建置沿革时，也没有一处记华州属于西河郡，或西河郡在华州。查阅当代历史地理方面的专著、地图，辞书，涉及于此，也无相关记述。



华州区的别称——咸林

闫广勤

有些城市在正式名称以外，还有别称。如南京的别称为金陵，苏州的别称为姑苏，扬州的别称为广陵。渭南市华州区，曾经的正式名称或为华州，或为华县，但自古以来的别称，则是“古郑”和“咸林”。“古郑”，众所周知，是西周末年，郑桓公受封于此，建郑国，后郑国东迁，人称此地为古郑。而“咸林”，也与郑桓公有关。

北宋学者乐史在《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九中，所引《国语》便作“郑桓公为周司徒，采地咸林也。”南宋学者王应麟在《诗地理考》中，所引宋忠《世本》也作“桓公居咸林”。

咸林之名一直作为华州、华县的别称，这可在一些古代诗文中略见一斑。唐朝著名诗人储光羲有两首分别描写在华州征兵的诗歌，曾有“帝念霍嫫姚，诏发咸林兵”；“朝集咸林城，师言乱啁啾”等句。老县政府门前的唐朝李元谅碑中，记述叛唐之军在华州肆虐，有“垦掘咸林”一句。明代伟大戏剧家汤显祖有诗云：“宝莲开华岳，仙树出咸林”。清末沈文荧在《新建驿馆颂》中描写华州是“岩岩咸林，襟河带岳”。“咸林”作为华州（华县）的别称，可谓源远流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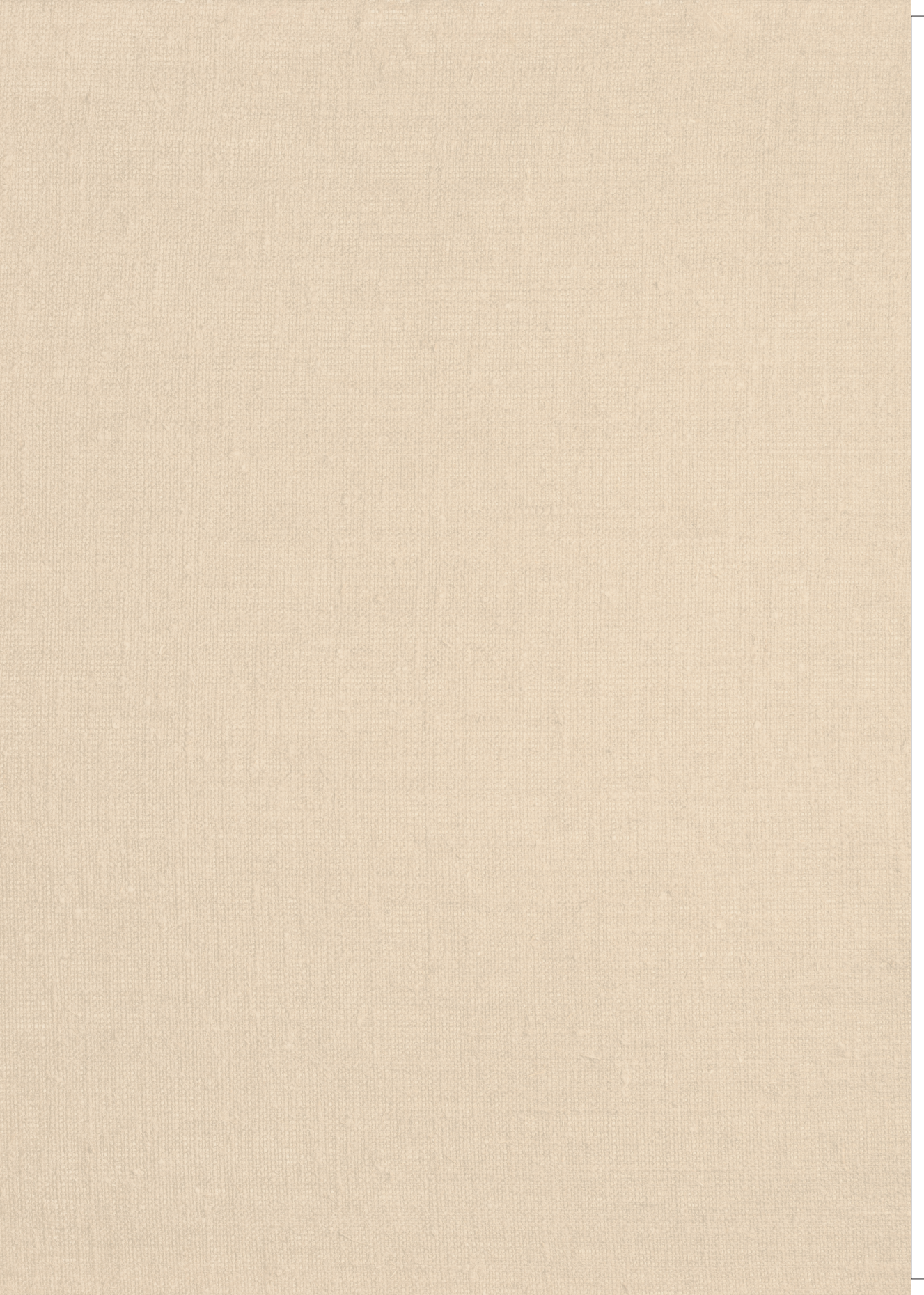
民国时期的1919年，陕地东区的第一所中学——华县咸林中学成立，该校的创办人杨松轩先生1921年8月20日的一篇文章中说：“定名咸林，系地点关系。”也就是说，咸林中学因华县的别名“咸林”而得名。

有一种说法，“咸林”本称“械林”，因讹传误写而成“咸林”，但也有人认为，“械林”其实为“咸林”之误，郑桓公的采地就是咸林（如周雯《械林地望释疑》，载《历史地理》第二十六辑）。这些不同意见可以争鸣，但“咸林”是华州（华县）的别名之一，为古今所公认。





回忆纪实



解放初期的华县干部工作作风

刘耀明



刘耀明

1949年5月8日，我们南下关中接收国民党政权的210多人，从延安李家渠出发，19日抵达渭南固市；22日，组织正式任命我为中共华县县委书记；23日，我率数十名老区干部从固市奔向华县；24日，到达华县县城。在中共华县工委的努力下，华县已于23日和平解放，我们顺利接收了国民党政权，成立了新的华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

华县解放初，华县干部队伍中，有从延安老区来的20多人。除此之外，主要来源是华县地下党经长期艰苦工作培养保存的一批素质很好的党员干部队伍，这是华县解放后干部队伍的主力。另外是解放后，在社会上吸收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总之，干部队伍的主体是由本地干部组成的。

当时华县干部队伍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是好的，至今给我留有深刻的印象，现在回忆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每个同志，都有一种为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积极工作、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分配工作征求他们有什么意见时，他们的回答都是：“组织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这种淳朴而诚实的回答，充分体



现了他们为人民、为国家、为党的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们有的分配在机关，有的去基层或岭南（金堆）边远山区做群众工作，有的分配到地方部队，有的分配去带领民工支援前线，个个都是高高兴兴地接受分配，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我在华县工作的半年中，没有发现不服从分配、不接受工作任务、对工作挑挑拣拣或提出这样那样条件的人和事。

二、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华县和平解放时，我们接收下来的是个破烂的穷摊子，财政上没钱，仓库里无粮。我们既要吃饭也要办公。每月每人发办公用品，只是发几张纸，两支铅笔。每人每天一斤粮，三钱盐，一个月半斤油的生活费。从县长到干事，都吃一样的饭，住的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破房子。按房子大小，一间住两三个人、四五个人、七八个人不等，简易木板床，行李自带。没有粮吃，由县委副书记王平凡同志出面，向西关一家粮行借了几千斤面粉，再搭些杂粮，才解决了县级机关的吃饭问题。因为缺油，经常是清水煮萝卜、土豆、大白菜。同志们开玩笑说：“我们吃的是清淡素食，一天三顿，天天如此，是最虔诚的佛教徒。”当时对干部的待遇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对于新吸收的干部，只能供给吃饭、住房，发给办公用的铅笔、纸张。其他的被褥、衣服、看病等一切费用都得靠自己解决。财政上非常困难，又不能向人民群众乱派一文钱，只能向干部讲明：“困难是暂时的，大家只有咬紧牙关，带领群众一道克服困难，我们的日子才能一天天好起来。”就是在这样物质生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叫苦，个个斗志昂扬，愉快而紧张地工作。那时没有星期日休假制度，很多同志在小麻油灯下，通宵加班加点，一个人干几个人的工作，高效率、高质量。那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敲诈群众的国民党作风，顿时绝迹。干部这种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作风，在群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很快树立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大形象。

三、团结一致干革命。老区来的干部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其不足之处是普遍文化程度低。同时，长期在边区工作，对新区当地的历史、社会现状、民情风俗、群众心理状态都不太了解。本地干部长处是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对当地社会情况熟悉，群众的心理状态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都能说出个



解放初期的华县干部工作作风

一二三四来。本地干部的长处正是老区干部的短处。因而，我们强调老区来的干部要信任本地干部，尊重本地干部，虚心向他们学习，取长补短，并把积极培养、大胆提拔本地干部作为老区干部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当时到处洋溢着革命的友谊，充满了团结的气氛，所有的干部，都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不辞劳苦，勤奋工作，使解放初期的华县，生机勃勃，政治清明，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共产党，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

作者简介

刘耀明（1917-2002），华县解放后的第一任县委书记，此文完成于1993年，由刘耀明口述，邵拉雄、张平、王莎整理。



原华县人民政府（摄于1985年）



入社前后的回忆

刘正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土改中，我们那里（赤水辛村）的贫下中农都



农业合作化时的宣传画

分得了土地，但不久就出现了部分困难户（缺乏劳力、农具、资金等）因无力耕种而出卖土地的现象。1952年6月，我乡东边东赵乡汪楼村的汪保善，自发组织12户农民成立了互助组，解决了这些困难。当年11月，他又把互助组扩大为22户，建立了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名为“晓光社”。《陕西日报》对此作了大量宣传，县政府也号召农户向他们学习，走联合起来的路子。1953年春，“晓光社”进一步发展，扩大为50户，实行土地合股经营、牲口同槽喂养、劳力出勤记工、年终结算分红的经营办法。当年的

结果表明，其产量明显高于单干户和互助组，汪保善因此获得省劳模称号。这件事在全县影响极大，加之当时全国都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大办合作社，于是在1956年，我县掀起了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高潮。

也就是在这年冬天，上级向我们村派来了工作组，发动农民把土地、牲口及大型农具等都交给社里，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但在起始阶段，由于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和习惯于搞单干的思维定势，村民们对加入合作社疑虑重重，并不热情，特别是舍不得把土地和牲口捐出去。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我爷爷对入

入社前后的回忆

社的事情却充满热情，非常积极。报名的那天，天还未亮，他就早早起了床，跑去敲开村干部家的大门，第一个报名入了社。后来，他还拉着我家的那头小牛，扛着铁犁和牛跟头等农具，把这些都统统捐给了社里。因为这件事，他曾受过我大爷（爷爷的大哥）不少风凉话。

甭说别人，就连我在长大以后，对爷爷当年的举动也很是纳闷——他不是党员，也没文化，为何却有这样高的觉悟？因此也曾悄悄地问过我妈。我妈的说法是，那时咱家的男劳仅你爷爷一人，脏活重活全靠他来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那几年，他“实在是累得干不动了！”

入社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村里在学校（高家村祠堂）召开群众大会。工作组里一个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干部，按报名顺序宣读报名入社人员名单。爷爷作为第一名，自然受到了大会表扬。当时我年龄小，也挤坐在开会的群众中看热闹。听到工作组表扬爷爷后，我感到非常高兴和骄傲。后来，我家的小牛就和其他入社农民的牛一起，集中在高家的一个社员家里，让社里的饲养员喂养去了。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路过高家，无意中看见了我家的小牛。它当时和其他牛一起，拴在高家一片空庄基的木桩上。当它瞧见我时，好像是认识似的，睁着两只乌黑的大眼睛，静静地望着，一动也不动。我从小牛这眼巴巴的神态中，感觉到它非常可怜，仿佛是受到了别的牛欺负似的。于是就跑了过去，搂住它的两只小犄角，对它说：“牛啊牛！现在入社了，你就好好在社里住吧！以后有机会，我让爷爷把你拉回去，在咱家好好转一转！”

这个情况，正好被高家景朋他妈看见了。她当时正从家里出来倒脏水，听了搂着牛犄角说的话，很是诧异和感动，逢人便夸：“外娃（那个娃）碎碎（小小）的，咋恁们（那么）灵醒（聪明）！”

想起来真有意思，当年小小的我，确有些对牛弹琴的味道！

作者简介

刘正军，1947年出生，曾任渭南市教育局副局长。



故乡的“官路” 故乡的桥

刘正军

我的家乡华县赤水镇辛村，地处渭河南岸、遇仙河东侧，受两河之阻隔，地域偏僻，是个死角，但村南却横贯过两条重要的交通线。一条是陇海铁路，距我村仅三四百米；一条是西潼公路，距我村也仅千米之遥。两路横贯东西，南北照应，如影随行。1966年10月，陇海铁路南迁，村旁的那段铁路便遭废弃，仅留下了几处遗址。而西潼公路虽然也于1961年南迁，但原来的旧道至今却依然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历史悠久的“官路”——“潼天路”

这条西潼公路旧道，原是一条古老的驿道。它东起潼关，西至西安，全长170多公里。周时这条古道称“桃林塞”，秦及西汉时称“函谷路”，东汉至清时称“潼关路”。20世纪60年代以前，我村民众则长期称其为“官路”——大约因其是官家驿道之故吧。

清代以前，“潼关路”为车马大道。它行经关中平原东部南侧的阶地塬区，线路平直开阔，路基比较稳定；除帝王出巡等重大事件时有过不定期的修缮外，历代从未有过大的整治。到了清代，清廷在此驿道上设立了六个驿，自西向东分别为：京兆驿（现西安市碑林区马厂子饮马池一带）、新丰驿（今西安市临潼区）、丰原驿（今渭南市临渭区）、华山驿（今渭南市华州区）、潼津驿（今华阴市）、潼关驿（今潼关县）。清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对包括“潼关路”在内沿途道路，进行了大规模整治，使路基宽到三至十丈。它东起潼关，横穿甘肃河西走廊，旁出宁夏青海，到达新疆哈密，再分别延至



故乡的“官路”故乡的桥

南疆北疆，全长三四千里，后人尊称其为“左公大道”。当时在大道沿途遍栽杨柳、榆树及沙枣树，名曰“道柳”，陕甘民众称其“左公柳”。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北公路建设，基本上是沿用这个路基的。当时，对“潼关路”的养护，有“雨后除道”的要求。华州知州因雨后没有及时铺垫沙石，导致道路泥泞，曾遭到左宗棠的严厉斥责。

民国十年（1921）九月，冯玉祥出任陕西督军，出于军事及政治需要，曾责令驻军和沿途各县，于当年冬季修筑西潼公路。当时在原车马大道基础上，裁弯取直，降低坡度，加宽路基，平整路面，并对原有桥涵予以整修或加固。历时五个月，于民国十一年（1922）二月完工，全长170公里。从此，“潼关路”属于驿道的历史宣告结束，陕西境内诞生了第一条公路——西潼公路。是年八月，西潼公路客货汽车开车运营，陕西汽车运输业由此发轫。但因当时路面为黄土、沙石，加之初成公路，路基低下，所以雨季泥泞难行，常遭冲毁之患。

民国十七年至十八年（1928—1929），冯玉祥率部驻防关中，军车往来不便，又令沿途各县及驻军征用民夫，对西潼公路西安—华阴县岳庙间的140公里，进行了较大整治，曾使路基宽到9米。后因年久失修，路基又多为民众垦种，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西潼公路又陷入凹凸狭窄的境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政府多次整修，西潼公路路基拓宽至12米左右，路况也有了极大改善。

造型奇特的“桥上桥”

西潼公路从西安发端，向东穿越原临潼县及渭南县后，便进入华县境内。华县境内有五条小河，自西向东依次为赤水河、遇仙河、石堤河、罗纹河、方山河（均为渭河的南山支流）。它们发源于秦岭北麓，沿阶地塬区和平原地帯向北缓缓而下，最后流入渭河——其中赤水河是原渭南县（今临渭区）与华县的分界线，方山河是华县与华阴市的分界线。西潼公路进入华县后，自西向东，拦腰横穿五条河及赤水镇、华县县城、柳枝镇进入华阴；之后穿过华阴后径直向东，直达鸡鸣三省的战略要塞潼关古城（位于现潼关港口镇，1958年已毁）。



在它和华县域内五条河流的交汇之处，每处皆有一座古桥。其中最奇特的，当数赤水“桥上桥”了。

赤水“桥上桥”位于赤水镇西端的赤水河上，是原渭南縣（今臨渭區）和華縣的分界橋——橋西屬渭南縣，橋東屬華縣。據史書《三續華州志》記載，赤水橋建于清順治十七年（1660），竣工于清康熙六年（1667）。到了160多年后的道光年間，由于“河身漸高，橋眼壅塞，水難暢流，以致堤岸屢決，淹沒良田無數。赤水南北，几成水乡泽国，居民苦之”。所以道光二年（1822），在原桥上又砌石增高，另造一桥，成今日“桥上桥”之势。其后百余年来，古桥下层埋于河沙之中，后人知之甚少。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地民众在河床挖沙取石，使河床降低，于是古桥下层逐渐露出水面——开始只是拱形桥孔的顶部，宛若倒扣在河面上的月牙，后来逐渐增多，直至全部露出，使“桥上桥”奇景再现。

今日看到的“桥上桥”，下桥已340余年，上桥也180余年，各有桥孔9个，号称“9孔18眼”。桥全长约70米，宽约5米，桥面铺着大石，凹凸不平。桥面南侧桥孔上方，雕有6尊龙头，北侧对应处有6尊龙尾（史载均为9尊）。



赤水“桥上桥”（2013年3月10日摄）

故乡的“官路”故乡的桥

古桥这奇特的造型，让人们叹为观止。古往今来，过桥的商旅行人、铁骑战车不计其数，如今都成过眼云烟，唯有古桥依然屹立，见证着三百多年来人事休咎与环境变迁的历史。1992年4月，省政府将此桥定为省级重点文物，在桥头立碑加以保护。2013年3月，国务院又将其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

古朴典雅的遇仙桥

从赤水桥往东，穿越赤水镇东行五六百米后，就到了遇仙河。遇仙河上也有一座古石桥，叫遇仙桥。

遇仙桥本是石拱桥，据史书记载，它建于明崇祯年间（1628—1644），在清雍正十三年（1735）、乾隆四十年（1775）、光绪二十一至二十四年（1895—1899）曾多次补修。遇仙桥全长27米，宽6米。鉴于古桥于1989年已经拆除，所以有关情况，只能从人们的记忆里去寻找。

我记忆里的遇仙桥，是三孔石拱桥。桥面中间高，两边低，上面横铺着石条；两侧是两尺多高的石护栏，上面刻着花鸟人兽图案，护栏间是高约二尺的石立柱。石立柱通体呈正四棱柱，顶端雕刻着狮、猴、虎等石兽，酷似渭北一带的拴马桩。石护栏两头雕刻着端坐的石人，每侧两尊，共四人。石人皆背靠石栏终端，分别面向东西，正襟危坐，神情肃穆，俨然是古桥的守护神。桥下有四个由石条砌成的桥墩，桥墩间是高高拱起的石拱。石拱共三个，中间的略大，两边的稍小。每个石拱南面（迎水面）的拱顶上方，镶有一尊石龙头。龙头朝南，似乎欲吮吸自上游而来的洪水。北面与之对应，镶有一尊石龙尾，龙尾向北，指示着下游入渭的方向。因古桥上石人、石兽、石鸟、石龙等雕刻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所以我们当地人便把这座古桥称之为“娃娃桥”。“娃娃”是我们这一带的方言，即“图画”的意思。

也许是出于对故乡桥的钟爱吧，我历来认定，赤水桥和遇仙桥是悠久绵长的潼关路上，造型最为奇特、结构最为完美的古桥，尽管我从未全程游历过这条驿道。



“官路”及古桥的历史作用

潼关路作为古驿道，历史上曾发挥过重大的作用。



昔日“官路”——今日之西潼公路旧道

夏启征伐有扈氏（位于今陕西鄠邑区），商与周、崇等国的联系，周武王伐纣灭商建立东周，往返皆经行此道（桃林塞）。西周建国后，周公东征，利用此道制服东方诸侯，此道后即成宗周镐京与成周王城（今河南洛阳市）间的驿传之路。

秦国通过函谷路与晋争霸，后来消灭了魏、韩、赵等国，建立了中央政权。

秦、西汉、隋、唐等在关中建都时期，潼关路是横穿中国东西腹地的轴心干道，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分。秦始皇五次东巡，三次经函谷路出行；修陵墓、阿房宫等，经函谷路“徒送七十余万人”。当时实行“强干弱枝”，经函谷路不断迁徙关东豪富至咸阳、长安。如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西汉初年，楚汉决战于关东，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为“军无见粮”的汉军，提供了有力的后勤支援，才得以战胜项羽。隋、唐建都长安时，需输运江淮财赋以供京师，潼关道水陆两途，成了隋唐王朝的经济生命线。特别是唐代，潼关路是上都长安—东都洛阳间的大驿路，“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交通地位居诸驿路之冠。唐僖宗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军由潼关攻入长安，潼关路上“甲骑如流，輜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

宋、元、明、清时期，潼关路为官马大道，是京都联结陕西、西北、西南以至西域的纽带，经历了金戈铁马、血雨腥风的锤炼。如北宋时期，与西夏的战争长达百余年，中原的军需物资经潼关转运至沿边各地。元代建都大都（今北京），由大都通达陕西以及甘肃、四川的驿路，皆经潼关路。明代与鞑靼军事政权的长



期对抗中，陕西居于军事前哨，潼关路成为中原向沿边输送兵员、粮秣之路。清代，西北西南不断发生动乱，康、雍、乾、嘉各朝，不断调兵遣将，经陕西前往四川、西藏、青海、新疆平定。咸丰以后，太平天国起义军几度入陕，清军忙于镇压，潼关路上的军事行动则更加频繁。为此沿途各府、厅、州、县，先后成立“帮差局”、“官车局”“公局”“官柜”“兵差义局”等，支应兵差，输运官物。

那时候，无论是达官贵显（包括皇帝及文武大臣），还是贩夫走卒，无论是骑马坐轿，还是徒步跋涉，从长安到中原、从中原到长安，都要经过这条驿道及桥上桥、遇仙桥。正因如此，昔时文臣武将、战车铁骑从“潼关路”蜂拥而过的故事，从来都是我村老人对孙辈津津乐道的重要话题。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于次日凌晨仓皇出逃，沿山西赴西安避难。他们一行浩浩荡荡，于八月十七到达太原，八月二十五经风陵渡过黄河到达潼关，然后沿潼关路穿过华阴县西行，八月二十九（1900年10月22日）进入华州。华州知州李嘉绩一行，到二华交界的柳枝镇迎接。当夜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下榻在临时行宫——州署（今县政府）大院，王公大臣下榻在临时行馆——文庙大院。次日（九月初一），两宫离开华州城，经由我村村南的“官路”、遇仙桥，于巳初时（9—10时）到达赤水镇。当时我村及附近村庄百姓，按华州知州要求，在“官路”两侧设香案、摆供果，头顶香盘，跪在路侧以示迎送（时称“支皇差”）。慈禧一行在赤水镇恒生泰商号（山西商人经办，2006年拆除）用过早餐后，即西行通过“桥上桥”去了渭南。当时华州知州李嘉绩和百姓跪在桥东送行，渭南知县张世英和百姓跪在桥西迎接。慈禧一行于九月初四（10月26日）到达西安，后下谕旨免去潼关—西安官路两侧五里以内的钱粮。

第二年七月二十五（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八月二十四（10月6日），慈禧一行沿原路“回銮”。行前搜刮白银70多万两，除御车外另备3000辆大车，满载搜刮的服装、绸缎、珍宝古玩及文书档案随行，并令陕西巡抚征派民夫修治西安以东路桥。路面皆用黄沙铺垫，仿照秦汉旧规，辟中央3丈6尺为“御道”，专供西太后和光绪帝銮驾通过；两旁各宽3丈，供百官、



卫队及行李车辆行走。沿途每隔三十里，设行宫以备驻蹕休息，设香案摆糖果以供随从官兵享用。八月二十七（10月9日），慈禧一行自西向东逶迤而来。前头是整齐的马队，顶盔贯甲，刀枪鲜明。后边是拉着贡品的3000辆大车，及黄伞为盖的32人大轿等。地方大员及百姓，头顶香盘跪在路侧“恭送圣返”。车队在仪仗队簇拥下，浩浩荡荡穿过“桥上桥”、赤水镇、遇仙桥，到达华州，行宫仍是州署。次日离开州城，经华阴、潼关东出陕西，经河南、河北返回北京。据《陕西民国战争史》记载，回銮耗资高达190余万两白银。耗费之巨，人劳鬼怨。

此后数十年间，我村及附近村庄，一直流传着慈禧太后是“大脚”的说法，令看惯了“小脚女人”的汉族百姓，倍感新奇。其实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满族妇女从不裹脚，而作为当朝太后的慈禧，则自然是大脚了。

路桥今日之现状

1959年，因修建三门峡水库引起渭河河床升高及泥沙淤积，严重威胁到西安及整个关中平原的安全，所以国家不得不于1959年12月—1961年5月，将西潼公路南迁（其中华县段南迁2.5公里），改建到现在的位置，成了新的西潼公路（即310国道）。西安—潼关间的那段旧道，则降级为县级公路。之后，西安—渭南境内的那段便遭废弃，有的成了土路，有的开垦为农田，已不见了当年的影踪。而华县赤水镇—潼关县港口镇间的这一段，却一直受到华县、华阴、潼关三县市的精心养护，其中华县境内的这一段，曾于2006年铺成了水泥路面。现在，这条历史悠久的古驿道，作为连接二华潼三县市的公路干线，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再说“桥上桥”的遭遇吧。“文革”武斗期间，渭南县城的一个造反派组织，为阻止华县一个造反派组织的进攻，于一日深夜把“桥上桥”西段炸开了一个大口子，从而使桥身断裂，行人车辆不能通过。“文革”后虽得以修复，但桥面凹凸不平，留下的低坑至今仍依稀可辨。1992年4月，“桥上桥”由省政府定为省级重点文物后，在桥头东曾立碑加以保护。但不久石碑即被车撞倒，只留下了一尊底座，连残碑也不见踪影，后来只得重立了石碑（比原碑小多了）。



故乡的“官路”故乡的桥

在桥东两侧，现各有一个水泥石墩，间距 3 米左右，仅可容摩托、小车通过，算是保护古桥的唯一措施。2016 年元月 6 日，CCTV-10《地理中国》栏目，曾以“赤水叠桥”为题，对赤水“桥上桥”作了全面介绍。

遇仙桥上一次重修是在 1989 年。当时县政府为解决桥面太窄、坡度太陡等问题，责成县交通局负责重修。工程总投资 11 万元，由蒲城县建筑公司承建。是年 10 月 2 日动工，12 月 5 日竣工，28 日剪彩通车。重修时彻底拆除了原来的古桥，将石人、石护栏、石龙头龙尾等全部废弃，建成了现在的样式。改建后的遇仙桥，全长 35 米，宽 9 米，比原石桥宽阔平直了许多，功效远远优于古桥，但古桥蕴藏的文化内涵，却全然没有了踪影。可惜具有 350 年历史的一座古桥，从此成了只有我们这代人印象里才有的记忆。随着我们的逝去，它将彻底地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故乡的“官路”故乡的桥，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遇仙桥（2016 年 7 月摄）



桥峪水库大坝

火热的工地 火红的青春

——参加华县桥峪水库工程建设的记忆

杜明科

我荣幸，我曾有两年的时间参加了华县桥峪水库工程建设。这里是我走向社会的人生第一步，它为我多彩的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0年的冬天，我17岁，被派去参加桥峪水库工程建设。桥峪水库离华州杜堡村子约有15公里，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我，拉上架子车就上了桥峪水库。

一到水库工地，老远就望见东山坡上用小石头刷白镶嵌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八个大字，雄伟壮观。各单位车子集中停放的车场、水库工程指挥部机关、

水库广播站、医务室，虽说房屋都简陋朴素，但却引人注目。到了晚班的时候，水库灯火通明，拉运土方的架子车川流不息。水库工地吸引了我。

那时，水库坝面已有 10 多米高。车辆三班倒，不停地运土到坝面，轰鸣的链轨拖拉机反复碾压着刚刚运上来的虚土。坝面一天天在增高。我和同村伙伴换朝是一个车组的，名为“明科车组”。当时，有三分之二的车组都是三个人，我和换朝商定，我们就两个人一个车组，这样可以节省人力。

在我们到水库之前，得知水库领导最感头疼的事就是，拉运土方中的安全问题。主要是有些年轻民工“放飞车”，一人驾辕，一人站立车后。驾辕者两脚腾空，煞是“潇洒”，但出了不少事故。轻者负伤住院，重者滚入深沟，要了性命。

对此，我跟换朝商量说：咱们就不要干那冒险的事了，要按领导说的不放飞车，要对得起水库，对得起父母。

那时，水库倡导“饱车行动”，就是把车子装满土拉运。但水库是登记拉运趟数的，谁也不愿多装土耽误时间。对此，我和换朝不约而同地商议，把车子一定装满再运。后来除装满一车箱后，我们还在装满土的基础上，再加上几十锨土，装出个“鱼脊梁”，使得“饱车行动”名符其实。土装的多，负重大，30 多度的大下坡很难控制，尤其是冬天路特别滑。为了安全，我和换朝每人肩扛一边的车辕，控制步速，稳步拉运。当时，人们看到这俩小伙装得饱，运得稳，



桥峪水库建设工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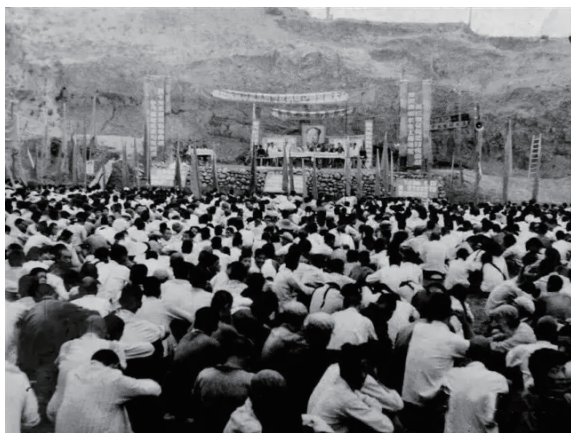
大家都投来赞许的目光。那时，别人普遍每个班次8个小时运10车，快一点的运十一二车。我和换朝早进工地，并坚持到每班的最后一分钟。我们时常的拉运趟数都在13趟（车）。这一来，水库很快就把我们评为“饱装稳运车组”。

我记得，首先是水库广播站让我们介绍经验体会，标题是：“我们是怎样做到饱装稳运的。”水库宣传员李翠丽、王华还把我们车组的情况，编成快板节目，在工地广播站广播宣传。1971年6月份，水库政治处组织我们到十几个民工营驻地介绍经验。

那时，我和换朝都向华州营团支部提交了入团申请书，很快，营长、副营长两名老党员，介绍我成为光荣的共青团员。当年12月，华县召开共青团第七届表大会，我又作为水库选出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团代会。1971年合并连队后，华州营还选我担任了三个生产大队合编的民工连连长。

桥峪水库不仅是水库建设工地，那里更是培育人的阵地，这是我最大的感受。水库早期体现的精神，就是“吃苦耐劳，乐于奉献”。后来这种精神被进一步归纳为“自强不息，奋发向上，团结协作，无私奉献”。我们车组之所以能成为先进车组，就是“桥峪精神”的启迪和鼓舞。

从家乡走出来，桥峪水库是我人生的第一站。水库大坝随着我们拉运的土方在升高，“水库精神”也为我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记得参加水库建设两



桥峪水库竣工典礼

火热的工地 火红的青春

年后的1972年12月份，我应征参军。1973年水库竣工庆典时，我二哥代我参加了庆典大会，领回了县委发给我的奖状。

火热的水库工地，火红的人生青春。我感谢“桥峪水库精神”对我人生的影响，感谢水库对我的培育。2017年，我作为当年的水库建设者，约几个伙伴前去参观了我曾为之建设的桥峪水库。桥峪水库与我今生有缘！

作者简介

杜明科，生于1953年，曾任新疆邮政公司工会副主席（正厅级）。



瓜坡，那曾经的古瓜田之地

雷凤侠

“瓜坡，荣以众泉，古瓜田之地也。”当明《华州志》卷二上这些字眼跃入我的眼帘时，“亲切、惊喜、豁然”瞬间一咕噜儿涌进我心田。

多年来，每每在读书看报或是聊天时，碰触到有关“瓜坡”的东西，我的每一根神经便会刹那绷紧，一定是要多看几眼，或是要多听几句，这大概就是家乡对于一个游子无穷无尽的吸引力和魅力所在吧！



瓜田之地

我的家乡瓜坡三留村位于华州区西南。记忆中我们那儿坡地很多，南面高处有许多村庄都以“坡”命名，如“后坡（现称井沟）、宰相坡、故城坡”等。而我们三留村就在坡底下。

何以称之为“瓜坡”？关于它的来由，从小到大，倒也听过一些传说：很久以前，此地一位农夫刘全，善于种瓜，瓜园连片，瓜果满地，他将南瓜带到阴曹地府，将东、西、南瓜留在阳世……民谣曰：“刘全巧种瓜满坡，阳世总比阴间多。东、西、南瓜在阳世，留得南瓜敬阎罗。”瓜坡之名，由此而得。而今，当“瓜坡，荣以众泉，古瓜田之地也”这些字眼出现在志书上时，内心那种“亲切、喜悦、豁然”以及瓜坡之名终于得以准确佐证，那种兴奋之情真是无以言说。透过这些灵性、跃动的文字，三十年前的景象在我眼前蓦地浮现开来……



瓜坡，那曾经的古瓜田之地

瓦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一块稍大一些的田地，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分散地蹲着几个身穿白褂子、头戴草帽的瓜农，正在精心地修剪着瓜藤上的狂枝，察看或是翻转着他们的瓜果儿。瓜田里搭建了三两个简易的瓜庵子，庵子下都有一张小竹床，还有几个十二三岁的看瓜少年。

这便是我家和村里另外两户人家里的瓜田。每到暑假，西瓜也日渐成熟，“去地里看瓜”自然就成了我们这些孩子们的主要任务。在瓜田看瓜，是漫长而无聊的轻松活，可是如果能有几本有趣的书籍或是几个能合得来的伙伴陪伴，那就会变得十分快乐有趣。玩牌、抓石子、拍四角包子……时间在嬉笑声中飞一样地流逝。

爷爷和几位伯伯都是务瓜能手，我们种的西瓜总是既大又甜。犹记得，那时候种西瓜是很麻烦的农活：育苗、耕地、打垅砌畦、栽苗、浇水、施肥一个环节都不能少，那时的西瓜分别是用农家畜肥和油渣做的底肥和追肥，每株碧绿的藤蔓上都会长着几个又大又圆的西瓜，熟透了的西瓜瓤红、沙甜、汁旺，很是解渴。

我们那里的西瓜是不愁卖的。因为附近有一个近四千人的大厂子——陕西省化肥厂。每到夏天瓜果成熟季，在厂区的家属楼南面十字路口处，就会聚集一些商贩，卖着各色水果小吃，犹以西瓜最多、最艳、卖的最好。清楚地记得那时西瓜大多是卖“豁”的，一豁一毛钱。现在想来大概是那时物质还较匮乏，不够富裕的缘故吧。

时至今日，那时的卖瓜场景还能清晰地在我眼前再现：在那个人流量最多的十字路口处，一排排卖瓜人，各自身后地上都是一堆西瓜，身前摆放着一张小桌子，几个小凳子，桌旁是一桶清水，桌子上是一把长长的瓜刀。路人经过此地，暑渴难耐，眼睛稍微一望，来到一卖瓜处，围桌一坐，这时，只见卖瓜人一脸笑容，即刻从身后瓜堆中挑出一个又大又圆又保甜的西瓜，拿抹布在水桶里一摆一拧，熟练地将瓜擦净，拿起瓜刀，刀刃刚接触瓜皮，“噌”，红瓤绿皮，沙沙甜甜，水汪汪、“门扇大的豁豁”就展现在食客眼前了。食客一人端起一豁，低着头“吸溜吧唧”地吃起来，满嘴汁液滴答流落，吃罢，嘴一擦，



脸上露出满意的表情，钱一付，起身走了。小桌四周地上露出一粒粒黑黝黝的瓜子来，卖瓜人拿起笤帚娴熟地将其扫到一旁。

那时候，人们经济收入来源很少，瓜田收入可以为家里补贴好多家用，我记得，那时一亩地能卖好几百块钱。有了这些钱，我们兄弟姐妹上学报名，买书包及学习用具就有了指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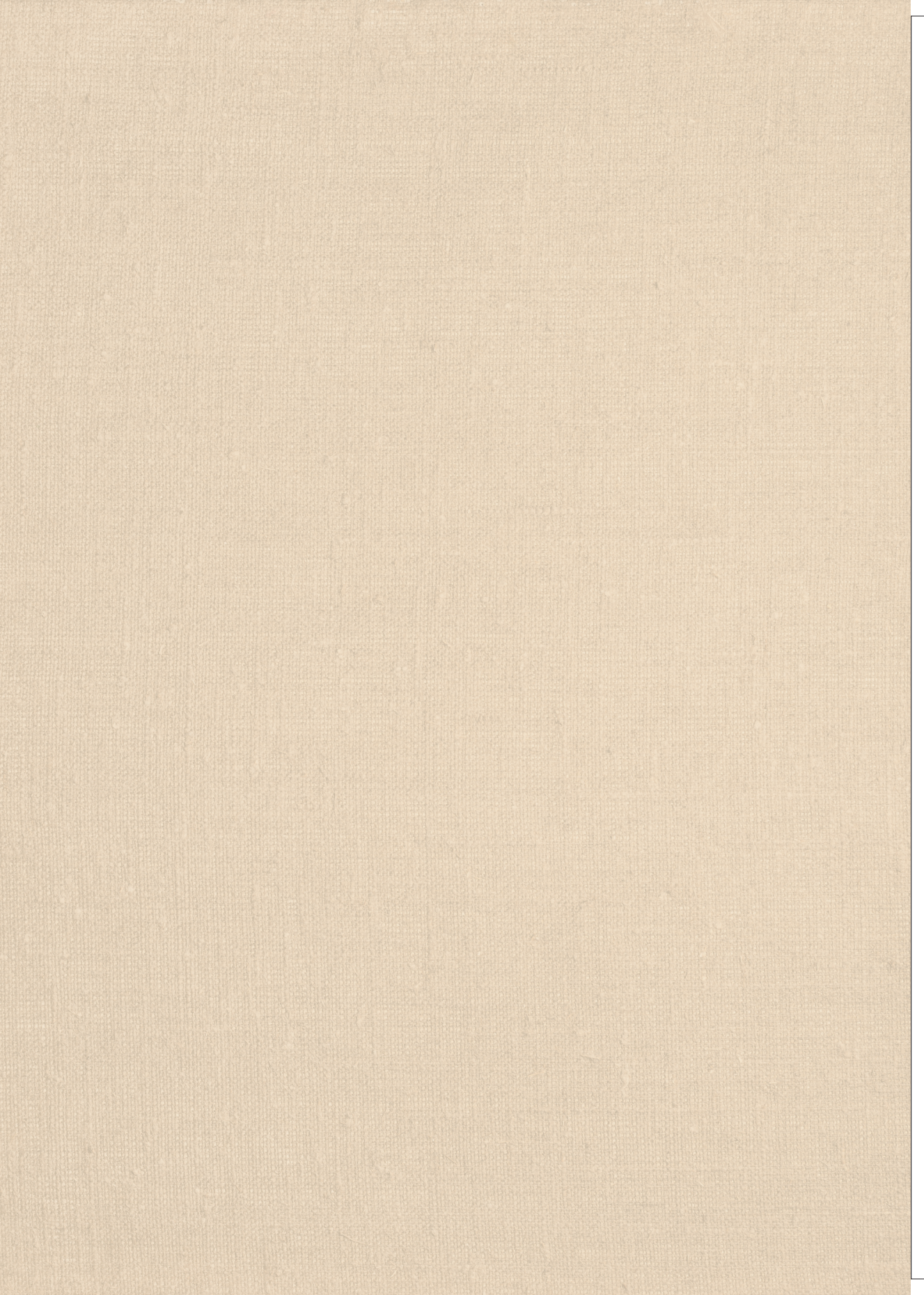
瓜坡，那曾经的古瓜田地，我魂牵梦绕的故乡，它承载了我儿时的难忘岁月，那一片碧绿的瓜田，那红艳艳的瓢，那透心凉的甜，那瓜庵下的欢声笑语，永远地封存在我孩提时的记忆里，如今，不惑之年的我，再次想起，依然如此清晰，热血腾然。





民间艺术





古老的民间艺术——华州皮影戏

贾平京

华州（华县）皮影戏以其古老、精粹、成熟、完美、经典享誉世界，被誉为“中华戏曲之父”和“世界电影始祖”。以其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完整的艺术体系，于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8年10月，华县（华州区）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为“民间文化（皮影）艺术之乡”荣誉称号。如此妥贴响亮的声誉，载着中华民族复兴、文明进步的足迹。

一、华州（华县）皮影戏的历史渊源

在华州（华县）区民间艺人中，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诗：“汉妃抱子窗前耍，巧剪桐叶照窗纱。文帝治国安天下，制乐传入百姓家。”

另据《汉书·外戚传》记载：“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

以上所言李夫人之事在《搜神记》《论衡·自然篇》《汉书·郊祀志》等典籍中多有记载。

《事物纪原》卷九也记载曰：“故老相承，言影戏之原，出于汉武帝李夫人之亡，齐人少翁言能致其魂，上念李夫人不已，乃使致之。少翁夜为方帷，张灯烛，帝坐他帐，自帐中望之，仿佛夫人像也，盖不得就视之。由是世间有影戏，历代无所见。”

由此可见，在汉代，由“弄影术”衍生演变而出现的借影还魂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构成了皮影戏起源的最初之说。

据有关史料记载：中唐时期，科白类戏空前发展，歌舞类戏编制进步，历



史戏具体形成，傀儡戏等杂技并作，民间更盛……傀儡戏（木偶、皮影戏）皆摹仿“弄影术”而作，并衍生为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其共同的一点就是配以说、唱、音乐，形成了民间新型的综合艺术。

据《中国影戏史略及现状》记载：“中国影戏之发源地为陕西，自秦汉至隋唐当皆以其最盛。”《影戏——故都百戏考（之四）》云：“按此戏当然始于陕西，因西安建都数百年，玄宗又极爱提倡美术，各种技艺，由陕西兴起者甚多，则影戏始于此，亦在意中。”又云：“汴京之影戏即由长安流传而来，言颇近理，因二地不但距离不为甚远，交通尽有频繁可能，更以其为帝都所在，凡百技莫不趋之，都城既由西安而汴京，影戏当随之而去……”



皮影表演

《中国影戏》著述：“中国影戏从陕西发源，首先沿黄河流域传播。……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破开封，二年四月，金人俘钦徽二帝和后妃、皇子、皇女以及宗室贵戚等三千多人北去，其中包括‘弄影戏’等

倡优技艺 150 余家，影戏随金兵北传。”其时，宋王朝变迁，高宗南下偏安，影戏随难民南渡，拓出黄河流域，首先入临安（杭州），继而播植于湘、鄂、粤、皖、浙、赣等南方各地。据考证：川北皮影，四川人称“陕灯影”“川北渭南影子”，流传至今。古之渭南，泛指骊山到潼关渭河以南一带的广大地区，时为华州所辖之地也。民间传颂着“贵妃啖荔枝，伶奏碗碗以增味，击碗拨弦者，皆自华州”。

《燕京岁时记》载：“陕西皮影戏历史悠久，关中则是中国影戏的发源地。近代陕西皮影戏流派极多，粗略言之，东路有碗碗腔皮影，南路有道情皮影，西路有弦板腔皮影，北路有阿宫腔皮影。尤以碗碗腔中的老腔皮影最为古朴。”《重修华县县志稿》记载“清末民初演唱者二三十家，民间极盛时多至四十八家”，据说：著名的班社有“吉庆班”“景隆班”“祥盛班”“德胜班”“仁义班”等，皮影戏艺人近二百。1914年，杨松轩、白瑞生、顾熠山等人创建了“强聒社”

宣传民主革命思想。

从以史料与口传不难看出：中国皮影戏源头在陕西，陕西当在华州，由此向中原及南北传播，今华州区乃是古华州的州治所在地，华州区是中国皮影戏的总源头应是不争的事实。

二、独具魅力的华州（华县）皮影戏演出

近代画家、民俗专家冯若飞先生在《绿鹦鹉轩随笔》记载：“秦中旧有影戏一种，或称灯影……舞者两手可持若干傀儡，生旦净丑，悉自动作，徐徐进退，俯仰如神。至于仪仗景物，亦甚自然。”生动描述了陕西古老皮影戏演出的幕后场景。

华州（华县）皮影戏为其代表作，表演由五个人组成，五人依次担当着“前声”“签手”“上档”“下档”“后槽”五个职位，“前声”负责剧中生、旦、净、丑各角色的演唱、道白、口技，兼司月琴、堂鼓、手锣、尖鼓、二梁子和帮签之责；“签手”负责操作影人的动作及道具的安插，兼接应“前声”的对白与帮腔、负责舞台灯光设备安装与灯光特效的操作；“下档”司板胡、长号，唢呐，兼司帮签、搭配安装影人、应合“前声”对白与帮腔；上档”司二弦、唢呐、大镲子、长号，兼帮签、应答“前声”对白、帮腔；“后槽”司大锣、小镲子、战锣、梆子、铜碗、大镲子，兼应合“前声”对白、帮腔。一场皮影戏演出，五人各司其职，忙而不乱，井井有条，配合默契，“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舞动百万兵”是对其最为生动形象的表述。

华州（华县）皮影戏班社演出剧目众多，清代李芳桂的《十大本》是基本剧目，清末至民国时期，多数班社都能演出200个左右的剧目，唱腔以碗碗腔为主，兼有眉胡（又名曲子），一般情况下本戏唱碗碗腔，后面加演的折子戏用眉



皮影演出



胡调。本子戏代表性剧目有《金碗钗》《火焰驹》《十王庙》《劈山救母》《万福莲》等。折子戏的代表性剧目有《秃子尿床》《张良卖布》《卖杂货》等。

三、精湛的华州（华县）皮影雕刻艺术

华州（华县）皮影戏的精彩演出，离不开幕帐上影子原形，精湛的手工雕刻技艺，使原形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展现在观众眼前。



皮影雕刻（张华州）

华州（华县）皮影雕刻技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汉代画像石、民间剪纸、唐宋寺院壁画等元素，在不断满足皮影戏表演和观众审美需要的同时，逐步形成了地域特色鲜明的造型风格。

华州（华县）皮影制作，注重雕、绘并重手法，一个皮影作品的完成，要经过设计、选皮、过稿、镂刻、敷彩、发汗熨平、缀结、合成等多道工序。作品以人物为主，兼有景物、道具等，影人造型，高不过尺，形体小巧玲珑，夸张巧妙，大部分是以侧面单目为主，不同的人物使用不同的刀法，“推皮运刀”是最基本的刀法。



皮影雕刻（薛宏权）

“公忠者雕以正貌，奸佞者刻

以丑形”，人物性格特点多体现在五官上，如：平眉表现文人雅士的清秀文静；立眉突现武生将帅的英武强悍；方脸、大耳、宽肩、圆腰表现男性正面角色的阳刚之美；“弯弯眉、线线眼、樱桃小口一点点，及细腰小脚”表现旦角女性

的妩媚阴柔；实脸、圆嘴则呈现出丑角的诙谐和幽默。人物的颈、肩、腰、膝、肘等处有轮盘牵线连结，实现表演动作自如的需要。影人的服饰图案，大轮廓常布以梅、兰、竹、菊图案，局部嵌以“十字、雪花、鱼鳞、星眼、松针等图案。帝王的皇冠龙服，高官的乌纱蟒袍，后妃的凤冠霞帔，宫娥的彩袖垂裙，大家闺秀的雍华娇贵，小家碧玉的弓鞋翠簪，平民百姓的布衣麻衫，纨绔子弟的绫罗彩缎……活灵活现的体现，无不折射出中国古代人的审美情趣。在艺术家的刀笔下，一个个人物形象犹如生活中的我你他，真可谓“一张牛皮居然喜怒哀乐，半边人脸收尽忠奸贤恶”。

华州（华县）皮影雕刻技艺伴随华州（华县）皮影戏走过风雨沧桑，以其悠久的历史、精湛的技艺，以及在当今所面临的困境，在2007年3月，被列入陕西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代表作名录。

四、华州（华县）皮影戏的传承保护与产业开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州（华县）皮影如日中天，1952年和1955年两次进京演出，得到国家文化艺术部门的嘉奖。“文革”期间，华州（华县）皮影戏应时而变，演出了现代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白毛女》等剧目，使古老的皮影戏得以延续和传承。改革开放以后，华州（华县）皮影戏再次迎来鼎盛时期，1988年1月，华州（华县）皮影剧团再次赴北京演出，以强大的艺术魅力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之后应邀赴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多达七十余场次。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电影、电视、互联网上网服务业方兴未艾，人们的生活习俗日渐变化，乡村民俗活动日渐没落，中青年人群生活工作不断加快，面对慢条斯理的皮影戏演出，他们不再是台下的坐客，更无年轻人拜师学艺，与之而来的是皮影戏演出市场日趋萎缩，演出机会越来越少，之后华州（华县）皮影的形势会随着老一辈艺人年纪的增长丧失演出能力和相继离世，向着濒临消失的境地靠近，后继无人的状况令人堪忧。

2004年以来，华县（华州区）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皮影戏的传承保护与产业开发工作，县政府先后下发了《关于加强优秀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工作的通知》



《华县皮影戏传承保护与产业开发工作十年规划》，将华县（华州）皮影戏作为对外宣传的四张名片之一，并写进了《华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县财政每年列支 10 万元专款用于《规划》和《计划》实施的引导资金。县财政还每年列资 6.4 万元，从 2007 年 10 月起，对德艺双馨的老艺人按月发放生活补助。县文化体育局制订了《培养皮影戏曲传承人奖励办法》，并联合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了《华县皮影雕刻产品质量检验标准》。在政府强有力的推动和引导下，华县（华州）皮影传承保护与产业开发的氛围初步形成，个体、股份制企业、农户等广泛参与，快速形成了万人参与皮影传承保护与产业开发的队伍。2005 年 1 月，陕西省文化厅授予华县为“陕西省民间艺术（皮影）之乡”称号；同年七月授予华县皮影产业为“全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称号；2006 年 5 月，华县皮影戏被国务院列入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8 年 9 月，华县皮影产业群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称号。各级政府的重视、关注与支持，使华州（华县）皮影这张名片更加响亮，几乎成为华州区（华县）的代名词。尽管如此，华州（华县）皮影戏的传承保护效果仍不乐观，虽然仅有的几个班社被周围大的景区聘作商演，年迈的老艺人每月获得 2000—3000 元报酬，但依然没有改变后继乏人的现状。

出人意料的是皮影雕刻已不再局限于为演出提供道具，进而扩大为艺术欣赏作品，市场前景看好，从而引领了一批年轻人加入皮影艺术品雕刻行业，据 2017 年官方统计，全区从事皮影戏艺术品雕刻、营销的多达 3000 余人，有关公司、展馆，销售门店 11 家，年产值过亿元。

华州（华县）皮影戏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历经风雨沧桑两千多年，映射出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伟大历程，被有识之士视为“国宝”“活化石”。今天我们站在新时代的起点，如何让它后继有人、人才辈出，由古老走向时尚，由国内走向国外。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

作者简介

贾平京，生于 1960 年，曾任华县文化体育局局长，现任华州区民间艺术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面花



面花花的世界

张潇娟

春节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节日，家家团聚，祥瑞盈门。一年的辛劳在这一刻释然，新的生活在这一刻被希望构想。春节，最重要的节日，祭祖拜年，走亲访友的礼馍更是不可或缺的。爆竹声声辞旧岁，欢欢喜喜迎新年，面花在这个隆重的节日呈现出她最为精彩的魅力。

过了小年，人们就开始忙碌准备了，面粉是精选的二道上好白面，在蒸的前一天开始发酵，面粉的多少，温度的高低都要依靠长期积累的经验，第二天开始和面，面一定要硬，这样才可以塑型，吃的时候也会有筋道的口感，至于

捏馍造型那就是民间艺术家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再经过泛、搭、蒸、凉、染、组装，鲜活的面花就形成了——憨态可掬的牛，威武的老虎，机灵的刺猬，摆尾游弋的鲤鱼，等等。或稚拙、或灵巧、或华丽的形象比现实生活中的原型更加让人喜欢，这些鲜活的形象分明是面花巧手心中善良世界的再现。诸般造型有着丰富而浪漫的想象，奇妙而夸张的制作技巧，把人们的目光与灵魂全部牢牢地抓住，引入到一个亦真亦幻绝妙纷呈的有着浓厚乡土气息的艺术时空。

乡村腊月三十的晚上要祭拜祖先，通常是拿几个好菜和几个白馍献在供案上。大年初一早上要在供案上摆放神府花花馍，即带有底座的十盘枣山花花馍，同时取供馍供奉各路神灵。乡间的白面花馍是最有敬意的礼品，是农人用最诚实的劳动和最真诚的心灵造就的，怎能不感动天地再赐祥瑞？初二走亲戚，女儿回娘家，外甥看娘舅，花馍也是包袱提篮里最重要的礼物，花馍品类多为造型朴素的馄饨、包子、枣糕等。

当日回礼的花馍通常为一个枣山花花，新婚的夫妻，娘家的母亲和亲友需备一双十盘花花送女儿女婿。外婆要给外孙蒸十盘花花，每年一个，直至孩子成人。十里风俗九不同，也有送孩子十二生肖的，也有送鱼馍的。单是鱼型花馍，民间的高手们各有各的造型各有各的讲究，其甚至截然不同。

正月初五追节的时候，花馍的形状愈发多样，花哨小巧而活泼娇憨。正月初五过后，该给外孙送灯笼了，各式花灯上挂着造型各异的坠灯鱼。正月十五也需要有礼馍献祭神灵，花馍当日食用一部分，然后用红毛线将剩下的和过年时的枣山花花拴起挂在通风的地方，到农历二月二才吃，此风俗叫叫“咬干”或“咬虫”。

陕西华县面花在四时八节、人生礼仪，敬神祭仙等民俗生活中都被广泛应用，面花成为“礼仪”的使者。这一地区尤以虎图腾盛行，比如婚礼当中造型夸张威武的谷卷——两尺见方，十几斤或几十斤重的大型面花，由虎头、龙身、鱼尾以及遍身插满的各种动物与花朵组装而成，视觉上甚为震撼。

谷卷是男女结婚时，婚后有了孩子“满月”时，孩子十二岁当年春节“完灯”时，外婆、舅舅和近亲阿姨的馈赠，有的人家姻亲众多，在婚庆当天收上十几



个大谷卷也不足为奇。谷卷花馍展示在礼台上，喜气洋洋自不必说，更是各路巧手奇斗艳的大好场所。老虎花馍还有仅有寸余的小老虎，也有以蹲、跑指示性别的清明老虎，各种虎形花馍无不憨态可掬，据说吃了可以强身体，走路如风，不生百病。

关于华县面花造型和其中的风俗讲究丰富多彩——有的是期盼丰收，有的是祈祷健康，有的是祝愿平安，有的是渴望多子多福，有的是盼望长寿……

女娲抟土造人，也创造了人类从降生到死亡的悲欢离合。与之相呼应的关中女人在贫瘠的物质生活中，用水与面的交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吉祥的祝愿与祈盼以应对人世间的悲苦，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意愿，在手指间翻涌而出，似鱼非鱼，似虎非虎，似鸟非鸟……那是什么？是中华民族的女儿的善良、淳朴、真诚之心幻化而成的精灵，那就是——面花。

作者简介

张潇娟，女，出生于1978年，西安美术学院公共艺术系教师。



清丽曼妙的华州秧歌

黄 玮

千百年来，古华州传承下来的民间艺术浩如烟海，而清丽曼妙、独具特色的稀有剧种秧歌戏就是其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2007年5月，它被列入陕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华州秧歌

表演以及行云流水的唱腔令人回味无穷。

华州秧歌全称为华州秧歌戏，又称布衣戏，以华县赤水镇的蒋家村、郭村、南北会同坊村和高塘镇江村的秧歌最为有名。赤水河沿岸地区自古以来水源丰富，盛产水稻及小麦等农作物，是华州秧歌戏的发源地。据《华县志》记载：“秧歌”相传是古代劳动人民在插秧时，为了消除疲劳，唱出的一些民歌小调，以后便称之为秧歌。它是先民在田间地头休息时的吟唱，后来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和演变，成为农闲或节庆时群众自娱自乐的一种表演形式。

华州秧歌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究竟是什么时间起源的，现在还没有定论。在华县文体局，有相关资料记载：它起源于汉代的“雉舞”，由宋代“村

提到秧歌，映入脑海里的是众多人腰系鲜艳的红绸，跳着欢快舞步的画面，然而看过华州秧歌的影像资料以后，才发现二者大相径庭。华州秧歌全然不似秧歌舞那般激越热烈，它是清丽淡雅的、轻轻吟唱的民间小戏，那朴实无华的



田乐”演化而来，兴盛于清道光、光绪年间。关于华州秧歌的名称，最初并没有确切的叫法。1957年，省艺术馆派人到渭南、华县对秧歌戏挖掘整理时，将其定名为“渭南秧歌”。从历史角度来讲，此秧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渭南、华县皆为古华州所在地，其名称命名为“华州秧歌”更为确切，《华县志》中就称之为“华州秧歌”。

据资料介绍，华州秧歌当初并没有十分完整的剧本，多是艺人们即兴式的创作，口传心授，仅供娱乐而已。后来，经过艺人们不断丰富完善，才形成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如《卖杂货》《办年货》《打补丁》《夫妻观灯》《偷荷包》《钉缸》《小喜接妹》《石榴娃烧火》等40多个秧歌剧目，以反映农村生产生活为主，也有历史故事、民间故事和爱情故事等，充满了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教育的情节与内容。

据介绍：过去华州秧歌的乐器比较简单，只有锣鼓、大镲等“武乐”而没有胡琴等“文乐”，敲敲唱唱，唱唱敲敲，所以在艺人中就流传着这样的口歌：“敲得快、跑得快，不敲不跑唱起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慢慢增加了弦乐器。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秧歌的痴迷，或许更是因了它简单易行的这个特点吧，农闲之际，大家找一块空旷的地方，聚集在一起，既当观众又当演员，一面鼓镲响起来，一块手帕旋起来，说着笑着，唱着跳着，全身的疲惫顿时消融在诙谐幽默的小戏里……

一生一旦或者一丑一旦两三个人，不需要华美的舞台，不需要艳丽的服饰，不需要复杂道具，甚至不需要浓墨重彩地装扮，只要心中有表达的渴望，不管是田间地头，还是在巷道场院，或是上舞台广场，都可以随时随地尽情唱起来跳起来，这就是华州秧歌的独特艺术魅力。华州秧歌不似秦腔和京剧那样有着固定的板腔式结构，它都是小调式的民间戏。在表演形式上和“东北二人转”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被称为“关中的二人转”。它融民歌、说唱、舞蹈为一体，以喜剧见长，载歌载舞。它在最常运用的欢快、活泼的“6”调式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了眉户、碗碗腔、商洛花鼓等剧种的旋律，形成了自己丰富的曲调模式，约有四五十个。曲调欢快流畅，委婉悠扬，悦耳动听；语言质朴自然，琅琅上口，



地方特色浓郁；舞步率性随意，洒脱自由，灵巧妩媚，体现出了浓浓的幽默风趣、生动活泼的戏剧风格，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因为华州秧歌是劳动者自己创造的艺术，所以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深深地植根于广大百姓的心里，千百年来生生不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当地就流行有“铁里的芯子，闫家的跷，街里的秧歌水上漂”的民谣，足以见得当时华州秧歌风行的盛况；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更是盛行一时，多次参加了省市文艺表演，以其多彩风趣的内容、浓郁的乡土气息及强烈的艺术魅力，获得了广泛赞誉。经过“文革”时期的短暂停顿后，华州秧歌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又焕发出勃勃生机。1975 年曾参加了全省的群众业余音乐、舞蹈会演；1982 年在“渭南地区民间文学普查”汇报会上，《卖杂货》《办年货》《石榴娃烧火》《小喜接妹》等剧目，受到了省、市领导和各地代表的热烈欢迎，与会专家给予华州秧歌戏高度评价和赞扬。省、市电视台对其进行了录音、录像。省、市许多刊物对其剧目、剧本进行了发表。但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文化艺术的多元性，华州秧歌戏渐渐失去了往昔的繁荣与活力。剧目的创作和演出市场逐年处于滑坡状态，演出人才匮乏，剧本创新停滞不前，使得华州秧歌戏处于濒临灭绝的情况。

新世纪的阳光和雨露，滋润得华州秧歌这朵民间艺术的奇葩枯木逢春，花艳香浓。2004 年以来，华县政府普查、调研、挖掘、整理华州秧歌戏资料，支持省民间文学艺术家、剧作家、华县文化馆退休干部史玉中搜集、挖掘、整理华州秧歌戏小戏，印刷出版《渭华秧歌》一书。华县文体局聘请西安音乐学院有关专家，对华州秧歌戏进行考察、论证，挖掘其价值，并抢救性地排演了华州秧歌戏中的 30 多个经典小戏。2006 年至 2007 年他们又组织专人对华州秧歌戏再次进行普查、搜集、整理，形成了文字、音像资料；对艺人进行了录音、录像，建立了华州秧歌戏艺术档案。目前，他们正积极将华州秧歌申报为省级、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华州秧歌也在师徒传承的同时，逐渐走上专业团体演出的程式。目前，越来越多的演员们积极投身于华州秧歌戏演出活动，排演经典小戏三四十个。



清丽曼妙的华州秧歌

观赏罢华州秧歌影像资料，顿觉心旷神怡，如食甘饴。那清丽曼妙的音韵久久萦绕在耳际，激荡在心田。祈愿华州秧歌这棵植根于百姓心中的艺术大树枝繁叶茂，永葆青春！

作者简介

黄玮，女，出生于1968年，渭南日报《话说渭南》栏目主持人。



华州背花鼓

黄 玮

早对华州背花鼓有所耳闻，但一直无缘相识。日前一个偶然的机，当笔者第一次与被列入省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华州背花鼓亲密接触时，便被它奇特的装束和粗犷雄壮的气势所吸引、所震撼。于是，笔者赶赴华州区下庙镇康甘村，寻访这一民间艺术瑰宝的渊源。

华县，西周时为郑国地，汉、唐时属京兆管辖，其后一直为州府之地，俗称“古华州”。华州背花鼓流行于华州北部下庙镇的东甘、西甘、康甘村一带。因当地方言称“跳”为“biē”，故该舞在华州群众中又称为“蹩鼓子”。

华州背花鼓历史悠久。康甘村村民张治敌、康长青告诉笔者，这一民间艺术形式起源于原始社会，那时先民们用石块、木棒，或投掷猎取动物，或击打发出响声进行自卫。从汉代开始，它以舞蹈的形式流传至今。

据《华县志·社会礼俗奢华篇》记载：“演大戏酬神，为千百年所留遗，遂成社会习俗者，莫如治城北下庙镇，三月八日、八月八日有西岳庙会。商货存集，演大戏数日。事先向华山取水。届期，社众迎接，锣鼓喧嚣，历年传为盛事。”

华山西岳庙，古称上庙，为历代帝王或帝王所派大臣（使者）祭祀的专用场所。为满足普通百姓拜神祭祀的需要，东汉时期，当地群众在华州北部集资修建了规模较小的西岳庙（西岳大帝行宫），民间俗称下庙，进行以祀社为中心的祈天求雨，迎神取水活动。

康甘村背花鼓第三代传承人、年逾八旬的康银娃及第四代传承人康振代告诉记者：他们年轻时听村上的老辈人说，每年农历三月初二，下庙都要举行盛大庙会。会期延续六七天，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先由主事村社的会长，



华州背花鼓

带领三人到华山西峰下的玉井取“神水”。取水时一个背着竹篓，篓内装着香表，手提马锣开道，其他两人手持白瓷小水瓶随行。至华山脚下玉泉院的庙内，会长率取水者烧香敬神后，将瓷瓶装满泉水，再将两个瓷瓶系在用鲜松枝搭成的三角形支架上，轮换背着回来。取水者到达华县城东十里处的罗纹河，众村社群众就鸣放鞭炮，敲锣击鼓，夹道欢迎，并组织“抬神楼”和八名拜水童子开道，其他社火依次相随在取水者身后。此时，背花鼓成两路纵队跟随社火舞队边走边敲。迎水队伍进村后，将盛泉水的两个瓷瓶安放在庙中大殿的神像前，就开始在庙前广场上唱社戏、耍社火，背花鼓也在庙前广场表演。嗣后，庙会即开始进行物资交流、商品交易。千百年来，已成为当地的民俗社规。背花鼓的表演历来和这里的传统迎神取水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才使这一古老的民间鼓舞形式在历史的繁衍生息中，得以世代相传，流传至今。



背花鼓

据介绍，背花鼓是一种民间祭祀性群舞，表演者均为背花挎鼓的青年男性。通常由30人组成。分两队排列成纵列，每队12人，共24人；领舞和配属角色共6人，分执大小铜锣，其中执小锣领舞者两人，

执大锣者两人，执大锣配音者两人。主要表演者服饰沿袭了东汉末年“黄巾起义”黄巾军的服装形式，背部扎着高2—2.5米的巨型扇面五彩舞饰，分五层装饰彩色纸花，顶层称顶花，稍大；下四层称杆花，稍小。用红、黄、紫、橙、蓝五色交替配置，背花中部置一面镜子，起避邪、镇妖作用，在镜子上方平扎红绸花一朵，象征丰收喜庆的愿望。挎鼓于腹前，双手持形若新石器时代石槌的鼓槌，击鼓而舞。舞姿粗犷原始，舞步多以跳为主要特征。背花随着舞者的跳动和舞姿的变化，如孔雀开屏，似旌旗飘荡。配以鼓声、锣声和演员节奏强烈、粗犷豪放的“啊唔！啊唔！”呼啸声，声威雄壮，有排山倒海之势，现场气氛庄严而狂热。



康银娃、康振代介绍说：背花鼓的鼓槌从它的形状与执拿方法上，都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原始特征：一是形状粗而短，很像新石器时代的石槌。二是执拿与击打法非常独特，颇似先民们围猎击兽、搏击对阵的动作。执大锣者不像一般的敲锣那样手提铜锣直接持槌敲击，而是锣面向外，反手由外向内击打，称为“勾锣”。

背花鼓的舞步非常奇特，两足相背，很像当今的八字步或马步，若要行进两腿必然要弯曲。行走时两脚不相越过，即一只脚不能越过另一只脚；同时还有跳步和跛子步。执大锣者在敲“勾锣”表演时，前后抬脚，弯腰点进，两脚也不相越过，原地挪动，恰似跛子步。挎鼓者的三个基本步法即马步、横跳侧弓拉腿，侧弓拧转，既有大八字脚弓步的因素，又有蹦跳的特征，而且两脚均不相互跨越。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背花鼓随着崇神祈雨活动的消亡而衰落。但是它作为传统节日、庆典活动时的一项民间艺术活动流传了下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康甘籍的甘一飞曾邀请康甘村的背花锣鼓队 20 多名演员，专程赴西安在戏曲研究院进行观摩演出，7 天时间共演出了 14 场，场场爆满，赢得了专家学者和文艺研究人员的盛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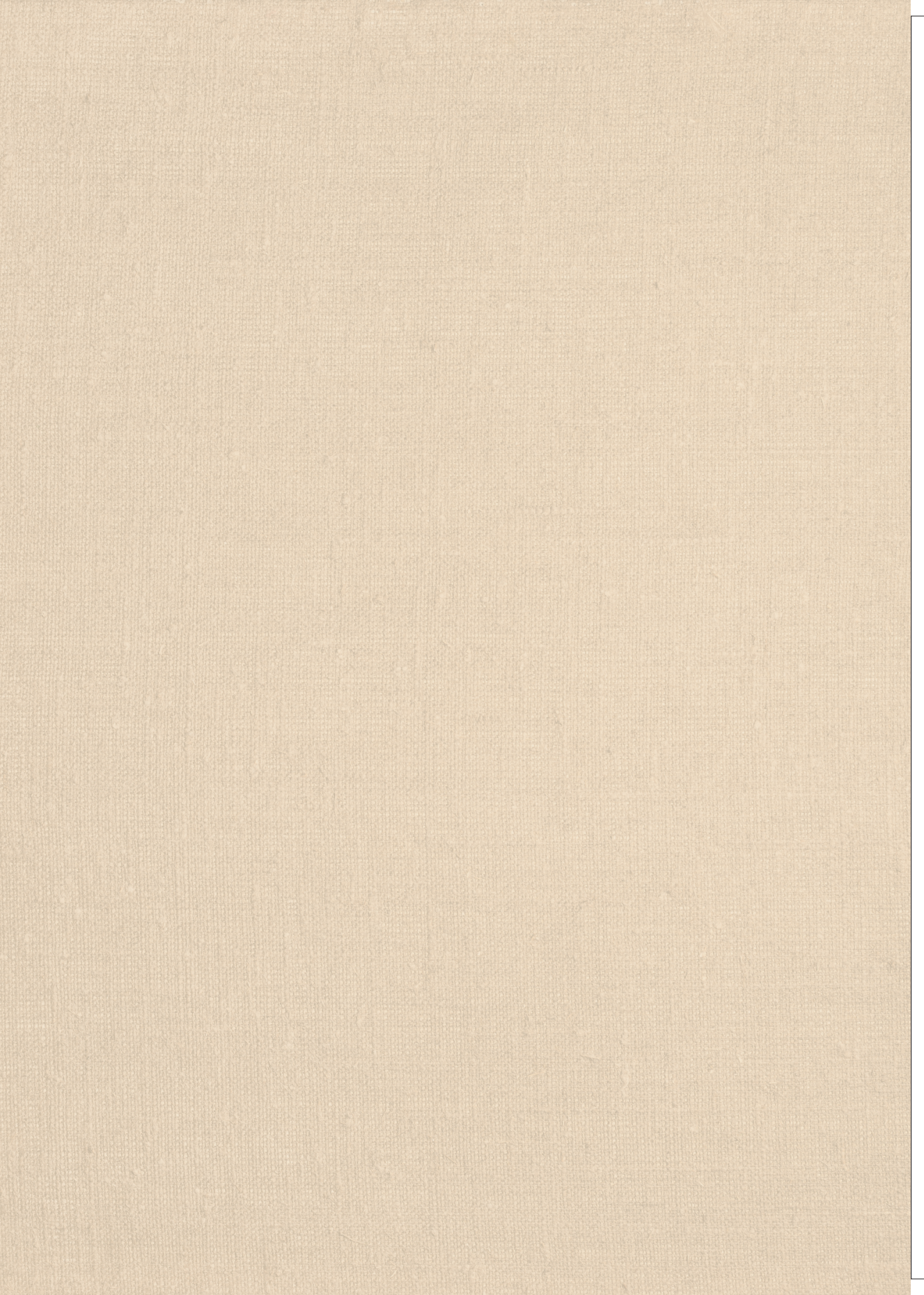
但是，20 世纪 60 年代，在“文化大革命”中，华州背花鼓这一民间艺术之花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摧残。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文化大院”的兴起，华州背花鼓开始有所恢复，但也只是昙花一现，很快也就销声匿迹。21 世纪的曙光终于使这朵民间艺术奇葩获得了重生，2004 年的正月十三，沉寂了数十年的华州背花鼓重新走上了街头。迎着人们惊喜的目光，演员们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将这一古老的民间鼓舞展现得淋漓尽致，舞者酣畅，观者惊叹。

采访接近尾声，康银娃、康振代等老艺人们似乎觉得绘声绘色的讲述还是不能表达自己心中那份激动，于是立即披挂上阵，激情洋溢地表演起了背花鼓。吸引得围观的小伙子们也纷纷加入他们表演的行列，跟着老艺人们手舞足蹈起来。





民风民俗



大年醇似酒

郝庆年

过了农历腊月三十，雄鸡引颈一声长啼，就唤来了大年初一：过年了。

这时在我的家乡华县秦岭北麓一个小山村（水峪），人们第一件事就是点



过年了

燃柏树枝段“接爷（神）”（据说京津一带人们也是买了柏树枝叶挂起来），村子上空很快弥散起浓郁的柏香。传说玉皇大帝和他的臣子们就在这一片芳香中莅临人间，与民同乐，领享人们的供奉、恭颂。接着

便是放鞭炮、打锣鼓。鞭炮声和锣鼓声炸脆、欢快，持续一个多钟头。大年就这样被热烈地推到了人间。

孩子们是最先冲出家门的。他们穿着新棉衣新“窝窝”（棉鞋），戴着新帽，竞相跑到放鞭炮人家的门前抢拾小花炮，捂着耳朵，踩着，挤着，笑闹着。今天的早饭早，八点多就吃。各家清一色的都是饺子，这是先一天就包好了的，绝大多数是萝卜馅儿（吃不起肉的）。煮好后，先献各神和祖宗，再给家中的长辈，轮到孩子时，奶奶妈妈就把事前做了记号的饺子盛给他，待孩子吃出硬币、红枣时，全家都高兴地笑着为他们祝福。这顿饺子是人们期待已久的了。我们都习惯吃汤水饺，每人先端一碗，调上油泼辣子，又香又热乎。这天的饺子即使煮烂了也不能说“烂”，而说“挣”，取意财多而撑破。在我家乡这顿饺子还不能剩，否则夏收时就要碾“塌场”（打场时遭大雨）。



早饭前后拜年活动就开始了。先去本家，在“爷簿”（即祖宗簿）前毕恭毕敬地烧香长拜，向长辈道年喜。接着去村邻家。年长的一些男人们特地穿上经年不上身的长袍，戴上帽瓢，脸上挂着笑容，逢人拱手恭贺“年好”。平日有些摩擦冲撞的，这时都不再计较，笑泯恩仇。最活跃的就是十多岁的少年们，三五成群或成十人结伙，挨门齐户走（大人们叮咛不能绕过某户人家）。巷道上好歹这样的人群碰来撞去，好生热闹。有的人家人缘好、“爷簿”前地方大、待客桌上麻叶、柿饼、花生摆得多，大家就认真地地上香叩头，向主人大声齐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有的人家待人冷淡不大和邻，进门就转一下，不烧香不叩头，不等主人出场，只喊一声“给你拜年啦”，说罢就走，哄笑着—掠而过。城内走完后就到城外西南角，这里有一户人家，静静地坐落在竹林间，青青的竹，红红的春联，明净的庭院。有一年门口迎候的是一个笑吟吟洋溢着青春英气的润姐，将这一角的新年装点得更有春意。



吃完早饭收拾罢锅碗后，一些中老年妇女们换上新的或干净点儿的衣服，三三五五地到邻家大院双手捅到袖筒里晒太阳聊天。一年360天闲不住的庄稼人，今天愿意不愿意都得放下活，享点儿清闲，有些还聚在一起抹抹纸牌。

大年初一的晚饭（晌午饭）是全年最丰盛的。一般人家都做三五个菜：辣白菜、油炸豆腐凉拼盘、洋芋炒肉丝、炒萝卜白菜，必做的是“熬菜”（大烩菜）：红白萝卜、白菜、山药、洋芋、豆腐、大肉、粉条，放上各种调料，统统熬到一个锅里。主食多是“捞饭”（即米饭），将米煮八成熟后捞出，做烩菜时再蒸熟。条件好的人家还有些酒，这顿饭要说多香有多香。母亲做的熬菜至今仍香在我的记忆里。

这一天人们不仅穿得好吃得好，而且心情也好。孩子犯了事，脾气最坏的大人也克制住不打不骂。不小心打破了什么碗碟，不但不责备，还说“响了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平日里紧绷着脸的婆媳们，今天都微笑着，说话也柔声细气。整个村子充满了和气和吉祥气。大年初二，按我们家乡的习俗是走丈人家。这是最重要的亲戚。提上马头笼（一种上大下小的长方形馍笼），带上蒸得最好的“追往包子”和枣糕等花馍，一大早就出村，同一方向同一路径的相

约同行，一溜一串，说说笑笑，熙熙攘攘。丈人家这天的招待自然也是最盛情的。有的还要请厨师做一桌酒席。小外孙是外爷外婆的兴奋中心，围着他们打转转，笑着逗他们成各种本事。中午巷道上，一堆一堆地聚着由十里八乡回到娘家村的姐妹们，她们成年时间没见面了，积攒了不少的话，说着笑着，彼此夸着别个的孩子聪明好看、衣服漂亮，心里暗暗比着看谁的手巧，孩子穿得有新花样，比谁的女婿帅气能干。

四五点钟人们相继回家了。这时你若站在高丘上眺望，广阔的田野上，麦苗青青，春风浩荡，远远近近的大道小路上都散布着蹒跚的人群。许多小伙子红着脸紧靠着媳妇夸赞岳父母。

初三初四大多是去舅家、老舅家、姑家、老姑家、姨家、姐妹家，有些还去干亲家。外面下着雪，两三个人坐在炕上，摆个凉拼盘，一壶酒，盖上拆洗干净棉被，谈现时，说往事；往事有些可追溯到清朝末年，已说过多少遍了，



过年走亲戚（张韬摄）



但还有味，越久远两家的亲情恩义就越深。这时夹一筷子辣白菜，抿一口酒，“嗷”的一下，这深情就顺着酒流进了心窝。

中老年妇女一般是不走亲戚的，待在家里招待客人。但为了自家或亲友孩子的婚事也会去走村串舍。许多人是小脚，十里八里也不辞劳累。过年说亲一说好就见面，也许是这时人穿着都体面一些，心情也好一些，一见面大多就能成。

初五，也叫“破五”，是大年最后一天。在我家乡这天许多习俗和初一一样：一大早放鞭炮，早饭饺子，晚饭米饭。为什么这样呢？原来在我国古代，五、“恶”同音，与五相关的月日人们认为不吉祥，端午节“五月五日”就是“灾月灾日”，许多民俗就是驱邪消灾的。正月初五这个日子也被说是灾日、穷日，所以要破这个灾和穷。早晨也就放鞭炮，两顿饭也要丰盛。

这天我村的小戏班和社火队又开始排练了。下午四点多，导演、演员和伴奏先后都到赵叔家的厅房下，胡琴、鼓镲响起来了。一些人戏词忘了，结结巴巴；动作也回生了，别别扭扭。四五天后就要演出，导演着急、生气，但又不能发脾气。围观的人们不时地哄笑着，替小演员开脱：“过年吃好的，娃把词儿都吃到肚子里去了。不要紧，重来。”又逗出一阵笑声。七点多，跑马和跑船的也着手彩排了。人们还留恋这五天的最后一刻，都去凑热闹。城门外的小场地上三四十个人驾着“竹马”在跑圈，两个人在撑着花船摇荡，观众们指手画脚地笑着、评论着，高兴时许多人甚至拍手狂叫起来，……大年五天大抵就这样过去了。初六，一些人就去地里看看庄稼，找点活干。田野里常常铺着厚厚的雪，多的人就在家做点竹器活。

实际上春节的欢庆高潮是在正月十五的灯节。十五前几乎天天是集会，街道上挂满了各种花灯。人们又忙着给孩子买灯送灯，演戏看戏，耍社火、看社火。十五前后三日，街衢人似潮，“花市灯如昼”，那才真正是热闹哩。



正月十五上元灯节

郝庆年

正月十五上元灯节，少华峰下的水峪村特别热闹，这是十里八村远近闻名的。沾上一点亲戚关系的这时都赶来，连远嫁的女儿们也携儿带女地回娘家住两三日。不大的山村这时充满了喜庆和祥和。

十三至十五的中午，村里业余剧团便在村外的一个露天戏台上演出。开戏前许多老人、妇女就搬上凳子占好了座位。一些卖炒粉、饴饬、甘蔗、水果糖、芝麻滚子等吃食的，卖“响巴锤”等玩具的也赶来做生意。剧团常演的剧目有《游龟山》《苏武牧羊》《苏三起解》《韩琦杀庙》《三娘教子》《杀狗劝妻》和《柳林告状》等。台上村里人演，台下村里人看。谁唱得好，谁扮相美，边看边议。尤其是谁慌忙中掉了胡须，甩脱了马鞭，忘了台词，丢了“丑”，“洒了汤”，台下便轰堂大笑，这笑好几天都响在巷道和小院里，挂在人们的腮帮和口边。

吃罢晌午饭，城门口的场地上便闹起了跑马、跑旱船。马是村里人自做的，马头和马屁股的骨架是用竹条编的，糊上纸花，用绳子固定在人的胯前和胯后。马脖子上套有铃铛。马队通常有四五十人，分骑马者和马僮。总队由一两人引领，跑单圆、双圆和“8”字形图案。跑了约半小时后，人人红着脸，冒着汗，这时马僮打起了“烈士”（即体操中



跑旱船



的“车轮”），领队打起了“唢哨”，这种粗野激越的响声立时把人们刺狂了。马队迅速旋转起来了，围观人群也激动了，粗犷的吼叫声、喝彩声、掌声、笑声和马铃铛的“呛呛”声，响成一片。

跑旱船也是水峪村的传统项目。船是雅号为“先生旦”的李应斌和另一个人在正月初五就着手扎糊的。船上的纸花是他用剪刀纸凿精心剪凿成的。李叔是村里的文化人，多年在渭河一带做小学教师，爱唱戏，饰旦角，所以大家叫他“先生旦”。跑船时，他常扮驾船的美妇人，浓妆艳抹，十分标致，而且唱得一口好曲儿，与撑船艄公嬉戏逗乐，驾起船行若流云，满场生风。水峪村不做“狮子”，但因为旱船、马队常去外村，作为“礼尚往来”，外村狮子也来水峪村玩。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首先走进巷道的是年轻媳妇和老太婆，她们抱着孩子，打一个灯圈，上面系着五六个以上的小灯。这种灯用细竹篾丝编成，外边糊上红纸，叫“火蛋灯”。点燃灯烛，就像红火球，给人以旺盛的生命力感。稍晚，与前门相对的北巷两排人家各自在大门上伸出两根竹竿，挂上六棱柱形的宫灯或圆形的纱灯、大花篮灯、莲花灯等。从东往西看，一条窄窄的巷道，成百个花灯，组成一个长长的灯廊，十分壮观。灯廊下便是打着莲花灯、石榴灯、鸡灯、猴灯等的孩子们。微风吹来，空中摇曳的灯廊在地面上翳出动荡的灯影，在月光下仿佛舒缓流动的涟漪，聚散游移的孩子们的灯群，就像是涟漪上轻荡的灯舟，与灯廊一起构成一种流光溢彩的梦幻般感觉，分外绮丽。

若从西往东看去，灯廊尽处则是另一番热闹景象。东城墙根的观音龛前点亮的“灯盏棚”（由细竹编排成的放有近百个陶灯的小灯山）灯火辉煌，自乐班周围人声喧嚷。记得有一年十五夜，“先生旦”约了十几个搭档唱眉户剧《李彦贵卖水》。“灯盏棚”前摆了三张大方桌，桌上放着白沙糖、柿饼、花生和茶壶茶碗。艺人们围坐在方桌边，自拉、自打、自弹、自唱。茶酣兴浓时，个个眉飞色舞，神采飞扬。说放，铁骑突出，诸乐齐鸣，演奏激情奔泻，唱腔高亢昂扬；说收，戛然而止，众籁骤寂，各种乐器，各人身手、面部表情都瞬间定格在最恰切、最得意的位置和状态上，恰如一副“乐神醉乐”群雕。

华灯红了，山村醉了。



追望、看麦罢

雷凤侠

华州地处关中平原东部，地形复杂，土壤肥沃，小麦是此地的主要农作物。在当地，麦收前，出嫁的女儿要回娘家探望，称为“追望”；夏收结束后，娘家妈回望称为“看麦罢”，这种风俗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追望”即看麦稍黄。民谣曰：“麦稍黄，女看娘，嫂子争着要吃糖。”麦稍黄，女看娘是节令的需要。农历四五月间，关中大地上的小麦就会逐渐退去绿油油的光泽，开始泛黄，随后变成金色的海洋，个把月后就可以挥镰收割，盘点一年的成果了。在未收将收的时间段，出嫁的女子都要择机回一趟娘家，了解一下娘家情况，帮着娘家做好夏收准备。看娘家的粮食够不够吃，父母身体硬朗不硬朗，麦子的长势好不好，这是出门女儿牵挂的事。女儿回娘家时，随身还要带上孝敬老人的礼品。嫁出去头一年的女儿，礼仪更重。通常女儿由女婿陪同去看岳父母，去时带的礼品有烟、酒、茶、糖等夏令食品。其中最多的是花馍。

“碌碡（圆状石物，用于夏收碾打）卸拨夹（套碌碡的木框），妈妈看怨家。”说的就是“看麦罢”。做妈妈的时刻惦记着女儿，夏收忙完了，打罢了场，娘家人要回访女儿家。一看女儿家粮食收成咋样，小夫妻关系是否和睦如初；二看外孙、外孙女是否安宁。看忙罢的时候，田野上的麦子都收割了，一眼望去是白亮亮的麦茬。村村的麦场上都是高高的麦草垛。碾场扬起的麦糠被风吹起，沿着大路飘得很远。这时传统的礼物是外婆用新麦粉加茴香、盐等调味烙上个大锅盔，土名叫“曲连子”。曲连子锅盔正面有圆孔，刻有各种花纹，如飞禽走兽或莲生贵子等吉祥图案，看起来好看，吃起来亦很有味，送给已嫁出的生



有十二岁以内的外孙外孙女的女儿；外婆给女儿家做个“曲连子”，取意套在娃的脖子上，把娃套住，娃能健康地成长。

外婆烙好锅盔后，用花格子包袱一裹，再买些小玩具，身着新衣去女儿家“看麦罢”。这时，太阳往往很亮，天气常常很热，乡间的大路上，往来着背着锅盔馍看麦罢的人，这样的锅盔，状似锅盖，厚有一拃，整整的圆块，不切一刀。并且越大越好，越厚越好。

女看娘，娘看女的礼俗至今在农村仍很流行，是亲家之间相互往来，彼此关怀的一种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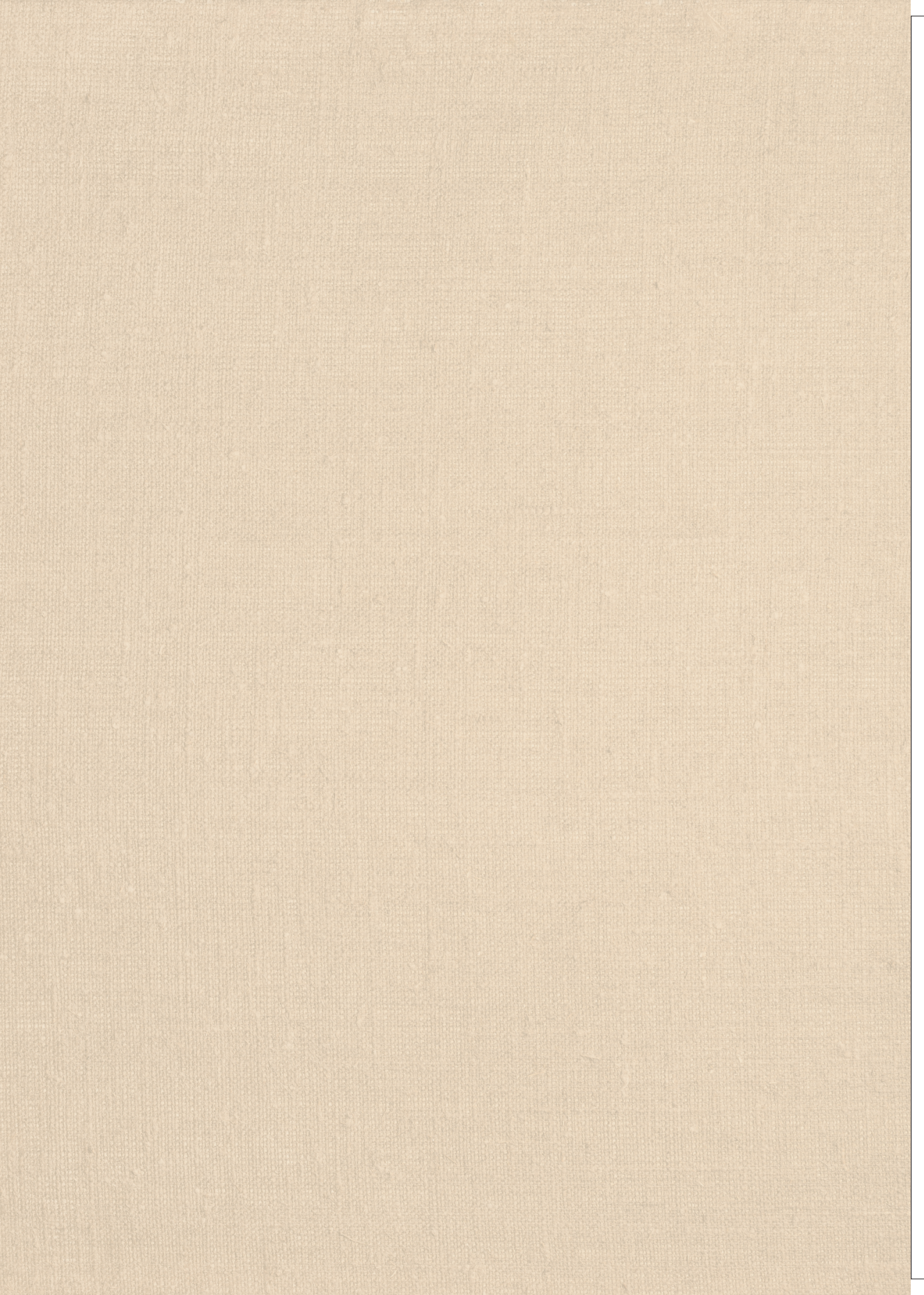
曲连子





物产小记





华州蔬菜种植的历史

闫广勤

华州蔬菜种植的历史久远，种类繁多，品质上乘，自古就驰名于世，当今更有飞跃式的发展，已经成为华州区农业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说到华州蔬菜种植的历史，应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因为那是华州农耕文明的发端。柳枝镇泉护村文化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有先民种植粟及稻谷的证据，虽没有蔬菜种植的考古发现，但考古学家在同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的西安半坡村遗址中，发现存有十字花科芸苔属的“菜籽”化石，证明那里有蔬菜种植。据此可以推断，与西安半坡村遗址同一历史时期、同一自然地理条件的泉护村的先民们，也应有原始的蔬菜种植。

华州区地处富庶的关中平原，在周秦汉唐时期，又是近畿之地，古代有发达的农业，蔬菜种植也应相应发达，只是至今没有发现直接的文字记载。直到明、清、民国时期，始有志书对蔬菜种植作了明确记录。下面按时代先后逐一转录，并对其中部分内容作简单解释。

成书于明朝万历初年的《华州志》卷九记：“蔬则宜葱，宜韭，宜薤，宜蒜；多芥，多茄，多萝卜；有蔓青，有黄精，有芹。……泥河沿蔬菜，颇足俯仰之资。”

这一段400多年前的记载，反映了当时华州蔬菜的主要品种及主要种植区。文中列举的大葱、韭菜、大蒜、芥菜、茄子、萝卜、芹菜至今仍是华州蔬菜之大宗。其中的大葱后来形成了知名品牌——赤水大葱，赤水大葱主产区为赤水地区，葱身高大，葱白粗长，肉质脆嫩，甜而辣少，味浓而香，营养丰富，品质佳，耐贮藏。2010年12月，经国家质检总局审核，决定对其实施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现在赤水大葱的种植已延伸到塬区各地，发展到 15000 多亩。

此志记华州蔬菜中的“薤”，音 xiè，俗称小蒜、野蒜、野韭菜等，李时珍《本草纲目》记：“其叶类葱而根如蒜。”

“蔓青”，是类似萝卜的一种食用蔬菜，至今华州农村还有食用，方言发音为“mán qing”。

“黄精”，又名野生姜、野仙姜、山生姜等，既可做菜又可入药。

“泥河”，村名，即今华州街道办事处宜合村，明朝时即以蔬菜种植闻名，400 多年后的现在，仍以蔬菜种植为主。

成书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续华州志》卷二，对华州蔬菜种植的记载是：“蔬则多南瓜、北瓜、丝瓜、瓠子、豆角、竹萌、香椿、木耳、蕨菜。……符禺之麓，千顷漫产朝菌，大者如斗，肉厚味甘，三四月间采之。”

文中的“瓠子”，又叫瓠瓜、葫芦瓜。

“竹萌”，即竹笋，自古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沿山地区绿竹千亩，郁郁葱葱，竹笋亦大量出产，是当地人菜桌上的佳肴。

“香椿”，高大落叶乔木早春生的嫩芽，呈黄绿色，可以炒肉、炒蛋或凉拌食用。早年都是人们在野外上树采摘，采摘不便，产量又低。近些年，柳枝镇引进新技术，在大棚里种植矮化密植香椿，香椿采用矮化密植栽培，不仅便于采摘和集约管理，而且可周年生产，提高了经济效益，逐渐形成了“柳枝香椿”这一品牌，并推向其他乡镇。目前，全县已发展香椿种植面积 3000 余亩，年产 100 余万公斤，远销西安、山西、河南等地。

“蕨菜”是野菜的一种，山区叫“十家菜”。其他地方又叫拳菜、龙头菜、如意菜等。它所烹制的菜肴色泽红润，质地软嫩，清香味浓，被称为“山菜之王”。

“符禺之麓、千顷漫”，地名，今大明镇桥峪口沿山一带。“朝菌”，一种食用菌。

成书于清光绪八年（1882）的《三续华州志》卷一，对华州蔬菜种植的记载是：“蔬则多菘，多辣，多山药；有菠，有藕，有芫荽；多王瓜，有葫芦，有茄密，有绞瓜、笋瓜、金瓜、稍瓜、冬瓜，有金簪，有扁豆、豇豆，有刀豆，



有茭白、回香、茼蒿、苋菜。”

上文中的“菘”，即白菜，华州的白菜个大脆嫩，呈圆形，菜球紧实，洁白无杂色，质柔味鲜。自古以来，一直是富有地方特色的名优农产品之一，尤以“华州白菜”的品牌驰名。延至现在，大白菜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2万亩以上，年上市量达6万吨以上。

“山药”，华州山药自古驰名，士大夫常作馈赠礼品，至今仍是知名农特产品，具有茎身粗，条长、皮薄、质细、味道浓郁等特点，毛稀皮薄，易于清理做菜，主产地在华州街道办，现已发展到下庙、赤水一带，优质山药田已达万亩。

“藕”，是莲的地下茎，当地人俗称“莲菜”。华州的藕为九孔，且无丝，成语“藕断丝连”不适用于华州的九孔莲。华州的莲菜种植，至今仍很普遍。

芫荽，俗称香菜，是人们最熟悉不过的提味蔬菜。

王瓜，黄瓜的别名。

茄蓂，茄；荷梗。蓂：荷根茎最初细瘦如指，称为“蓂”（莲鞭）。蓂上有节，节再生蓂。节向下生须根，向上抽叶和花梗。夏秋生长末期，莲鞭先端数节入土后膨大成藕，翌春萌生新株。茄蓂，说简单点就是未长成的莲藕。既可生食，又可熟食。烹饪方法较多，可以凉拌、清炒、辣炒等。

绞瓜，应为茭瓜，西葫芦的别名。

金瓜，南瓜的另一称呼。

稍瓜，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菜三·越瓜》：“越瓜以地名也，俗名稍瓜，南人呼为菜瓜。”

金簪，又作“金针”，即金针菜，是黄花菜的别称。黄花菜至今在华州仍大量种植。

刀豆，一年生缠绕性草本植物。豆荚的形状像刀，所以取名刀豆。

茭白，禾本科多年生水生宿根植物，华州水潭、水塘较多处有茭白生长。茭白味道鲜美，生食拌菜、酱制、腌制均可。

回香，即“茴香”。茴香是常用的调料，是烧鱼炖肉、制作卤制食品时的



必用之品。

莴苣，一、二年生草本植物。莴苣可分为叶用和茎用两类，茎用莴苣又称莴笋。

苋菜，当地人俗称“人旱菜”，生于田间或路旁、村舍附近、杂草地上，在华州农村，是人们经常食用的野菜。

成书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华州乡土志》，对华州蔬菜种植的记载是一言以蔽之：“凡蔬之类无一不备，最著者竹萌、藕、山药，亦上品也。”

此话虽然简单，却是对清朝末年华州蔬菜种植的高度概括和精要总结。

民国三十八年（1949）3月印行的《重修华县县志稿》卷七，记华县的蔬菜是：“初志：‘泥河治蔬菜’，今已普遍各乡。如泽口、梓里、沙圪塔之莲藕，李托、会同坊之葱，江村尤高大。良侯、寺门前、故县、李家庄……之蒜、辣椒、溪儿湾之莴苣，魏家庄、金城堡之萝卜，水泉河、三义村特粗大。白菜尤普遍。白菜一名菘，夏名热白菜，秋熟最佳，华产叶大丝少，阴腊多行销外境。山药，华产颇佳，士大夫每作馈赠品。苣荬、茄子、韭、甘薯、芋豆均繁殖。金针、芫荽无多。野生菜有：马齿苋、苜蓿、茵陈、邪蒿等。……有南瓜、王瓜、笋瓜、葫芦等。”

上文中的“初志”，指明朝《华州志》。“泽口”，村名，在今高塘镇。“梓里”“沙圪塔”在今杏林镇。李托，在今瓜坡镇。会同坊，即今赤水镇的南会、北会。江村，在今赤水镇。良侯、寺门前，在今瓜坡镇。故县、李家庄，在今杏林镇。溪儿湾，即今杏林镇三溪。水泉河、三义村，在今大明镇。阴腊：阴历腊月（十二月）。苣荬：即球茎甘蓝，当地人称“且莲”。马齿苋：当地人称蚊子菜。茵陈：当地人称白蒿。

1949年后，随着人口数量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蔬菜用量剧增，蔬菜种植面积逐步扩大，品种逐渐增多。1989年，全县蔬菜种植面积为2.6万亩，为1950年的3倍多；蔬菜计40种，120多个品种，其中，葱、蒜、白菜为大宗；蔬菜总产量为3万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华县着力引导农民调整产业结构，扩大蔬菜种植面积，增加农民收入，蔬菜种植业有了飞跃式的发展。1996年3月14日，县委常委会议研究讨论，通过了《华县十万亩蔬菜发展规划》。



华州蔬菜种植的历史

当年，县政府派员赴泾阳参观学习蔬菜日光温室生产技术，随即在全县推广，群众应用新技术的积极性日益高涨。1996年10月22日，华县三个蔬菜品种研究项目在北京博览会上被评为优秀项目。至2000年，华县露地蔬菜基本形成地域性基地生产，主要有：毕家芦笋，东赵白菜，杏林大蒜，塬区大葱、秋延（秋季延长时令生产）西红柿，侯坊秋延黄瓜、韭菜，沿渭河地区红（白）萝卜、冬瓜、山药，叶菜和茄果类蔬菜四季常有。温室大棚菜初具规模，主要分布在沿渭河及夹槽地区的毕家、下庙、柳枝、赤水、辛庄、侯坊、东赵、城关、华州、少华、莲花寺等地。2001年，华县蔬菜向新特名优型品种发展，引进了迷你黄瓜、香瓜、圣女果、七彩椒、飞碟瓜、人参果、地膜洋芋等80余种新品种。2003年，华县被认定为陕西省“绿色无公害蔬菜基地县”。2006年，华县成为陕西省第一个全国绿色无公害蔬菜基地县。2010年获“全国果菜标准化建设十强县”称号。2012年，全县43万亩的土地上，蔬菜种植面积达到30万亩，其中日光温室、设施大拱棚10万亩，蔬菜产量达到47万吨，产值8.5亿元，从事蔬菜生产的人数达3.2万人，菜农人均年收入1.2万元，仅蔬菜产业一项就使农民人均增收2170元，占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2%。

2016年，华州蔬菜种植面积30.8万亩，总产量82万吨，产值9.8亿元。其中设施蔬菜9万亩，总产30万吨，产值5亿元，露地菜21万亩，产值52万吨，产值4.6亿元。蔬菜品种已有200多种，从事蔬菜产业的农民近4万户，占全区农业总人口的54.3%。全区已建成下庙、柳枝、瓜坡、龙源四个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康甘、姜田、沟家、南沙、君朝、西罗、北拾、宏达、五龙九个现代农业（大拱棚示范）园区。形成年产10万吨的7万亩马铃薯，年产3万吨的万亩日光温室西红柿、圣女果，年产3万吨的万亩大拱棚辣椒、豆角，年产3万吨



大棚蔬菜



的万亩莴笋、甘蓝等六大无公害蔬菜基地。华州区拳心大白菜专业合作社生产的番茄、辣椒、豆角三个蔬菜产品获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绿色食品A级产品认证，将华州区农产品食品安全提升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

至2017年，华州区共有产业化龙头企业20家，其中省级2家（华县龙源生态有限责任公司、华县华州绿色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市级5家（华县莲峰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渭南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注册产品商标42个，中国绿色环保产品1个（华县立龙菜果专业合作社系列产品），陕西著名商标3个（渭华牌、龙霖牌、华州牌），渭南市知名商标1个。华州区先后被命名为“全国农业（蔬菜）标准化示范县”“中国果菜标准化建设十强县”“全省百万设施蔬菜示范县”和“陕菜之乡”等荣誉称号。

华州的蔬菜种植业的历史发展，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掘和总结，使“华州蔬菜”的品牌更加鲜明。



田园蔬菜

华州中草药漫话

雷凤侠

“秦地无杂草”。华州地理纬度适中，地形复杂多样，“山、川、滩、塬”兼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得这片山清水秀，土地肥沃之区，孕育着各种各样、品质优良的中草药，而且，华州中草药文化源远流长，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就记载了今华州地区出产的一些中草药：少华山上长有枸杞树和葶荔草。今桥峪山中长有一种树木，是可以用来治疗耳聋的文茎，今涧峪地区的山上长的一种草是可以治愈疥疮的条草。

唐、宋时亦有对华州中草药的记载。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华州的药材茯苓、茯神、细辛等为重要贡品。北宋的《太平寰宇记》一书，记华州的贡品仍是茯苓、茯神、细辛。杜甫在华州任司功参军时，一名叫杨綰的官员，曾托杜甫到华州后，给自己寄茯苓，可见华州茯苓之名气。

到了明朝，万历九年（1581）的《华州志》卷九载：“药则多细辛，多香附，有茯苓，有地黄，有白石英。”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续华州志》卷二载：“药则多艾，多款冬花，牡丹皮，苍术。”

清光绪八年（1882）的《三续华州志》卷一载：“药则多远志、木通、连翘，有党参，多防风，有甘遂，麻黄，黄耆，条参，枸杞。有何首乌，蒲公英，益母草，木贼，透骨草，地骨皮，金银花，有昌蒲，马兜铃，王不留、车前子，地榆，荆芥，苍耳，薄荷，茵陈，蝉蜕，马齿苋。”这一段时期记载的药材品种明显比明朝和清初期多了很多。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华州乡土志》63页载：“药类无虑数十种，防风、



苍术、麻黄多采掘者。本草云：款冬花出雍州南山及华州最有名矣。”从这个记载看，防风、苍术、麻黄等，在当时的需求量应很大。

时至民国三十八年，《重修华县县志稿》卷七对华县中草药的记载是：“秦岭出党参，医商收买，向在两岔河（在今洛南县）炮制。其余蒲公英、车前、款冬、甘遂、苍术、防风、茯苓，山野皆是。昌蒲、远志、麻黄亦多，山民采掘获利，为生活之资。民国三十二年（1943），豫籍难民，在种家村（在今华州街道办）租地十余亩，专种地黄，即生地，……华民购种仿栽者甚多。”该段文字记载了这一时期华县药材的流通、炮制、和人工栽植情况。

1992年版《华县志》有关中草药的记载为：“传统的中药材计150余种，其中国家收购者计81种，有：猪苓、伸筋草、卷柏、木贼、海金沙、替碎补、蒲松实、侧柏、鱼腥草、三白草、四块瓦、桑寄生、马兜铃、细辛、扁蓄、何首乌、红三七、大黄、金不换、牛膝、商陆、瞿麦、太子参、附子、铁棒锤、菖蒲、威灵仙、铁筷子、白芍、赤芍、丹皮、黄三七、红毛七、霍羊藿、厚朴、五味子、土三七、金毛七、盘龙七、杜仲、仙鹤草、山楂、杏仁、桃仁、地榆、牙皂、葛根、苦参、黄柏、透骨草、过山龙、地丁（见肿消）、白薇、紫花地丁、金腰带（芫花）、师麻、五加皮、刺楸、通草、独活、当归、柴胡、蛇床子、蒿本、川芎、羌活、前胡、山茱萸、金背枇杷、秦皮、连翘、全皮、女贞、密蒙花、拦路虎、紫草、藿香、香薷、益母草、丹皮、荆芥、华山参、刘寄奴、茜草、党参、桔梗、一支蒿、牛蒡子、艾、苍术、千里光、款冬花、蒲黄、白茅、芦根、天南星、半夏、白附子、天门冬、麦冬、重楼、玉竹、偏头草、独脚莲、山药、天麻、金银花、水飞蓟等。年收购总量36万—40万斤。”从上文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中药材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国家也进行收购，中药材逐渐成为山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2012年版《华县志》（1990—2005）有关中草药是这样记载的：“华县药用植物共计96个科236种，其中大宗药材有连翘、五味子、茵陈、薯蓣、金银花、野菊花等。连翘主要分布在秦岭山区的向阳山坡灌木丛中，南北二坡均有分布，蕴藏量约250吨，年收购量10吨左右，1993年收购50吨。五味子主要分布在



秦岭山区 1500 米以下的山坡沟岸或灌木林中，年产鲜果百万公斤，2001 年华县收购 5 吨。茵陈分布在沿山及各荒地、地埂，年产量 50 吨。薯蓣分布在秦岭山区各地，2002 年收购量 80 吨。野菊花分布在秦岭北麓，2004 年，收购量达 100 吨，主要销售至广州、江苏等地。金银花分布在秦岭山区的低海拔灌木丛中，2003 年林业部门从山东引进灌木型金银花。细辛主要分布于金堆和秦岭深山的山坡林缘、岩石旁阴湿处。华县细辛国内驰名，1990—2005 年，年收购量平均在 500 公斤左右。菖蒲又名九节菖蒲，主要分布在秦岭山区海拔 1400—1800 米林下的湿润腐殖土中，河南省及陕南药农常来华县采掘，年采量 1—2 吨。”

从上述文字记载来看，1990 年后，华县开发的中药材的品种愈来愈多，其采购均具相当规模，已成为山民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更可喜的是，政府部门更加重视中草药的栽植，并从外地引进新型品种，这无疑使华县的中草药上了一个新台阶。

纵观华州地区中草药文化的发展史，其源远流长，品质优良，远销各地。近年来，华州区中草药人工栽植已成为新兴产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茯苓



细辛

赤水小吃

蒋文正

对赤水而言，这一名词除了本身的地理含义外，可以说早就是“赤水小吃”的代名词了。本文不想就某个具体名吃而细究其历史、工艺及操作过程。由于品种太多，只宏观地就赤水饮食的开端、发展及对未来的展望略谈看法，以起抛砖引玉之用。

一、独特地理、人文环境，决定了饮食的多样化

赤水地处八百里秦川之腹地，三流环滋、水陆皆至、八径通达、气候温润、地势平坦，加之在此繁衍生息达几千年之久的勤朴憨厚、能融九州的赤水人生存特点，早就形成了一整套农耕、贸易、好友的丰富经验，使赤水在关中乃至全国的农耕贸易史上揭开了光辉的一页。棉花、粮食、土特产自水陆多路销至全国。每当粮、棉、大葱等土特产销售旺季，这儿总是聚集了山东、河南、四川、福建、甘肃、宁夏等地大量的客商，仅贸易这一点，当年赤水之盛景可想而知。

长期的交融相处，将各自的饮食文化汇聚于赤水，久而久之，使赤水饮食早已超越了陕西地区而包罗万象，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

二、繁华的经济市场，旺盛的人脉资源，促进了赤水饮食市场的繁荣

《重修华县县志稿》载：赤水依傍公路为东西冲途，资本较厚之，商号特多，又复北达渭北，南通岭南，故会集日商货麇集，人山人海，在全县各市镇号称巨擘。20世纪80年代前，每逢赤水集市，东至娃娃桥西及九眼桥西半里余，二三里长的赤水集市自晨至暮人山人海，别说负重携物，就是只身而过，也得二三个小时。赤水集市辐射面广，南抵高塘、崇宁、金惠山根，北达孝义、故市，东至华阴、潼关，西及渭南。有的人鸡鸣即起，且大部分徒步而行，人们到这



儿的目的之一就是吃上一顿。即使那些匆匆过客，一旦入街，也易被那锅铲盆勺的碰撞声、童子的吆喝声、红红的灶火，以及各种小吃的色香味所诱惑而身不由己了。还有那些领孩子的，带老人的，走亲戚的，除了他们本人美餐之外，也忘不了为亲人买大包大串的食品，我想还是富有的孝义人说的好：进了赤水门，小吃多如蚊，一样赏一口，用尽孝义银。

三、在历史的积淀中吃出品牌

来自四面八方的老幼妇孺、尊长青壮、贫贱富贵的食客们，在数千年的赤水饮食文化的长河中，可以说是他们吃出了赤水饮食的品牌及种类，使赤水饮食具有典型地五湖四海口味。在多达百余种的小吃中，形成了饮食的全方位的立体空间。热的凉的，干的汤的，晕的素的，酸的甜的，粗（粮）的细（粮）的及各种形状的各种吃法。仅就赤水凉粉而言，就有绿豆、红苕、土豆做的，有的如碗形的饼状凉粉，有大如盆的大块凉粉，有凉的，有炒的，有烩的，有大块的，有细条的，而赤水醪糟这样再简单不过的一碗汤，做法也多样，如纯汤、蛋花汤、醪糟煮甑糕等，还分热的、凉的等。如果把各种食品的各种吃法汇聚一起，赤水饮食真不知有多少种。时至今日，赤水扯面、腊肉、醪糟、甑糕、牛舌头饼等一二十种品牌的食品早已自成体系，独丰其门，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中国中西部久负盛名。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8月华州水灾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救灾领导、记者及志愿者在离开华州时十有八九都会去赤水上上一餐，再买点带上，如腊肉、醪糟、麻花等。至此之后，在赤水街道隔三岔五的可见到山东、山西、甘肃、河南的过往车辆在此驻足，吃上一顿，带上点便扬长而去。

四、在品牌的传播中，做大做强，推陈出新

勤劳智慧的赤水人似乎天生就与饮食有缘，他们善于钻研总结，做精品牌，且能做大



赤水扯面



做强。如赤水扯面早已走出赤水，在华州城、渭南、西安开设馆；赤水醪糟早在十年前已通过县级非遗申请；赤水饮食中的绝品佐料“赤水大葱”早已通过国家级审核认定，成为华州区地理标志型产品。近年来赤水独特的桥家锅盔已名冠渭南，往往供不应求，不少购者说，当你在还距做锅盔处数百米时，那种微焦的天然的麦香味就已浸入你肺腑，使你早已不闻已闻，不香已自香，不醉已自我陶醉于这天然的食品之中了。当然还有栩栩如生的赤水花馍、异军突起的赤水拉面等，这些都为赤水饮食提供了充足的底气和后劲。

五、赤水饮食的整体特点

赤水土地平整湿润，水资源充沛，棉花、瓜果、蔬菜、油菜等物产丰富，除供应当地人外，大部分销往域外，鸡、猪、牛等肉蛋油食品也完全满足当地市场；赤水大葱、南塬柿醋、街北花椒、辣椒等主要食品佐料早已是年年用之有余。因此，赤水饮食绝大部分食材均由本地出产，完全可以做到随用随取。这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内久负盛名的赤水大葱。赤水人的确把它用到了极致，生吃脆甜，熟吃清香，入汤上浮，每每菜中一含大葱，地道的“赤水味”便一闻即知，难怪赤水人称之为菜稍子，百味之王。还有这一带南北几百公里，东西几十公里无有任何大中型工业区，构成了这儿水质甘甜，水量充沛，空气清新，景色宜人的独特魅力，这一整体效应构成了赤水小吃的整体特点，即环保、新鲜、清淡、色形俱佳，口感良好。

六、赤水饮食文化的展望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赤水地区的红色旅游文化、独特历史地域文化、赤水河经济旅游带等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形成，必然强力地促使赤水饮食文化高速健康发展。华州区的设立使赤水成为渭南向东发展的第一站，赤水地处渭南市东西的中央地段，这也使得赤水的发展成为必然。近一段时间，从人们的街谈巷议中，我们或许感觉到人们正在祈盼着大赤水的形成，即南北赤水河流域为一体，东西赤水合壁，构成新的生态的赤水旅游经济文化带。我们相信随着这些有利条件的形成，赤水的饮食文化的又一个春天即将到来，到那时赤水饮食文化之花必将再一次靚遍中国、馨及九州。



关中华县大布与“织女”

杜明科

大凡度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公民，都会记得起那时的“洋布”之说。洋布是啥？它就与“洋蜡”（蜡烛）、“洋硷”（肥皂）、“洋火”（火柴）等物一样，都是从国外进来的生活用品，是质地细于粗布的布匹噢！

粗布，是华县人祖祖辈辈制作服装的用布。当今，人们穿上了类别多样、花色多种的“新式布料”服装，但总是不会忘记那早些年供人们取暖和遮身，并形成中华服饰文化特点的“粗布”。同时，人们更不会忘记那一代代勤劳的“织女”。

在我家乡的关中华县大地，人们也常把粗布称作“土布”或“大布”。大布，是相对于边角布料和擦桌抹椅的小块布来说的，它用于棉被床单和做衣服使用，而“土布”的名称，是相对于洋布来说的。

在我的记忆中，大布的制作过程是相当繁杂的。

母亲是我家的“资深织女”。记得每年冬初，生产队里给分了白生生的棉花后，母亲就开始忙乎了，因为，过年时我们兄弟姐妹还等着穿新衣服呢！

那时，母亲找来一只筷子做轴，撕下一块棉花，与筷子对齐，两手向下再向前一搓，就卷成了里面空心、外面齐整的“捻子”。煤油灯下，那捆扎成把的“捻子”，是妈妈做



纺线



大布的第一道工序。

在陕西关中，只要有女人的家里，就会有一部纺线车。母亲纺线真是一把好手。这可能还因为，母亲的名字就一个字：线。这个名字的来历，我听说是姥姥在纺线时生的我母亲。

母亲的纺线车摇得真是欢呢！每晚的七点开始，她可摇到十点多钟。嗡嗡嗡嗡的声音，伴随着辛劳的母亲。一把“捻子”在她老人家手下，不一会儿就变成“线团”，缠在了锭子的头儿上。有时我睡一觉醒来，还能听到纺线车的嗡嗡声音。

“捻子”成为线团，又见母亲拿着一个“工”字型的木玩意，母亲把它叫做“线拐子”。她手握中间木杆，上下左右翻动拐子，把线缠在拐子上。再捋下来，线就成了一把一把的。

再以后是“浆线”的工序，母亲用稀糊面浆把线浆匀，以增加线的韧度。再进行“倒筒”“撒线”“染线”“经线”等七八道工序之后，母亲就开始将经好的长线装上织布机。这其中有一道“撒线”的工序很有意思。母亲叫来邻家“织女”，两个人拉住长约七八米的线的两头，有节奏地将身体向后摆动，把浆的线拉扯开来。那协调的动作，煞是一道风景。那景致，只有在农村才能看到。我常常是看着母亲把那一坨一坨线撒完才离开。

关中华县大地的织布机分为两种，一种叫“平机”，一种叫“腰机”。“平机”是经线搭机，脚踏线板，上下分离经线，线梭（纬线）通过分离的上下线空间，再用“紧挡”把线梭供给的纬线推实。新布织成后，就紧卷于布轴。“腰机”则是将挂线的另一头，用绳索缠绕固定在织布者的腰上，反复给梭织布的机子。两种机子相比，“平机”要稳固和便于操作。

就说这两种机子，我家还都没有。要织布，母亲还要到别人家的借机去织。每当新织粗布下机，母亲都要把布叠平成摞，又是一棒槌一棒槌地将布捶展，这才完成了织布的全过程。

那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话，我倒觉得，若改为：“孩子身上衣，母亲皆辛苦”，倒也是挺合适的。

农村人穿大布衣服，那真是现代人说的“纯棉”货。你还别说，这种大布



的确易吸湿，透气性能也好呢！难怪现代人穿腻了毛料和丝绸后，到处找棉含量多的布料呢！

关中人自己做的大布单裤和大布棉裤很有特点，那就是：腰宽裆大，穿脱方便。后来的小孩子们形容这种大布做的大裆裤，还有一首自编儿歌逗趣，那就是：“关中‘大裤裆’，打仗不用枪，发现两个美国佬，就往裤裆装。”

记得有一年国庆节，县上举办大型庆祝活动，我所在的重点小学被确定为游行队伍，那时，我们是多么高兴啊！很多城里的孩子，都由妈妈陪着到商店购买时兴的条绒上装。我家经济不宽裕，妈妈连夜给我和哥哥做了有竖纹的大布衬衣。虽说比不上城里孩子的条绒新衣那么洋气，但煤油灯下，妈妈为我们赶制新衣的情景，我还记得清楚。穿上大布新衬衣，也高兴得喜笑颜开。

几十年过去了，我真是赞赏像我妈妈一样的“织女”们。自古到今，这一代一代的“织女”们，为了家人的生计，在努力，在辛苦。还是她们，创造了棉织工艺和早年的棉纺织文化。每年七月七鹊桥相会的织女，我们谁也没见过，但身边的“织女”，确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我们怎能不赞颂。

从过去说到现在，尽管后来市场上的精纺细棉布料、机制纤维布料、毛织布料、丝质布料等琳琅满目，但关中农村的大布棉纺始终是没有停止过的。20世纪70年代，我回岳母家探亲，大姑姐还特意送给我们大布床单作为礼品。别具关中风情的大布床单，我们很是喜欢，回来就铺在了床上。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度推进，关中的土布制作工艺又有了更新的发展。尤其是几个县建立了大布制作的公司。这些公司生产的大布出口量很大，甚至连老外都喜欢上了关中的大布。

有一家大布制作中心，其“布艺简介”这样写道，“大



织布



布布艺由农村织布巧妇组成，在传统织布工艺上进行技术更新，原料上萃取上等优质棉花，经过五十多道工序纺织而成。大布鲜艳耐看，花型多式，图案雅典温馨，手感柔软舒适，古朴大方”等等，几句朴实且时尚的“简介词”，道出了关中大布的创新与发展。

如今，关中华县人还把大布的制成品作为礼品送人，连包装盒都特别精美。我到某单位业务考察，这个单位送我的漂亮大布床单，我好几年了还舍不得铺用。

现在，大布与细布布料一样，既能制作漂亮的床单被罩，又能制作成各种色彩交织的衬衣外套。大布商店里的几款小孩的连衣裙、超短裙还特别“惹眼”呢！

我有几次回家探亲，听说我爱人的小弟媳红红就是新式大布纺织队伍中的一员。她经过了专门的纺织培训，制作的大布交给制作中心，中心付给她丰厚的报酬。我们逗趣地称她是新时代的巧手“织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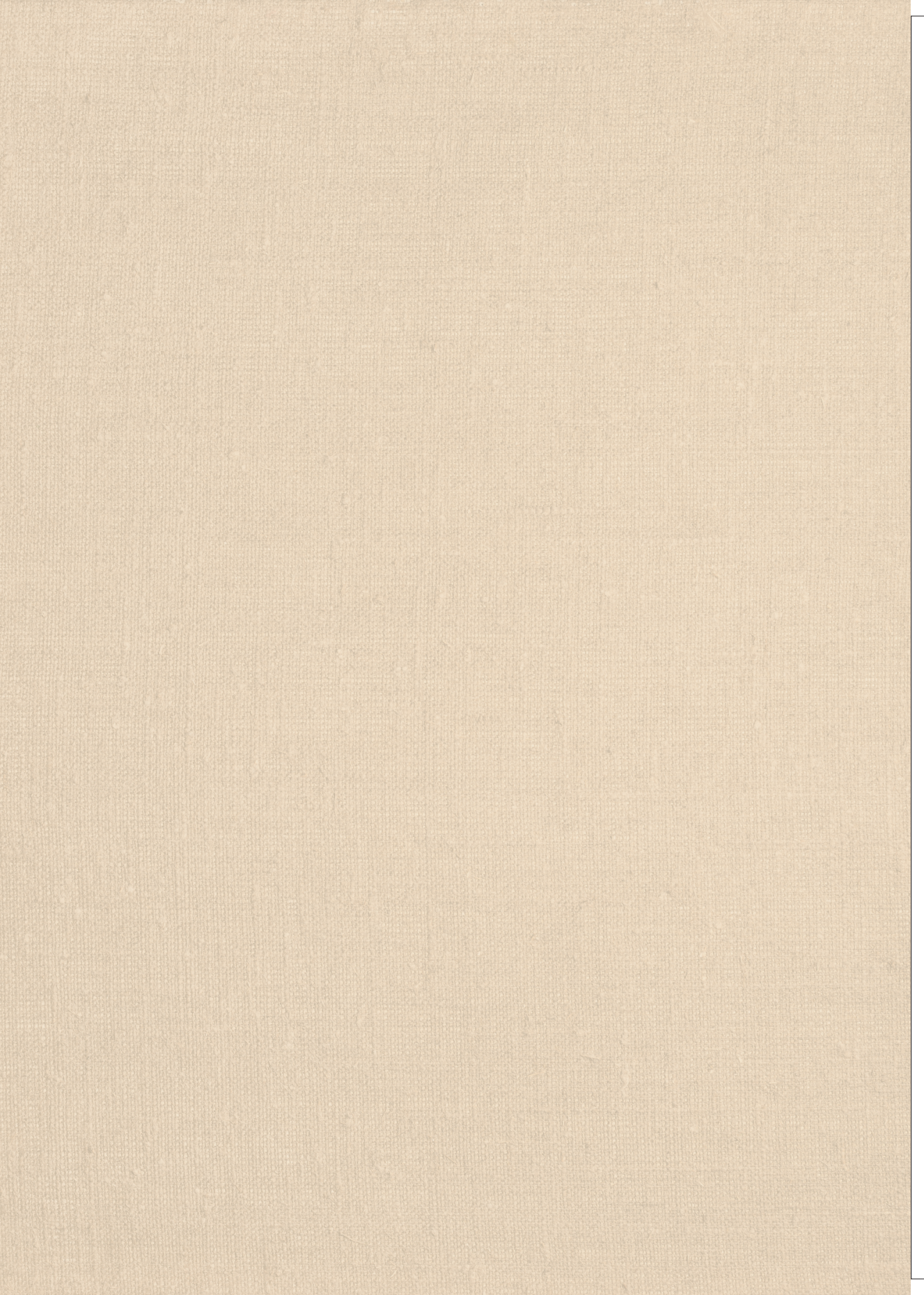
关中华县大布发展到现在，我觉得，它起码不应该再叫做“粗布”了，应该为它“正名”。





诗文华州





华州的历代诗歌

闫广勤

(一)

渭南市华州区虽然建区不久，但这一片热土，无论是称郑国、郑县、华州、华县，还是称华州区；无论是县级规模，还是管辖数县，其核心区域在两千多年里，基本以今华州区所辖地域为主。因此，岁月的积淀，社会的演进，文化的交融，形成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华州文化。华州文化的组成，不仅有以皮影、面花为代表的民间艺术，更有以杜甫、王维楨为代表的文学创作，以明《华州志》为代表的地方史志，以郭宗昌为代表的学术研究，以潜龙寺为代表的古代建筑等等。它们共同构建起华州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其中文学创作中的诗歌一脉，更以其典雅优美的字句抒发思想和情感、以诗的语言记录社会与自然而独树一帜。



(二)

华州诗歌之滥觞，当为《诗经·国风·郑风》中的《缁衣》。西周末年的周宣王二十二年（前 806），周厉王之子友，被分封于郑地建郑国，后称其为郑桓公。郑，即今华州区。郑桓公及其子郑武公相继任王室司徒，他们见周幽王昏庸腐败，天下动荡不安，遂将郑国东迁至今河南洛阳以东地区寄居，并使之成为春秋初期的强国。《缁衣》这首诗，就是郑国人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创作的。《礼记》中就有“好贤如《缁衣》”和“于《缁衣》见好贤之至”的记载。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的《郑世家》“述赞”中说：“厉王之子。得封于郑。

代职司徒，《缁衣》在咏。”宋代的朱熹在《诗集传》中说：“旧说，郑桓公、武公，相继为周司徒，善于其职，周人爱之，故作是诗。”据此可知，《缁衣》是歌颂郑桓公（或郑武公）好贤的诗。

西周之后至南北朝，笔者没有搜集到本地区的任何诗歌，是一段空白。

（三）

自隋唐以后，华州诗歌呈现繁荣景象。尤其在唐朝，一批在中国文学史上星光璀璨的著名诗人，在华州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章。这其中有著名诗人李白、杜甫、刘禹锡、白居易、杜牧、李商隐、郑谷等，虽然他们不是华州人，但他们的诗歌，在华州诗歌发展史上不可或缺，而其中又以杜甫为其杰出代表。

伟大的诗人杜甫，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六月至次年立秋前后，任华州司功参军。虽然只有一年时间，但他在此期间写的30多首诗歌，注视社会，反映现实，以苍生为念，是杜甫诗歌创作的里程碑。尤其是著名的“三吏三别”，是他在去洛阳探亲返华州途中的见闻，修订、脱稿是在回华州任所以后。在华州诞生的这六篇“诗史”般的作品和其他在华州的诗作，是杜甫在任华州司功期间忧国忧民、遣兴抒怀之作，是华州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章。

其他非华州籍诗人，有的吟颂华州在天下州郡中雄邦重镇的地位，如刘禹锡在《途次华州……》中赞华州为“百二山河雄上国”，王建有《赠华州郑大夫》中称华州为“通化门前第一州”^①。有的游历华州而描绘其壮美山川，如白居易在《旅次华州赠袁右丞》中称华州“山水一何丽，君子在其中”；张乔在《游少华甘露寺》写道：“少华中峰寺，高秋众景归。”郑谷在登上少华山时看到“孤烟薄暮关城没，远色初晴渭曲分”。有的仰慕华州人、汾阳王郭子仪而吟颂其功业，如杜牧《云梦泽》中认为“直是超然五湖客，未如终始郭汾阳”；薛逢在《开元后乐》中说：“一自犬戎生蓟北，便从征战老汾阳。”有的用诗记录了在华州发生的历史事件，如黄巢起义时，韦庄在《秦妇吟》中，记华州受战乱影响而“百万人家无一户”，“破落田园但有蒿，摧残竹树皆无主”。史籍对此次

^① 通化门：唐朝京城长安的东门。

兵燹之中的华州社会状况无一字记录，韦庄这几句诗显得难能可贵。

华州在唐朝时发生的最重大事件，莫过于唐末皇帝唐昭宗受藩镇逼迫而流亡到华州，不得不受制于割据一方的华州刺史、镇国军节度使韩建。唐昭宗及朝廷被困华州达两年之久，朝廷的日常运行、进士考试也在这里进行，大批中央政府官员及随之而来的逃难百姓云集华州，华州成了临时“首都”。这一时期产生的一些诗词，从侧面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可补史之缺。其中唐昭宗李晔的《菩萨蛮》词，抒发了这一历史事件主角被困华州的无奈和忧愤；郑谷的《奔问三峰寓止近墅》、褚载的《吊秦叟》等，反映了随唐昭宗流离到华州的官吏、百姓的悲惨遭遇；殷文圭的《行朝早春侍师门宴西溪席上作》、薛昭纬的《华州榜寄诸门生》等，记录了唐昭宗及朝廷被困华州，进士考试也不得不这里举行的史实。

唐朝时华州本籍诗人不多，笔者只见到郭子仪、王韞秀、马戴三人的诗作。郭子仪是功名显赫的将领，虽出将入相，但吟诗作词显然不是其所长，《全唐诗》收录他的《享太庙乐章》二首，为唐玄宗、唐代宗庙祭祀时的舞乐撰词，是应景之作。王韞秀是华州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三位女诗人之一^①。她的父亲王忠嗣发迹早于同乡郭子仪，曾同时任四个镇的节度使。王韞秀作为将门之女，心高气盛，这从她的诗中可以看出。马戴，其籍贯有不同说法，一说为华州人^②，另一说定州曲阳（今江苏省东海县）人^③。元代《唐才子传》称“戴诗壮丽，居晚唐诸公之上”。

(四)

北宋时期，外籍人士涉及华州的诗词相对唐朝较少。著名诗人仅张先、苏轼、张耒等，华州本籍诗人笔者见到的有韩丕、曹辅、李廌。李廌在华州诗歌史上是华州籍诗人的杰出代表。他是“苏门六君子”之一，很受苏轼赏识，诗文俱

① 另二位女诗人，一是明朝王维楨之妹，王维楨称其有“咏絮才”，以东晋女诗人谢道韞作比，可见她能诗，可惜无诗作流传。再一个是清朝颜氏，见《王千波落叶诗和韵》。

②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七。

③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唐诗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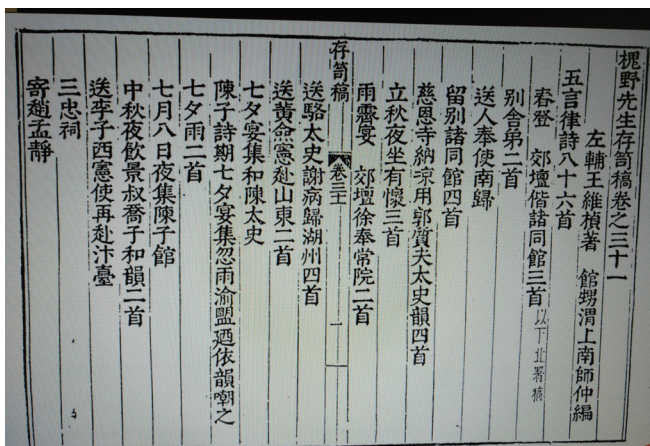
佳，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人物。李廌的诗词议论深广，想象驰骋，咏物自然清新，写景如同画境。如《虞美人》中的：“玉阑干外清江浦，渺渺天涯雨。好风如扇雨如帘，时见岸花汀草涨痕添。”寥寥数笔，生动形象地勾画出一派江畔雨景。他一生坎坷，未获功名，但在当时的文坛上却享有盛誉。他所作诗词不少，但大部分都失佚了，现存诗词被《全宋诗》收录的有诗四卷 390 多首，《全宋词》收录词 4 阙。

北宋灭亡后，华州受金朝统治，期间的诗作笔者仅见到华州人杨庭秀的一首。同一时期的南宋大诗人陆游，力主北伐，收复失地，所收《书事》，想象收复华州后的情景，反映了他不忘中原，统一北方的爱国情怀。元朝时期，华州诗坛与金朝时一样凋零，笔者仅见到山阴人杨维桢华州栖云楼怀古的一首词。

(五)

明朝时期，华州诗坛重现繁荣。外籍诗人中有曾任华州知州的伍性、甘为霖、陈应麟、吴箴等，他们的诗以描写华州风光为主。如成化二十二年（1486）前后任华州知州的伍性与华州训导的钮莹中合作的《华州八景》诗，歌咏了当时的华州有代表性的八个景点，虽然有些景点现在消失了，但因此诗而有了历史的记录。外籍诗人中的知名人士有状元康海，著名教育家吕柟，著名文学家何景明、袁宏道，著名戏剧大师汤显祖等。他们的诗，清新自然，情感真挚。如

康海劝勉华州友人的“功成莫羨五湖游，河华山川已自优”；吕柟吟友人草堂的“少华峰阴一草堂，醉眠仙客日如长”；何景明回忆自己年少时在华州生活经历后的感慨：“追游少小还今日，浪迹乾坤任此身”；汤



明朝王维桢的诗作



显祖赞华州的“仙树出咸林”；袁宏道描写华州风景的“古槐修柏琅玕竹，晓日晴岚翡翠山”。这些诗作，无不展现大家名士的学识和功力。

明朝时的华州籍能诗者众。华州旧地方志等资料显示，曾出过诗集、或记载“能诗”的华州籍诗人有几十人。没有诗作流传下来或无记载的“能诗”者应当更多。这其中诗歌成就最高的，当属王维桢。

王维桢在明朝中后期的文坛上有一定的全国影响力，长期在翰林院供职，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与他同时代的人称他“文章气节见重当世”^①，“其有异才”^②，为“关中伟人”^③。王维桢的诗学盛唐，以杜甫为宗。如《寄家书二首》《寄东氏妹二首》，思念家人，感情真挚，情深意切。华州西溪的几首诗，写景形象、鲜明，借景抒情，情景交融，意境深远。王维桢的其他诗作也都沉郁有调，情感深厚。王维桢除著有许多诗文外，对李白、杜甫的诗作也进行过深入研究。其著作有《槐野先生存笥稿》《李律七言颇解》《杜律七言颇解》等。

其他华州籍诗人，虽然影响不如王维桢，但也各具特色。如张潜、张必大描写华州风光的恬淡宁静，王庭诗纪念杨椒山时的悲愤激昂，郭性之、王庭譔记边防状况时的雄浑大气，都是很不错的诗作。

(六)

清朝时期，咏华州的外籍名人不多，其中以清初诗坛盟主王士禛名气最大，诗作较多。他在华州写的《寄显应侯祠》《栖云楼故址》《渔川原》《谒郭忠武王祠》四首诗，或写景，或怀古，或咏贤，诗句简练蕴藉，清新自然，富于神韵。

光绪年间的华州知州李嘉绩，是明清两代华州知州在诗作中，最关注民生、关注经济、关注百姓疾苦的一个。如他在《竹》中，认为华州之竹“稻粱利弗若，方产矜黎元。上以供赋课，下以养子孙”。在《杏四首》中吟道：“尔侪同有三农意，正要当春雨一林。”在《柿二首》中写道：“州人多种柿，只在亩西

① 《明征仕郎翰林院检讨文庵王公配太孺人刘氏合葬墓志铭》（华州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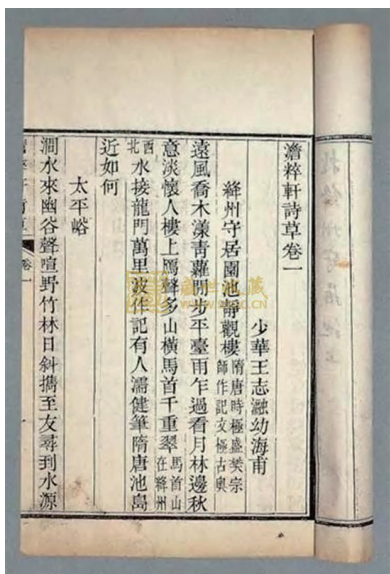
② 明·郭朴《明故国子监祭酒王公墓志铭》（华州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藏）。

③ 明·瞿景淳《南京国子监槐野王公行状》（《重修华县县志稿》卷十七）。



东。作饼能安业，为醯亦考工。”在《悯农》一诗中感叹：“少华之区本卑湿，南者为原北者隰。今年少雨隰难滋，龟坼啾啾叹何及。”他的诗，在那些官僚作诗只是风花雪月、歌功颂德的时代里，是很难得的。

清朝华州本籍诗人中，最出色的是王志湑、王志澍兄弟，及他们的堂弟王志沂。进士、朝邑人张佑在《王氏松健楼记》中，称王志湑、王志澍兄弟“俱以诗名鹊起二华间”^①。进士、洋县人岳震川认为王志湑的诗“有古乐辞之淡泊”，“又有古高士之风标”^②。王志湑的写华州风光的诗，轻快明丽，恬静自然。《陶园初夏》一组诗，描写华州人的田园生活，情趣盎然，朴实澄净。如：“辘轳声里静嚣埃，井灌花畦水曲回。稚子临流争洗果，戏抛桐叶放舟来。”诗句淳朴，描写真实，生活气息浓厚。



清朝王志湑的诗作

王志澍曾官至冀宁道，他的涉及华州的几首诗，虽以吟景为主，但含有退隐无为的心境，如“伫立万虑空，旷视形神化”；“石坪同偃息，无处起空心”；“回忆京华听夜雨，眼前无数梦中山”。借景抒怀，情思邈远。

王志沂的诗以纪行诗为主。他游历过云南、江南、陕南，皆写有游记，尤其是道光三年（1823）陕南之行的纪行诗，汇编为《汉南诗草》，记录了当时陕南各地的风土人情、山川地貌、军事关隘，是研究道光年间陕南状况的珍贵资料。

清朝华州本籍诗人中，不能不提唯一的女诗人颜氏。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里，她的诗作无疑是那个时代里的奇葩。颜氏的诗作流传下来的仅为《王千波落叶诗和韵》，这两首七律，格律严整，遣词精准，用典贴切，情感细腻，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① 《三续华州志》卷十二。

② 《重修华县县志稿》卷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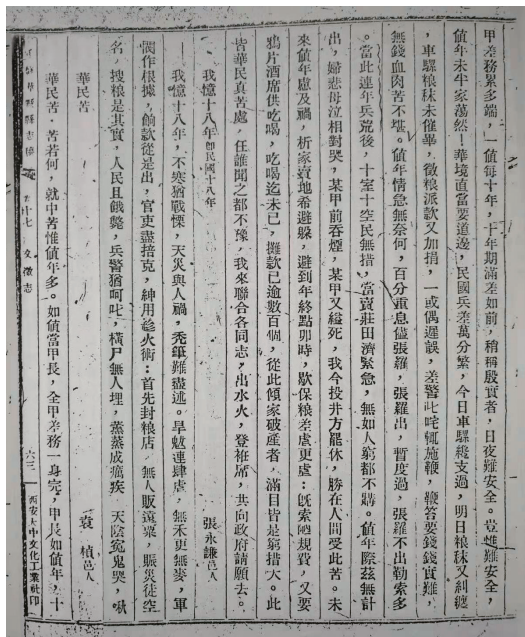
(七)

华州诗坛在明末清初，还诞生了一批诗社，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是绝无仅有的，这就是南坻社、郑社、怀雅社。南坻社的成员有郭宗昌、郭畹、东肇商、郭蕃、王承祐、郭思、东荫商、王承之等，编有诗集《南坻社诗草》。郑社的成员有宋瓚、张久经、张世锡、王承裊、张廷统、王承襪、王会图、郭民藩、武桓、刘遇奇、樊春、释如应等，编有诗集《郑社诗草》。怀雅社的成员有王理、郭孝延、张漠明、王增、刘洙、宣元熙、张洞明、李藻、刘湛、孙织锦、刘建奇、刘穢等，编有诗集《怀雅社诗草》。

(八)

辛亥革命后，华州改为华县。30多年的民国史，时间不长，但跌宕起伏，华县诗坛也较为冷清。诗人为数不多，可他们的诗作更注重民间疾苦，关注社会问题。华县知事侯旬是清正廉洁、有所作为的官员，他的《堕马行》《瓜坡原》表露了他“拯民”“救民”之心。华县诗人袁楨的《华民苦》，深刻反映了苛捐杂税、征粮派款给百姓带来的苦难。张益斋的《我忆十八年》，揭示了天灾加人祸的民国十八年大灾荒的惨重和悲怆。而杨松轩的《劝妇女戒缠足歌》，是那个时代华县一批知识分子力图变革，救亡图存的产物，是杨松轩及其同仁们脚踏实地，身体力行去改造社会的切实行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华县的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诗歌再不是少数文人墨客的专利，普通群众挺进诗坛，涌现了大批优秀作品。



民国《重修华县县志稿》上的两首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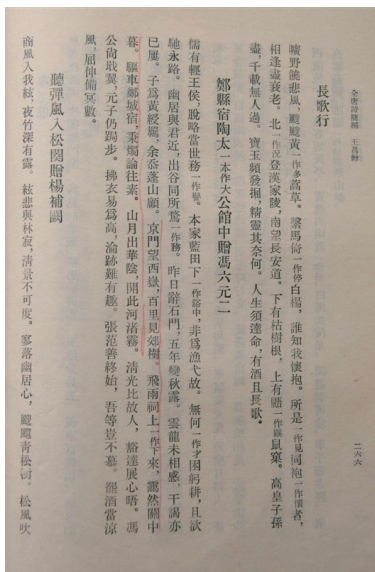
唐代诗文中的华州风物

闫广勤

唐代的华州是京城长安的东方门户，是朝廷直属的雄邦重镇，大文豪韩愈就曾称华州为“百郡之首”。由于华州的政治军事地位如此重要，因而在文化昌明的唐代，华州（主要为郑县）的许多风物，在那时的诗文中多有生动具体的记载。

大诗人李白在《郑县刘少府兄宅月夜登台宴集序》中说：“城临近高山，俯瞰平隰，秦郊汉院，相错如绣，且有颢气足以娱人。”著名诗人王昌龄在《郑县宿陶大公馆中赠冯六元二》一诗中写道：“京门望西岳，百里见郊树。飞雨祠上来，霭然关中暮。驱车郑城宿，秉烛论往素。山月出华阴，开此河渚雾。”另一诗人司马扎在《自渭南晚次华州》诗中描绘的华州景物是：“火云入村巷，余雨依驿树。”“峨峨华峰丘，城郭生夕雾。”诗圣杜甫在华州任司功参军时，描述的华州景物，有“更欲题诗满青竹”“南望青松架短壑”“昊天出华月，

茂林延疏光”等句。诗人刘禹锡曾登华州城北楼，写出了“城楼四望出风尘，见尽关西渭北春”的诗句。而郑县城墙上曾筑一小台，号凉风台；县城东北有万里沙，故诗人独孤及有诗云：“凉风台上三峰月，不夜城边万里沙。”从上述摘引的诗文中，可以知道唐时的华州郑县，作为周秦汉唐的畿辅重镇，有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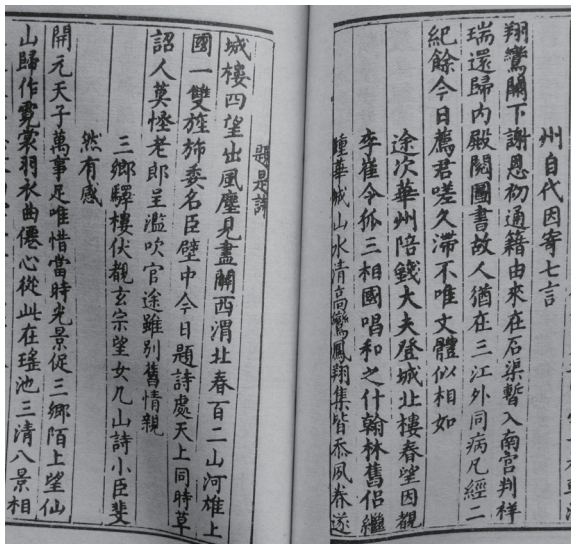


王昌龄在华州郑县作的诗

伟的高山，浩荡的河流，无垠的平原；茂林修竹，村巷点点，城阙耸立，相互交错，大地锦绣，是颢气娱人，风光绮丽的灵秀之地。

而华州景物中最为醒目的，是直插云天的太华山和少华山。两座华山山势相连，横亘于华州的华阴、郑县之南。太华山，即西岳华山，因山势高峻而称“太”，“太”即“大”；少华山山势较太华山为小，故称“少”，“少”即“小”。太华山与少华山分峙东西，并称“二华”，为长安之东的重要屏障，故唐人李庚在《两都赋》中称“二华”为长安之“重城”。唐诗中描写太华山的诗很多，最有名的，有李白“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三峰却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开”；有崔颢的“岩峩太华俯咸京，天外三峰削不成”等。少华山在唐诗中也屡屡出现，王建云“少华山云当驿起”；张乔吟“少华中峰寺，高秋众景归，地连秦塞起，河隔晋山微”。郑谷则具体描写了少华山的景物是：“石门萝径与天邻，雨桧风篁远近闻，饮涧鹿喧双派水，登山僧踏一梯云。孤烟薄暮关城没，远色初晴渭曲分。”以写“清明时节雨纷纷”著名的诗人杜牧，有《望少华三首》，其中有“今对晴峰无十里”“羞对灵山道爱山”等句。“大历十才子”之一的李端在游少华山时则有另一番情趣：“寻危兼采药，渡水又登山。独与高僧去，逍遥落日间。渐看闾里远，自觉性情闲。”

除少华山外，郑县名山还有郑南峰。郑南峰在今城区南太平峪口至五龙山一带，当时这里建有伏毒寺，故又称伏毒岩。诗人杜甫描绘郑南峰一带景色为“郑南伏毒寺，潇洒到江心。石影衔珠阁，泉声带玉琴。风杉曾曙依，云峤忆春临”。诗人刘禹锡则称“曾作关中吏，频经伏毒岩。晴烟沙苑树，晓日渭川帆”。



《刘宾客文集》中刘禹锡在华州作的诗



郑县境内的河流，唐诗中被记述的，有渭河和小敷溪（又称小敷谷水）。渭河是黄河最大支流，东流经华州北部入黄河。李白在《赠华州王司士》一诗中，记“渭水不绝波澜高”，唐昭宗李晔在华州曾登栖云楼，描写登楼所见：“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丘。”而上文已引的“远色初晴渭曲分”“晓日渭川帆”等句，也可见华州境内的渭河风光。小敷溪，今称罗纹河。王建在《赠华州郑大夫》诗中称“小敷溪水入城流”，可能当时将此河之水引入州城。《新唐书·地理志》记，开元四年（716），当时的著名水利家姜师度曾主持修建“罗文渠，引小敷谷水，支分溉田”。唐代诗人对华州的小敷溪似乎情有独钟，除上文所引王建的诗句外，还有许多吟咏，如王昌龄的《小敷谷龙潭祠作》中，描写小敷峪口的水石激荡的景象是：“崖谷喷激流，地中有雷集。百泉势相荡，巨石皆却立。”郑谷有“敷溪秋雪岸，树谷夕阳钟”；司空图有“岂似小敷春水涨，年年鸾鹤待仙舟”等诗句。



华州城西，唐时有一处名胜，即西溪，在今杏林镇老官台村东一带。当时这里水势浩大，风光绮丽，为眺游佳景。诗圣杜甫在华州任司功参军时，多次到此游览。西溪畔有西溪亭，又称郑县亭子，杜甫曾作《题郑县亭子》一诗。唐末皇帝唐昭宗李晔，于乾宁三年（896）被军阀韩建挟持到华州两年，朝廷也因此迁到华州。唐昭宗曾携百官到西溪观“竞渡”，即划船比赛，其中有一官员即兴写诗记胜道：“片水耸层桥，祥烟霭庆霄。昼花铺广宴，晴电闪飞桡。浪叠摇仙仗，风微定彩标。都人同盛观，不觉在行朝。”描绘了唐昭宗西溪观竞渡的场景。

上述诗文，让一千多年后的我们，透过历史的岁月风尘，窥见了当时华州风物的些许碎片，从而由此生发想象出盛唐华州雄邦重镇的风貌。

名家论杜甫在华州

秦 寂



杜甫

唐代大诗人杜甫，曾在朝中任左拾遗。乾元元年（758）六月因仗义执言，被贬谪为华州司功参军。至次年立秋后，他弃官离开华州。虽然在华州任职只有一年时间，但他在此期间写的30多首诗歌，注视社会，反映现实，以苍生为念，是杜甫诗歌创作的里程碑。尤其是著名的“三吏三别”，是他在去洛阳探亲返华州途中的见闻，修订、脱稿是在回华州任所以后。在华州诞生的这六篇“诗史”般的作品和其他在华州的诗作，是杜甫在任华州司功期间忧国忧民、遣兴抒怀之作。杜甫在华州，是他创作生涯的重要

时期，许多研究杜甫的著名学者，多有阐述。

如，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的现代著名诗人、学者冯至（1905-1993），在《杜甫传》中说：

（公元七五八年），杜甫已离开了皇帝周围的“氤氲香气”，走出一个曾经经过的金光门，被派到华州作司功参军，……。

他离开长安时，心境是很凄凉的。……他当时只认为这对于他政治的前途是一个打击，但他并没有意识到，他从那狭窄的天地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出来了，对于他的诗的发展却是一个大的恩惠：他由此才得到机会，又接近了战



乱中的人民，认清时代的苦难，因此而恢复并且扩充了他的广大的诗的国土，从一个皇帝的供奉官回到人民诗人的岗位上。

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当代著名传记文学家、文学史家朱东润（1896-1988）在《杜甫叙论》一书中评论到：

乾元二年（759），杜甫的诗已经发展到最高境界。……乾元二年杜甫是人民的诗人，因为这一年他的利害和人民的利害一致。在其他的年代里最多他可以称为同情于人民的诗人，但是还不能说他是人民的诗人。……为什么乾元二年（759）杜甫已经是人民的诗人了，后来反而不是呢？这很简单，水经过不断地加热达到一百度的时候是沸水，但是沸水不是不可能冷却的。……

乾元二年是一座大关，在这以前杜甫的诗还没有超过唐代其他的诗人；在这年以后，唐代的诗人便很少有超过杜甫的了。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著名文学史家陈贻焮（1924—2000）在《杜甫评传》中认为：

乾元二年这一年，对杜甫的一生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就在这一年，诗人经过多时的反省和探索，终于从思想感情上完成了日渐远离皇帝和走向人民的痛苦过渡，谱写出反映人民苦难生活的新篇章，为他前期已取得的辉煌的诗歌创作成就，增添了新的耀眼的光彩；同时也清醒了头脑，破除了对朝廷的幻想，……



陈贻焮的《杜甫评传》

“三吏”“三别”写的是乾元二年三月老杜自洛返华途中的见闻，修订、脱稿当在回华州任所以后。

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文学评论丛刊》上署名谢吾的文章写道：

杜甫在大历三年（768）的《峡中览物》一诗中说：“曾为掾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三辅”是泛说，实指华州。杜甫曾在乾元元年（758）六月至次年夏末出任华州司功参军，掌表疏考课等事。潼关属华州，诗中以此来概

名家论杜甫在华州

言华州。所谓“记在潼关诗兴多”，即回忆自己在出任华州司功这一年里的诗兴多。

……

杜甫在华州一年里的活动情况约分为三个阶段：一、乾元元年六月至这年的冬天。除秋天曾往蓝田访友外，诗人均在华州；二、乾元元年冬末至次年春天。诗人先由华州返偃师陆浑山庄，乾元二年二月至东京（即洛阳），遂经新安、石壕、潼关回华州；三、乾元二年春天至立秋。诗人均在华州任上，此后弃官西客秦州。

……

诗穷而后工。在这一年里诗人饱经的种种挫折，不仅决定了诗人遣兴的丰富而深刻的社会性，而且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

……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杜甫在华州的一年，是在艰难中苦斗的一年，是深刻认识现实，深入接近人民的一年，是思想急剧发展、诗兴多的一年。



华州大地的“帝王之声”

殷小明

冬日的下午，残阳斜照，我漫步在华州公园，看落叶流水，赏绿竹青松，顺着蜿蜒通幽的小径，来到了棲云楼之前，风花雪月、清风秀山、亭台轩榭乃文人所咏之物，望着挺拔的棲云楼，里面像是浮动着一缕淡淡的萧瑟之气——“不是朕要作词，而是朕实属无奈”。诗言志、词明志，一首在华州吟诵的不是文人而是帝王之词在我脑海里且现且明：

菩萨蛮·登楼遥望秦宫殿

登楼遥望秦宫殿，

茫茫只见双飞燕。

渭水一条流，

千山与万丘。

远烟笼碧树，

陌上行人去。

安得有英雄，

迎归大内中。

很难相信，这首词出自一位帝王之手，据《唐宋词鉴赏辞典》记载，乾宁三年（896），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率兵攻占京师长安，皇帝唐昭宗李晔逃奔河东，被李茂贞盟友、华州刺史韩建截拦，在华州居住实则幽禁长达三年，在此期间而作了此词。在当时，唐昭宗李晔是一个聪明而又有才能的皇帝，他充分了解阻碍恢复唐朝力量和权威的形势，并发誓自己要复兴王朝，恢复大唐盛世，但是此时的唐王朝已经积弱难返，回天无力，战乱之际，皇帝出逃，落魄华州，受制于人，心烦意乱，皇帝与众大臣在华州登高楼，西望长安，物是人非，潜



然泪下：在高楼上遥望秦宫殿，其意暗指长安宫殿，只见辽阔的秦川大地燕子飞舞，渭水东流，根本就看不见所谓的长安宫殿，只是在看不见中增添了无尽的愁绪。而此时这位皇帝不甘落魄，望着远处烟雾迷蒙的绿树、川流不息的人群，在苍茫的华州大地发自内心地喊出了“有哪位英雄，愿将朕迎回长安城皇宫内”的无奈之音！



唐昭宗

伴着落日的余晖，我思绪漂浮，边行边思，夕阳也日渐西去，天空送来阵阵寒气，难道这位帝王真是“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川被犬欺”？真是在我所对面的这座亭台登楼召唤他的英雄？

历史是一副画卷，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间可以冲淡一切，但不能冲走一切，这位壮志难酬的帝王早已化为灰土，自己的宏图伟业也已被岁月冲刷的一干二净，但他却在华州大地发出了一句愁苦忧愤、凄怆动人的肺腑之音，留下了一首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无奈之词，让人们回味无穷！正所谓“斯人已去，都付笑谈中；此词永驻，历史道真情”！



作者简介

殷小明，出生于1979年，华州区效能办副主任。



栖云楼

北宋文学家李廌

秦 寂

在浩翰的中国文学史中，众多诗人的姓名灿若星辰。这其中有一个是华州人，他就是李廌（zhì）。李廌（1059—1109），字方叔，号德隅斋，又号齐南先生、太华逸民，华州郑县（今华州区）人。

李廌生活在北宋中后期，这时期的经济文化比较繁荣。但他家境贫寒，6岁就成了孤儿，他勤奋力学，稍长，就以学问称誉乡里。元丰年间（1078—1085），李廌到黄州（今湖北黄冈）拜谒著名文学家苏轼。苏轼对他的文章极为赞赏，认为笔墨翻澜，有飞沙走石之势，拍着他的背说：“你的才能，可敌万人。”他受教于苏轼，并与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陈师道一起，被人们称为“苏门六君子”。

北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苏轼以翰林学士的身份知贡举。李廌也于本年参加考试。因为李廌以文章受知于苏轼，人们认为他定能考中进士。然而放榜后，李氏非但未能高中，而且根本榜上无名。对于这一颇出人意料的结果，当时士人每有感慨乃至惊诧之言，宰相吕大防甚至叹息说：“有司试艺，乃失此奇才耶！”

苏轼深感愧对李廌，特意写诗送其还乡，诗题为《余与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诗送之》：

与君相从非一日，笔势翩翩疑可识。
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
我惭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责。
青袍白苎五千人，知子无怨亦无德。
买羊酤酒谢玉川，为我醉倒春风前。



归家但草凌云赋，我相夫子非癯仙。

此诗前四句自责虽与李廌交往日久，理应认识他的文风，却错过了他在考场中写作的优秀文章；中间四句表现李廌“行止皆天”的通达洒脱；后四句正面描写饯别场面，希望李廌回家后潜心向学，并预言其不会终生理没山泽之间。

元祐六年（1091）李廌再次应试，再次下第。他从此绝意仕进，致力于撰文著书。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去世，他感其知遇之恩，悲怆痛哭，作祭文曰：“道大不容，才高为累。皇天后土，鉴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词语奇壮，读者无不竦然。他晚年定居长社（今河南长葛），生活清苦，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去世，享年51岁。

李廌才气横溢，落笔如飞，诗文并著。他为文纵横驰骋，与苏轼的风格接近；条畅曲折，颇具逻辑性；喜论古今治乱，曾上《忠谏论》《忠厚论》《兵鉴》于朝。在文学批评中，他提出文章须具备体、志、气、韵的“四要”说；在《师友谈记》中记载苏轼、范祖禹、黄庭坚、秦观等人关于治学为文的言论，是宋代文学理论批评中有价值的材料。又有《德隅斋画品》22题，对唐、五代及宋的名画评定品位，考证作者和阐发画理，也多精辟的见解。他的诗歌多以山水、行旅、酬唱、题画为内容，诗风雄健奇丽。如他写的《少华山》一诗：

少华连延翠烟永，细路缘云上高顶。
奇峰西奔入秦蜀，幽谷南通接荆郢。
昔年蛟龙忽变化，怒蹙山巅压州境。
山灵吐怪助豪强，地轴狂推如转梗。
盘龙七社万户余，卵覆巢倾伸臂猛。
近来又说神羊岭，六里横开罅如井。
居民惴惴已忧疑，惟恐蛟龙怒还逞。
勿令岸谷复颠移，鼓铸神功烦禹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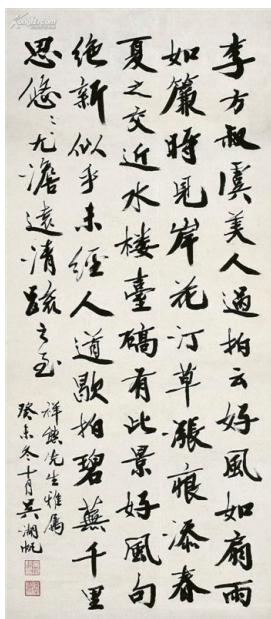
李廌的词作也颇为出色。如《虞美人》一词：

玉阑干外清江浦，渺渺天涯雨。好风如扇雨如帘，
时见岸花汀草涨痕添。青林枕上关山路，



卧想乘鸾处。碧芜千里思悠悠，惟有霎时凉梦到南州。

此词怀人念远，意境深长，淡泊清疏，回味无穷，为词作佳品。



书法家吴湖帆书写的李廌的《虞美人》一词



华州颂

闫广勤

雄哉华州，天长地久。三辅名邑，青史悠悠。
文明曙光，泉护村旁。仰韶遗迹，源远流长。
桓公开疆，郑国立邦。秦始置县，郑县流芳。
设州西魏，华名始归。大唐上辅，百郡之魁。
宋金五县，治乱互见。省县入州，元省郑县。
明代要枢，重镇东府。嘉靖地震，万户萧疏。
清为散州，人口渐稠。回变圣山，又见吴钩。
辛亥变天，改州为县。民国初始，军阀混战。
渭华起义，惊天动地。征途漫漫，人民胜利。
共和国建，社会发展。改县为区，华州重现。
形胜争嘉，山水如画。甲于关中，地灵吾华。
南踞峻岭，中瞰畴平。北渭如带，西南塬横。
少华山高，凌空如削。钟灵毓翠，为郡一标。
渭水泱泱，生民滋养。孕育文明，润泽郑壤。
山河并秀，地宽土厚。物华天宝，特产拔尤。
南山宝库，奇珍异木。更富矿藏，首推金钼。
五谷俱美，菜蔬皆备。沃野膏腴，养我侪辈。
百果缀珠，千亩青竹。万物精聚，锦绣画图。
风流人物，英才辈出。豪杰乡贤，彪炳史部。
郑国桓公，古郑肇基。天下郑氏，陵寝共祭。
郭公子仪，平定安史。功盖天下，再造唐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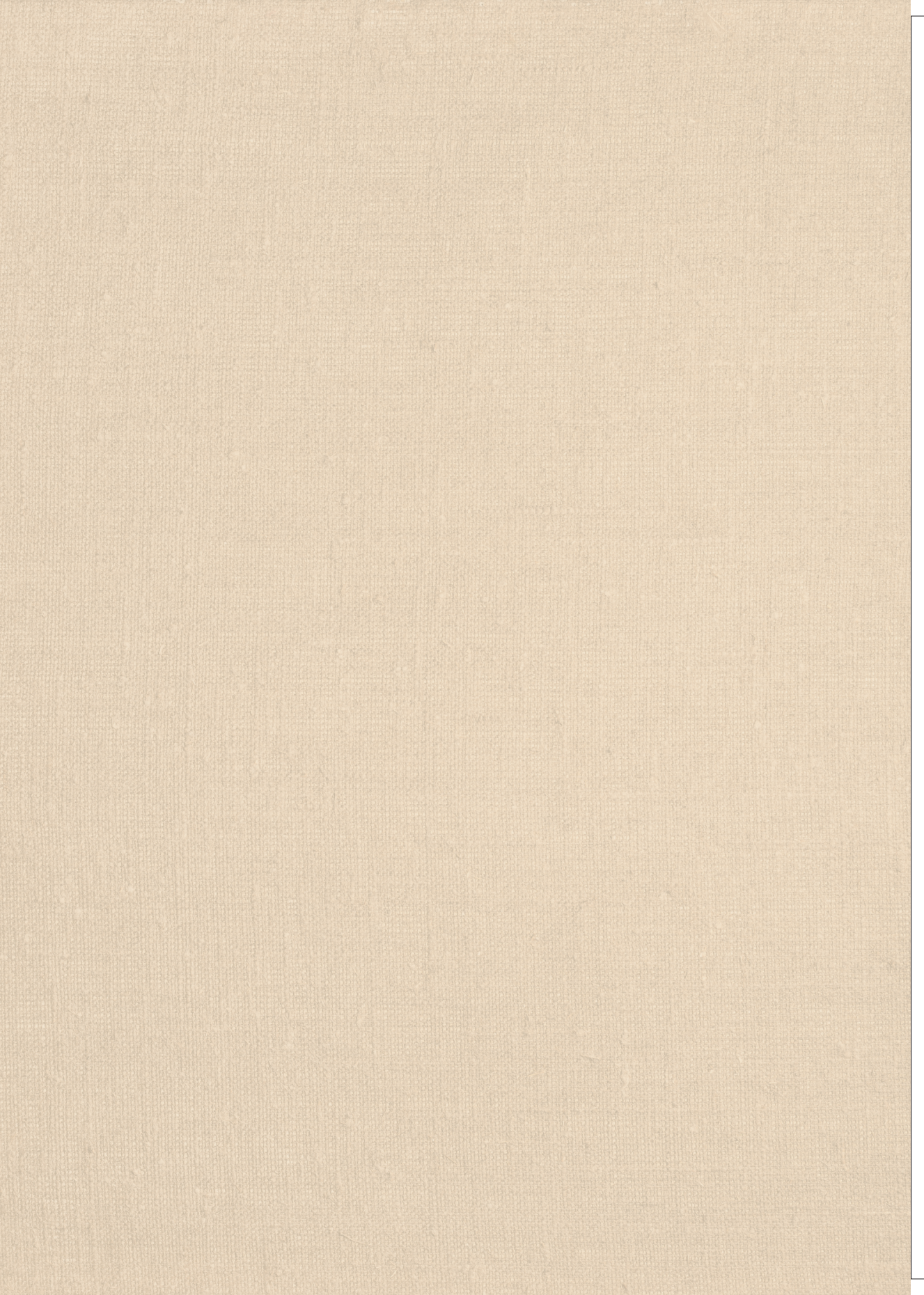
明朝维桢，清代士棻。文人世宦，华州名门。
清末民初，先贤杨顾。开拓新学，遗教千古。
潘高诸公，革命先锋。艰苦卓绝，为党立功。
杨公钟健，科学登攀。学部委员，星光灿烂。
文化灿灿，艺林翩翩。底蕴深厚，古今斑斓。
杜甫留踪，华州司功。三吏三别，诗史黄钟。
北宋李廌，苏门学士。笔底翻澜，生不逢时。
明代祭酒，文坛泰斗。王公维桢，诗文俱优。
志湑兄弟，清代擅诗。享誉二华，声名鹊起。
民国克难，顾公熠山。重修县志，笔耕累年。
民间艺术，琳琅满目。叶茂根深，扎根沃土。
华州皮影，刻皮成型。隔帐唱舞，历代传承。
礼馍面花，造型奇葩。农妇巧手，名动京华。
秧歌整鼓，曲子迷胡。拨弦起舞，欢悦乡庐。
教泽绵长，文脉恒昌。重教兴学，育才兴邦。
簧宫孔庙，阐扬文教。四大书院，树蕙滋兰。
新学开拓，旧学始破。开启民智，学校渐多。
咸林学校，陕东为高。教学相长，独领风骚。
当代教育，春风化雨。百年树人，飞腾长驱。
今日华州，大写春秋。改革开放，百舸争流。
交通运输，通讯网络。互联互通，惠及万户。
卫生城市，人文宜居。市政建设，日新月异。
蔬菜基地，大棚温室。瓜果飘香，味甘如饴。
美丽乡村，精准扶贫。共同致富，面貌一新。
治水兴华，高筑大坝。锁蛟安澜，水润万家。
新兴旅游，形胜为优。渐成产业，聚引人流。
未来展望，乘风破浪。华州再造，古郑重光。





华州新貌





华县撤县设区的历史变更

雷凤侠

2016年1月22日，渭南市华州区建设推进大会在华县召开，华县正式更名为“渭南市华州区”。

华县位于渭南市东部，总面积1139.5平方公里，总人口36.08万人。春秋时秦武公十一年（前687）在此设郑县，南北朝时西魏废帝三年（554）在此设华州，民国二年（1913）改华州为华县。千百年来，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滋养着这片沃土。改革开放以来，华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长足的发展，撤县设区，纳入渭南市的整体发展规划，成为华县经济进一步腾飞的需要，提上议事日程。

2011年在渭南市两会上申请撤县设区，之后华县为其做各项积极准备工作，并于当年7月将请示上报国务院。

2015年初，渭南市人民政府再次将这一工作提上日程，随后市县两级政府和民政部门多次与省民政厅进行衔接。同时，还按照要求，进一步完善撤县设区所需相关资料，并每周向市人民政府汇报工作进展情况。

2015年7月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理事、民政部中国地名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华林甫等专家，组成课题组到华县，对华县撤县设立渭南市“华州区”的命名进行论证。8月底，有关材料及华林甫教授为首的课题组的论证报告一并上报了国务院。

2015年10月13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渭南市部分行政区划调整的请示》，同意陕西省调整渭南市部分行政区划，撤销华县，设立渭南市华州区，以原华县的行政区域为华州区的行政区域。2015年10月28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向渭南市人民政府行文，同意撤销华县，设立渭南市华州区。



2016年1月22日正式挂牌。华县撤县设区工作，历时五年。

国务院批复华县撤县设区，是渭南推进城市化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成果。渭南城市发展模式的开启，对华县和渭南全面转型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在“县”变“区”的过程中，华县作为渭南城市融合发展的重要腹地，迎来了更多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机遇，使生产要素更加集中，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撤县设区也将使华县百姓分享到更多的发展成果。

华县撤县设区之后，华州成为渭南市中心城市“五大组团”的关键部分，加快渭华一体化发展，拉大华州区城市骨架势在必行。目前，310国道、渭华快速干道、渭华城际轻轨等项目正在积极建设中，届时，连通生态宜居的高塘、大明，空港物流的下庙、柳枝，产城融合的瓜坡、赤水和具有铝工业特色的金堆四大板块后，城乡相融相契，一个崭新的华州城市新区将屹立于关中平原东部。

渭南市华州区设立，结束了华县置县2000余年的历史，回归了华县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同时，也预示着37万华州人民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华州的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2016年1月22日，华县正式更名为华州区

华州的西南塬区

大美华州

殷小明



华州之区，吾之家乡。陕西东部，渭南辖地。东临华阴，西接渭南，南依秦岭，北靠渭水。位置优越，天府之称；人杰地灵，物华天宝；风景秀丽，环境优美；民风淳朴，文化深厚；水源丰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宜居宝地。

历史悠久，史载详细。西周封郑国，春秋置郑县，北朝设华州，民国称华县，今为华州区。郑氏之姓，祖籍之地，遍布海外。解放之后，镇乡分合，村组撤并。乙未羊年，镇村改革，撤县设区。丙申猴年，十三五初，建区挂牌。千余平方公里，九镇一街道办，三十七万人口。

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南高北低，中间夹槽，分区明显。五条支流，由南至北，入渭走黄。南山挺拔，背山向川，波状连绵；中部平原，稍有起伏，东西延伸；北部河滩，渭水冲积，沃野辽阔；外加台塬，沟壑交织，南北条带。六山一水三分田，山川塬滩交错。南北走，有上有下；东西走，有沟有岔。

自然美景，数不胜数。四季分明，冷暖交错；气候适宜，干湿显著。锦丽春色，绿柳花香，秀峰浮云，和风徐徐。艳阳夏日，逐浪清溪，绿野观景，凉

爽怡人。如诗秋景，满目苍翠，空山新雨，鸟鸣谷幽。入画冬月，银装素裹，雪尽叶稀，灵气悠佳。自然风光，无限美好；一年佳景，尽收眼底！



华州南部山区

资源丰富，驰名中外。钼金铜铅，储量极丰；钼业资源，亚洲第一。林麝青羊，珍禽猛兽；牛羊猪驴，量大质优。渭水穿越，淡水丰足。农业为主，工业为辅。粮食棉花、油料果蔬、奶畜林木，种类繁多；冶金建材、能源化工、生物医药，发展迅速。



物华天宝，宜商宜居。抓住机遇，全区目标：东西依靠，南部开发，北部提升，中间建城。旧貌变新，城区改造：东部扩进，重心南移，西部拓展，优化北面。山前有城，城中有水，水旁有绿，绿边有花；城市拥抱森林，森林驻足城市。郑西高铁，陇海铁路，西潼高速，西潼公路；铁路公路，高速低速，贯穿东西，交通便利。元君庙故地，新石器遗址，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少华山景区，陕西九寨沟，旅游避暑养生福地。金堆钼矿，中国钼业之都；华州皮影，国家非遗项目。百年咸林，陕东学府，马列传播，点燃火种；渭华起义，震惊全国，革命旧址，红色圣地。蔬菜基地，享誉三秦；华山白石，名牌石材。民间社火，游艺活动；华州秧歌，曲调悠扬。潜龙佛寺，历经千年，香火不断；桥上之桥，上下相接，奇姿俊美。少华晴岚，白崖瀑布，游人向往；柳枝香椿，毕家芦笋，深受青睐。

卧虎藏龙，人才辈出。桓公分封，古郑始兴。诗圣于此，三吏三别。子仪名将，再造唐室。元谅平乱，功德碑立。维桢好诗，明代才子。松轩办校，造福后代。钟键治学，科技精英。国桢就义，时代先锋。胡珽抗日，一代名将。自力驻苏，外交大使。林毅少将，献身航天。学复专数，科学院士。师统赴京，奥委会主席。克林留名，西北局书记。

大美华州

人稠物穰，繁荣昌盛。发展同向，干群同心。转型发展，追赶超越。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持续四轮驱动，优化四张名片。加快转型升级，推进项目工程，建设新型工业强区。突出景观创意，发展文化旅游，打造人文旅游美区。积极招商引资，做大蔬菜产业，定位休闲农业大区。加大投资力度，着力改善民生，打响绿色生态佳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开发，构建和谐文明乐区。忆往昔华县，政通人和，安居乐业，青山绿水蓝天碧野之古城；观今日华州，经济发展，人民富裕，生态园林实力人文之名城；看未来家乡，精神指引，乘势前进，富裕宜居和谐开放之新城！

华州大地，接纳百川，有容乃大，锦天绣地。华州文化，通古贯今，包罗万象，灿烂辉煌。华州人民，自强不息，胸怀博大，敢为人先。华州精神，厚重浓郁，气势磅礴，大气夺目。华州梦想，勇于创新，敢于实现，永载青史！

美哉华州，美哉家乡！



华州的北部平原



俯瞰渭河大坝

太阳照在渭河大坝上

雷凤侠

我的家乡在渭南市华州区，就是以前的华县。华州依山傍水，风物丰厚，景色宜人，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北乡沿渭河大坝一带，常发洪水，河水经常决堤，常淹没农田数千顷，甚或房舍人畜一时殆尽，灾害无穷。

据 1992 年版《华县志》记载，从唐朝元和八年（813）至公元 1987 年，渭河流域发生洪水灾害就达 134 次，是典型的洪水灾害多发区，从 1990 年 7 月至 2005 年 7 月，15 年间，渭河干支流有 9 年发生决口 30 多处，而最为惊险、受灾最严重的一次就是闻名全国的 2003 年 8 月的洪水。渭河大坝一带防洪治理问题是一直以来困扰华州区经济发展、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一大难题。而且每年省、市、县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

终于，党的光芒照在渭河大坝上。华州人民迎来了渭河大坝崭新的一页。

依据《陕西省渭河全线整治规划及实施方案》《渭南市渭河综合整治实施意见》和《关中水乡建设规划》，2011年3月31日，渭南市渭河综合整治工程全线开工。地方投资暂且不说，光省上就投入248亿元（陕西段），市上投入106亿元（渭南段）用于渭河大坝治理，经过五年浴血奋战，治渭工程建设者们用辛勤的汗水、青春年华和实际行动，筑成了一座座渭河安澜的不朽丰碑。如今，渭河这条华州人乃至陕西人的母亲河已真正变成一条安澜河、景观河、生态河。

如今的大坝，其顶部按照公路标准建造，已成为一条重要的交通线，从渭南出发，向东可途经华州区、华阴、潼关、大荔一带，向西可通往临潼、西安、宝鸡。如今的大坝，行在上面，倍感舒畅。你若驱车行驶在大坝上，听着音乐，和着小曲，赏着那美丽如画的渭河生态园，望着那葱郁茂盛、色彩层叠的景观林，瞅着那碧波荡漾的蓄滞洪区，远瞧着那鸥鹭成群的南山支流入渭口，惊叹着那气势恢宏的彩虹桥，那份雀跃，那份畅然，从心底油然而生。

美丽的大坝，宽阔、壮观、干净、畅通、风景宜人。走在坝上，那宽阔厚实的坝堤，平坦宽敞的柏油路面，那醒目的红字碑石标识；那气派现代的石堤桥、遇仙桥、赤水桥造型各异，设计独特，使你不由得感慨：党的好政策，真是暖人心啊！

如今的大坝，的确是一个渡时光、渡自己的休闲好去处。站在坝的北侧，举目望去，坝身似一个斜坡形的草原带，坝下是一片一望无垠的田野，与天际接壤，大有“天似苍穹，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之势；坝的南侧坡上，每逢春季，有些地方会长出一些珍贵野味，比如地软、白蒿、蒲公英、荠菜……坡下是一片片树林，再过去就是沿河一带的村庄，我知道的村名并不多，比如，魏三庄、薛史、小涨、詹刘村这些。如若在春天，择一晴朗的日子，约上几个好友，依身在坝坪上，沐浴着阳光，听着鸟鸣，闻着花香，漫无目的的闲聊着，有时，还会有一群牛羊“哞哞”“咩咩”地走过，那份自然，那份惬意，那份悠闲，那种诗一样的日子便就这样过了。

大坝最热闹的日子，要算夏季了。每到夏日的午后，太阳稍落，映着夕阳，沿河村民，华州的城里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走来的，有骑摩托车、



开三轮车来的，还有开私家车来的，赶趟似的，有赶来做买卖的，有吃夜市观光的，有散步吹坝风的，还有来买菜的，聚集在石堤河、方山河口处，那热闹劲儿绝不亚于城里的夜市。

那坝上的夜市，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有卖凉皮的、卖鱼鱼的、还有卖砂锅的、卖油糕的、卖烤包谷、卖烤鱿鱼的……很是馋人。那坝上的菜市，有西红柿、辣子、土豆、红薯、茄子……当然大部分都是当地农民种的寻常家菜，天然新鲜，价格低廉。坝上还有各种应季的水果，比如，苹果、梨子、桃等，绝大多数也是当地果农种的，很便宜，却很新鲜。

大坝的美，不光是它那宜人的景色，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人们带来了无比便利的交通，完美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堤固、洪畅、水清、岸绿。同时，渭河大堤还在推进渭南市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城乡统筹发展、加快建设陕西东大门的伟大实践中彰显着巨大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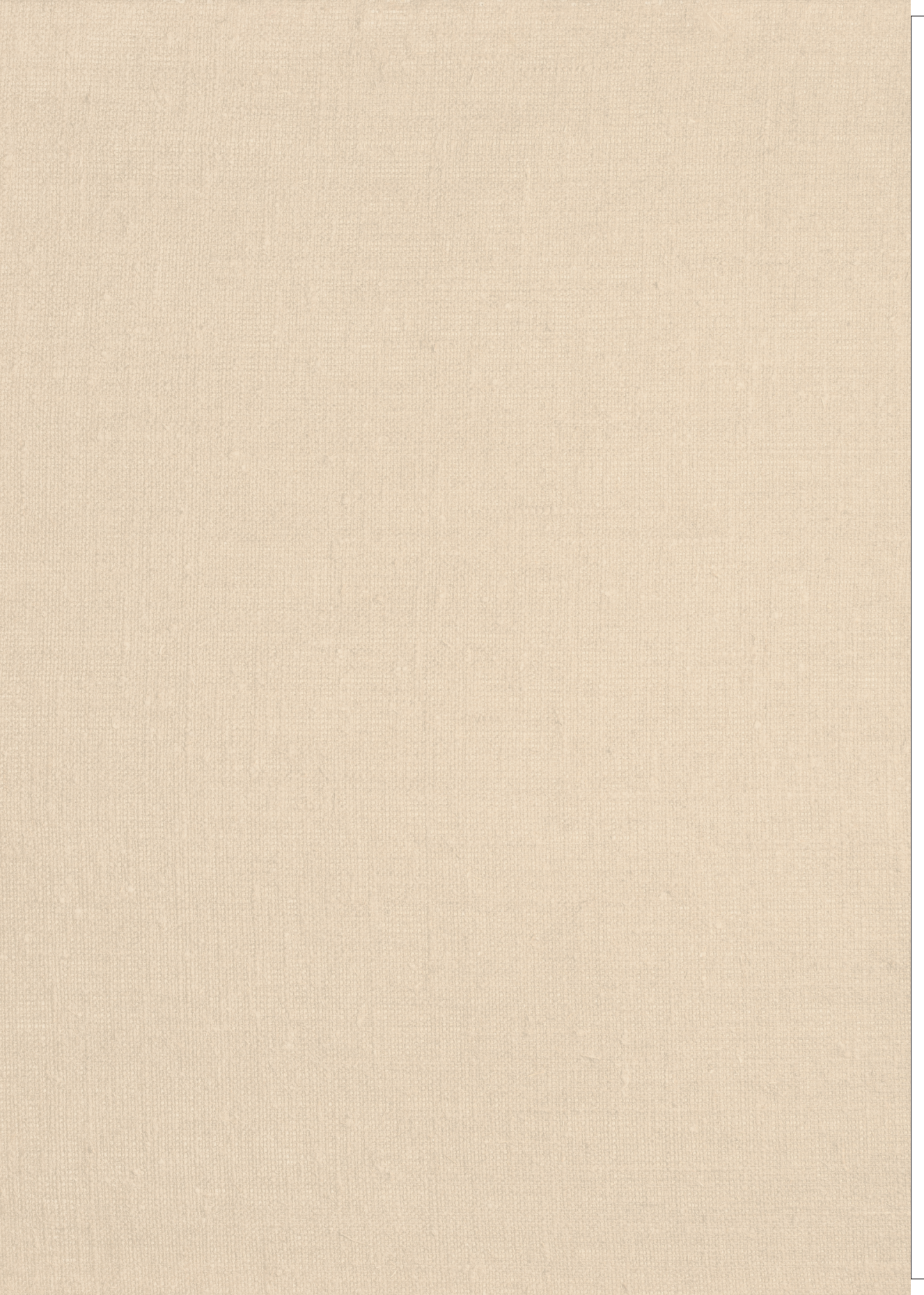
美丽的大坝，阳光普照的你，你的新，你的绿，你的开阔，你的壮观，你的现代，吸引着我们，走向你，亲近你。



渭河大坝坝顶



传奇传说



凤居山与鸾凤神鸟

秦 寂

柳枝镇上安村南有一寺庙，名永庆寺，永庆寺南是巍峨挺拔、柏树成林的风居山。风居山又称龙凤山，或称凤谷山，是华州东部名山。其山名虽然有多个，但都不离“风”字，因为其中蕴含着有关“风”的传说。

一则传说来自东汉的《三辅决录》一书，说的是东汉初年，有一个叫辛缮的文人，善于谶纬之学，对《春秋》也很有研究。他一直隐居在凤居山，汉光武帝得知了辛缮的大名，派人请他下山到朝中做官，被辛缮婉言谢绝了。有一天，一只大约五尺高的大鸟，飞降到辛缮屋前的一棵老槐树上，一连十天不肯离开。那鸟儿长得奇形怪状，鸡的脑袋、燕子的下巴、蛇的头颈、鱼的尾巴，它的羽毛五彩缤纷，但偏于青色。当地的太守马上将此事奏报了汉光武帝。汉光武帝得知这一消息后，深感诧异，立即下诏询问百官，这是什么鸟？朝中百官都是饱学之士，他们引经据典，纷纷说是只凤凰。只有太史令蔡衡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像凤凰的鸟共有五种，色彩偏红的是凤，偏青色的是鸾鸟，偏白色的是天鹅，另有两种偏黄，或偏紫。这只大鸟虽然像凤，但色彩偏青，一定是鸾鸟，决非凤鸟。”光武帝听了，觉得蔡衡讲得很有道理。众大臣当然也随声附和，赞同了蔡衡的说法。鸾鸟虽然只是准凤凰、亚凤凰，但毕竟也是只吉祥之鸟，它出现在辛缮的家门前，足以说明辛缮的品德高尚、学问渊博。朝中的大官都感到自己不如辛缮，地位最高的三公，即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都主动提出辞职，让位给辛缮。辛缮不愿意放弃隐居，不愿卷入朝廷的权力纷争之中，于是他继续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另一则传说来自明朝的《偃曝余谈》一书，说的是唐朝开元年间，有一只



凤凰追逐两条龙，至凤居山，二龙坠地，化作两道青泉，凤凰怒愤而死。有和尚以石匣收其尸骨葬埋，在上面建塔覆盖。据说到明朝景泰年间，乡民因筑城取塔砖，发现石匣，打开石匣，见有凤胫骨长二尺，围可六寸，股骨长一尺五寸，围如胫骨，其骨晶莹如玉。

这两则传说中，无论是鸾是凤，都是吉祥神鸟，凤居山的山名也由此而来，其中寄托着人们的美好期盼。



凤居山

赤水河与周处除三害

翟羽佳

明《华州志》记载的赤水河，在今天的渭南市华州区西境与临渭区交界处，为渭河支流。赤水河为何名为赤水？据旧志载：“赤水上原，有周处之居。处尝斩蛟，以赤此水。”传说，周处除三害，就是在这里斩杀恶蛟，蛟的血染红了整条河，此河便被人称为赤水。赤水河南边有山，名为倒兽山（在今渭南临渭区），周处在此处射杀白额虎，当地人在峪口建庙来纪念此事。此外，胡村有周处祠，尹村有崇灵观，观中有元大夫王文博撰写之碑，颂扬周处为晋将之贤。《华州志》记载，“秦人思而立祠，不言射兽斩蛟之事。盖疑似之事，莫可遐考矣。”明朝华州志作者张光孝，认为此事不可考，只可作为当地的地名传说。



民间故事《周处除三害》

周处除三害这个典故最早出自南北朝时期刘义庆所编《世说新语》，《世说新语》并非信史，是小说家言。而《晋书》的作者未经甄别就将其载入史册，所以周处除三害这件事本身是传说的可能性极大。再者，周处是义兴阳羨人（今

江苏省宜兴市），他为乡里除三害，也不会跑到千里之外的关中地区。

笔者认为，关于赤水河地区流传着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理解，其一，元康六年（296）关中的羌、氐族起兵反晋，推齐万年为帝。一时关中地区又卷入战乱之中，西晋朝廷下诏任命周处为建威将军，与振威将军卢播都隶属于安西将军夏侯骏，征讨齐万年。元康七年（297）正月，齐万年屯驻梁山（今陕西乾县西北），拥有部众七万人。梁王司马彤，安西将军夏侯骏不听周处劝告，逼其出征，周处虽斩杀俘获大批齐万年军，但因无援兵相助，粮草尽绝，最终战死沙场。而赤水河地区与周处相关的传说故事，很可能是当地人民感念周处为平定战祸做出的贡献，而对其相关事迹的赞颂，之后又口口相传，经过加工渲染，讹传为在此发生。

其二，周处除三害的传说有着极大的劝诫教育含义。周处年少为害乡里，其后幡然悔悟，改过自新，最终成为国家的忠良之臣。这也是当地人民希望以此故事的流传来教导子孙后代，学习周处知错就改，最终成为人才，报效国家。对于希望借用这层教育含义的人们来说，至于周处除三害故事的真假，和此事的发生地究竟在不在此，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作者简介

翟羽佳，女，1994年出生，现于渭南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审科工作。

唐代华州“人鬼情未了”的传奇

闫广勤

美国电影《人鬼情未了》描述了一个凄美的人鬼之间的爱情故事。其实，早在中国的唐朝时期，也有一个类似的人鬼相恋的传奇，而且就发生在华州。

唐人李景亮在传奇小说《李章武》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唐德宗贞元三年（787），文人李章武从长安（今西安）到华州访好友崔信，偶然在市场北街见一妇人很美，于是找借口辞别崔信，偷偷在美人家租了房子住下。主人姓王，美人是其儿媳。王氏妇与李章武一拍即合，由爱慕到私通，两心相谐，情好弥切。一个多月后，李章武有要事必须返回长安，二人不得不分离。告别时，李章武送给王氏妇两丈多绣着交颈鸳鸯的丝绸（鸳鸯绮），并赠诗一首：

鸳鸯绮，知结几千丝。

别后寻交颈，应伤未别时。

王氏妇回赠一个白玉指环，也赋诗曰：

捻指环，相思见环重相忆。

愿君永持玩，循环无终极。

二人依依不舍，洒泪而别。一晃八九年，二人再无联系。贞元十一年（795），李章武从长安到下邽县（在今渭南市临渭区北部）访友人张元宗，忽然想起旧好王氏妇。下邽距华州不远，遂暂别张家，驱车南下渡过渭河，黄昏时到了华州，不想王氏妇家中阒无人迹。适逢东邻杨六娘，杨六娘告诉李章武，王氏妇死去两年了，她的公公已舍弃家产外出游历。杨六娘又说：“我嫁到杨家不过五年，与王氏妇交好，她告诉我：‘李十八郎（指李章武），曾经住在我家，初见之后，不觉失身于他，以后与他私通，确实蒙受他的欢心喜爱，现在和他分别多年，



怀念日深，有时竟整天吃不下饭，整夜睡不着觉。’过了二三年，她卧病不起。临死，又拜托我说：‘承蒙李郎的厚爱，心常感念，思久成疾，自己料想不能好了。万一他回来，请你向他表明我在九泉之下的怨恨，千古离别的感叹。要他留在这里，希望我的神魂与他相会在冥冥之中。’”李章武于是留宿在王氏妇房中，并置办酒食祭祀。至二更时，房子北角悉窣有声，如有人形，冉冉而至，果是王氏妇，二人相拥携手，若平生之欢。五更时，王氏妇下床呜咽，向李章武赠诗：

河汉已倾斜，神魂欲超越。



唐女题诗图

唐代华州“人鬼情未了”的传奇

愿郎更回抱，终天从此诀。

李章武也悲不自禁，答诗一首：

分从幽显隔，岂谓有佳期。

宁辞重重别，所叹去何之。

二人相扶悲泣，王氏妇再赠诗：

昔辞怀后会，今别便终天。

新悲与旧恨，千古闭穷泉。

李章武也再回一首答诗：

后期杳无约，前恨已相寻。

别路无行信，何因得寄心。

叙别后，王氏妇向房的西北角走了几步，回头抹着眼泪对李章武说：“李郎，不要忘了我这个泉下之人。”哽咽伫立，依依不舍，见天就要亮了，乃急促向墙角走去，遂不复见。此后，生死两茫茫，李章武再未会过王氏妇，只有思念绵绵无绝期。

这个唐代华州“人鬼情未了”的传奇故事看起来荒诞不经，其实反映了人类情感世界中的某些真实，或是“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的遗恨，或是痴情女子为爱而死的悲愤，或是情侣之间生离死别的缠绵……而且这一段凄婉动人的唐代传奇，比文学名著《牡丹亭》（明朝）、《红楼梦》（清朝），更早体现了爱情永恒的主题。西周时的洽川（在渭南市合阳县）诞生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名句，唐代华州有一段“人鬼情未了”的传奇，在渭南市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不知还有多少爱情故事有待我们去发掘。



陈抟老祖在华州的传说

闫广勤



陈抟

陈抟是五代宋初道士，道行颇深，宋太宗赐号希夷先生，人又称“陈抟老祖”。他曾在华山隐居，在华州也有许多遗迹及传说。

《宋史·陈抟传》记他先在武当山隐居，后“移居华山云台观，又止少华石室，每寝处多百余日不起”。今少华峰顶现尚存石洞、石炕，可能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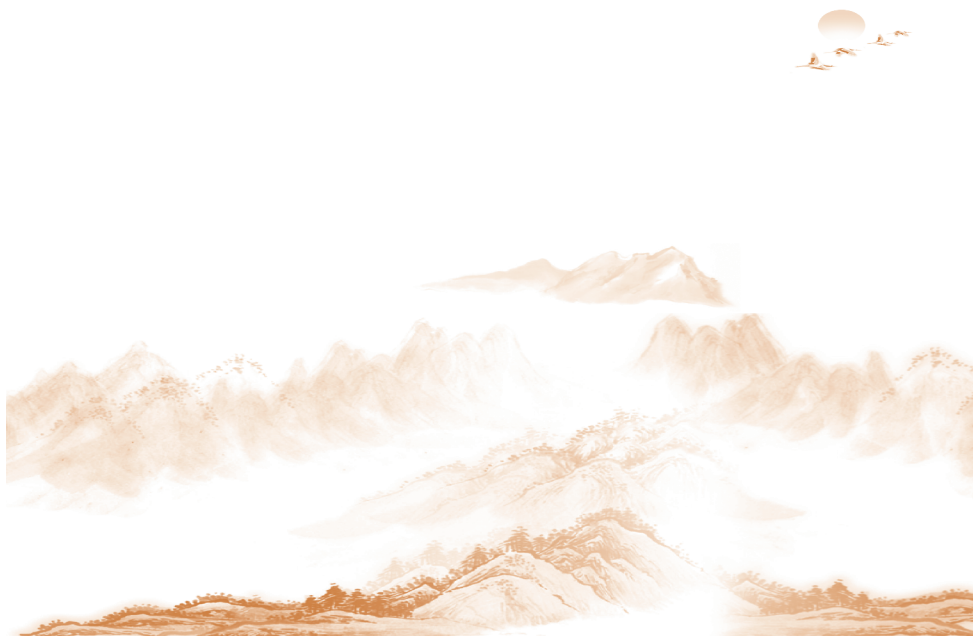
是所谓“少华石室”。他深修睡功之法，人称“睡仙”。宋朝诗人胡仲弓写诗记他：“形睡神非睡，心闲身亦闲。是非都不管，高卧华州山。”

华州有从桥峪发源流入渭河的遇仙河、遇仙河上有遇仙桥（在今赤水镇境内）、遇仙桥附近有遇仙村。据说这“遇仙”二字也与陈抟老祖有关。华州民间传说，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发迹前在华州流落，于此河桥上遇见道人陈抟。陈抟知赵匡胤非同常人，日后必当大有作为，遂赠送兵书，指点迷津，并鼓励其发奋努力，建功立业。赵匡胤后来果然“一棒打遍天下四百军州”，当上了皇帝。这一段“豪杰遇仙人”的佳话，就在华州流传开来，人们还将此河命名为“遇仙河”，将此桥叫作“遇仙桥”，再衍生出“遇仙里”“遇仙村”等地名。

华州还有一则民间故事说：五代时的华州东关外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石

陈抟老祖在华州的传说

桥，陈抟老祖一天骑着毛驴过桥，见桥上一个逃难的中年汉子担着一付箩筐，箩筐内有两个小儿，陈抟在驴背上仔细端详着箩筐里的两个小男孩，他看见箩筐内哪里是两个小儿，分明是两盘龙！再看上去，又分别是金銮殿上两个气宇轩昂的帝王。他就拍掌笑道：“天下太平了，天下太平了！”谁知这一举动惊动了胯下毛驴，那畜牲向前一跃，把老神仙摔在了石板桥上。那逃难的中年汉子，把陈抟扶起。陈抟从行囊中取出几本兵书和一张天下归势图，递给逃难汉子，然后，拍了拍身上尘土，爬上毛驴而去。原来这中年汉子箩筐里挑的两个男孩，正是日后平了五代十国、统一了万里江山、开创了三百年大宋基业的赵氏双雄——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匡义兄弟二人。华州人为纪念这一往事，就把东关外这一小河叫太平河，石桥叫做太平桥，还特意立一石碑：“陈希夷先生坠驴处”。此碑民国时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太平河改道，太平桥不存，碑也不知去向。



少华山崩的历史和山塌金斗王的传说

秦 寂

少华山包括三个巍峨雄险的山峰。中峰称少华峰，又名独秀峰或玉女峰，即现在的少华山。西峰即五龙山，又名马岭山。东峰又名阜头峰。北宋熙宁五年（1072），阜头峰崩裂，其崩山遗址今称半截山（在今柳枝镇张桥村），又称复成山，东峰崩下的土石东西2.5公里，南北长5公里。为什么阜头峰会崩裂呢？在当地人民中有一个名为“山塌金斗王”的传说。

据说阜头峰崩裂之前，山下住一个叫王十万的财主，他为富不仁，在当地



20 世纪 90 年代的半截山

欺男霸女，巧取豪夺，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财主。为了夸富斗宝，他将家藏黄金打制成大小两个金斗，对外号称“金斗王”。大斗进小斗出，从中剥削穷人血汗。

有一年，关中遇到百年大旱，农田里的庄稼眼看都要枯死，四乡八社的农民，实在没办法，只得联名向金斗王提议：聘请华山的道士设坛求神赐雨，让神灵悯农，普降甘霖解除旱象。众人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他最终提出：“费用按户均摊；拿不出的，由他垫付，待秋后加倍偿还。”众人只能默认。他就趁机设局，大捞了一笔。

后来在大家请来的一位华山道士祈雨后，真的下了场透雨，关中大旱有所缓解。可是，金斗王欠华山道士设坛做道场的香火钱，他却迟迟不想给结算。每次道士去要，他不是搪塞，就是推诿。后来，不但不给茶饭招待，还连一句好话也没有了。再后来，要么命家丁将道士赶出大门，要么纵恶犬将道士咬伤轰走。百姓看见，也只是唉声叹气，护送道士回归华山了事。

金斗王家中，有位眉清目秀的丫鬟，名叫凤姑，也是因葬父欠债，被金斗王掠去为奴的。她对华山道士非常同情，每次道士受了委屈，她背着主人，给道士端茶倒水，还偷着送馍送饭。华山道士不无感慨地想：这府中，就剩下这么一个好人了。

眼看到了九月，道士讨账无果，还被恶狗咬伤。凤姑扶道士到柴房后，为他包扎好伤口，将他送出大门。华山道士走了几步，又回头叫住凤姑，低声交代：“你每天黎明起来扫地，但见大门两旁的石狮子眼睛红了，说明大难将至，你赶快往东逃跑！来华山找我。”凤姑反问：“为啥呀？”道士说：“天机不可泄露，尽管照办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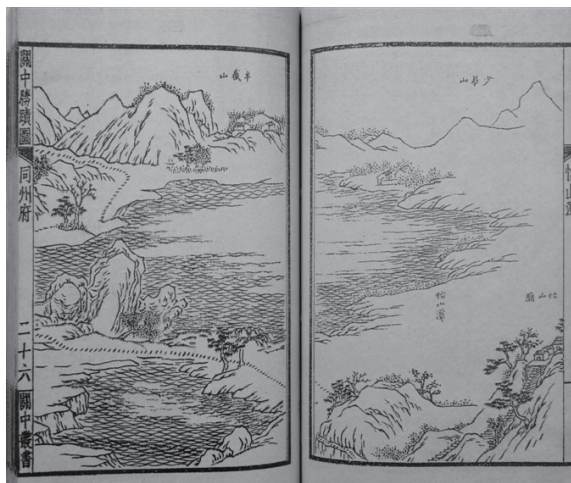
从此凤姑每天照常洒扫，开大门先看石狮子，没有变化才开始劳作。九月初九那天，东方刚亮，凤姑起床披着衣服，拿起扫帚，开门一看，不知谁用红纸贴住了石狮子眼睛。这不也算红了么？她想到华山道士的叮嘱，赶忙扔了扫帚，就向东跑。

凤姑一口气跑了五里，身后飞沙走石，大雨滂沱，她这才扣好衣服上的一个钮子。这地方便被后世谐音流传成了“柳枝”，就是今天华州区最东边的柳



枝镇。凤姑又往东跑了六七里，忽然传来轰隆一声巨响，气浪将她推了一个趔趄。她抬头回望，少华山东烟雾混沌，阜头峰倒了。她这才知道：原来是地震山崩了。这地方以后就叫“抬头”，即今天华阴市西部的抬头村。凤姑再往东跑了几里，边跑边想到灾难惨象，停下来面西嚎啕大哭。从此这里便叫作“哭水”，后世谐传为“敷水”，即华阴市西部的敷水镇。凤姑有幸逃过一劫后，果真按道士的嘱咐上华山修道去了。

后世的老百姓，都说金斗王作恶多端，言语欺天，玉皇大帝派巨灵大仙下凡，扳倒了阜头峰，把个金斗王全家活埋了，留下了当今的半截山。



清朝《关中胜迹图志》中的半截山图